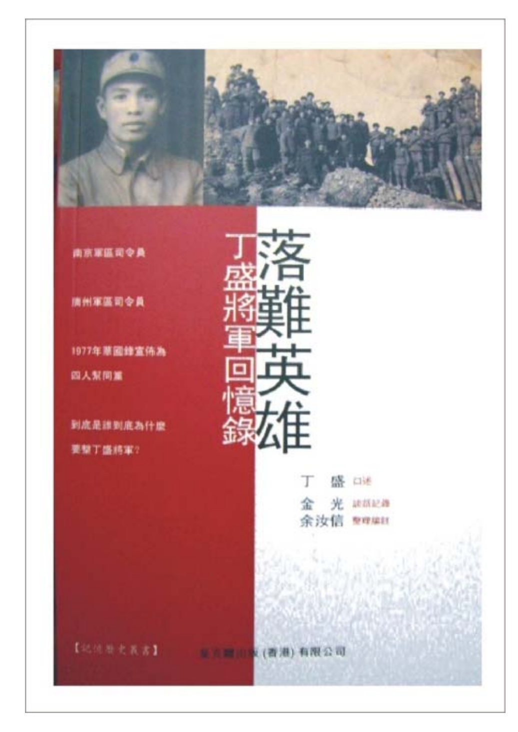


一部可歌可泣的共和国将军落难史。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民谓落难英雄。从十四岁的“红小鬼”到大军区司令，他为共产党打天下冲锋陷阵、九死一生，立下丰功伟绩。“马背英雄”不识官场险恶，一场飞来横祸令将军沦为阶下囚。捉襟见肘，居无定所，右眼失明，身罹重病，他一次次踏上漫漫上诉路，不求高官厚禄，唯求还其清白。九十老人饱尝人间冷暖，终落得含冤去世，死不瞑目。这就是这部《丁盛将军回忆录》告诉你的真实经历、悲剧故事。

落難英雄

丁盛將軍回憶錄

丁盛 口述

金 光 谈话记录

余汝信 整理编注

Thinker Publishing Ltd

HONG K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丁盛口述，金光谈话记录 余汝信整理编注，—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6

ISBN 978-988-994556-5

I.落… II.①丁…②金…③余… III.中国当代历史 IV.B80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1508 号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作　　者 丁　盛

谈话记录 金　光

整理编注 余汝信

出　　版 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湾丰业街 14 号启力工业中心 B 座 11 楼 2 室）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988-994556-5

定　　价 39.00 元



丁盛将军

（1913-1999）

目录

第一章 跟红军走

一、贫困的童年

我祖上是江西省于都县新陂乡水排村人[①]。1913 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家中兄弟姐妹七

人，四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最小，全家务农。

我记得我的童年时期还是可以的，不算太困难。我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我非常好。我很怀念我的母亲。后来当我大一点的时候，到了一二、三岁，我们家就比较困难，比较穷了，越来越穷。那时候，吃饭都困难。江西这个地方，10 月份之后，地瓜（红薯）就收起来了，从 10 月份开始，11 月份、12 月份、1 月份，这几个月，我们基本上是吃地瓜管饱。我们那个地方冬天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干，大家在家里闲着，所以冬天都吃地瓜。我是家里最小的，早起，家里每人一碗蒸地瓜。这种情况之下，我的母亲就会单独给我蒸一碗饭。

我母亲卖鸡蛋。有两只老母鸡，生了鸡蛋，一个鸡蛋两个铜板，时不时地给我三、五个铜板，买个零嘴，买个糖。我母亲对我非常好，她的为人对我影响也很深。勤俭度日之外，她老人家还有一手做果脯和年果的手艺。每逢村里办喜事或办年货，乡亲们都请她去帮忙，把梨、柚子等水果用刀雕成花，然后用糖浸泡、晒干，办事或过节用。乡亲们酬谢她的果子，带回来给我吃。我每次放牛回家，母亲都给我准备好了吃的。她为人敦厚善良，从不与人吵架。1951 年驻军广东时，我寄回家的罐头，她用勺子分给村里的乡亲们都尝一尝。1958 年，在朝鲜战场接到她老人家去世的噩耗，我十分悲痛！

那时家庭生活困难，我的二哥生活不下去了，就去当了和尚。三哥、四哥出外打短工。他们成了家，都分开了，房子也很困难，两个人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住。他们也都是种田，没有别的什么收入。有时候下雨，在河里、田里搞到几条小鱼，他们都会把我叫去，或者端一点，送一点给我，所以哥哥嫂子对我非常好。我对他们也是很留恋，很感激的。他们对我的父母也都很好，但就是穷、困难。

到了十四、五岁，家庭更困难。这时候和我的童年就不一样了。我原来和父母住一个房，这个房子很小，放两张床就拐不过弯了。我在 1994 年回去过一趟，带着我的老伴、孩子，去看看我原来的住房。白天屋里都看不见，不要说晚上了。白天进去都要电灯，面积很小，人进去拐不过弯来。

瓦房倒是瓦房。历史上我们这个家庭是不错的，可能还比较富裕，搞不清楚是多少代了。我们的院子是一个房子一家，住了七、八家，我们的这一个房子是隔开的，前面是我的四哥、四嫂他们住。后面是我和父母我们仨住。一个房间隔成两个，所以就很小很小。我们这个房子和牛栏挨在一起。我们小孩子没地方睡觉，晚上就挤在一起。生活过得很困难，吃饭也困难。青黄不接，三、四月份，喝稀饭，吃不饱。冬天穿两件单衣，很困难。环境恶劣，家里睡觉的房间里都有一个尿桶，小便都是在房子里边。到了冬天，一进去房子里，跳蚤就像蚂蚁上树一样，呼呼地往腿上钻。记忆犹新的是夏天蚊子多，嗡嗡直叫，扑脸，臭虫也多。

穷啊，也没办法解决，这样我就产生了不愿在家里的想法。怎么办呢？那时我十五、六岁，也出去做过工。给有钱人发排砍树，顺着河放下来，我们几个人就捞起来，对在河边。因为年纪小没力气，干活达不到老板的要求，他就不要我们干了。

我们村子旁边有一条河。我们一群放牛娃，夏天几乎整天就在水里泡。所以我们放牛并不太累，热了河里面泡；泡了起来，男男女女小孩子在树底下一起玩。我们家乡是不错的，我也很留恋，就是生活太困难，因为穷是整个地区的问题，不单是哪一家的问题。

①于都 旧称雩都，1957 年改现名。丁家后来迁移到本县罗江乡上溪村居住。

二、少年红军

1929年，我十六岁了。这一年，朱德、毛泽东的红军从井冈山下来了，路过我们那里，从江西又到了福建，转来转去打游击。1929年以后，红军在江西、福建一带发展很快。到了1930年，天气很热，快收谷子的时候，陈毅老总的一支部队到我们家门口，是红一纵队[①]。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部队，只知道是红军就行了。我们有六个小孩子平时在一起玩，放牛，觉得在家里太穷太苦太累，就想去当兵，脱离这个环境，找个地方有饭吃。打土豪我们都是看见了的，红军来了，分地主的浮财，杀猪宰羊的。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当兵！

就这样，我们六个人，红军过来时就跟着走了。当时各家的父母亲人都是不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当兵，什么革命思想，我是想不起来有，就是为了有饭吃。看到打土豪，杀猪有肉吃，就行了，就这样当的兵。是在陈毅的部队，红军一纵队特务连。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参军后，各家的父母都很担心。我的母亲多次到村外的山坡上去眺望，想我回家。

我们六个当了兵，跟着红军走，愈走愈远。走了三、四天，从恶魔家乡走到赣州。现在看来很小的事，从我们那儿到赣州50公里，那时候转来转去，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因为我们小时候没出过门，就在本村里，没出过20里地。连我们县城20多里地，我们也没有去过，顶多就是10里地。跟着红军转转转，也不知道转到哪儿去了，也不知有多远，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个把礼拜之后，红军打赣州。打一下，没打开，国民党部队追出来了，追得我们很远。这样一追之后，我们六个人有两个人就不见了，回家去了，我们四个人没有跑，我们不跑。

这样越走越远，走到了赣南地区的信丰，后来由信丰转到了江西、湖南交界的上犹、崇义。对这个地区，国民党正规军是不出动的，他们的部队顾不过来，因为赣州是个中心区，所以国民党正规军就在赣州。县里边，其他地方就是地主武装，保安团这些东西。

六、七月份，我们在上犹、崇义一带，待了大概有三、四个月。这三、四个月，我感觉不错，比在家里要好得多。仗也没怎么打，要打也是和保安团打，谁也打不过谁，谁也消灭不了谁，也没什么伤亡，你来我跑，我来你跑，打来打去。这样，我们四个人也稳定下来了。

1930年8月以后，朱毛红军主力部队打开了江西的吉安，随即把我们这个纵队调去吉安。到了吉安，我第一次看见电灯。我看见电灯泡这样小，晚上忽地就亮了。也是在吉安，第一次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那时也不知飞机的厉害，感觉很有意思，跑出去看。从吉安出发一天后，又返回，这时候国民党要进攻我们了。

我们从吉安向红军最老的根据地东固走的路上，就看见死尸。什么人呢？当时说是“AB团”[②]。路上陆陆续续就看见一些死尸，也没有问，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实在可怕。往东固一直走到黄陂，在河边上住下了。下午挖深坑，早上起来，连队排以上干部一下子不见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说“AB团”是国民党派来的反革命。把你抓起来，搞逼供信，互相咬，咬到你就跑不掉。当时也没有什么根据，更没有什么法律，咬着你就杀；动摇逃跑的，抓回来也杀。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不过，就这么简单。团长、师长都被杀了，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那时我还小，是个战士，别人也不怎么认识我，也没人咬我。排以上干部在劫难逃啊，杀了很多人，部队减员很多。那时我在特务连当战士，我们住在河边上，经常看到一溜一溜地，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押过了河对面，就挖一个个的坑，杀了就下去埋了，很惨啊！用梭镖戳，我们都看到的，就在河对面，河又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还痛心，还难过。哪怕和敌人拼，死了也认了，却都死在自己人手里！

到了1930年11月初，整个红军整编，几个纵队变成一个师，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当时师长是粟裕。我们这个纵队改为一九二团。改编之后，就把我调到团里当通讯员。当时就在这种红色恐怖下，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这时，同来的三位伙伴已经不知去向。直到解放后回家，才知道早已牺牲了。也不知何年何日在何处牺牲的。

①红一纵队 1929 年 1 月，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地区出击。3 月中旬，在福建长汀进行改编。第一纵队由原第二十八团大部编成，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

②“AB 团”即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 反赤团”，，为北伐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数月后即解散。1930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以缴获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一部分材料，误判“AB 团”已大量打入中共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苏区内，派李韶九带部队到当时江西省行委所在地福田抓人，导致红二十军哗变，此即“福田事变”。其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成代表团直接处理事变，逮捕事变领导人，包围全部排以上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此后，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杀“AB 团”7 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200 人，“改组派”2 万多人。

三、在反“围剿”中成长

1930 年 12 月底，整个形势变了。当时红军从吉安北上，准备再攻南昌、九江，打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结果没打开长沙，回到江西。

1930 年底到 1931 年初，第一次反“围剿”。蒋介石命令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国民党 10 万人进攻中央苏区。红军总共才四万人，在朱德、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在龙岗打歼灭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活捉了张辉瓒。这是红军的第一次歼灭战，缴获了敌人很多武器，有机关枪，有追击炮。在这之前，红军还没有炮，装备很简陋。一看到缴了这么多武器，高高兴兴。每个人都扛好几条枪，抬着跑，我也扛了几条枪。战斗胜利的喜悦和丰收，并没有使我想到危险。

龙岗战斗之后，打东韶，这次打的时间长了一点。我那时是通讯员，才十七岁，跑步快。从这山跑到那山送信，穿过田陇，子弹在耳朵边“呼呼”地叫。东韶一战，我们又胜利了，打败了敌人的一个师。这次反“围剿”结束后，苏区内部打土围子，把根据地搞好。部队休整，开始走上正规了，出操、上课、讲革命道理。在这以前，除了打仗，就是休息，没事到田里捉泥鳅，捡田螺，到河沟里捞鱼，到山上去挖竹笋，搞野菜。因为山沟里没有土豪可打，只能这样补充给养。

1931 年 4 月至 5 月，敌人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出兵 20 万，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敌人引进对我有利的苏区内。红一方面军主力以急行军将敌二十八师包围在东固的观音崖、九寸岭，经一昼夜激战，将敌消灭。我那时送信，山高路远，只知道部队的方向，具体位置全凭自己判断。我那时十八岁，机灵的很。有一次送信，累得不行，晚上没有归队，就在山沟里整整睡了一夜。可这一睡，部队开拔了，第二天我好一阵找，终于找到了部队。第二次反“围剿”，我们行军速度和反击都很快。从江西到福建，著名的“横扫七百里”战斗，历时半个月，打土豪，分浮财，部队很快解决了供给问题。中央苏区扩大到了福建，人口二、三百万，很快就粉碎了敌人二次“围剿”。

7 至 8 月份，蒋介石又开始第三次“围剿”。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30 万人进攻我们。红军主力迅速从福建回师江西，插入宁都、兴国一带。这时我正发痢疾，既得不到休息，也没有药治疗，发烧就喝凉水，照样行军。在兴国和敌人打了一仗，那时团首长命令我扛军旗——也就是团旗。我扛着团旗走在前面，跑得快，团长很高兴。我和团长首当其冲，进攻敌人阵地，全团跟进，消灭了不少敌人，打了胜仗。

战后整编，我们这个师编散了，我们团被分编到十一师、十二师去。我被编到十一师，让我到师部打旗。打什么旗呢？指挥旗！我估计是我们团长向十一师师长推荐了：这个人很好。打良村时，我一个人打着旗跟着团长。不然的话，别人都编到部队里去了，而我这个班就我一个人到师里打旗。这个变化很重要，假使不是到师里当通讯兵，去打旗，在以后的战斗中不知道会怎么样。到师里那就不一样。那时候的战斗是非常频繁的，经常打仗，一般情况下，步兵伤亡是很大的。所以后来我们红军的许多指挥员，都是通讯兵、司号员、文书出身的，真正步兵起来的也有。但通讯兵比较灵活，比较之下，伤亡就少一点。到师里之后，我们在兴国高兴圩，和十九路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惨。十九路军，广东部队，后来参加过上海抗战。这个部队很正规，善战，加之装备精良，有刺刀、手榴弹、机关枪、炮。他们在镇子里，我们在山上，攻了两天也没有攻下来。军部通讯员来传达命令："你们攻不下来就要杀你们的头！"命令就这样简单明了。杨得志是机枪连长[①]，梁兴初也在[②]，部队打的相当疲劳，伤亡大。师长曾士峨[③]率领全师人马，包括师机关人员在内，向敌人冲杀。他对我说："你呀，把旗子插在这里，不要动！"后来，师长牺牲了，大部分同志阵亡了，也没有打下来，只好撤走。

第三次"围剿"粉碎之后，我们这个师也撤编了，取消了。因为高兴圩战斗打得艰苦，部队伤亡很大。这以后，红军很长时间没有打仗，住下来，训练上课，有时也出以下操。第三次反"围剿"，部队没有刺刀，也没有手榴弹。这时候，部队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训练比较正规一点了。高兴圩没有打下来，原因是敌人有刺刀、有手榴弹，而我们没有，人去冲，他不动，你没办法。我自己这时又生了病，全身长脓疮，脸上、手脚上都流脓。没有任何药，每天去池塘里洗，就自然痊愈了。十一师取消了，我被调到四军政治部，还是通讯员。这时有个战友，叫吴兴。我 80 年代在江西干休所看到过他，后来去世了。到四军政治部，还有一个战友，现在还在世，就是当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王东保[④]。他当时是勤务员，我是通讯员。

①杨得志 湖南醴陵人。1928 年参加工农革命军。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红十一师师部特务连连长。

②梁兴初 江西吉水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机枪连政委。

③曾士峨 湖南益阳人。1927 年 9 月随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加秋收暴动。时任红四军第十一部师长。1931 年 9 月 8 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牺牲，年仅 27 岁。

四、在王稼祥身边

到了 1931 年底 1932 年初，江西有了很大的变化。1931 年 11 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2 月，国民党二十六军在宁都暴动，成立红五军团。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到各军去调人，1932 年初，我就从四军政治部调到总政治部，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是通讯员，所以，我这个通讯员是从 1931 年当起，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1932 年调到总政治部，驻瑞金。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①]，我经常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送信。1932 年，我当了通讯班长。在这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并转了党。

王稼祥是总政治部的主任，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开始，我和主任联系不多。后来打赣州，机关转移，行军每到一个宿营地，就帮助王稼祥的勤务员搞房子，卸门板，打扫卫生。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就只有一个勤务员，没有警卫员，更没有警卫排。总政治部就只有一个通讯排，送信是它，警卫也是它。我从出发到打赣州，打完之后往福建走。一路之上，又当勤务员，又当警卫员，在王稼祥身边就这样工作。

后来又打了广东的水口，走路行军，回到江西宁都，召开宁都会议[②]。我当时是通讯员，不知道会议内容，70 年代周总理给我加过这些事情。宁都会议完了，第四次“围剿”来了，当时是 1933 年 8、9 月份，天气都有点凉了。机关跟着战斗部队走，第一次就消灭敌人两个师，占领了黎川，是江西比较大的一个县。有一次，王稼祥主任散步时，我跟着他。他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江西人。”当时部队里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江西，一部分是湖南。他说：“你还是江西老表嘛，小老表啦。”这以后，他就慢慢跟我们说些话。以前，他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话。1933 年黎川之后，他就了解我多一些了。他出去时，无形之中，我们这个排里就我跟着他。

1933 年第四次反“围剿”，我当了班长。当时总政治部驻在宜黄县的一个村子，叫固岗。有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我们机关，那时防控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往地里走，乱跑。这次轰炸，王稼祥负伤，弹片打进肚子取不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取出来。王稼祥负伤之后，要从前方护送到后方。我带了一个班，护送王稼祥到瑞金。当时还有些什么人呢？有我这个通讯班；有个医生叫陈志方[③]，很有名气，在广州当过副市长，后来当了大使；还有一个马夫，带一匹骡子；一个管理兵。就这么几个人，回到瑞金。王稼祥伤很重，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好一些，可以起来了，搬个凳子在门口坐一坐。有一次，他做在门口把我叫去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没有写信回去？不通信问问？”“没有，我不会写字，写不了信。”“你们还很年轻，很小，要学学文化。”“我们什么也没有啊！”我当时既没有纸，也没有笔。“这个没有关系，你们拿个棍在地下划嘛。找个识字的人教你们几个字，你们写，不就行了吗？我们在苏联的时候也很困难，吃的是黑面包，也要学习。你们还年轻，要学文化。”所以，是王稼祥第一个要我学文化。我们当时也没有事，就大家划哟，带一个班乱划。所以我后来认识几个字，写得不好。后来到延安，学文化，写字。现在我会写，是在延安练的。这样，我们学写字，学文化，慢慢就认得几个字了。

第二件事，因为王稼祥主任也没有钱，也很困难。有一次下雨，我们江西那地方，一下雨，小鲫鱼，那些两指大的鲫鱼会从小水湾、水田里跑出来。我们就会抓鱼，雨一停，把上下一堵，把水搞干净，鲫鱼就可以抓起来。抓来后，我们就搞来吃。我拿到伙房，叫炊事班做，没有油炸，就搞点水煮，煮一碗给王主任吃。他问我们勤务员：“这个鱼是哪儿来的？”勤务员说“是班长拿来的。”王稼祥把我叫去：“小老表，你这鱼哪儿来的？”“我在小沟里面捉来的。”“你怎么能够捉得到啊？”“这个很简单，我们当老百姓，这是我们的里手。我们很会抓这种小鲫鱼的，把水一堵，把水搞干净，就把鱼抓起来了。”那时我不懂这叫“竭泽而渔”，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成语的。“噢，是这样来的。你可不能够要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抓老百姓的鱼。你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我知道，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他点点头，很高兴。

①王稼祥 安徽泾县人。1925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由团转党。1931 年 4 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 年 4 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

②宁都会议 1932 年 10 月，在江西宁都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对

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和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后，毛泽东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解除了毛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③陈志方 江西无锡人。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1927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央军委总军医处代处长，总卫生部医政局局长兼卫生学校校长。建国后历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驻叙利亚、伊拉克、乌干达、瑞士、越南大使。

五、到公略学校学习

王稼祥主任常常坐在门口，看看田里的稻子、庄稼，和我随便聊聊，因为那时也没别人。后来很熟了，我感觉他对我还是很器重的。他说：“现在前方战斗很激烈，基层干部伤亡很大。你去学校学习，你当了两年多的通讯兵，一年多的班长，也是个比较老的同志了。你去学习学习，学点本事，到前方去。”去读哪所学校呢？当时有两所步兵学校，一所是瑞金的彭杨学校，一所是雩都的公略学校。公略是黄公略，红三军的军长，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被国民党飞机炸死了。这所学校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他的。王主任很体贴人，他说：“你到公略学校去，公略学校在你家乡，你可以回家看一看，看看你的父母，看了以后再去学校报到。”我向他辞行，他再次叮嘱我到家看看，到学校好好学习。

随后，我就到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学习内容很多，有平时的政治工作，战时的政治工作等等。学习结束后，我回到瑞金。回到总政治部，向王稼祥报到：“主任，我回来了。”“回来了很好，休息几天。”几天后，王主任把我叫去：“你学习毕业了，学了些什么东西？”我汇报后，他指示：“你还是到前方去，前方需要基层干部。”王主任讲：“你还年轻，读了一期步兵学校。你虽然过去当过兵，现在到前方去锻炼一下好。”我说：“我在这儿挺好。”他说：“没有关系，你去吧，以后有机会时 ，你回来看一看我。”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感情了，讲到这样，我没有什么话说了，好吧，那就去吧。第二天，他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信上怎么写的，我也没敢看。让我到彭老总的三军团政治部报到，因为我是总政治部去的，就让我到三军团政治部。到了军团政治部，看了介绍信，就让我到第六师一个团的卫生队当指导员。我在这个卫生对当了一年多的指导员，这和步兵连不一样，伤亡情况不一样。卫生队嘛，你不是在前面真刀真枪干嘛，主要是接手伤兵。伤兵主要是敌人飞机轰炸的，敌人的炮打的，子弹打的并不多。

就这样的，我没有当过排长，直接当了指导员。我从指导员到团政委，也是这样的，中间没有当过教导员。我当指导员不久，红军就开始长征了。

第二章 万里长征

一、参加长征

红军长征路过我的家乡，中途离我家最近的就是十来里地。我是路过家门而不入的[①]，我当指导员嘛。行军的时候，一个团的收容队嘛，收容掉队的，走不动的，干这些事情，自

己怎么能回家呢？红军长征，我当个指导员，也不了解形势，也不知道什么长征短征，反正跟着走吧。只要保证你这个单位不开小差，少掉队，少减员，就是好样的。当时就这么个要求，没有别的要求，连队是这样，哪里也是一样的。因为红军长征，减员很厉害，掉队的，开小差的，什么样的都有。

1935 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整编[②]。因为湘江一战，红军减员很大。原来我们从江西出发时，中央机关、各军团、担架队，加在一起全部八万人。一路上打好多仗，过好多封锁线，白天晚上行军。减员、伤亡、开小差，特别是湘江一战，部队减员很大，到整编时还剩三万多人。到遵义之后，毛主席来指挥军队，红军整编。我们三军团由三个师编成为四个团，就没有师了。师长、政委都下去当团长、政委；团长、政委下去当营长、教导员；营长、教导员下去当连长、指导员，统统往下压。那时编余的干部不是充实机关，而是充实连队，充实基层。我被编到十二团的四连当指导员。第十二团团长的名字记不起来了[③]，政委是钟赤兵[④]。我们二营教导员是谢振华[⑤]，后来在昆明军区当政委。

遵义会议之后，想从土城过长江，到四川的泸州。但是没过去，情况有变化，打土城没打下来。后来转来转去，第二次占了遵义，打娄山关。打娄山关前两天，刘志坚[⑥]是三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他下到我这个连来动员，说明这一仗的重要，一定要打胜，要消灭敌人，勇敢不怕牺牲！我们从桐梓出发，部队快步走，前面已经打起来了。三军团前面那几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三团已经打起来了。听到机关枪、炮，呜呜地响，我们就加快走。到了娄山关后，团长、政委一看，教我么第二营冲上去。正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个团反击我们，把我们在娄山关的先头部队打了下去。我们十二团刚赶到，第二营全营冲上去，那个时候讲什么战术啊、动作啊，这一套全都没有，就是冲上去，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垮了，压垮了，猛冲、猛追。娄山关这一仗，我们二营打得不错，很有名气。1994 年谢振华谈到娄山关：“噢，当时你这个连打得不错，跑的也快，冲得也快。”他也高兴啊，他是教导员啊。1994 年我们在昆明疗养院碰到的，我不知道他来，他戴个礼帽，拿着个棍，到我房间里来。我一看，“哟，你来了！”他知道我来了，我一到昆明他就知道了。他过去是昆明军区政委，他突然到我房间，因为我们很熟，后来我们在南京又是同学。大家见了面寒暄，他就住在我们附近的另外一座楼。大家看一看，聊一聊，就谈起了娄山关。他给我介绍了报社，报社给我来了信，要我写娄山关。我写什么娄山关呀，小小一个指导员。

这一仗打得好。但这次战斗中我右腿负了伤，跑得太快了，支不住，一下把我摔下去了。当时不能走路，不能动，躺在那里，部队哗哗地往前冲上去了。后来的伤兵有能走的，有不能走的，给你几块钱，到老百姓家里养伤。有的在贵州安家落户，有的被国民党抓走杀了，有的后来打起了游击。所以毛主席讲长征是播种机，讲的是这一部分人，伤病员，在贵州那一带搞活动。我拼命也得走！跟着部队一拐一拐地走。有时也没能跟得上部队，但也没有脱离部队，稀稀落落就这么跟着走。后来走到赤水，四渡赤水，转来转去，我伤好了后，把我调到十一团五连当指导员。我们这个部队是后卫，过了金沙江，到了会理，这个部队也没有打。到上夹金山之前，在泸定桥掩护了一下，没有打。到了十一团，一直过了夹金山。十一团政委是王平[⑦]，后来为什么熟呢？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关系都很好。

① 1934 年 10 月 15 日至 20 日，中央红军主力地一、二野战纵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机关队伍 8 万 6 千余人，集结雩都，从中央苏区突围，经湘南、桂东北向贵州转移，史称长征开始。

②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中央领导作了调整，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部，不久成立了有周恩来、毛泽

东、王稼祥组成的 3 人军事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③ 第三军团第十二团团长为谢嵩。谢于 1937 年任晋西游击队第一路纵队司令员期间，因车祸负重伤，翌年初在陕北绥德逝世。

④ 钟赤兵 湖南平江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地十二团政委。

⑤ 谢振华 江西崇义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二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地三十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地六十三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

⑥ 刘志坚 湖南平江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⑦ 王平 湖北阳新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政委。建国后历任二十兵团政委，志愿军政委，军事学院政委，军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政委，总后政委，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常委。

二、红大“上干队”

过了夹金山之后，我们到了黑水、芦花，一、四方面军会合。会合之后，1935 年的六、七月份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两个方面军调人去学习。我们三军团每个团一个人，一军团也是每个团一个。十一团就是我去的，十三团是张海棠[①]，他解放后在昆明军区。当时给我们动员时就讲：你们到红军大学去学习。学习完之后，中央就要你们到四方面军去工作。这批是什么人呢？我们去的都是营连干部，张海棠是俱乐部主任，是属于营级干部；我是指导员，是连级干部。为什么把我叫去呢？都是团、营级干部，我是个连级指导员啊！是不是和娄山关战斗有关系啊？这是我自己想的，我没有问过王平。据说，毕业之后，这些人去四方面军当政委。当然，还要看以后的学习情况。这样，我们就去了，各个部队都有，一军团、三军团，四方面军也有。我们到了红军大学，住在毛儿盖。我们这个队叫做“上干队”，上级干部队，就不是一般的连队了。广州军区萧元礼[②]也是这个队的，我们是一个班的。讲起那时候，有很多故事。萧元礼哭鼻子，叫他背枪，那时不管你什么人（他也是俱乐部主任），每人发一杆枪，萧元礼不肯背，他不要，背不动，背不动也要背！

在毛儿盖以后，分两路，向北走，要北上抗日了。1935 年，发表了《八一宣言》[③]。毛泽东、周恩来带着我们三军团、一军团为右路军；朱老总、刘帅和张国焘他们为左路军。过草地了，我们是水草地，他们是干草地。过了草地就比较困难了。我们也开始学习，学习一些政治常识，讲到猴子变人了。这时候生活比较困难，没有饭吃，没有粮食。喇嘛庙里有一些，要自己去搞。群众都跑了，那时候叫蛮子，不叫藏族，都跑了，没有人。这时候麦子海子地里长着，我们自己去割青稞麦，弄下来以后，就用火去烧，烧熟了就那么吃。这时很困难，所以当时脸色很难看啊。烧了麦子就用手搓，有皮呀，搓了就往嘴里搙，所以脸呢是黑的，什么样子都有。衣服也破烂。我们从江西出发，打土豪，打到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时候什么衣服也没有了，也没有土豪打了，衣服破破烂烂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没有盐吃，那时真是困难！

突然间紧急集合，出发，走！据后来讲，是张国焘要危害中央。叶剑英在右路军。徐向

前是右路军总指挥，叶剑英是参谋长。张国焘当时有个电报，要危害中央。叶剑英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就没有告诉徐向前，直接拿着电报报告毛主席，说是张国焘要危害中央机关[④]。我们右路军立即出发走了，因为一军团走了，我们三军团后卫。到了山脚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普、李德都在，四方面军那个参谋长李特，也是吃洋面包回来的，苏联回来的，带了骑兵跑过来。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房子里开会，开了大半天，说是他们要南下，不北上了。要我们，要毛泽东也南下。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南下，我们要北上，你们也要北上。你要他北上，他不北上；他要你南下，你不南下，两个就吵啊！吵了，好吧，那就来个自愿，南下的南下，北上的北上，达成这么个协议。开完会以后，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现在四方面军要南下，不北上，不走了，我们一方面军要北上。"当时我们队里，四方面军干部也有，就说："你们愿意北上的就跟我们走，你们愿意南下的就南下。"这么一讲呢，我们这个队的大部分人走了，南下了。我们一方面军的干部，军事队的，政治队的，加在一块也就六、七十个人。所以后来毛主席不是讲吗，南下还是北上，不管对什么人，就是对伙夫也是战略问题。南下，跟着张国焘，这是个战略，是个方向；北上，对毛泽东也好，对伙夫也好，也是个战略问题，是个方向问题。

这样，我们就跟着毛泽东，一路北上。1994 年，在张海棠家里吃饭。他讲，出了腊子口，到了甘肃的哈达铺，我们一个班买了一条猪，我们大会餐，吃得拉肚子的，吐的，什么都有。实际上，我记得是买了一条羊，他说是一条猪，我也没同他争。我记得是一条羊，三块银元，都会死自己动手，杀呀，煮呀，炒呀，大家都饱餐一顿。因为在草地里边看不到老百姓，到了哈达铺后呢，看见老百姓了，我们心情不一样，很高兴，很舒畅。因为在草地这几个月没老百姓，没有盐，没有吃的东西。到了哈达铺，自己可以买羊啊，也有馒头、面，什么都有了，这个就不一样。在哈达铺住了几天就走了，10 月份到了吴起镇。对我个人来讲，从草地到吴起镇这一段很苦。脚裂口子，很痛，也没有鞋，穿草鞋，也没有袜子。冷天过河，过水沟，脚一沾到水，疼到要命，一走就出血，一颠一颠地走，真是苦！

到了吴起镇就好了。不管你苦也好，累也好，痛也好，到了根据地了，有刘志丹的部队了[⑤]。当时刘志丹还关着呢，掌权的是郭洪涛他们[⑥]。休息几天之后，东北军张学良的一一九师从西安方向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到了离直罗镇不远的地方，到了陕北第一仗就是直罗镇。我们"上干队"总共就这么几十个人，跟着毛主席，给毛主席站岗放哨。当时我们就不叫一方面军了，叫陕甘支队，一军团两个师，三军团四个团，加上陕北部队，十五军团徐海东的部队[⑦],还有其他一些部队。在直罗镇打了一仗，打得好，歼灭了张学良的一一九师，连官带兵全都抓到了，这对以后的"西安事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打完仗之后，毛主席带着我们这些中央机关人员到了瓦窑堡。我们红军大学又开始学习了、上课了。那时很冷，但瓦窑堡煤炭多，烧炕，这就好了房子里很暖和，外面穿着破烂衣服，这样上课。

①张海棠 江西清江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先后任红三军团第四师俱乐部主任，第五师（后缩编为第十三团）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②萧元礼 江西万安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俱乐部主任。建国后历任江西省军区政委、司令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顾问。

③《八一宣言》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

国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④1935 年 8 月，红一、四方面军联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为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率一方面军之一、三军（由一、三军团改称）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随右路军行动。

9 月是日凌晨，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及军委纵队突然甩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转移北上。究其原因，据毛泽东 1971 年 8 月 28 日晚在长沙与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是称：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1970 年代末，时任右路军作战科长的吕黎平着文称，电报是他看到后交给叶剑英的。

1980 年代后，王年一等大陆党史学者对吕的说法提出质疑，称至今在保存完好的长征时期文电档案中并没有发现上述电报收、发底稿；中央在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而事实上徐向前、陈昌浩也没有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任何阻挠部署及行动，相反，却严令禁止部队追击。

⑤刘志丹 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5 年由团转党，入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渭南暴动与组织革命武装，历任西北抗日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西北军委副主席，红十五军团副军长见参谋长。1935 年 9 月被中央代表团隔离审查，同年 11 月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后平反释放。1936 年率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战斗时牺牲。

⑥郭洪涛 陕西米脂县人。1925 年由团转党。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根据 1959 年 11 月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称“他不是 1935 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建国后历任天津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经委顾问。

⑦徐海东 湖北黄陂人。1925 年底加入中共。1955 年授大将军衔。1935 年 9 月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所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

三、“西安事变”前后

到 1936 年，春节前后，我们就毕业了。红军东渡黄河，在这之前，把我分到保卫局当指导员。保卫局的指导员和连队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出门就不要自己被包袱了 ，有挑夫给我挑了。这个待遇相当于营级干部的待遇。到了山西，打仗、筹款。二十八军是刘志丹的部队，刘志丹在和阎锡山作战中牺牲了，后来派了宋时轮当军长[①]。当时通知我到二十八军去当团政委，所以我这个指导员没有当营干部没有当总支书记，直接当团政委，任二团政委。

东渡黄河之后，国民党又来陕北捣乱，我们回到陕北。这时候，二、四方面军也开始向陕北靠拢。我们一方面军先到陕北的部队也向西靠拢。会合之后打了几仗，但我没有参加，仗打得不错，把二、四方面军接到陕北。到了 12 月份，我们在盐池、定边方向。那里最苦的是没有粮食，水也是苦的，那个地方没有河，盐多，也没有井，就是一个坑，下雨是把水存起来，羊也喝，有羊屎，牲口也好，人也好，洗什么东西也好，都是那坑水。也没有菜，

也没有钱，钱也不值钱，搞几个土豆，有点粮食就不错了，要搞点赃菜、蔬菜都很困难。

12 月份发生“西安事变”。就我来看，“西安事变”不仅是为以后开创了抗日局面，也确实是挽救了红军。再像前面那样维持下去，当时对付胡宗南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物质方面，衣服、粮食的困难。二、四方面军菜刀，他们很疲劳，后来改编，一块儿加起来也是三万多人。“西安事变”后，我们增加许多人。当时贺老总二军、六军到了，张国焘的部队呢，到了一个四军，还有一个军，到了两个军。有些部队到河西去，被马步芳他们消灭了。所以“西安事变”很重要，非常重要！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本来我们多困难啊！一事变，好了，胡宗南往后撤了，我们的部队往关中，往庆阳走了。到了庆阳，当然什么都有了，面呀，吃的呀，有钱的人就多了，那时我们就不困难了。所以说，“西安事变”结束了我们艰难困苦的生活。这一段，我没有别的什么危险，就经过这么一个困难阶段。

“西安事变”以后，整个红军靠近西安，大家很高兴。抓住蒋介石了，高兴得不得了。蒋介石这家伙太坏了，双手双脚都沾满了共产党、工人、农民的鲜血啊，非杀他不可啊！一致这样认为，没有人不同意。我们这些干部当时也是这个思想，要杀他！后来听说把他放了，转不过来弯，战士们都不高兴，我们干部也一样，谁也不通啊。为什么把他放了？后来就解释了，那个时候人，官也好，兵也好，只要是上面说的就信，就听，就执行。为什么不能杀他？上面就讲了：不能杀，杀了谁高兴呢？何应钦，亲日派高兴。把蒋介石杀了，日本鬼子高兴。为什么呢？你杀了蒋介石，打内战，大打，日本鬼子高兴，汉奸高兴。因为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对我们也不一定好。当时杨虎城十七路军也没有多少部队，东北军十来万人，我们就这么几万人。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敌人赞成杀蒋。杀了正好中敌人的计，大规模内战打起来，谁胜谁负就不知道了。所以首先要抗战，要打败日本鬼子。我们从草地出发就是为了北上抗日。我们东渡黄河，也是这个口号。我们要到山西，打到河北去，也是抗战的口号。1935 年《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也是抗日的口号。这样大家开始训练，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准备打日本鬼子，思想就稳定多了。

1937 年，红军整编，和国民党谈判好了，红军就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编三个师：一方面军，包括陕北部队，一一五师；二方面军，贺老总的部队，一二〇师；四方面军的部队，一二九师。我们部队就编到一二〇师，成了贺龙、贺老总的部下。当时，从外地，从国统区，很多学生、知识分子、男男女女到陕北，到延安学习。那时候，我也想去，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愿意去学习的。那时候，我的部队取消了，我没有部队了，也没有职务了。甘泗琪②就问我：“丁盛同志，你怎么样？”他当时任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我说：“我要去延安学习，反正我也没有事。”他想了想，看来原先也是有准备的：“你不要去了，你到三五八旅去当协理员吧。”我说：“甘主任，我还是去学习吧。”他说：“学习的机会有的是，以后再说。”这样，我就到了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任协理员。当时旅长是张宗逊③，政委是李井泉④。李井泉这个人是很有水平的，有文化，知识分子。他开始是副旅长，副旅长就是政委，后来没多久又叫政委。姚喆是参谋长⑤，他资格很老，是平江起义的。

1937 年，一一五师到平型关方向打了一仗。一二〇师在山西原平，就是这一路，日本攻的很凶。国民党卫立煌一个师阻击的凶，我们一二〇师两个旅抄到后面去打。在这个过程中，七一五团的组织股长不见了，不知哪儿去了，也不知是不是牺牲了，当时这种情况很多，牺牲了找不到尸体，就叫我去七一五团当股长，我又当了组织股长。

①宋时轮 湖南醴陵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上将军衔。1936 年 4 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牺牲后，宋于次月接任军长。

②甘泗琪 湖南宁乡人。1927 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后参加红军。

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训处（后改政治部）副主任。

③张宗逊 陕西渭南人。1926 年入黄埔军校。1927 年参加秋收暴动。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

④李井泉 江西临川人。1925 年参加革命。时先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成都军区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

⑤姚喆 湖南邵阳人。1928 年参加平江暴动。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参谋长。

四、抗日团长

到 1938 年的 4、5 月份，晋西北战役结束了。整个晋西北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二〇师的根据地。这时，中央决定在冀东搞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决定由宋时轮、邓华组织挺进纵队[①]到冀东去。当时宋时轮在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当团长。他原来是军长，一整编就当团长。邓华在平西地区宛平县这一带活动。宋时轮就把我，还有好多原二十八军的干部统统带走，组织宋时轮支队，叫宋支队，我任组织科长。

我们从山西的五寨、神池出发，经过一段时间，到了平西和邓华会合了，是 1938 年的 6 月份。出发那天，我们带着原二十八军部队改成的三十四大队。行军时，从平西过铁路到昌平，大队长、政委朝着前面走了，他们也不知道部队没有跟上。到昌平县，不对不动了，我有个习惯，不对不动了，就要走到前头去看一看。总支书记高克恭[②]说："走不动啊，前面没有路了。"我一看，原来是昌平县的城墙，土城墙不是很高的。和高克恭个人商量，怎么办？进去！这样，也没打枪，敌人的保安队都以为离北平就几十里路，很麻痹。在敌人迷迷糊糊时，我们进了城。赶快把城门打开，让部队进城。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也不知是些什么人，反正是把他们放出来。还到银行里搞了点东西，半天以后就走。我们就把部队带出去，因为大队长不在嘛，政委也不在。后来，宋时轮把这个大队长撤了。这也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不论你是什么指挥员，什么人员，有机会就要指挥部队，消灭敌人呢，壮大自己。当时我也没有其他什么思想，就是想我们已经到了那里，为什么不进去？

到了热河，冀东还没有暴动。邓华与三十一大队的一个政委不知道发生什么矛盾，吵起来。那也是老同志，说话也不大注意，说："我要枪毙你！"邓华想，你要枪毙我，我先把你关起来，就把他撤了。这样，我由宋支队的组织科长，到了三十一大队当政委。我是个老团政委，那时的大队就是个团。大队长是季光顺[③]，山东人，1929 年从福建俘虏过来的一个兵，很能打仗。长征时候就是营长，话也不多，山东大汉，说话直来直去，好人，我和他合作的不错。当时，冀东暴动起来，我们不知道。让我们出去看，我和季光顺就出去了。到了一看，老百姓暴动起来了。司令多如牛毛，这个队，那个队，说：我们暴动了，你们赶快过来。那时邓华、宋时轮还没有和李运昌[④]他们联系上。李运昌他们来了后，到遵化的党峪，坐下来开会，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划分了四个分区，我们这些大队长、政委就成了分区司令、政委。我们这个分区就在唐山迁安县，靠近县城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已经到了那里了，到了唐山附近的迁安、抚宁等县。宋时轮、邓华没搞好，我们没站住脚。主力部队又回到平西，挑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同志坚持冀东的工作。所以，后来冀东的工作没搞好，我们分区的司令、政委也没当成，还是个大队，就回到平西。

因为他们搞得不好，1939 年，延安就派萧克[⑤]接替宋时轮。还是挺进军，萧克就是挺进

军军长。我当时还是大队政委，后来要调我到宋支队当主任，我不干，又回到邓华支队，到七团当政委。和萧思明在一起[6]，我们合作得也很好，部队建设也不错。萧思明后来到新疆当政委，又到武汉军区当政委，现在在天津离休。他解放战争时在华北当干部部长，在六十六军当过政委。他有文化，聪明能干，我们关系很好。1990 年我们去天津，他给我安排住宿，他的车专门给我用。1939 年，中央要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就是在这个团里当选为“七大”代表[7]。

我在这个红军时期有三个关键：第一，参军；第二，王稼祥对我的培养、教育。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直接的老师，所以后来长征我才能当指导员；第三，娄山关战斗，一、四方面军会合，到“红大”学习。没有娄山关，我估计后来去学习也困难。没有这个学习机会，后来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样。这是连着的，这是“三关”。困难艰苦不算个什么，我觉得我成长很顺利，中间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我和上面的关系也很好，从十二团教导员谢振华，十一团的王平，到后来的宋时轮、邓华、萧克，这些上级的关系都不错。我至今仍非常怀念他们。

①邓华 湖南郴州人。1928 年参加湘南暴动。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委。建国后历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1959 年受彭德怀案牵连后降任四川省副省长。文革结束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②高克恭 陕西绥德人。1935 年参加红军。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营教导员。建国后曾任总参管理局副局长、顾问。

③季光顺 1935 年至 1938 年曾任红军二师四团一营营长，六团团长，八路军独一师三团团长，十一支队（邓华支队）三十一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六团团长。以后情况未详。

④李运昌 河北乐亭人。1925 年参加革命。抗战后历任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司令员，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员，热河省政府主席，冀察热辽区副司令员。

⑤萧克 湖南嘉禾人。1926 年参加革命。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先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过去副司令员。建国后曾任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1958 年受批判后降任国务院农垦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历任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

⑥萧思明 江西永新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冀热察挺进军十一支队（邓华支队）七团团长。建国后历任山西军区代司令员，东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六十六军政委，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军区第二政委，武汉军区第三政委。

⑦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决定 1938 年内召开“七大”，惟由于战争紧张和准备工作不足，大会未如期举行。1938 年 9 月至 11 月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代表名额定为 350 人。1939 年 6 月和 7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通知，决定再增加 100 名正式代表和 150 名候补代表，要求 1939 年 9 月 1 日前代表选举完毕。1940 年，各地中共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陆续来到延安。此后，曾分别两次准备在 1942 年、1943 年召开“七大”，均未成事。直至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七大”方在延安举行。

第三章 七大代表

一、奔赴延安

1939 年，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通知，在各个地区选党代表。我在挺进军，在晋察冀的平西，靠近北平那一带地方活动。萧克是挺进军的军长，我在第七团当政委。1939 年，部队把我选为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这个地区的军队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挺进军政治部的主任伍晋南①。整个晋察冀地区，每个分区都是两个人。1940 年 5、6 月份，晋察冀代表团赴延安。当时团长是舒同②，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我们代表团有军队的，有地方的，有群众团体的。

到延安之后，我们军队的代表就全部到了军政学院，中央军委办的一个学校，在那里学习。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学了很多东西。1940 年开始，我们就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全部都学文化。我们当时心情很高兴，我也很喜欢学习，特别是哲学。我感到这个哲学很有意思。那时候课很紧，一些文化比较高的同志就做笔记，下来后我们对笔记，抄笔记，一天很紧张。这个学习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从来都没学过这些东西，都不懂。什么哲学，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讲起，艾思奇③教的。还有一个教哲学的青年，讲得很好，叫何培源④，非常生动。我特别喜欢这个课程。讲中国革命史，那是王若飞⑤讲的。从 1940 年一直到 1941 年底，整整一年学这些课程。这一年学下来，多我的思想提高、知识开阔作用很大，因为过去没接触过这些东西，没学过。

1941 年，国民党反共进入高潮，封锁我们，不供给延安，不供给我们八路军。怎么办？第一、饿死！大家当然不愿意；第二，解散！大家当然不愿意解散；第三，自己动手生产。所以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1941 年搞大生产，我们都参加。延安这个地区只要有劳动力，荒地很多，所以我们就开荒种小米，高粮食是很容易的。地多，又好开，广种薄收没关系的，很容易，只要下雨就行。我们自己小单位呢，学校里就砍柴，背柴，种菜，高大生产运动。这样，在我们脑子里，对军队也是生产队体会很深。那时，全党全军、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搞，一搞起来，就解决了我们八路军的粮食供应。这是很大的问题，国民党封锁我们，想搞垮我们，它整个是失败了。那时大将都参加，陈赓⑥他们都在。大搞生产，大家很高兴。三五九旅不是到了南泥湾嘛，南泥湾后来我们也去了，也是荒地，很少人家，郭兰英歌唱得实在的⑦。

1942 年，毛主席号召整顿“三风”，2 月 1 日的报告⑧.那时成立中央党校了，我们各个地区来的军队代表到中央党校去了，开始是在一部。毛泽东是校长，具体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彭真副校长⑨。彭真是晋察冀分局的书记，他到延安汇报，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感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模范根据地。学习毛主席报告之后，当时又规定有 20 多个文件，关于整顿“三风”的，大家要通读。然后是“六大”以来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全部文件、电报都拿出来。我们从党的成立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有的规定只准在学校里面学习，讨论，谈都可以，但是在校外不行。当时，毛主席规定，我们的责任就是治病救人，对事不对人。弄清事实，弄清当时的环境，为什么是对？为什么是错？这样，我们 1942 年学习了整整一年。讨论关于党风不正，党八股，文化上的八股。整顿三风，对于我来讲，增强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过去不知道党的历史，参军之前也没有读过书，所以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我帮助很大。当然现在来看，当时了解的那些也不一定完全是对的，但对于开阔思想是很有好处的。

学习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很细，一样一样，一件一件地讲。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什么原因？我们当时的中央领导对武装斗争，抓枪杆子，对国民党的斗争是右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立三路线”，当时什么情况。当时李立三是宣传部长，书记是向忠发，向忠发是工人出身。“立三”路线，当时是过“左”的行动，但时间不长，半年时间。学习这些东西，大家非常有劲。1931 年以后就是王明路线了。这些党的历史搞得很具体，很详细，也比较公正。当时大家心情也舒畅，我们不懂，中央就作辅导报告

① 伍晋南 广东兴宁人。1926 年参加革命。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区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② 舒同 江西东乡人。1926 年参加革命。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0 年免职），华东局委员。文革结束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③ 艾思奇 云南腾冲人。1935 年加入中共。1937 年到延安，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着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

④ 何培源后来在延河洗澡时不幸意外溺水身亡。

⑤ 王若飞 贵州安顺人。1922 年参加革命。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军委总参谋长。1946 年 4 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⑥ 陈赓 湖南湘乡人。1922 年加入中共。1955 年授大将军衔。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兼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

⑦ 郭兰英 山西平遥人。著名女歌唱家。1964 年参加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一曲《南泥湾》成为中国民族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⑧ 整顿“三风” 1942 年，中共开始了全党的整风运动。2 月 1 日和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又称整顿“三风”。

⑨ 彭真 山西曲沃人。1923 年参加革命。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二、“抢救运动”

1942 年整整一年就学这个。党风为什么不正？毛泽东讲，防空洞出了股阴风！讲得很具体，讲了很多例子，所以 1942 年的学习，整顿“三风”给我什么收获呢？一个是知识，对党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再一个对人生观的确立，怎样作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样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这个非常重要；三是个人政策理论水平的提高，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对解放战争的工作，帮助非常大。在我来讲，那种场面，那种民主的运动，那种方法，印象很深。大家什么顾忌都没有，讨论的时候，我们争论的面红耳赤，你说是这样，我说是那样。但是，下来以后呢，咱们还是很好的朋友，不会因为我们争论了什么问题有隔阂。为什么呢？这不是为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你说对，我说错；你说错，我说对。课堂争论，走路争论，吃饭争论。那时空气非常活跃，同志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就很难得，很不容易。争议问题归争议问题，和工作、感情是两回事情，不能混淆起来。我们经常讲的，

不能感情用事。从这方面，对我来讲，意义深远。

1943 年，查历史。虽然我们都是红军，老同志，也都要查。你参军怎么参的？你什么时候动摇过没有？过草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查的。你当时就这么坚定？你就没有动摇？都要问的，都查。把我们这些人查完之后，又来个“抢救运动”①，查地方，查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这就很厉害了，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做法。什么叫“抢救运动”呢？你在白区干什么工作？怎么来根据地的？大学、高中，你在那里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当时对白区又不了解，他怎么解释也不行，不少人受委屈，戴特务帽子。“抢救运动”，不知是谁的发明。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在地方工作过，上去第一句话就承认，我是特务！其他什么话，什么解释都不要。晚上开会呀，抢呀，抢了几个月，以后又搞“甄别”运动。这样就伤害了一部分人，这些人都是受委屈的，证明当时抢救运动是错误的。

我们支部的一个人，我们住在同一个窑洞，他是大学生，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他是湖南人，湘潭的，叫杨第甫②，非常好的人！抢救了，要他上台讲，说是特务。日本鬼子投降后，他回到白区工作去了，后来在湖南当了省委秘书长。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打成右派。有一次，湖南的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档案馆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很熟，这些同志是非常好的，很坚决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这样搞，很伤感情的！当时，我觉得有个好处，他承认了，下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怎样歧视人家。大家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这一点也不容易。什么情况都有，有人认了，也有人就不承认，“我们不是特务”，“我不是嘛，你们强迫，我没有做这个事嘛！”我们支部一个女同志说，我没有做过特务！现在在广东，是个广东人，大革命时的一个女同志。

这个“抢救运动”是个错误的东西，伤害了人，伤害了感情，把一部分人整得非常苦。1943 年就搞这个东西。我们是老同志，也搞了很长时间，个把礼拜，一点一点都要讲，要问。那个声势好大，开大会，那时候没有电灯，是煤气灯，挂在上头，这就是整顿三风的好处，抢救运动的坏处。

① “抢救运动”指 1943 年 7 月在延安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突破，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加紧进行反特斗争的动员大会，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报告称清除内奸是急不可缓的任务，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康生的报告使延安立即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反特运动，十余天内，搞出了大批“特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抢救运动”虽至 7 月底 8 月初即令纠偏，惟随后开展的甄别平反工作延至 1945 年“七大”前夕方告基本结束。

② 杨第甫，湖南湘潭人。1938 年加入中共。1941 年 10 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被“整风”整了 3 年。建国初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1954 年因“地方主义”受批判降任省工业厅副厅长。1959 年被列入以周小舟为首的“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1963 年甄别平反后任省农垦局局长。文革结束后任省政协副主席。其子杨小凯（杨曦光），1968 年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十年，狱中刻苦自学，后为著名经济学家。

三、延安的学习与生活

到了 1944 年，又转为正常的学习，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延安的学习对我的影响很深，收获很大。在延安的这四、五年，特别是到中央党校，因为它是党的组织，没有行政组织，支部书记就管一切事情。我当时是个支部委员，管生活。说以，那时很活跃，除了学习之外，我记得一个是跳舞，跳交谊舞。开始我们不会跳，不愿意去，但就像后来讲的“开始看不惯，后来旁边站，再跳试试看，最后一身汗”，四步曲嘛，那时我还是跳了，还是不大习惯，这对大家心情活跃很有好处。一个是唱歌，在党校很活跃，唱京戏。每天吃了晚饭，什么地方去跳舞，什么地方学唱京戏，什么地方看打篮球排球，什么地方下棋，什么地方拉胡琴，非常活跃，那时我们这个组有几个广东人，他们拉胡琴，文化生活非常活跃。

唱京戏，我都学呢，当时我都会几句，还放电影，演戏。在延安，京戏很吃香，后来我们看京戏这个习惯都是在延安养成的。《三打祝家庄》、《宋士杰》、《杨家将》啊，我们都是在延安看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都是在延安看戏学的。我为什么好下棋呢？也是在延安学的。吃了晚饭下盘棋，大家很潇洒，很舒坦，大家非常高兴。不是过春节慰问王班长嘛，“羊肉饺子香又香”，慰问王班长，就是那时演的。三五九旅，南泥湾，红军到了陕北，陕北许多的民歌就这么出来的。当时演个什么戏，河南人挑一个担子，一边一个小孩，逃荒逃到陕北来。真苦，实际上是诉国民党的苦，诉地主的苦，文化娱乐工作很活跃。

大生产运动之后，延安的生活相当不错，吃的也好，比较难解决的是穿衣困难，这个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冬天穿的棉衣，外面的布本来就是很粗的粗布，自己织的粗布，而里面装的不是羊绒是羊毛，一穿上身，羊毛都往外窜。没有办法啊，这种衣服一开始还很暖和，羊毛一点一点掉，后来就成夹衣了。延安的窑洞好，虽然没有炕，窑洞暖和，冬暖夏凉。我们那时穿着黄衣服，走路都很整齐的。白区来的学生很多，什么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同志外面来的。1938、1939 年来了很多男学生、女学生。他们是文化人，生活习惯和我们截然不同，身上系个麻绳子，脚上拖双鞋，邋邋遢遢，头发长长的，走路吊儿郎当。他们讲：你们八路军，走起路像邮差一样，很快嘛；站在那里，像电线杆子一样的。谈恋爱也不知道怎么谈。也可能是挖苦我们老干部，说两个人谈恋爱，女的对男的讲：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男的说：这有什么好看的？烧饼一样的。他不懂恋爱的关系，不懂这是一种感情的融洽。过去没见过这些东西，思想上非常单纯。外面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也没有去过，也没有接触过。

所以，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开始交流了，男男女女都有啊。他们给我们讲，你们这一套，你们这些同志，大家感觉很好，就是说话太直了，一点弯都没有。我说，你们也是太不直了。有时说：你们知识分子太懒，如我们都住在一个窑洞里，他换了衣服洗澡，把衣服连袜子往铺下一塞。下个礼拜换衣服，他又拿出来穿上。我笑他们，你们去洗一洗嘛，又不是没有水，延河有水嘛！他说：还不是一样嘛，你们是太讲究了。大家在一起聊，很轻松。这样的交流，对我们来说，也有些好处。外面的知识，外面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去过呀，不知道国民党到底怎么搞。是他们讲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环境，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生活，这样慢慢沟通。我和他们几个一直不错，河南那一帮子人很好。我们在一个支部，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后来回河南，后来什么“红旗党”①搞他们很厉害。在我们一个支部里有四、五个河南人，后来证明他们都是好同志。一个叫郭以青②，后来到内蒙古当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我在南京时，他给我来过一封信。在延安时，“抢救”得他够呛，后来什么事也没有。沟通了，大家比较融洽，对我们也有好处，知识是各个方面的，无限的，所以在延安这几年，对我来说，无论从那方面讲，收获都很大，没有虚度年华。

①“红旗党”案 1942 年 10 月，延安整风进入后期阶段时，康生将时年 19 岁、1937 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后到延安学习的张克勤拘禁，连续审讯 6 天 6 夜、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嗣后，康对所有国统区中共组织表示怀疑，在其鼓动下，被打成“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除甘肃外，还有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十个省市党组织，这些地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一大批党员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

②郭以青 建国后历任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代理常委。

四、重返部队

到了 1944 年后，虽然生活很好，我们也很高兴，但是总觉得在后方呆的时间太长，想到前方去了。那时，聂荣臻、聂老总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因为我们都是从晋察冀去的，聂老总就把我们召集起来，看望我们。“你们到延安这么多年了，怎么样啊？”我们就讲这些情况，他很高兴。后来我们就提出：聂老总，我们在延安时间太长了，现在都四年了，我们想回晋察冀去，到前方去干。文化，整风，这些都学过了，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呆了。给聂总讲了之后，他把我们七、八个人，都是从晋察冀来的，一起分配到教导二旅[①]。这个教导二旅是 1944 年从晋察冀回延安来的。为什么会延安？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反共规模更大了。晋察冀是教导旅，冀鲁豫是新一旅，新二旅，山东也是叫教导旅。我到教导二旅第一团当政委。因为我来延安之前就在晋察冀平西的七团。这个来龙去脉是从这儿来的，因为晋察冀那几个团，从一团、二团到七团，这样排上去的。1939 年，我在晋察冀的六团，那时叫大队，当过政委。所以聂老总就把我分到一团当政委。当时，教导二旅在哪里呢？在陕北的洛川。洛川是一条河，我们这个团的具体位置叫乱柴沟。乱柴沟就是乱柴，那个树乱七八糟，多少年都没有人去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开荒。在延安开荒种粮食不困难，我们自己打窑洞，自己开荒地。我们教导二旅路过延安时，没人发一件劳动工具，锹、镐、铲。一到驻地，东西一搁下，先开荒种地，开完荒，种完地再来挖窑洞。这样一搞，一年时间都解决了。有了粮食，什么话都好说了，可以喂鸭，喂猪，蒸酒，生活都解决了。那些地方种菜，种土豆，和南方不大一样，那个地很解决问题。以后就是烧木炭，烧了木炭就不冷了，烤火了。粮食有了，就有了，鸡也有了，猪也有了，生活就解决了。所以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非常正确。到了 1945 年 4 月份，开“七大”了。我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三五九旅是几月份走的呀？他们走了，是收庄稼的时候。那是王震[②]、王首道[③]他们带着南下，准备到广东和东江纵队会合的。他们从延安出发，经过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到了广东边界，没联系上，没站住脚，又回到延安。三五九旅从南泥湾走了，我们从乱柴沟去接防，我们这个部队又到南泥湾呆了一段时间。南泥湾的条件比乱柴沟好一点，一方面是山，开发出来了。同时，地里有一条川，可以种稻子。稻子是南方才有的，我们在乱柴沟没有这个条件。所以郭兰英唱那个歌，“处处赛江南”，就是这个道理，可以种稻子，产大米。我那个团就种了大米。这时候，1945 年 6、7 月份，很紧张了。国民党向我们进攻得很厉害，是胡宗南的部队。

这几年我们到延安后，国民党有几次反共高潮。一个就是皖南事变，一个就是增加兵力向边区压。这样，党中央毛主席就从前面调回几个旅；到冀鲁豫调一个旅，杨得志那个旅；到晋察冀调一个旅，教导二旅，黄永胜[④]、邓华这个旅，回到延安来。到 1945 年 7 月份很紧张，我这个团奉命到关中和国民党打仗，反顽斗争，到关中地区的爷台山地区去作战。我

们这个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是很好的部队，就中国说来是属于第一流的部队[⑤]。我们从南泥湾向关中进发，到关中很远，天气又热。我们还没有到达战区，在路上的时候听到日本鬼子投降。日本鬼子一投降，任务就变了，叫我们这个团赶快回来。回到南泥湾，命令我这个团到东北。中央制定我们教导二旅的一团，就是后来四十二军这个部队，由黄永胜、吕正操[⑥]、林枫[⑦]率队，加上杨得志教导一旅的二团，这样组成一个单位，向东北挺进。

① 教导二旅 1944 年 1 月，以晋察冀军区第一、五、九、三十四团、独立团和骑兵团等合编组成野战旅。3 月，该旅奉命开赴延安。同年秋，改称教导二旅，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旅长黄永胜，政委邓华。8 月，其一团随黄永胜调往东北。1945 年冬，教导二旅与教导一旅合编组成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1947 年 10 月，编入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1949 年 2 月，改称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十六师。1953 年 6 月，整编为农业建设第五师，后隶属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②王震 湖南浏阳人。1927 年参加革命。1955 年授上将军衔。抗战后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1941 年初率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1944 年 10 月，三五九旅一部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南下支队）南下，任支队司令员。

③王首道 湖南浏阳人。1925 年参加革命。时任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政委。建国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④黄永胜 湖北咸宁人。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1955 年授上将军衔。1944 年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六纵司令员，四野四十五军军长，十四兵团、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十三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十五兵团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 年 9 月受“九一三事件”牵连被撤职。1981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

⑤ 教导二旅一团 其前身为井冈山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团。1933 年 8 月，由红三军第七师整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号称“红一团”。1937 年 8 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一营。同年 12 月，恢复团的建制，编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1944 年 5 月，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一团。1945 年？月，编为热辽纵队二十七旅七十团。1947 年 7 月，改为冀察热辽军区独立一师一团。1948 年 3 月，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同年 11 月改称第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四二四团。1951 年 2 月，全建制调入四十八军一四四师，四二四团番号撤销，改为四三〇团。1952 年 10 月，改为第五十五军第一四四师四三〇团。1970 年 1 月，改称陆军第五十五军一六三师四八七团。1985 年 10 月随一六三师改归第四十二集团军建制。1993 年，抽调四八七团机关、一、二营及炮营部分官兵等，组建驻香港步兵旅。

⑥吕正操 辽宁海城人。1937 年加入中共。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到东北初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

⑦林枫 黑龙江望奎人。1927 年加入中共。时任晋绥军区政委。到东北初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组织部部长。

第四章 挺进东北

一、到东北去

这个问题加起来很大了。日本鬼子投降之前是三家争：日本、国民党、共产党。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两家争啊，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国民党蒋介石要独占东北，调兵遣将，把什么远征军、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都调到东北，成立东北剿总，杜聿明管。他要抢，我们共产党、毛泽东也要抢占东北。所以我们在延安集结后出发，大概是 8 月底 9 月初。我们走的时候，毛泽东可能还没有回来，还在重庆。

1944 年到 1945 年，一年的时间，我们教导二旅，黄永胜是旅长，邓华是政委，我在一团当政委。1945 年"八一五"之后到东北，黄永胜带我们这个团，还带杨得志一个团到东北去。九月初，我们从延安走，两条腿，一天起码一百里地。我们这个团就是能打能走，非常有战斗力。从延安到张家口，那时张家口是晋察冀军区，聂老总他们的军区司令部驻在张家口。到张家口休息了两天，聂老总就把我叫去说："你带一个团到东北去？"我说："是。聂总有什么指示？"聂老总就给我讲了一段："这个团，你知道不知道它的历史啊？"我没说，我不大清楚，当时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团原来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是红三军，黄公略带的部队。后来 1933 年整编，红三军编为第一军团的第一师，这个团就是一师一团。你知道吧？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就是这个团的二营。晋察冀，狼牙山五壮士是这个团三营七连。1939 年黄土岭战斗，打死阿布中将的是这个团。晋察冀反扫荡，扩大晋察冀军区，包围晋察冀军区，这个团是立了功的。"聂总给我讲了这一段，"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呢？"他指着我，当时就我一个人。当时我是这个团的政委，又是团长。就一个参谋长，还有个总支书记，那时的团干部很简单。"你到东北以后，要很关心这个团"，聂总讲。"这个团出干部，出很多的干部。你要尽量保持这个团的原套人马，原建制，不要把它拆散。因为这个部队拆散就没有力量。所以你要扩大，到东北肯定要扩大，要壮大起来，要壮大一个团也行，一个师也行，但要保持这个团的建制，调干部没关系。"聂总交代我。我说："对！好！"聂总简单几分钟就交代完了。

我就带这个团走了。我们由张家口出发，到宣化，到承德。在承德，萧克找我说："这个团留在这里不走了。"因为黄永胜他们不跟着我们部队走，他们先走了，黄永胜这个时候已到了锦州。留在承德，萧克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们怎么决定也可以。但是，我们从延安走时交代我们是要到东北的。所以你最好请示一下中央。"因为当时热河地区不归东北管，是归晋察冀军区管。萧克说："你等着吧。"我们这个部队在热河住了一段时间。等啊，因为中央那时很忙，也没那么快给我们回电报。等的时间不短，我问过萧克，他说再等一等。几天后，萧克告诉我：中央来电报了，叫你继续往东北走。这样，我就由承德带这个团到了锦州。到锦州之后，形势很紧张。10 月份，杜聿明从山海关向我们进攻。杜聿明是 1945 年的 11 月 16 日占领山海关的。很快啊！日本鬼子是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9 月 15 日、10 月 15 日，两、三个月时间就占了山海关，是国民党的十三军。

我们到东北时很乱，走路的，爬火车的，什么样的都有。黄永胜先走了，我们团的四连从承德爬火车到锦州。到锦州之后，因为当时李运昌部队都是些新兵。形势好了，忽地壮大了，扩充了好多部队，编成一个旅。李运昌就把我们四连分掉了。当时我也没有办法，你李运昌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们团领导又没有来。到锦州之后，我们就找到了黄永胜，部队全来了，安排好住下。到锦州的不只我这个团。还有文年生[①]带陕甘边区警备第一旅警备一团，

即张德发团[2]，也到了锦州；欧致富带一个团[3]，即朱德警卫团，保卫黄崖洞那个团，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也到了锦州。这时候，虽然锦州还没有什么动静，形势已很紧张。我们部队从延安出发，一路上走的都是自己的根据地。我这个团的枪很好，都是“三八”大盖，沿途各地的民兵看到我们说：“你们到东北去，枪给我们吧，你们就不要了吧，到东北有的是枪啊！”我们沿途陆陆续续都给了老百姓，这样就空手了，没有什么枪了。那时候也不要什么批准，反正我说了算，给他们吧。到了东北有的是枪嘛，日本鬼子留下的。这个我们心中还是有数的。

①文年生 湖南岳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 3000 余人抵达东北，随后任热辽纵队副司令员。

②张德发 河南光山人。1928 年参加红军。1945 年到东北后担任热辽纵队第三十旅旅长，热河军区独立第十六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三师师长，四野一三四师师长。

③ 欧致富 广西田阳人。1929 年参加百色暴动。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45 年到东北后任热辽纵队第二十二旅旅长。

二、组建二十七旅

到锦州以后，形势那么紧，我们就不高兴了，发脾气了，到底怎么办？留还是走？到沈阳去？如果在这里，那就把我们装备起来啊，发枪，发子弹啊！我们几个团就这么待着。又待了几天时间，形势比较紧了，可能到了 11 月底 12 月初了，李运昌他们就决定：欧致富这个团和李运昌在冀东那个旅，二十二旅合并，仍称二十二旅，欧致富当旅长。李运昌还有三十旅，从冀东带出来的，就和张德发这个团合并，编为三十旅，张德发当旅长。我这个团，还有沙克[1]从冀中带来的一个团，叫三十一团（以后的一三五师四〇三团），还有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在沈阳由工人和过去八路军被俘同志组织的一个团，即李运昌特务团，决定着三个团组成二十七旅，我为旅长[2]。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很重要的。在这之前，决定把冀东十八总队，并入我们一团。十八总队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从冀东到锦州来领枪的，打算领枪以后，回到冀东去的。结果跟我们合并了，我这个团又增加了一千多人，就成了个大团。很充实，新枪、新炮、新衣服，什么都有了，装备很优良，很充足，人也很充足。那个李九龙[3]，就是这时候编过来的新兵，编到七十团的二连当兵，现在驻港部队就是这个团。

半个月左右，杜聿明十三军就打来了。当时我们很紧张，部队才合并起来，官也不认识兵，兵也不认识官，子弹袋也没有搞好，子弹也没有搞好。操场上就发东西，装口袋呀，东西也很多，什么都有。我们这个团打开仓库，需要什么拿什么，仓库里留下的日本鬼子的子弹袋是皮子的，装不了几颗子弹，战士们就把子弹装进干粮袋里。敌人快来了，你不拿，不丢给他们去了嘛。这个团很完整，我们很高兴。因为聂老总在张家口交代给我了：这个团你要很好地关照它。我任旅长时，就把这个团交给了吴瑞山[4]。我说：你来带这个团，当团长。总支书记叫王星[5]，也都是长征来的，当政委。这样我就放心，团长、政委都经过考验的。营连干部大都是抗战中来的，在晋察冀分区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一连连长就当参谋长。剩下的，这个团用不完的，我全部带走到旅部。这个团我就放心了，由吴瑞山和王星带着。

后来杜聿明部队攻锦州，他们都走了，黄永胜就找我说：“敌人来了，要攻占锦州，我们要打。”我说：“我不同意打，不能打。打也打不赢，我们这么一个团怎么打？他们都走了，

怎么打？”黄永胜说：“不行！你不打一下，国民党一枪不放占了锦州，这太不好说话了嘛。”这个话也对，打就打呗，当然打是抗击一下，我们又不能阻滞他前进。敌十三军，那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打就打，上去抗击了一下，敌十三军当时进度很快。黄永胜、沙克跟着我们。我说：“你们两人快走啊，你们走了，好撤我的部队，你不走我怎么办？”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样杜聿明就占领了锦州。所以当时黄永胜布置情况也对，我说不打也对，没什么错。不能打呀，官兵互不认识，再说我们的力量又太小，人家十三军来，我们怎么能打得赢它？我们伤亡不大，但丢散了一些人。我们离开锦州，到了义县，看到李运昌他们在火车上。他们走了，我就带着我的几个团会合了。原来三十一团在葫芦岛，这个独立团不知道在哪里，没和我见面。到了朝阳，我的三个团会合了。我随黄永胜到了朝阳，李运昌、文年生他们坐火车往北票、阜新方向走了。

到朝阳是 1945 年的 12 月份。下雪，旅部就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有个管理科长是我从一团带去的，管理员当科长；一个参谋长当作战科长。除了他们两个人，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到了朝阳之后，延安来一批干部。黄永胜介绍：韦祖珍到你这儿来当政委⑥；李勃也是从延安来的⑦，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陈运春是警一旅来的⑧。旅部有政委，有副政委兼主任，有参谋长了，只有我们四个人。政治部来了两个科长：一个是抗大来的韩辰⑨，宣传科长。解放后韩辰到军事科学院，后来到贵州省军区当政委。那是蓝亦农⑩他们在贵州主持工作的时候。现在在天津，他是天津人，抗战的干部。再有就是许文益⑪，也是延安来的。他是俄文学校学俄文的，他给黄永胜他们当翻译。当时不是有“老毛子”嘛。这时没有翻译工作可干了，所以许文益到我们师宣传科当副科长。政治部就有了人，但还是不健全。在朝阳，这个旅部的架子就比较充实一点了。这时候，黄永胜就给我们交代任务了：“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占领了锦州，从天津、山海关、锦州，一路进了沈阳。中央指示，在锦州、山海关和承德之间要有一支部队。”黄永胜要我带部队到这一线活动，叫我带两个团，三十一团和独立团，就是现在的四〇四团。黄永胜自己要带老一团，就是延安带出来的这个团，带到赤峰方向去⑫。当然，这个任务我没有什么说的了，但是当时乱的不得了。这个三十一团的人我不认识，一个人也不认识，独立团我也不认识，谁都不认识谁。热河地区原来赵尔陆他们在那里搞⑬，山上到处都有土匪。日本鬼子投降，开始很多人参军，到国民党一进攻，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个混成旅，国民党一进来，“哗”地散了，没有了。

我对黄永胜说：“你把这个团带走了，不行！”按道理讲，我不应当要这个部队。聂老总告诉我了嘛，建制不要拆散。当时这个情况，我看着有点玄啊，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当然独立团领导都是我们派去的，底下部队不知道，不了解啊。我说，我也带一支老部队，我没有多要，我说要两个连到旅部，跟着我走就行了。不然，我怎么办？光杆子司令，所有的部队和干部都不认识，有什么事情我找谁去？黄永胜考虑说：“可以。”12 月下旬，我就带着两个团，两个连，从朝阳向南，向中心地区去。黄永胜带走七十团主力，到赤峰方向去了。这里要记住一点。过去他们一讲就是黄永胜当旅长，我就当团政委；黄永胜要当纵队副司令，你就接黄永胜的班，当了旅长。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黄永胜从教导二旅走了后，就带了一个管理科长，旅部还在教导二旅没有动，只带一个人走。我这个旅部不是教导二旅的旅部，是重新组织的。所以他们又说，后来黄永胜当八纵司令，他走了以后，我又当了四十五军的军长。实际上这之间都隔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不是那么一回事。人们总说我和黄永胜的关系。我为什么还详细讲呢，就是讲清楚这个问题是这样来的。黄永胜从延安走，就带了一个管理科长。我这里的管理科长是我老一团的人，我带来的，所以这个旅部是我重新组织起来的，不是教导二旅的旅部。这些干部是延安学校、各个方面来的人，不是教导二旅。教导二旅是罗元发他们⑭，在南泥湾没有动嘛。后来编成一野的第六军。不是一回事，这是 1945 年的事了。

从 1945 年的 12 月初，一直到 1947 年的 7 月底，我们这个部队编成第八纵队二十四师，又见到黄永胜。1946 年的一年，1947 年的 7 月以前，和他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归热河指挥，归黄火青他们指挥[15]。黄火青是热河省委书记，段苏权是司令，[16]黄永胜他们到了林西地区。

①沙克 辽宁丹东人。1937 年加入中共。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45 年 10 月率冀中军区第三十一团 1500 余人抵达东北，随后任安东军区副司令员。

②二十七旅 1945 年 11 月，由冀中军区挺进东北的三十一团、陕甘宁边区挺进东北的教导二旅一团与在沈阳新成立的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合编成立冀热辽军区二十七旅，下辖三十一团、七十团（教二旅一团）、七十一团（冀热辽军区特务团）。该旅与二十二旅、三十旅及炮兵混成旅统由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领导的临时前线指挥部指挥。临时前线指挥部 1946 年 1 月改称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又称黄永胜纵队、辽西纵队。

③李九龙 1945 年 8 月参军后历任二十七旅七十团战士，一三五师四〇五团连长、营长，四〇四团团长，一六二师师长，五十四军副军长、军长，济南军区司令员，总后副部长，成都军区司令员。1994 年晋升上将军衔。

④吴瑞山 安徽六安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曾历任教导二旅一团参谋长、团长，二十七旅七十团团长，八纵二十四师副师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副师长、师长，五十四军副军长，闽北指挥部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⑤王星 四川古兰人。1935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大校军衔。文革中历任炮兵学院副院长，石油部军管会主任，燃化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七机部副部长。

⑥韦祖珍 广西東兰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曾历任二十七旅政委，八纵二十四师政委，四十五军一三五师政委，第五十三军副政委，二十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空四军副政委，空五军政委，空军工程学院政委，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广州军区政委兼关系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区党委书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2 年 4 月后受批判，1973 年 8 月被免去一切职务。1973 年至 1978 年 10 月被羁押。1981 年 7 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委。

⑦李勃 四川平常人。1937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曾历任二十七旅政治部主任，八纵二十四师副政委，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政治部副主任，空四军政治部主任，空军雷达兵部政委，空六军政委，济南军区空军政委，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顾问。

⑧陈运春 江西兴国人。1930 年参加红军。曾历任二十七旅参谋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副师长，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⑨韩辰 1948 年后历任八纵，四十五军、五十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71 年至 1980 年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⑩蓝亦农 湖南茶陵人。1935 年入抗大学习。1951 年后历任五十四军一三四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1969 年后历任昆明军区副政委，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1973 年 5 月至 1980 年 7 月下放工厂劳动。1985 年任昆明军区顾问。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委。

⑾许文益 1938 年入伍后，历任延安大学俄文系党总支书记，二十七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一三五师四〇三团副政委，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二秘、一秘，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

驻刚果大使馆参赞，驻蒙古、黎巴嫩大使。在任驻蒙古大使期间，曾到现场处理“九一三事件”林彪座机坠毁事宜。

⑿1946 年 1 月，二十七旅七十团（欠二营部、四、五连）调出该旅，归三十旅建制。

⒀赵尔陆 山西崞县人。1927 年参加南昌暴动。1955 年授上将军衔。抗战期间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政委，冀晋军区司令员。

⒁罗元发 福建龙岩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1945 年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委，西北野战军六纵司令员，一野六军军长。教导二旅见本书第三章注释。

⒂黄火青 湖北枣阳人。1926 年参加革命。时任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副书记兼热河省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副政委兼热河军区政委。

⒃段苏权 湖南茶陵人。1930 年加入中共。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后历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参谋长。

三、开辟热东根据地


【圖1】1946年，於熱河任熱東軍分區司令員。

我带这个部队过去以前，整个热辽地区没任何部队，什么都没有，真空地带。所以我们一过去就很困难。第一个困难，内部谁都不认识谁，谁都不了解谁。旅部之间也好，各团也好，都不认识。我们从锦州出来这一段，马也没有了，骡子也没有了。我们从朝阳出发时只有三峰骆驼，两峰骆驼给司令部，一峰骆驼给政治部驮东西。到羊山打了一帮土匪，一下缴了一、二十匹骡马。后来韦祖珍骑的那匹黄白马就是土匪头子的，很漂亮的马，那才开始有马。钱呢，一分钱没有！现洋没有，日本鬼子的伪钞没有，国民党的票子没有，我们根据地的纸币没有，一分钱没有。地图也没有。我拿份什么图呢？五十万分之一的图，就知道个方向，到了哪儿都搞不清楚。因为没有友军，也没人介绍情况，电台才来，张忠跟着我。真空地带，国民党也没有。我们在朝阳休息了几天，往哪儿走？也不知道，后来我决定往南走吧，往有铁路方向走吧。

刚到羊山地区，我们在那休息了几天。那天真不巧，晚上我们撤出羊山镇，转到乡下了。我们走了，其实一团（就是四〇四团前身）二营副营长张进[①]教导员张谦道[②]他们以为我们旅部还在这里住，懵懵懂懂骑马跑到里边。一到里面就遭遇国民党十三军的部队，出不来，被俘虏了。张进和张谦道是这样被俘的。张谦道后来留在四川，张进一直不能重用。张进受苦啊，头发都白了。这事没有任何人来问我：张进怎么样被俘的？怎么回来的？没人问我。哪有这个道理？我是最了解的，任何人都没有我这么了解。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搞的。现在张进头发都白了，早就白了。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很多，敌十三军跟着我们来了。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把这个部队带出来？走又不能走，打又打不赢，怎么办呢？反正我不和你打，打不赢就有伤亡嘛。

我何必去打一下，撵得我乱跑，我就不如不打。你来我就走，你不来我就不走。我们就从羊山出来一路走，走到建昌的玲珑塔。当时打了一下建昌，打下建昌好过年，没有打开。困难在哪里呢？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过去日本鬼子在的时候，那些汉奸队，乌龟王八地方武装欺压老百姓。国民党过来后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国民党支队，保安部队。这些家伙压迫老百姓，反对共产党。他们是里手，不用学，他们都会。他们对我们很仇恨，压迫老百姓。保安队土匪多，三五成群，十个八个。建昌尤其多，大概有千八百人，东北保安三支队嘛。开始打没打下来，部队回来了，把它打下来了。这次战斗中，我从一团带去的一个通讯班长张凤鸣光荣牺牲了。我很喜欢这个小年轻，十七、八岁。本来我叫他在旅部当排长，他不干说："我不当，我要下连队"。一团这个部队战斗力强，人人都好战。我就让他到七十一团（即后来的四〇四团）一连当副连长，打建昌负了重伤。撤出战斗后，回到玲珑塔，我那管理科长是一团来的，他认识张凤鸣，向我报告："旅长，张凤鸣负伤了。""怎么样啊？""很重，他现在想吃个鸡蛋。""你去买啊！""没有钱，我到哪儿买去？"我一下心就痛了。我带来这样的人，负了重伤，连买个鸡蛋的钱都没有，我从心里动了感情。还是想办法吧，后来是想办法找什么东西吃，我记不起来了。他就这样牺牲了。这个人我一直记着他，非常聪明，非常好！

后来旅部韦祖珍、李勃我们几个就开会了，说我们这样不行。这时延安学的就用上了。咱们就像蝗虫一样走到哪吃到哪，不分穷富？本来热河地区老百姓就穷得不得了，还去吃人家，那怎么行？我们想在陕甘宁边区吃大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个地方的特点，是穷的穷得不得了，富的非常富，粮食非常多。后来我们决定：部队到一个地方，不要吃老百姓的东西，看哪家最富，向他借一些，要一些，我们吃大户。那时候我们是二十七旅，老百姓说我们是八路，你不给也得给，给也得给，反正我们要！这样维护了这个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整个活动的地区没有钱，没钱也不行，也得跟他们借。反正给你一个条子，不愿意也不行。那时候没有人和我们联系，我们一直退到靠近冀东，在承德方向上才联系上，热河地区才开始给我们供给。这时候，钱是自己印的票子，我们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这一段，我们部队非常困难。整个形势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签订了停战协定，不打了。这时候，我们在菠萝树，五个旅围着敌人一个师打，没打下来。打到半路时，停战协定小组来了，说不让打了，就这样把它一个师放走了，这个师很反动。停战了，没事了，部队驻在凌源的叨尔磴（是东北少数民族的一个名字）。这时热河召开高干会议，师以上干部开会。中央对整个方针政策有变，因为停战了嘛。要加强根据地，发动群众，野战军要地方化，整个东北都是这个样子，其他内地可能不大一样。会议决定我这个二十七旅改为热东分区[③]，当时热河有热东、热西、热南、热北四个分区。二十七旅番号取消了，三十一团就改为辽西支队，规定活动地区是从锦州到山海关这一段。这样它背靠我们，这个支队归我统一指挥，也归地委统一指挥，那时王国权当地委书记。组织形式变了，任务也变了，二十七旅就和原来热东分区的一部分合并了，我们机关真正充实起来了。这些人大部分是延安警卫团和枣园的一个单位拉出来的。这样，摆在我们领导者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创建、开辟热东根据地。

锦州到山海关、锦州到承德这个位置，中间是建昌县，规定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范围。任务就是把这个地区的土匪消灭，深入地方，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因为我们没有搞过地方工作，摆在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搞好团结。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能不能团结这一批人，这是关键。内部团结、上下团结，和地方的关系能不能团结好，我认为我们做的比较成功。韦祖珍这个人非常好。我们共事五年，没有什么问题争论过，面红耳赤都没有。他很全面，当过侦察兵，侦查参谋，文化比我高一点，会照相，不但政治工作好，军事上也很行。我做过很长时间的连指导员、团政委，我对政治工作很重视，这样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非常协调，不分你是政治，我是军事，遇到问题按照原则处理，所以我们非常团结。什么原因呢？我又要说到延安时的学习。在抗战时期，

毛主席把这么多老干部集中到延安来学习，这一手非常英明！因为当时抗战初期，1940 年之后，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直到 1942 年之后，那是非常苦。吃黑豆，吃榆树叶子，榆树皮，都是这个时候。这时候，毛主席把几千老干部调回延安，一是保存了力量，再是思想水平提高了。这个不得了，大家都很理解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所以当时的思想很一致。不单是我和韦祖珍两个人，整个部队都受到教育。毛主席这个决策太英明了，思想一致就好说了。思想是很不容易一致的。

我们两个人是主要领导者。回忆那段时间，我们无私无畏，没有什么私心。只有无私无畏，才可能对各方面来的干部公道；有私心，就不可能公道。按原则办事，不管是谁，不管是你带来的，他带来的；我认识你也好，不认识也好，一视同仁，按原则办事，这点非常明确。论功行赏，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我们对有错误的人是采取延安那个办法，治病救人，教育为主，不是惩办为主，教育大家，使大家感到受教育。我那时很严厉，这个部队不少人挨过我的骂。我当师长、军长的时候，大家都感觉我这个人很厉害，但是也很公道。你处分我，骂了我，我服气。因为你处分我，骂了我，但是并不抛弃我，而是一样地关心，这一点很得人心。不会把一个人一棍子打死。毛泽东讲的，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嘛！我们能够团结广大指战员，共同做事，这很重要。

①张进 建国后曾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四〇四团团长、师司令部参谋长、副师长，一三四师师长。

②张谦道 建国后曾历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炮兵第五四二团政委，四〇五团政委、师后勤部政委。

③1946 年 4 月，二十七旅在叨尔磴与冀热辽军区辖下热河军区热东军分区合并，又称第十八军分区。11 月后，直属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王国权。三十一团压缩为四个连，与七十团二营（两个连）合编为辽西支队；七十一团压缩为五个连，与原热东军分区独立营合编为军分区独立团。

四、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我们和广大的干部战士很接近。我不但认识师、团、营、连干部，连队的许多兵也认识，都很了解。因为我们没事就到连队去啊。我对张进、张谦道这一批人非常的熟，不是一般的熟。那些通讯员，比如宋福堂[①]，都是我在延安带的通讯员，在东北是当骑兵通讯员，有官不做。宋福堂这个人呢，没有文化，脑子有时比较笨一点。这个人你叫他太提高也不可能。张英新[②]也是骑兵通讯员，我都叫他们骑兵，这些都是有官不做的，张英新就比较聪明。这么多人，我和他们很接近，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架子。指战员也认识我们两个人，也认识我们骑的匹马，韦政委骑的那匹马很壮，很漂亮的大马，我骑的是青骡子。马一来，大家就知道分区司令、政委来了，肯定要干什么事了。那些兵都判断，要去打什么地方了。

在这个期间，我们几乎没开过什么大会，决议、文件这些东西很少。什么问题当面讲。怎么样，讲一讲，完了就完了，完了就去办就是了。所以查证一三五历史上有什么文件？没有什么文件。我回忆，大家天天坐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有什么话就说，说完了就去办，办完了就没有了。这样做，现在看来也是个缺点，没有东西了，没有资料了。所以对我们内部来讲，公道啊，民主啊。我从来没有讲过他们哪个人骄傲啊。有些人也很爱提意见

唉。那次在济南，荆建[3]说："我就好提意见。"我说，是啊，提意见也没有什么错啊。他是好提意见，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他印象不好。我认为提意见是好事。对，我们就赞成；不对，我们不照着你的办就行了嘛。我何必说人家骄傲呢？我当师长，当军长，从来没有说过哪个人骄傲。耿志刚[4]这个人，凶啊，我从来没有说过他骄傲。提一回意见也好，骂我也好，从没有说他骄傲。我只能说你这件事情不对，这样人家就放心。我们那个冰野[5]，他也好提意见。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是人家提意见就骄傲，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提意见是好事，怎么是骄傲呢？"你这个人啊，骄傲、无组无纪律。"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犯什么错，不记仇，你骂了我也好，我批评了你也好，以后大家还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做对我们这个部队的团结是很成功的。一直到现在，我们那些老同志在热东分区的、一三五师的、后来五十四军的，见到都非常亲热。1994 年，我们到了昆明和大理。很多人我也不认识，他知道我啊，坐在一块吃饭有三桌，我哪能都认识啊！只认识几个人，王铎、秦经玉、王凤戈、佟俊阁[6]。方一川[7]，我们的秘书，很倔。我没有计较过方一川，我们使用他的长处，何必用他的短处？他是个人才嘛，他写字别人都不认识，但是他很负责，很认真。

那么对敌人到底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大。当时，一个辽西支队单独活动去了。我就跟着这个团，四〇四团。我们的力量不大，但也有个好处。1946 年，国民党中央正规军到乡下来的少，他们也顾不过来，都是些保安、花子队（老百姓骂那些到处派饭吃的土匪）、地主武装，斗争很激烈。我们的方针就是把这些人消灭，只有消灭了这些土匪，群众才能发动起来。只有发动了群众，才可能消灭更多的敌人，这时连在一起的。我们把在延安学习的这一套方法用上去了。没有去延安学习，我们也不懂这个方法。所以说毛泽东伟大，解放战争为什么这么快胜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思想一致。我们把这部分人消灭干净了，国民党没有爪牙了，就困难。你们单独来一个部队，来一个团，找不到我们；来一个营，我就消灭你！这样，我们扩大根据地，建立政权就方便了。1946 年这一年，局面打开了。小的反动武装都被我们消灭了，就剩下一个建昌，后来也解决了。这一年，我们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国民党五十二军从绥中路过凌源，我不跟你打啊。毛主席的游击战术，你来找我，找不到；你走了，我又回来了。

1946 年的 12 月份，毛泽东主席下令，全国所有师以上的单位至少要消灭敌人一个营。12 月份，国民党九十三军，云南部队，一个搜索营从凌源出来袭击我们。我们师部驻在姚路沟，他们先到另一个村子扑了一个空。当时我们不在姚路沟，在建昌。得到情况后，我们迅速赶回姚路沟，将国民党这个搜索营基本歼灭，跑了一点。当时，我们全部歼灭一个营，围住它，还困难；放开一个口子，主力歼灭了，走也走了一点。这样，我们解决战斗比较快一点，那时力量还是不行啊。歼灭这股敌人，对部队鼓舞很大。它是美式装备的正规军呢，美国佬的衣服，我们就穿起来了，卡宾枪也缴到了。辽西支队在那边活动，我们接着就从热东分区打到绥中。我们消灭国民党工兵十二师的一个营。重机枪、物质搞了不少，很多俘虏后来当了我们的干部。政治上打击敌人，军事上采取这种方针，所以 1946 年到 1947 年这段时间，我们在热东地区伤亡不大，只有一个团的副主任叫白立风，1946 年在山嘴子时被国民党偷袭，他带着队伍掩护主力撤退，被敌人打死了。打建昌时，一个副团长受伤，营以上干部没有别的伤亡。

这一年，消灭土匪，政权建立起来了。区小队，县支队，独立大队都有了，局面打开了，地方扩大了。1946 年 12 月就决定把县支队、区小队合并起来，就扩充为现在这个四〇五团第二营、第三营。第一营是我带去那个部队，就是原来要的那两个连，老一团的四连、五连。后来改四连为第一连、五连为第二连，一个县大队改为第三连。第二个县大队，这儿一个连、那儿一个连，这样凑起来，组成四〇五团。这一年我们成绩就不小啊，我们站住了脚，进展不错[8]。所以，我儿子问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我说：解放战争，热东分区，一三五

师，我最满意的，最值得回忆的！我在热东分区一年多就这么个方针：团结内部，打击敌人。先捡弱的吃，捡豆腐吃，然后才啃骨头。你先捡硬的，硬去碰，伤亡也大，得不偿失，也缴不到什么东西。所有这些方法，这些思想都是在延安学习是的飞跃。所以，我在延安这几年，思想上是个飞跃，上了个台阶。没有延安这几年，我们在解放战争中，热东这个根据地不可能创建出来。

①宋福堂 建国后曾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四〇三团团长。

②张英新 建国后曾历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炮兵第五四二团团长、师司令部副参谋长。

③荆建 曾任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〇五团政委。建国后曾历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政委。

④耿志刚 自 1945 年后历任二十七旅七十一团参谋长，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副团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团、四〇四团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五十四师参谋长、副军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装备部副部长。

⑤冰野 自 1947 年 8 月后历任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二团政委，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〇四团团长、副师长，国防科委第二十三基地副司令。

⑥王铎、秦经玉、王凤戈、佟俊阁均为在五十四军工作过的干部。

王铎，曾任五十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秦经玉，女，王铎夫人，曾任五十四军文工团团员；王凤戈，曾任五十四军政治部直工处处长；佟俊阁，曾任五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后历任昆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

⑦方一川 1945 年入伍，曾任五十四军党委秘书，后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陆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副政委。

⑧1946 年 12 月，热东军分区扩编：辽西支队改为独立一团；军分区独立团改称独立二团；以军分区独立营（原七十团二营）为基础，与凌源支队、青（龙）建（昌）、绥（中）大队合编为独立三团。

第五章 决战辽沈

一、两战杨杖子

1947 年 7 月底，我到赤峰开会，团以上干部开会，成立八纵[①]。我们整个的隶属关系变了。原来是归晋察冀，归聂老总指挥。从 8 月份以后就归东北，归东北局指挥了。会议没有开完，陈诚这个老反共专家来了。在江西红军时期，陈诚一直跟红军打。经过 1946 年、1947 年这一段，杜聿明实际是被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又换马，把杜聿明调走了，陈诚上任。陈诚一到东北就吹牛，就批评杜聿明没把东北共军打下去，是因为方针不对，说杜聿明从锦州到山海关整个交通线没有保障好。陈诚以来就说他六个月内要把整个东北形势改变，第一步就要打通锦州到山海关这条铁路线，保证安全通过。他说完这话就派了两个师，敌九十三军的暂二十师，另外有五十师。九十三军这个师是从锦州出来的，五十师是从绥中过来的，

从北宁线向我们压过来。我们在开会时接到情报，会不开了，回去打仗。当时我们纵队就住在凌源。当时，八纵成立是三个师；我这个师是二十四师；张德发是二十三师，二十三师的部队基础比较老，是警一团；另外一个二十二师，是原来冀东的十二、十三旅合并起来的。十二旅是过去段苏权在察哈尔以南组织的。

纵队命令我率二十四师，带上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就是白斌那个团[②]，归我指挥，到梨树沟门，先把五十师消灭。然后再转到杨杖子去参加那里的战斗。这样，我们从凌源出发，这儿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五十师到了梨树沟门这一线，我们已经走了。但当时了解的情况，敌五十师不在梨树沟门，在六道沟。这个地方，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搞了一年多。晚上，我带着指挥所“呼呼呼”一下子冲到梨树沟门，因为情报是那里没有敌人。到那一看不对头，不是我们的部队，是敌人！啊，这一下就乱了，我们迅速撤出来。撤出来以后，我就吹号调部队，调七十一团和七十二团，从那边转出来。这样就在梨树沟门打起来，没有把敌人全部消灭，情况变了嘛。打了个击溃战，消灭敌人一千多人。打了梨树沟门之后，纵队指挥那几个师打暂二十师，叫我们迅速赶去。但当时他们也没有把敌人歼灭，暂二十师也是打垮了，跑了，跑回了锦州。这时候，陈诚火了，刚一出关，暂二十师就打败仗，虽然未被全歼，但打败了。陈诚在沈阳不服气，从关内、从苏北调了一个军，四十九军。陈诚派四十九军的四个团再次进攻杨杖子。这就是第二次杨杖子战斗。他一定要把我们压过去，离开北宁路，保证交通安全，他就这么一个目的。

当时，我们很快知道敌人来了，部队就往后撤了一下，休息隐蔽起来。敌人到了杨杖子，前面一些小规模游击队和它接触了。纵队命令我军另外三个师攻打，就是欧致富的热河独立师，这个师没有编入八纵；吴烈的二十二师[②]，张德发的二十三师。我们二十四师比他们新一点。他们这几个师 1946 年以来一直都是野战军，没有地方化，只有我这个师地方化了又组织起来的。这样就让我们作为第二梯队、预备队隐蔽起来。另外要我派一个团向锦州方向警戒。他们打了一天，我就自己到指挥部去了。当时纵队领导是黄永胜、刘道生[④]。

刘道生是政委，邱会作副政委[⑤]，黄鹄显是参谋长[⑥]，还有个副主任林忠照[⑦]。他们在最高的三个坎子前面指挥，那天下午我去了。黄永胜、刘道生就给我任务：你看见没有？那个师在那里，叫我从什么地方出发，从什么地方打，攻到什么地方。接受任务之后，我就回到部队，简单讲了一下纵队交给我们的任务。部队虽然新，但动作很快。纵队还给我们配了一门山炮，这门山炮是二十二师的，只有三十发炮弹，他们都没有用，跟着我们走。我的两个团，六个步兵营，轮番进攻。第一梯队就是七十团，过去的那个三十一团，这个部队战斗力很强，因为它是抗战时期组织起来的。我们采取轮番攻势，车轮战术。第一营上，占领这个山头；上去以后，第二营上，第三营又上。我们跟着这个团，没有指挥所，四十八个人跟着我和韦祖珍。七十团攻下来以后，接着七十二团上，我们就再跟着这个团里走。上去就攻下一个山头。这车轮战术，敌人没有办法层层组织防御，一下子我这六个营跃上去了，一直打到黑鱼沟。黑鱼沟就是它的指挥部，攻下来以后，天还没黑，还看得见。我就叫山炮打欧致富攻击的那个石砬子，用炮给我打，三十发炮弹全打光算了。欧致富、张德发他们同时发起总攻，四个师发起攻击，这样一下就把他攻垮了。攻垮之后，九纵队又来了。就纵队是从冀东来，还在铁路边上。我们打垮敌人，当时我们八纵缴获不多，俘虏不多，我们打了一天一夜，又打到晚上，晚上追击看不见。敌人四十九军也不知道我们九纵在外面埋伏着。一退下去，九纵队正好把他们全部俘虏，一万多人，才跑回去两百多人。

第二次杨杖子战斗的胜利，对东北很有意义。《东北日报》发表社论，说杨杖子战斗给陈诚屁股上踢了一脚。中央都广播了。这样一打，陈诚就乱了。他从铁岭调新六军的两个师道荆州，这个二十二师是所有东北敌军主力的主力。这时，东北解放军发起全面总攻，全面出击，陈诚又赶快把新六军主力调回去应付我们的秋季攻势。秋季攻势打得非常有力，一家


【圖2】1948年1月·授予二十四師通訊隊榮譽錦旗。授旗者丁盛。

伙就把陈诚的部署全打乱了。陈诚招架不住，就通过蒋介石从傅作义的部队调了一个军，九十二军。军长是侯镜如，这个家伙反动啊！傅作义的部队从华北出关，路过荆州到了义县。这时候，我们两个纵队围着他们打，没能歼灭，九纵队俘虏他一个师长，他们又跑回去了。至此，1947年秋季攻势在我们这个地区就基本结束了。

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开会，刘道生就给我讲：“老丁啊，你这个游击师不错啊！动作很快，这么快就攻下来了。”刘道生说这个话，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思。原来他们对我们这个部队是不大放心的。是游击师嘛，当了一年半的游击队，才组织起来。这样一来，纵队对我这个部队印象不错。秋季战役之后，大概 10 月份，黄永胜就走了，到哈尔滨去了，到总部去了。后来我们知道，他调到六纵队当司令[⑧]。所以我们成立八纵队，黄永胜实际上在这个部队只待了两个月，指挥了一个秋季战役。但是，他这次战役指挥对我们部队印象很深，觉得黄永胜打仗就是很硬。开始我们了解情况也不够，也不知道敌人有四个主力团，以为他是一个师，一个师当然和四个团就不一样。他们有一万两千人，我们虽然是四个师，也就一万两千人，比例上是一比一。这样，我们对黄永胜、对刘道生，对纵队领导印象都很好。上上下下，这个战斗打下来，大家都很高兴！战斗之后，我们在凌源、朝阳这一带休整，就没有见到黄永胜了。到 1947 年 12 月份，段苏权来当司令，刘道生还没有走，还在八纵队当政委。我们是 12 月份离开热东地区的，在热东地区活动了两年，1947 年 12 月份告别了热东。

在这段时间里，我很欣慰的是在热东地区创造了一个堵死陈诚、卫立煌他们退路的根据地。对于攻打锦州，辽沈战役，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堵死了敌人从锦州到山海关这条道路，作用是很大的。当然，开始我们认识不足，这是个走廊，北宁路，沈阳到锦州，锦州到山海关，山海关到天津。我们在这个走廊搞得国民党不安宁，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① 八纵 1947 年 8 月 1 日，冀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在赤峰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指挥机关，热河地区之十三旅、十六旅（原三十旅）、十八旅（原热东军分区）编入纵队建制，并依次改称二十二师、二十三师、二十四师。纵队司令黄永胜（1947 年 11 月后段苏权），政委刘道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参谋长黄鹤颢。第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副政委孔瑞云，政治部主任李勃，参谋长徐其海。

②白斌 建国后曾历任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师长、副军长，国防科委地二十一基地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③吴烈 江西萍乡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东北野战军八纵二十二师（后四野一三三师）师长。1949 年 5 月调任华北军区独立地二〇七师（后改编为公安纵队第一师）师长。

④刘道生 湖南茶陵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1947 年 8 月至 1948 年 3 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后东北野战军）八纵政委，1948 年 4 月调任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

主任。

⑤邱会作 江西兴国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1947 年 8 月至 1948 年 3 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后东北野战军）八纵副政委见政治部主任。1948 年 3 月至 1951 年 1 月任八纵（后四十五军）政委。建国后历任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总后副部长、部长。文革中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均为办事组成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 年 9 月受“九一三事件”牵连被撤职。1981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

⑥黄鹄显 福建上杭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参谋长。1949 年 4 月任四十五军一三四师师长。

⑦林忠照 福建龙岩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八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由副政委邱会作兼）。

⑧黄永胜 1947 年 11 月离开就医。1948 年 3 月病愈出院，至 11 月任六纵司令员。

二、八面城练兵

1947 年的冬季攻势开始了。东总命令我们第八、第九两个纵队，从热河地区到沈阳方向参加冬季攻势。我们就从朝阳出发，我们师是从二十家子出发的过大凌河那天，锦州到北镇有座山叫老爷岭，下大雪。晚上过了老爷岭，我们七十团一下子就占了北镇，也没有打。敌人当时没有想到我们突然到那里去。我们占了北镇之后，当地国民党政府还不知道，白天还照常上班。上班一看，不对头了，是解放军来了！对这些人，我们也不会怎么搞他们。在北镇休息了几天，补充了一下，发了点财，打开了一个县城了嘛。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去过解放军，是个死角。占领北镇休息了几天以后，部队就出发，从北镇到新立屯。那时，东总给我们八纵的任务是和一纵及总部炮兵一起攻打新立屯。

那时候正是三九天气，我们从北镇到新立屯冷得不得了，零下三十多度，又下大雪，很厚。部队走不动，还带了很多担架队，那是冀东的担架队跟着我们走，参加东北的冬季攻势。1948 年。我 35 岁了，穿着北方那种长筒子毡窝子，很暖和，但是走不了路，一走路就出汗。到了新立屯，开始发起攻击。我们没打进去，一个营攻击受挫，伤亡很大，王明德都负了伤[①]。敌人是四十九军二十六师，这时敌人的战法改了。过去我们红军、八路军的战法是游击战、夜战、近战、埋伏。我回顾了一下，从当兵、当红军起，第一次反“围剿”，我们是诱敌深入。按照毛泽东的思想，主力摆在两边山上，隐蔽起来，让敌人钻口袋，钻进来以后，再收拾你。所以张辉瓒为什么被捉？是这样来的。第二次反“围剿”还是诱敌深入。所以过去我们都是运动战、游击战，还有夜战，埋伏诱敌深入。从红军时期到八路军时期，基本上是这样。现在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攻打新立屯没有打下来，没有打进去，就不是游击战的问题了。当时，敌人第一层做鹿砦，第二层铁丝网，第三层暗堡，后来是碉堡。敌人的整个这套战法改了，我们还是那样“呜呜呜”的，好像演电影那样，一个个部队跟着去，那还受得了啊？当然打不进去。受挫了，我就感到没有办法，这怎么办啊？想不出个办法。后来一纵来了，新立屯打下来了，把敌人消灭了一部分，跑了一部分。冬季战役结束了，我们八纵队到八面城练兵。

八面城练兵，这时我们东北进行了几个大的运动。第一，那时西北方面的新式整军，叫诉苦运动。我们在八面城的整个部队也都展开了新式整军运动。诉国民党的苦，那些俘虏兵


【圖3】1948年・在東北戰場與戰友合影・右一丁盛・

诉说怎么抓来的，国民党怎么压迫他们；诉地主的苦。诉说村长怎么抓壮丁，怎么派兵，怎么压迫他们。他们家庭、父母怎么受苦受难。这个从政治上、思想上作用非常大。部队查斗志，查思想，查阶级。你是想和平了，想休息了，想回家了？凡此种种，一句话查斗志，接着还演戏。我们第一次看到演《白毛女》，台上台下呜呜直哭。那时候的战士容易启发，很单纯。看了杨白劳、喜儿这个样子很受教育。对战士保持高昂的斗志，求战心理，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当时在东北开了一个参谋长会议，提出现在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就要健全司令部工作，要健全后勤。下载不像过去简单的小米加步枪，现在有炮了，就必须健全司令部工作。你这个司令、师长，靠一个人就不行，必须有健全的司令部，坚强的司令部工作。刘亚楼[②]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对部队建设很重要。参谋长会议开完了，回到部队就贯彻，开指挥员会议、首长会议。叫我们师长去，开了三个会。这次会议提出很多问题。关于军事上，一个是讲战术。要讲战术，必须先学技术。原来我们练三大技术：投弹、刺杀、射击，后来加上土工作业、爆破，五大技术。讲战术，必须有技术作保证，没有技术就不行。讲战斗动作，各种姿势的运动，什么情况怎么运动，选择和观察地形，讲怎样运动，这是打基础。讲战斗作风，就是死打硬拼，战斗作风要硬，要勇敢，强调大兵团作战必须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行动。谁完不成任务是不行的，谁耽误也不行的，战场纪律讲的很严。讲三种不同情况的三种不同打法[③]，对防御的敌人怎么打法？要扫清外围。讲“一点两面”、“三三制”[④]。必须要这样子，不能和过去一样“呼呼”地跑过去，要讲土工工作，讲爆破。要讲组织尖刀部队，一点就指尖刀。有的人不懂，说尖刀子很尖。不是这个情况，实际上攻击部队是一个铁锤。

讲攻坚战。比如我们打天津的时候，我是一个尖刀营，实际上是一个连在前面，一个营组织尖刀。我全部的炮，全军的炮，东总给我们一〇五榴弹炮，同时打这个地区。以尖刀作比方，一下子就杀进去。用铁锤是不是更好理解一些？一下子就把它砸碎了，必须要这样才行。因此，打这种仗就提出“四快一慢”[⑤]。“四快一慢”也有人不理解！“打仗还能慢啊？”慢的意思是要做准备工作。快挖交通壕，快做工事，快捆炸药，累得满头大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大家拼命做准备工作，“四快”是干这种事的。准备好了，打的时候，扩展战果要快。他这四快——前进要快，准备要快，发展战果要快，追击敌人要快，是这个意思。当时我们理解，毛泽东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我们理解东北的这个做法是遵照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战”的具体化，当时就这么理解的。所以攻坚这一套，“一点两面”攻击去，敌人就跑不掉。攻进去之后，强调纵深战斗，要求从高级指挥员到战士，积极地、勇敢地、灵活地区完成任务。

纵深战斗中，上面不可能及时了解每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必须是你们主动地区作战。为了消灭敌人，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敌人，枪声就是命令。失去了指挥，你带着部队必须主动去靠拢。如果你不去，那就是消极。这个战斗，大的方面，小的方面都非常不容易。纵深战斗，谁能指挥谁啊？怎么知道啊？我当师长打天津，我知道你这个营，这个连在哪里啊？遇到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打的方面也是一样，在辽沈战役中打廖耀湘兵团时就是这样。

训练中的内容，这些东西都要用上。攻坚，缺一不可。没有爆破，怎么行？经过这一段训练，别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个部队差不多连一下，人人都可以爆破，拉出一个排就可以爆破，动作很快。战斗作风，战术思想，一点两面，四组一队[⑥]，四快一慢，全部都有了。我们面临情况时必须这样。

第二种情况，敌人在驻守，要跑不跑。跑的敌人怎么打法？这还没有走的敌人怎么打法？都有很具体的规定。要跑的敌人，你就猛追它，把它切开；对于没有跑的敌人，你还是要作准备，不能打莽撞之仗。第三种，对于逃跑的敌人，你就不顾一切地猛追，穷追不舍，一定要全部歼灭。三种不同的情况，这很具体了。我们在东北就按照这种思想打了硬拼仗。什么叫硬拼仗？我们打锦州时，塔山阻击的部队就是硬拼的。你不能上来，上来我就和你硬拼。人在阵地在，人不在阵地还可以在，还可以上。黑山阻击战，硬拼！你不能来，阵地不能丢失，这是硬拼仗，这是一种方法。另外是灵活机动，毛泽东讲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战场上要敢于打有命令的胜仗，这个好说；要敢于打没有命令的胜仗，这个就比较难；还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你瞧，就是这么些问题。什么道理呢？举一个例子。六纵队的黄荣海[⑦]，当时是副师长，按照原来总部的命令打敌人就打不到，敌人跑了。黄荣海副师长说，情况变了，我们就不能按照原来的，只有违抗原来的命令，才能消灭敌人。结果按他的打法，违抗了原来的命令，消灭了敌人。这样就打官司了。纵队说你违抗了命令，总部的命令不是这个样子。他也不服，说我消灭了敌人，情况就反映到总部。这样，我们字啊哈尔滨开会时就讲这个问题：你去作战的目的是什么？作战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这就是总的前提。你要按照原来的命令，敌人跑了。是死死执行命令让敌人跑了好呢？还是按照实际情况消灭敌人好呢？所以就给黄荣海平反了，他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很难，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后来我们很多个战役，就举了这个例子。敢于这样，根据实际情况打仗。又规定，一个是死打硬拼不许动，一个是灵活机动。一个指挥员对上面的命令，自己不灵活机动，还死死地拿着那个命令，就不行。所以要积极地独断专行，积极地配合友邻。我们在东北练这一套东西。我们的部队真是练得滚瓜烂熟，人人都知道。我们回到部队以后，政委他们就去管政治了，做思想工作，后勤工作，这些我都不管了。我这个师长和团长们就坐在四平，按照一个师的战斗步骤，分练、合练，分练、合练，那像真打仗一样。我们全是真枪真炮实弹地打，手榴弹都是打真的。纵深战斗，攻这个房子，先扔几个手榴弹进去，再杀进去。就这样打，完全和打仗一样，真是练为战，不为看啊。运动中规定要告诉战士们：我们打的都是真的，目标就是那个地方，匍匐前进。这个枪规定就是一公尺高，打过去，你必须是匍匐前进，不能站起来。你如果是弓着腰走，就把你打死了。这样练，就能够利用地形匍匐前进。土工作业就很熟练了。我们练半年时间，3 月份开会，4 月份回来就练兵，9 月份走的。这一年战斗动作、战术思想、战斗作风、五大技术，全体指导员都很熟，所以这个部队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后来都是不错的。部队就是雷厉风行，强调严格地执行命令，严格的纪律，谁也不许马虎。

经过 1948 年半年练兵，对我个人来讲，对不对来讲，都有一个新的飞跃。我在延安时，思想上、政治上一个飞跃。这次对我个人的军事思想，指挥部队作战又是个飞跃。这样我就有办法了，什么办法都有了，什么情况怎么办，脑子里有一套东西了，原来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经过这次练兵之后，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

①王明德 建国后历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团长、副师长、师长，五十四军副军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②刘亚楼 福建武平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上将军衔。1947 年 2 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8 年 1 月起，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林彪在东北战场总结的“六大战术原则”之一。指根据敌人三种不同情况（防御、退却、要退而不退），采取三种不同的攻击方法（不打莽撞仗，要打莽撞仗，半打莽撞仗）。

④一点两面 林彪“六大战术原则”之一。一点，指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以保证一定打垮敌人。两面，指至少从两面，兵力多时可以从三面、四面包围敌人，既保证打垮敌人，又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

三三制 林彪“六大战术原则”之一。如将一个班编成三（四）个战斗小组，每组三（四）人，以便于班长指挥，小组灵活机动，各组互相支持。

⑤四快一慢 林彪“六大战术原则”之一。四快是：向敌前进要快；攻击准备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敌人要快。一慢是：总攻击一定要在准备好了的情况下才发起，如果尚未准备就绪则宁可慢一些。

⑥四组一队 林彪“六大战术原则”之一。指以连为单位，设“四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持组，合起来为“一队”突破队。

⑦黄海荣 江西万安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东北野战军六纵十八师副师长。建国后历任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师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四十二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广州市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委。

三、攻克锦州

1948 年 9 月，辽沈战役开始。我们从八面城、四平附近出发，参加攻打锦州。走了半个月时间，到了大凌河东面，离锦州也不远了。段苏权这个人实在是好，党性强。那天下午开会，敌人飞机在飞，我就提议：“段司令，咱们部队下午过河，天黑以前过河，晚上过河容易乱。”段司令说：“不行！”他怕暴露目标，当然也是对的。我指挥部队是怕乱，晚上过河不好办，淹死了人都不知道。我说：“好吧，白天不行，就晚上过。”晚上过大凌河就碰上炮师，他们是配属二纵队五师攻打义县的。部队占领义县往锦州移动。那些家伙插队呀，谁都不让谁，抢路！部队行军抢路，搞得疲惫不堪。第二天拂晓，我们纵队三个师一下子出现在锦州外围。我这个师到了葛文碑，歼灭敌人约有六、七百人，任务完成了。二十三师打得很漂亮，一下子就占领锦州外围的大紫荆山，小紫荆山，歼灭敌人一个连，这对锦州威胁很大。

占领小紫荆山之后，副团长韩风[①]，还有个营长，有个连长，大家麻痹了。打完之后没说赶快做好工事，作好准备，防止敌人反扑，大家就在那里休息了。疏忽太多，因为他们打得很顺利，歼灭了敌人，占领了这个山头。由于没有准备，敌人来了一个反扑，上来一个营，一下把他们打下去了。打下去问题就大了，后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团长撤职，赶大车。营长也撤了，连长枪毙！锦州三件事，这是第二件。第三件是我们八纵队攻打锦州的时候，没有按时突破。我们八纵队前进到锦州的时候，东总发来一个电报：“迅速占领飞机场。”锦州当时有两个飞机场：一个是锦州西部的飞机场，实际使用的；一个在锦州北面，不用的。发这么个电报来，段司令这个人就是太本份了一点，又发电报问了一下：“两个飞机场，我占领哪个飞机场？”这下刘亚楼火了，下命令叫九纵占领飞机场，上去了。打下锦州之后就挨批评了。

当时小紫荆山失守，纵队没敢报告。为什么不报告呢？当时说："我们收复回来之后再报告。"说错也不错，但这个在当时是不行的呀！后来总部都知道了，刘亚楼就拿着电报报告林彪："糟糕，八纵队小紫荆山失守。"林彪就火了："他的司令官跑不掉！"所以罗荣桓到八纵来了，这是实情。敌人想占领小紫荆山、大紫荆山。还好，大紫荆山，我们师上去一个团，我让张谦道他们顶住了敌人。要是大紫荆山也失了，那问题就更大了，锦州外围嘛，制高点哪！这是打锦州，我们八纵队丢脸！打锦州，我们这个师打的很漂亮，俘虏敌人二千多人，俘虏了一个敌九十三军的军长，好象是七十一团俘虏的吧，纵队给我们的任务，把北大营打下来。派了七十团去打，很顺利地把北大营的敌人歼灭了。然后，纵队命令把东大梁打下来。东大梁实际上是整个锦州防御体系的纵深，所以我们打得很残酷，伤亡很大。我这个七连冲上去一下子就伤亡一大半。战斗激情太高，不到时候就上去了，一打上去，敌人反扑，来回地争夺，两方在拉锯。陈运春和卜占亚[②]很好，打北大梁的时候，敌人一个团反扑上来，两人带着部队一下反击过去，把敌人打下去。东大梁我们控制住了，锦州东北部就安全了。为我们二十二师、二十三师攻打锦州城造成了很有利的条件。我的这两个团打得很漂亮。后来我在北京，段苏权对我讲：锦州东大梁附近的老百姓自动给我们二十四师修了一个纪念碑。

①韩风 时任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副团长，被撤职的是团长张峻岚。韩建国后历任一三四师四〇一团团长，五十四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军长，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

②陈运春、卜占亚时分辨任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政委。

卜占亚建国后历任四十五军一三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师副政委、政委，一三四师政委。1960 年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3 年后历任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70 年 4 月调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见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年 12 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72 年 10 月停职审查，被令交代"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问题。1973 年 2 月，在压力下虚构"上了林彪贼船"的一些虚假情节。同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批林批孔整风问题的中发[1973]12 号文件，称：卜占亚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经过揭发批判和教育，他的态度有所转变，对他的进步，中央表示欢迎，鉴于他继续留在湖南工作有所不妥，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同年 7 月，任兰州军区副政委。1979 年 2 月改任顾问，翌年 1 月免职。后经本人反复申诉，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南省委于 1982 年 12 月发出文件，认为卜在湖南工作期间有错误，但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的问题。中共中央亦同意撤销中发[1973]12 号文件。

四、围歼廖耀湘兵团

撤出锦州，我们过了大凌河之后，部队前进到离黑山不远的位置。当时十纵梁兴初他们打得很苦。三十师贺庆积[①]、孔石泉[②]他们和我们二十二师联系：我们打得很苦，伤亡很大，你们来保证我们右翼的安全。孔石泉当时是师政委。我们就上去了。打的是谁呢？新六军二十二师。硬对硬，碰上了，打上了。要是我们的二十二师晚一点去，黑山就很危险。我们是随时走，随时做工事，走到哪里做到哪里。哪有什么睡觉不睡觉的，有时间就打瞌睡，没有时间就干啊，非常紧张。六纵队黄永胜、李作鹏[③]，李作鹏兼十六师师长。他的一个侦察连一下打到廖耀湘的司令部。这个连大部分伤亡了。廖耀湘搞得莫名其妙，哪里来的解放军？不管是哪里来的，事实上就给他打乱了，廖耀湘带着部队就逃跑啊，一打乱，六纵的十六师等其他部队就上来了。这一下就把整个廖耀湘指挥部打乱，电台也打乱了，廖耀湘没办法指

挥了。新六军军部也打乱了，都乱了。我们呢？我们也乱了，大家就往有枪声的方向去，“呼”地往前攻。这时候，命令我二十四师迅速插到辽河边上，不能让廖耀湘兵团过辽河到营口。行军中，有时敌我都分不清楚，大家都只顾抢路，往前赶啊。那时辽南地区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到了不久，七纵邓华，吴福善[④]来了。邓华知道我来了，就把我叫去：“这个地区由我们负责，你这个部队迅速向铁路放心靠拢。”邓华说：“不能让廖耀湘的部队往沈阳跑。”这样，我的部队就往东走，走的过程中，廖耀湘兵团全部垮了。我们纵队的后续部队，二十二师，二十三师，纵队司令部都来了。我们就地摆开，就地打。那次打廖耀湘兵团，段苏权，邱会作、黄鹄显他们都亲自拿了枪打敌人啊！这个可不是假的。敌人乱跑，我们也乱了，谁都抓不到部队，都是在行进间打起来的，以乱对乱。我听说林彪有这样一句话。刘亚楼说：“乱了怎么办？指挥不到了，纵队找不到师，师又找不到团。”林彪说：“不怕，以乱对乱！我要廖耀湘！把廖耀湘抓住！”

十六师把敌人兵团总部打乱之后也没怎么打，伤亡不大。廖耀湘兵团歼灭以后，总部命令我们八纵、九纵迅速赶到营口，别让敌五十二军从海上跑了。部队不能休息，不能停着吃饭，不能睡觉，不顾一切疲劳，也不说一定要管着部队整整齐齐，反正有一个走一个，往前走，到营口就是胜利。这时候，辽南的独立二师占领了营口，九纵也占领了，我们还没到。当时东北的指挥就是这样子：叫你到哪儿去，不管有没有敌人，你必须到那个地方。这样，我、韦统泰[⑤]，七十二团都到了营口。一看九纵队在那里，没事了，我们又回来了，把部队收拢起来整训。

东北有这个特点，打了个战役，就要开会。先开政治部主任的会，师以上的主任，任思忠[⑥]他们都去了。开大会总结，表扬好的，批评差的，那时候是一点不客气的。大会上，刘亚楼批评我们八纵队说：“你们八纵队，吃饭是用鼻子吃，还是用嘴巴吃啊？”什么事呢？就是为锦州飞机场。按道理是不该问，有用的飞机场你去占领，没有用的飞机场你去占领干什么啊？所以说组织观念太强，上面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上面没有指，我就不管。他这点理解不够，段苏权啊！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各部队开始休整。东北敌人解决了，华北怎么办呢？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大意是你们消灭了东北的敌人，很好！现在问题是华北的傅作义有五、六十万部队，你们现在就进关来。到华北消灭傅作义！利害关系非常清楚。当然了，当时大家劲头都很足，不休整了，走哇。这样，1948 年 12 月，进关！进关路上，我们已经快到长城了，又有命令把段苏权调回沈阳。这样，我们在东北的战争就整个结束了，我们进关了。

①贺庆积 江西永新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惟贺时任东北野战军十纵二十八师师长，三十师师长应为方强。

②孔石泉 湖南浏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东北野战军十纵三十师政委。建国后历任总政干部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副院长、政委。文革中历任广州军区第四、第三、第二政委、政委，成都军区第二政委、顾问，济南军区顾问。并曾兼任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广东省委书记。

③李作鹏 江西吉安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东北野战军六纵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建国后历任第四、第一高级步校校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文革中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军委办事组成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 年 9 月受“九一三事件”牵连被撤职。1981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

④吴福善 江西吉安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东北野战军七纵政委。

⑤韦统泰 山东曹县人。1938 年参加红军。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时任东北野战军八纵二十四师七十团（后为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一三五师参谋长、副师长，一三〇师师长，五十四军副军长、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机部军管会主任，七机部革委会主任。1972 年中央批林整风会议后受诬陷，被羁押两年八个月，1978 年彻底平反。

⑥任思忠 四川达县人。1934 年参加红军。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时任东北野战军八纵二十四师（后为四十五军一三五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一三五师副政委、政委，政委兼师长，一军参谋长、副军长，四十二军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1975 年 3 月调任济南军区政委，同年 8 月改任副政委，1983 年至 1985 年为济南军区顾问。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委。

第六章 进关南下

一、断敌退路，包围天津

我们是 48 年 12 月底到天津，军部驻宝坻。这时候就开会，一到军部，黄永胜在那里。段苏权不是调走了吗？黄永胜又来了，坐在那边。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来反正是指挥我们这个部队吧。那时候，我们改称四十五军了[①]。分配我一三五师的任务，是沿着天津周围过去，插到天津和塘沽之间，具体位置叫白塘口。“你到那儿设防，你的任务是不能让天津的敌人跑掉，跑到塘沽去。如果跑掉的话，你负责！晚上立即出发。”我和韦祖珍两个人坐车，那时我们有吉普车了，不一样了。坐车到路上翻了车，翻到沟里面去了，马路两边不是有沟嘛，正好把我俩扣到沟里面。什么事也没有，老百姓帮我们把车翻过来，我们又回到部队去，一点伤也没有。我们的任务要急行军，从天津周围走。我开始和师部一起走，后来我和吴瑞山两人坐车走前面。走了一夜，快到天亮了，一下冲到王庆坨。老百姓说，哟，国民党才走，你们就到这来了！部队占领了王庆坨，哪儿有条子牙河，抢着过这个桥。四〇三团走前面就打起来了，攻打杨柳青车站，天津外围的车站，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打下杨柳青之后不能停，还要赶路，白天走一整天。四〇三团打了杨柳青就变成二梯队了，四〇四团走前面。当时四〇四团团长不是陈运春，是冰野了，换了。走着走着，前面又不动了。怎么不走了？我就往前走，到前面卡看，看见他们主任张家水，原狼牙山七连的老支部书记。我问：“怎么不走了？”他说：“这里有很多很多马车，有县政府的县长，有保安队的，一大片，多得很，怎么办？”“走，你不要管他。要他干什么？马车你要嘛，要一辆也可以。其他什么都不要，走！怕他跑？他往哪里跑？往天津跑？这些人没有用，没有战斗力。”耽误了一点时间，我就很生气。这时什么都不能要，“告诉冰野，快走！”

这一夜一直走到天亮。到王庆坨，占领杨柳青，到了白塘口之后，迅速做工事。怕敌人向塘大沽口方向跑了。因为当时侯镜如兵团在大沽口方向，在海里坐着船。一个是那边不能进来，一个是这边不能出去，我们一个师部就单独地过去了，也是总部直接给的任务。到了第二天，四是六军的詹才芳[②]，李中权[③]他们来接替我们的任务说：“我们负责这个位置了，你们走，归建。”这是天津的东南方向，我们又围着天津转一圈，转回天津北边，转到民权

门这个方向。到达后，军部就开会了，决定攻打天津。对天津的整个部署：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在一个方向并肩攻击；四十四军、四十五军由黄永胜、邓华统一指挥。我们这两个军并肩攻击；还有四十六军和四十九军的一个师，他们在天津南攻击。这样一共五个军加两个师。

我们这个军像两把尖刀。当时的任务是一三三师、一三五师并肩突破，攻打民权门。在民权门外围大概两、三百公尺，敌人有一个加强营，住在范家祠堂，也叫范家堡。我给四〇五团的韦统泰、荆建、韩怀智[④]他们的任务，是把它拔下来！当时郑金海是副营长[⑤]，刘九龙是个班长。四〇五团经过准备，土工作业，爆破。当然，炮兵支援就不是他们的事了。师的，军的，还有四野炮兵，他们在那里搞试射，试炮。准备了一下，四〇五团只用了两个多小时把范家堡的敌人全部歼灭。那打得真是漂亮，我们伤亡不大。为什么打得这么漂亮呢？要回到名为在八面城练兵的“五大技术”、“四组一队”、“四快一慢”，运用上了。土工作业，尽量往前挖。爆破，进去手榴弹一阵打，把敌人打得懵头转向。不仅歼灭敌人干净利落，而且部队的战场纪律非常好。缴获敌人的饼干啦，一些吃的东西都没有动。这就受到四野政治部的表扬：四〇五团，政治纪律好！

四〇三团在旁边也歼灭敌人一个排。这样我们攻打民权门的外围就扫清了。我们军指挥所搬到范家祠堂过去烧砖留下来的五个大窑里面。我们就靠在前面。战前准备很充分，时间很长。我们观察地形，侦查敌人的一些工事。当时天津守敌的工事很好，给我们造成伤亡最大的就是地雷。地雷好像地里的西瓜一样，他们来不及埋，遍地都是。有个护城河倒是不起作用了，因为天气冷，冻住了，还有铁丝网、鹿砦、土墙，土墙不高，上面一溜碉堡，敌人炮火纵深支援。

二、突破民权门，攻占金汤桥

我们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四〇三团第一营为攻击部队，一个尖刀连三十个人。我们的交通壕挖到敌人铁丝网跟前，每天晚上挖呀，一直挖到跟前。这样炮火一打，我们的爆破手就像平时演习一样轮流爆破，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把铁丝网炸开了几十公尺，开阔通道啊。铁丝网炸开了，鹿砦炸开了，河是可以过去的，没有问题了。炸开之后，按原来的部署，炮火准备 10 点开始，要打两个小时。但爆破非常成功，只有一个战士负了轻伤。炮火一打，没有命令，第一连“呼”地就上去了。这一下把我们搞得很被动。一下子冲进去后就困难了，这炮就不好打了。怎么办呢？营长康文庆迟疑不决，第二梯队没有迅速跟上去，一下子隔断了，被封锁了。当时这个连在里面呆了两、三个小时，很困难。哎呀，把我们气得要命哪！后来把这个营长撤了。这个营；立了功营长撤职，你没有及时上去啊，这个营富国跟上去了，营为单位，那就不要紧。搞得不好，敌人封锁死了呢，这个连就被敌人消灭了，非常危险。

过去新六军在东北时常用这个战术。让你打进来，打进来把口一封，进去的部队全部消灭。它善于这一手。天津时，我们打这个部队，七十一军二十六师，战斗力不算很强。加上我们炮火这么猛烈，它又不是很厉害的，这样我们争夺以后就上去了。接着，四〇四团从左翼进去，扩大、突破之后，前面的部队径直前进，后面的部队撕大突破口，这样部队才能够上来，才能够进得去。四〇四团一进去，就扩大突破口，向左右扩大，四〇三团全部进去了。所以我们突破民权门才用了三分钟，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没有按计划，先打进去了，把旗一插。这样按道理是不对的，但打进去了，后来也没有怎么说他们。这面旗烂得一塌糊涂，现在这面旗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四〇五团整个团都进去了，那时候打天津就不一样了。有了榴弹炮、一〇五和一五五榴弹炮，配备给我们三辆坦克，还有工兵，什么都有。那坦克

16 吨重的，这也有用啊。因为到了纵深之后，敌人有些碉堡，坦克开过去就不怕，机关枪对坦克是没有办法的，“咚咚咚”，冲一冲，把它冲倒


【圖4】1949年3月，與戰友在解放後的北平頤和園昆明湖前。左三丁盛。

当时军里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开这个口子。第二必须占领金汤桥和金刚桥。占领两道桥之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为什么呢？因为三十八军、三十九军从西面突破跟我们会师。所以他们到那个桥，你也到这个桥，两个部队会师。这样一下子就把陈长捷的防御体系，东南西北给截断了，分成了豆腐块。任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部队按时打到金汤桥，四〇四团七连被誉为“金汤桥连”。


【圖5】1949年3月，在解放後的北平與戰友合影。左二丁盛。

打天津，我们这个军大约俘虏有两万人。当时我们有四个师。我们这个口子撕进去了。一三三师呢，没有突破，没有打开。所以一三三、一三四、一五八师、炮兵、工兵，统统从民权门进去。进去以后就扩大了，那边工厂区都被我们占领了。所以整个天津，准备的充分，一切任务都在战前分配了。和别的战区打仗不一样，不是临时分配任务，从开始到结束战斗，任务都区分开了。

打下了天津，大家都很高兴了。打完天津之后，部队未休息就撤出去了。我们到了王庆坨，军部在杨柳青。补充俘虏就多了，主要是补充我们这几个师，其他一五八师，他们伤亡就小点了。我们这师伤亡最大，伤亡三千多人哪！我们锦州伤亡一千多，加起来就五千哪。一个师有多少战斗部队？就说有一万人也好，主要是战斗部队伤亡大，机关没有什么伤亡的。打天津之后，我们就猛补充，也没有什么教育，抓住了俘虏之后，帽徽摘了就行。结果国民党部队变成了解放军了。我们这个师，每个连补充到一百八十个人，没有限制，上面也不管，你能补充多少就补呗，一个师一万多人。为什么搞这么紧张呢？总部命令我们这个部队准备攻打北平，参加战斗。呵，紧张！所以当时来不及了，什么清查俘虏，了解军官，哪有时间去搞？反正是俘虏就抓起来，抓起来就一层一层地交给他们。很紧张，很有意思。准备打北平，傅作义那时候还在谈判，还在犹豫。打开了天津之后他才动摇的。他以为天津可以守半年，结果刘亚楼二十九个小时把天津打下来了。五个军另两个师有十几万人，陈长捷呆在里面没有办法。

天津打得时间短，纵深打得不多，主要是突破口，激烈。所以打天津，打民权门，它的工事是标准工事，纵深除了铁丝网、鹿砦、地雷，里面的堡垒是一群一群的，大概是八十公尺到一百公尺。这么个纵深，很难打。当时是夜晚，看不见，趟雷什么的，伤亡大。另外，

就是敌支援炮兵给我们伤亡大。那种一〇七化学迫击炮，那个炮弹下来，心都是悬的，那炮很厉害。所以攻打天津，敌人工事很坚固，“固若金汤”，敌人硬是这么讲的。打天津要像打锦州那样，你不要想！“我的工事好，你不容易打下来。”侯镜如在外面等着看情况。我们打下来之后，侯镜如跑了，傅作义软了，就谈判了，这样北平就和平解放。

所以我们打天津伤亡很大，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营长是四〇五团一营营长景德胜，和赵希武[⑥]一块的陕北小红军，牺牲了，很勇敢。另一个是四〇四团，抗战后我带出去的老一团，牺牲了一个营长刘凤臣。四〇三团牺牲了一个教导员张进才，也是我从延安带出去的。连以下的干部，带伤、带亡三千多人，当时数字是这样。后来也没有核对，也没有时间去搞。天津战役我们攻得很艰苦，所以我们在天津得到总部的表扬。这是标准的攻坚战，我们那一套五大技术、爆破、土工作业，全部用上了。“一点两面”突破，组织攻坚部队，全部用上了。扩展战果要快，撕大突破口，全用上了。我归纳起来，这些都是在八面城练兵的结果，这一套会了。那时我们通讯联络都是背个很大的通讯机，不是现在拿在手里可以讲话的那个东西，那时刘中山当报务员，打天津时，敌人的炮弹把他屁股炸掉一块肉。他腰里面还有个弹片没有取出来嘛。总部的表扬，这个师比较年轻的，没有太多的经验，打得不错，就这个意思。

打下天津之后，黄永胜走了[⑦]。我们也没有问，到哪儿去了？那时谁也顾不上问这些事情，除了开会，我们也不去军部。他们在杨柳青，我们在王庆坨，在天津王庆坨过的春节。

①四十五军 1948 年 11 月，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在辽南地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所辖各师，依次改称为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一三五师。同时将冀东的一个独立师拨归四十五军，番号为一五八师。军长段苏权（19484 年 12 月为黄永胜），政委邱会作。一三五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副师长吴瑞山，参谋长徐其海，政治部主任任思忠。元二十四师所辖的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依次改称四〇三、四〇四、四〇五团。

②詹才芳 湖北黄安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四野四十六军军长。

③李中权 四川达县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时任四野四十六军政委。

④韦统泰、荆建、韩怀智时分别为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团长、政委、副团长。韩怀智 1973 年参加八路军。1948 年后历任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副团长、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师长、师长，五十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总参谋长助理兼总参军训部部长，副总参谋长。1988 年授中将军衔。

⑤郑金海 建国后曾先后任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团长、副师长，一六〇师师长，五十四军副军长。

⑥赵希武 建国后历任一三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1963 年转业授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

⑦黄永胜 1949 年 4 月升任四野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即离开四十五军。

三、打过长江去

打了天津过后，准备南下。过去的老兵，包括营连干部，思想波动很大。我们部队总的来讲河北人多。抗战时期，我们带出来的都是河北人。这下问题很多："我是抗战出来的，当八路参加了抗战，我们到了延安，我们也解放了东北，现在该回家了。""不想干了，家里还有老婆，还有孩子，还有老母亲。"道理都很充分的。他们家里来人，母亲带着未过门的媳妇来了，有的是过了门的媳妇来了，那时多得不得了，挤挤乎乎，哪儿的人都来了。那些人倔啊，母亲给儿媳下命令说，你去，不把你丈夫弄回来，你就不能回我家，我就不要你了。本来我们做思想工作，一些干部说："老婆来了就住上呗，住上几天叫老婆回去。"有的就想通了。住了几天之后呢又反复了：我还是不去，我还是要回家。这些老婆也很厉害，都是年轻人，倔啊。老婆和丈夫同床，用个什么办法呢？她说：我不跟你脱裤子，你不回就不行！什么办法都有。

总而言之，打开天津之后，这一部分人思想混乱。毛泽东不是讲"将革命进行到底"吗？我们就讲道理，道理归道理，具体归具体，实际上是有这个问题。年纪有二、三十岁了，有的结了婚，有的没结婚；有的当国民党的兵，有的当共产党的兵，家里人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还有的过去当汉奸队，到我们部队上来了，地方上抄他的家。他说："你看，我现在当了解放军，我家里搞成这个样子，这怎么办？我不回去行吗？"这些都很有道理，但地方不知道啊！抄家的，批斗的，你说你儿子当了解放军，谁知道啊？他要回去，要解决。但是不能回去，写封信可以，这思想非常多。我们一三五师南下时，跑了一个营长，营长逃跑了，连干部和战士都有逃跑的。方一川讲，那个营长是他抓回来的，方一川就是负责这个，在后面押这些人，收容嘛。这个人也是我从延安带出去的，叫张振林。我批评他开小差："你怎么搞的？"他说："我实在想家呀。"好吧，也没有什么，背锅吧，当伙夫，南下。总而言之，我们还是把部队都带着南下了。逃跑还是有，也没有枪毙，解决具体问题。有的问题就解决不了，那怎么解决？什么大道理，小道理？你说哪条不对？我当兵这么多年，我要回家，老母亲没人管，老婆没有人管。我有未婚妻，我再不回去，她就不要我了。这些也不是歪理，也都是很具体的。但我们说，你们都回去了，我们部队怎么办啊？都走了，还要不要到江南区？我们都是南方人，毛泽东的家乡都没有解放啊，这样讲。

有些解放战士是南方人，又当了骨干。我们从东北进关的时候，就布置关里人注意关外人。关里的人他不跑，他高兴啊！关外的也想回家。这南下以后，北方人不愿意到南方，南方人愿意到南方。南方人不会开小差，他往哪儿开？他到南方很高兴啊！北方人呢，当时传说又很多，说南方太阳晒，鸡蛋一放就熟了；蚂蟥有多大，一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蛇到处都是，跑到床上。也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这些胡说八道。蚂蟥是有，蚊子也是有，蛇也是有，太阳也是热，这都是事实，但不是夸张的那样厉害。那些人说："我们害怕，我们过不惯。""不是，我们是南方人，蛇不是到处都有，蚂蟥、蚊子也没有那样大。""反正我不去。我就是要回家。"我还记得一个人，我们在热东的时候，打白庙子战斗，有个当班长的战斗英雄。打了天津，他想回家，跑到我那里来装傻捣乱。"小于子"，我抬起手来打他一下。"啊，你真打我呀。"哈，他不傻了。什么原因？想回家。他们也不背后讲，当面公开讲："我就是要回家"。讲什么大道理也讲不通，当时情况就这个样。这样，解放兵也好，老兵也好，让南方人注意北方人。大道理也对，小道理也对，最后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个人服从组织，南下了。

这时，我们军的领导来了。军长陈伯钧[①]，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参谋长原来是黄鹄显，到一三四师当师长。从东北派了个参谋长，叫雷震[②]，湖北人，又从四十军派了个师政委，叫李改[③]，派到我们军当第一副主任。军领导班子改了。我这个师没有动，一三三师师长调走了，原来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他是老中央警卫团的，打下天津之后调到平津卫戍司令部去了，师长从三十八军调来一个人。一三四师师长不行，调了黄鹄显当师

长。军事领导有变化。

4 月份南下。我们在天津王庆坨整训了近两个月。大道理也讲了，战士们也懂得；小道理也讲了，我们也懂得。最后，我们的指战员还是好，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地南下。当然，开始几天还是有开小差的。不是有个营长开小差吗？这是老八路啊！这人年纪比较大了，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叫张振林。我问他："你老同志为什么开小差啊？"他说："我部队。我是参加了抗日战争的，现在东北解放了，到这里来。我为什么开小差呢？我感到对不起首长，对不起大家，但是我实在是想家。我年纪比较大了，有 30 多岁。家里有很多人要养。"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处理他，算了吧，当伙夫呗，背个大铁锅，走，。这样除了少数人以外，部队就顺利地南下了。

南下的过程，部队是天天行军，比较太平，没什么战斗，当然防空还是有的，指定防空的火力，还是有的。一般每天走六、七十里路，地方上一站一站安排好了。这一站到哪里，有多远，根据住房的情况，村子有大有小，今天可能走 60 里，明天可能是 70 里，后天也可能不到 60 里。根据村子和粮站大小，来安排我们行军的路程。我们从天津王庆坨出发，一路上过阜阳，属于安徽；阜阳之后到河南的固始；离开固始又到了安徽的商城，商城翻山又到了河南的光山。秦经玉他们就是从那地方来的，来了一批河南人。光山一直往湖北走就到了黄冈，在赤壁之战那个地方渡江。那时，四十三军早过了长江，江南岸没有敌人了。我们正面这个地区没有敌人了，所以是和平地过了江。渡江后住在鄂城，一路上，沿途老百姓、地方政府安排，食宿都很周到。有些村老百姓都出来欢迎我们，欢送我们，对部队士气有鼓舞作用。这样，我们领导人没费好大劲，住宿什么的都搞好了，我们不用干什么事情。所以这一段就比较简单。

到了鄂城，江南了，这里风俗习惯就和江北不大一样了，属于南方的气候习惯了，但和真正的南方又不完全一样。我们在鄂城休息了将近一个月，习惯一下南方的生活，然后就全军南下了。从鄂城出发，经过湖北的通山。这个县在幕阜山底下，翻山过去就是江西的修水，很大的一座山。当时我们四十五军的两个师，一三五师走幕阜山，下去就是修水；一三四师是走九宫山。一三五师翻幕阜山那天搞得很苦，下雨，幕阜山又高又大，路很窄不好走。我到前面看一看，路只能单行走，骡马不好走，胶皮轴辘大车就不行了。这样大约走了两天，下山之后，就是江西的修水县，有修水河，下大雨涨水，那时没有船，也没有桥，部队就只能涉水过河。这时，部队就开始尝到江南的滋味了，下雨，天气热。我们从修水的铜鼓，问地方部队，说敌人才走，我们没有赶上。铜鼓虽然是个县，但怎么这么小，没有多少房子，没有几家人。我们就没有停，部队继续往湖南浏阳方向走。路上遇到敌七军的一支后卫部队，他们也走得很快，我们没撵上，让他们跑掉了。到了浏阳也没有停，直接就到了萍乡。这个行军就和在江北不一样了，处于战争状态，随时都可能遇到敌人。

①陈伯钧 四川达县人。1927 年参加秋收暴动。1955 年授上将军衔。1948 年 12 月至 1950 年 4 月任四野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1949 年 4 月至 1950 年 3 月兼第四十五军军长。

②湖北黄陂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调四十五军前为吉林军区参谋长，1949 年 3 月至 1950 年 11 月任四十五军参谋长。

③李改 湖南茶陵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调四十五军前为四野四十军一二〇师政委，1949 年 4 月至 1951 年 8 月任四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四、兵临湘赣

从鄂城，经幕阜山、修水、铜鼓、浏阳，到江西的萍乡。这一段天气又热，6、7 月份了，蚊子的味道也尝到了。行军路上，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也没有时间休息，就开始发病了，有发疟疾的，有烂脚的，有烧裆的。这个烧裆很厉害。记得我这个师病号还不很严重。到萍乡之后，总部通报，有的部队减员很严重，病号很多，百分之三、四十，多的甚至达百分之五十。整个四野部队都停下来，不能前进了。总部就决定第四野战军过江之后，都在萍乡一线休息，突击治好这些病号，适应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我们南下时，没有雨具，没有蚊帐，也没有防治蚊虫咬的药品，什么都没有。总部采取了很多的措施，第一是防止打摆子，发疟病，吃奎宁片。吃药的时候，部队要站队的，因为战士不懂，不肯吃，于是就站队，张开口，卫生员看着一个个吃下去，这很有效。再就是发蚊帐，挂蚊帐。南方的房子和北方的不一样。我们在东北、华北时，房间的炕很大，一个炕住上一班人，二班挤在地下，那是很好的。南方不行，一个是房间比较小，一个是潮湿，也没那么干净。南方普遍习惯了，卧室都有尿桶，很脏，而且猪、农具都在房子里。一下雨，“哗，哗”天井直漏水。适应这种环境不容易。蚊子、跳蚤就多，所以就发蚊帐，没有水壶的发水壶。

走了一段以后，领导上看到我们在北方的装备不适应南方的道路了。我们在东北、华北时，每个师、每个团都有胶皮轴辘大车，到了南方，胶皮轴辘大车就不行了，哪有路啊！于是就改大车为驮马，驼骡，要做很多很多鞍子、垫子，很麻烦。装备不适应，要改装，有的东西就不能要了，堆在后边了，这样才能适应南方的情况。经过短时间治疗，战士们还年轻，适应环境也还是比较快的。病号大致恢复体力了，吃得好一点，战士们高兴。这时总部发慰问信、派慰问团。我们一三五师在萍乡，记得总部政治部的一个部长带钱来，战士每人一斤肉，慰问说：“大家辛苦了。你们的辛苦，我们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战士们一听就高兴，“哟，我们的艰难困苦，毛主席都知道，总部都知道。”这样对大家很大的鼓舞。

通过对部队进行南方环境的教育，大家还是认识了。南方的气候也不是那么恶劣，山是很大，但是幕阜山那么大，我们不也过来了吗？这样，大家就适应这个气候，适应这个条件了。政治教育讲我们的任务。我们四十五军驻在江西萍乡地区，我们一三五师住在萍乡，一三四师住在芦溪，军部住在上栗市，都在江西，一三三师住在醴陵，属于湖南。我们要打仗，我们要解放中南，解放全中国。正面的敌人就是白崇禧集团，白崇禧是反攻老手，我们就针对他。消灭白崇禧集团，其他部队就不在话下了。我们在北方是平原，走大路，南方是走田埂。北方人走田埂不会走呀。江西、湖南这些地方的路，上面铺个石板，下面因为种田，挖得有沟，不小心一踩就翻下去，连人带马。学走路，稻田里面走，学爬山，演习射击。在北方，我们是平射；南方山多，就不一样了，有仰角、俯角，向上怎么打？上了山往下怎么打？投手榴弹往上怎么投？往下怎么投？攻击敌人时怎么爬上去，怎么快？要适应南方的地形。训练我们的战斗动作、技术、战术。北方打仗要占领村庄。南方就不行，占村庄要吃亏的，必须要占领山头，无论什么情况，进攻也好，防御也好，必须要抢占山头。谁抢占上去了，谁就是胜利，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训练山地战。还要学游泳，南方江河多，有时候需要游泳。否则，过不去怎么办？虽然后来我们并没有渡河去打，但是这是必须要学的，大家学，会水不会都得去学。南方人一般都会水，北方人有的会、有的不会。北方有在江边住的，他也会，但很多人不会，所以要适应南方的地形。

经过了改装、慰问、体力恢复、训练，思想情绪好了。战术也适应南方的山地战、运动战了。南方主要打运动战，不是什么攻坚战。攻坚战，我们在北方学了，但南方的山地战没有好好训练。萍乡这一段，经过一连串训练，我们这个部队打山地运动战还是比较有特长，比较善于打这个仗了。

第七章 鏖战衡宝

一、向衡阳、宝庆开进①

改装好了，炮可以驮了，其他装备可以背了，人背马驮了，这样，中央就发动 1949 年的秋季攻势了。1949 年 9 月份，毛主席部署消灭白崇禧，这个战役网撒得很大。当时考虑什么问题？不能让白崇禧的部队往四川，往贵州，往云南走。这几条路必须要堵死！所以我们的右翼是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七军，他们从湖南过去，迂回的很远，走芷江方向，一直插到柳州。到柳州就把白崇禧到四川、到贵州的路切断了，这是大的战略布置。广州方向，就不能让广西的任何部队过海，到海南岛。毛主席提出“关门打狗”，把门关死，让它走不掉，关起它来打。

具体讲衡宝战役。当时我们是十二兵团，是萧劲光指挥的，刘道生和陈伯钧都是副司令。十二兵团当时指挥四十军、四十一军、四十五、四十六军、四十九军五个军，这五个军当时都在湖南、江西一直前进。四十一军从哪儿走，我没看到，四十军是从湖南的茶陵、攸县方向开进的。我认为，整个的战役开进很成功，很隐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这样大的兵团向衡阳、宝庆方向开进。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大战役开进，我们从江西、湖南都是路过湘潭、湘乡，向衡阳、宝庆前进，这步走的非常好。当时敌人飞机也来，但一般我们都是晚上行军，没有发现我们。过了湘乡以后，军里面就开会，布置具体任务了：兵团命令我们所有部队必须要在 10 月号，进到前面打响，这时规定，所有部队要接敌。对我们的具体任务，我们四十五军在水东江这一线突破衡宝公路。四十一军在黑田铺方向和敌人打起来了。我们在路上已打起来了，接敌了，零零碎碎消灭一些敌人。军里给我们一三五师师长、政委两个人布置任务：“你们一三五师直插洪桥。”这个洪桥是衡阳到桂林的火车路上的一个大站，只要占领洪桥，切断敌人归路，白崇禧在衡阳的全部机关、物资都跑不了了。他在整个湖南的部队要撤回桂林去就困难了。所以我这个师就是尖刀部队，直插敌后，断敌退路。这样我们就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你插进去后，部队两边走嘛。敌人必须来争夺洪桥，所以要准备和他们有一场硬仗。

接受任务之后，回到部队，我们就进行精简。当时一个山炮营不是胶皮轴辘马车拉，是马驮。就决定炮少带，弹多带，炮多了，没有弹没有用啊，带二、三门炮，一个连的炮，多带炮弹，那就有用。二是机关不能去的就不要去，病号不要去，尽量减少勤杂人员。那时我们师里有文工队，有很多女兵，身体不行的不能去。开会告诉各团，我们的任务比较艰巨，要准备单独作战，两面受敌，一面是衡阳的敌人，一面是桂林可能出动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准备艰苦作战。接着部队就开进了。10 月 3 日那一天就打响了。我们出发走了，4 日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直接到了衡宝前线，接近公路了。当时我们的右边，四十一军方向打得很激烈。我们的具体位置是花明楼，我看到右侧有白崇禧部队向黑田铺方向开进。我们在花明楼休息了一下。休息的时间短，原来规定部队休息必须架电台，这次因为休息时间短就没有架。我看一下，天还没有黑，就决定迅速前进。

按照我们的前进方向，到了洪桥，抢占洪桥，就是胜利。四〇三团作前卫，走到半山上，四〇三团参谋长王洪章[②]就回来报告：“前面有敌人，沟里面有敌人一个医院，怎么办？”我们师长、政委行军都在一块的，想了想说：“这个不要管他。”医院嘛，你管他干什么？留给

后面部队收拾，这是习惯了，也是规定的打穿插的部队不能管这些，不能因小失大。“走！”从山上往下走，走了一夜，南方的路不好走，天亮到了水东江。敌人没有发现，四〇三团就过去了，两边派出警戒。这时候，敌人有七、八辆大卡车，拉的是呢子衣服，从衡阳往宝庆方向走。我们把他们截住了，把呢子衣服全部缴获了。四〇三团不动，一面向衡阳方向警戒，一面向宝庆方向警戒，四〇四团作前卫。这样，第一梯队变为第二梯队，四〇四团作前卫往前走。5 日上午，师部到了灵宫殿，各团全部过了衡宝公路。

过了公路之后就架线了，架起电台报告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这是规矩。收到第一份电报，才知道我们整个十二兵团都在衡宝公路以北停止前进了，都没有过来，唯有我们一个师过来了。这一下我就感到这问题大了：衡宝公路是敌人的一道防线，封锁线，我们突破了，过去了，但后面没有过来呀，隔得很远，我们走了一夜，160 里地呀，怎么办？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命令赶快上山。部队占领山头，我们发报请示总部：“我们没有接到四号命令，现在越过了衡宝公路，住在灵宫殿，怎么办？”电报发出后，四野指挥部很快回电，这次特别快，说：“你们不要动，原地待命。”我现在还记得灵宫殿，山上有个庙。我们去看地形，各团都必须控制一个山头，不控制山头就不行。5 日晚上总部来电，“继续往洪桥方向插。”命令我这个一三五师归四野直接指挥。这个很重要，电台直接和总部联络，可以不和兵团或军联络，因为会耽误时间，他们当时也解决不了问题。

6 日我们起床，准备往前走。一起床，敌人来了，和四〇五团打上了。敌人有一个营，可能是敌一七一师或一七二师的，上来一下子就压到四〇五团团部不远，打起来了。韦统泰团长、韩怀智副团长他们从房子里跑出来，指挥部队一个反击，追了敌人有四、五里路，打下去了。这样就不能前进了，让敌人“粘”住了。我们就报告总部，我们是穿插部队，不能够恋战啊。我们把敌人压下去了，敌人也不知道我们什么部队过来了，也摸不着我们的底，所以当时也没有和我们恋战。这样，白天我们没有动，山上从灵宫殿出发向石株桥走。这时候，石株桥的敌人也刚走。从灵宫殿出发的时候，因为南方的路不能走两路，只能用一路队形走，这样一个师距离拉得很长。考虑这样不行，一路队形太孤单了，决定四〇三团走在我们的左侧，并肩前进，由参谋长刘江亭带领这个团[3]。刘江亭在四〇三团当过团长，他很熟，往前进。

①宝庆 湖南邵阳旧称宝庆府、宝庆县，1928 年（民国十七年）改宝庆为邵阳。

②王洪章 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③刘江亭 时任一三五师参谋长。后历任一三五师副师长，军事学院高级系学员、教员、副主任，高级兵团教授会主任，二十一军六十三师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总政军管小组副组长，二十一军军长，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

二、黏住白崇禧

实际上南方行军走两路，隔座山没有用，谁也不知道谁，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和北方的两路走是不一样的。刘江亭带一个团在我们左侧前进，我就带两个团走石株桥。到了石株桥，四〇四团走前面，打起来了。敌人一七六师和一七二师阻住我们，在那儿打了一天，进不去。我们部队从 3 日出发，就一直这么行军，几天下来都比较疲劳了，都 6 日了吗。四〇三团是单独走，刘江亭带一个营作前卫，一下插到敌人窝里去了，这个营和团失去联系。

这个团呢，当我们在石株桥时，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后来我就派参谋去找他们，就是 1994 年在南找来一起照相的那个张佑啊。他当时是四〇四团的一个参谋，找到了四〇三团。我们师的任思忠主任到四〇三团看一看，还有军组织部长林谦[1]，他一路跟着四〇三团走的。该团走得很疲劳，到了铜锣坪休息，一休息就东倒西歪地睡觉。任思忠到这个团看到部队在睡觉。非常巧，这时候山上来敌人了。任思忠一下子发现了敌人，连喊带催"赶快起来，敌人来了!"四〇三团拉上去与敌人争铜锣坪。这一打，刚刚联系上的四〇三团和我们师部又分开了。四〇三团分成了 2 股：刘江亭带一个营，插到前面去了。任思忠主任、林谦部长带团部和两个营又走了一路。石株桥打得很激烈，我也不能动。我们就报告总部，现在在石株桥，前面已经打了一天，过不去。总部就告诉我，周围现在有敌人四个师：一七一师、一七二师、一七六师、一三八师，这些都是七军的部队，七军很骄傲。同时，敌人从广东的乐昌方向又调来一个独立师，挡在我们前面。

打到 8 日，总部来了电报：你现在处境比较困难，周围这样多敌人围着你，洪桥也过不去，到洪桥切断敌人归路不可能了。现在，你们自己选路向西走。洪桥是向前，向西就是走黄土铺方向了，选择好阵地，打击敌人。总部知道敌人很多，令我们选择阵地，打击敌人，洪桥就不去了。这时我方的情况。白崇禧呢？从凌云上（敌七军副军长）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部队。为什么说我们的战役开进很成功，很顺利。突然进去一个部队，哪里来的呢？他不知道。过来多少人？他也不知道。我们的代号叫模字部队，模范的模。白崇禧认为是林彪的模范部队过来了，这对他有威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四〇三团分成了两股，我们这边一股是主要的。一下打起来，这里有解放军，那里有解放军，把他搞懵了。白崇禧判断不出我们过来多少部队，因为他没能俘虏我们的人哪。他不了解情况，因此就想逃离这个地区。为什么讲战役隐蔽开进，白崇禧没有发现呢？白崇禧原来在黑田铺和四十一军打，他把七军从耒阳、衡阳调到邵阳方向来，因为黑田铺离邵阳的公路很近，他就想在这个放向抓一把，发点小洋财。小诸葛嘛，想占点小便宜。1949 年南下时，四十九军一个师在湘潭吃了点亏，叫青树坪战斗。白崇禧大肆宣扬"伟大胜利"。他还想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抓一把，然后回广西。白崇禧是准备撤退，不是与我们决战，这是白崇禧的企图。

而林彪得到的情报呢？白崇禧部队从衡阳、耒阳过来了，是准备要与我们决战。我认为，他是错误的判断，白崇禧不是与我们决战，是想把部队调过来，占我们点小便宜，然后向西。这个错误的判断形成错误的决定，使整个十二兵团停止前进。如果不是这样，按照原来的计划，三个军并肩前进，我们很快就可以把白崇禧这些部队消灭的。三个军十二个师，我们每个军是四个师，每个师都有万把多人，因为我们在天津补充的兵力很充实。我们四个军，二野的五兵团，即杨勇兵团，就在我们后面作第二梯队。决战也不怕的。一下子过去十几万人，只要插到洪桥，插到湘桂公路，那么白崇禧在衡阳的整个部队都跑不掉。白崇禧可以坐飞机走，但他的机关跑不掉，物资跑不掉啊。因为我们在这磨了好几天，他衡阳的飞机、物资就得以拉回广西去，白崇禧所有的部队都可以顺利地回到广西。如果我们部队全部过去了，我们师也不会在敌人的包围之下，打那么 6、7 天。4 日过去的，5 日打起来，一直打到 10 日才解决战斗。那样，我们就没有这样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一三五师这样一个好战绩。

白崇禧发现我们部队之后，就下令全线撤退。但我们 3 支攻击他的部队，四〇三团的两个营，我带的两个团，在石株桥打一七六师和一七二师。实际上一七二师是跟着我们走，所以当时我们打了这么多的部队。他想迅速撤退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成了牛皮糖，粘住他了。白崇禧想走走不掉，想打又打不成，攻我们攻不下来，我守着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这个部队有战斗力，守着个山头，你白崇禧就不可能打下来。他的部署一下就给搞乱了。东走一下，不行；西走一下，也不行。这里碰一碰，哪里也碰一碰，到处碰到我们的部队和他打。因为

山地不是到处都可以走的。没有路，漫山遍野地走，那不行。这样，我们粘了敌人 6 天，10 日在黄土铺把他歼灭了。第四野战军本来是停止前进，准备和白崇禧决战的嘛，结果我们师一过去，四野部队又前进了，也把白崇禧部队打乱了。他原来想抓一把，一把没抓到，走又走不了，他的主力被我们歼灭了。所以这个战斗复杂得很。

①林谦 建国后历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后勤系政委，后勤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三、全歼“钢七军”

我们一三五师有这样前的战斗力，还是要讲八面城练兵，政治素质提高，军事素质提高。后来我们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部队士气高，虽然补充这样多俘虏，但骨干在，凝聚力很强。别人说我是“丁大胆”，我不是什么“丁大胆”，是我们这个部队胆子大，什么都不怕。在那样困难的环境，周围那么多敌人，大家都在一起，没有人向我提出“哎呀，怎么办呀？”这个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我们四〇三团一个连的一个排，40 多个人，被敌人围着打。打了一天，跑出来八个人，其他人全部牺牲，枪砸烂。敌人有多少，也不怕。这是部队战斗力强，意志坚强。

话说回来，我接到命令之后，当时四〇四团顶着和敌一七六师打。我让四〇五团走，当时他们在石株桥向北面警戒。从石株桥到黄土铺方向有一条很长的沟。我们往前走，到了下午大约五点钟左右，后面四〇四团打得很激烈，张进就到前面来问我：“师长，怎么走不动？后面敌人跟得很紧。”我说：“是啊，怎么搞的？我到前面看看。”我到前面看，四〇五团到了鹿门前。团长韦统泰、政委荆建他们都在那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走了？”那时讲话很简单的，不很客气。韦统泰指着前面告诉我：“前面有敌人在做工事，我们要把他们消灭。”我说：“快走。”我让他们迅速靠近鹿门前的山边过去，脱离这个地区，什么都不讲，赶快走！我们师部也统统过去那边。这样，四〇五团当晚迅速通过了黄土铺、鹿门前地区。第二天一看，大家满身是泥，摔跤啊。当时 10 月份，湖南下着要死不活的毛毛雨，特别讨厌，路也不好走，滑。大家看着笑，你也一身泥，我也是一身泥。

天亮，我自己决定（因为总部给了我这个权）让四〇四团迅速占领鹿门前的西山。因为后面有敌人嘛，占领阵地本来就是准备打仗。四〇五团迅速向黄土铺方向布置警戒，我们师部就在官家嘴。我看见四〇四团很快上了山。上了这个山就有把握，否则就不行。团长韦统泰、副团长韩怀智都到前面看地形，发现敌人从鹿门前出来，通过黄土铺开进。韦团长下决心很快，命令部队迅速跑步，一线展开，发起攻击。这时候的战斗积极性就非常重要，如果等命令，请示要不要打，那就又要犯我们在锦州的错误。看到敌人不打，你来干什么吃的？占领阵地就是命令，就是要打仗，还有什么命令？所以他们这个决心很好，一下就打下去了，打他的军部，打他的要害。他这个军部可不是没有战斗力的，有三个营：警卫营、工兵营，还有个通讯营。战斗力都很强，都是老兵，都是步兵武器。四〇五团一下杀下去，敌人乱了。他不知道啊，天兵天将从哪里下来的，一下把他们搞乱了。这样把它切成很多段，从下午一直打到黄昏 7、8 点钟结束战斗。将桂系起家部队，所谓“钢七军”军部全部歼灭，就是让军长李本一跑了。晚上看不见了，军长化装跑了。我们那时没有广西人，也不会讲广西话，也不懂广西话，他很容易化装跑。他跑到洪桥那边坐火车回广西了。凌云上副军长不是我们抓的，是由友军俘虏的。

就在黄土铺全部歼灭，打得漂亮，也很艰苦。那个 2 连大概就剩下 20 来个人，伤亡很大，死打硬拼，手榴弹也会，冲锋枪也会，什么都会。有个俘虏兵杨贵峰，是在辽沈，还是平津俘虏的，我都不记得了，当时自动代理排长。卫生员陈焕柱，那是热东的子弟兵，站出来勇敢地指挥。这还是我们过去练兵的基础啊！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往哪里冲。歼灭了敌人，就自动地向另外一个方向去。这个非常重要，连自为战，排自为战，人自为战，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四〇五团结束战斗之后，师部命令他们立即集结起来，准备配合四〇四团攻打鹿门前的敌军（当时不知道是敌七军一七二师）。晚上集结，第二天早晨就上去了。我和政委上到鹿门前的山上，还有刘建邦[1]。炮兵营长把山炮也带上去。我一看，正好我们四〇四团和敌人打得很激烈。山炮开炮，一下打敌人中心开花，打乱了。这时四〇四团向上攻击，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张进、冰野他们都在那里，郝子义、吕作绪[2]他们都在鹿门前口子上，一打乱了后，敌人就向山上跑。

四〇三团和我们失去联系以后，晚上也听到枪声。因为我们 9 日在这个方向打起来了，四〇四和四〇五团在黄土铺鹿门前都打起来了。任思忠他们判断师主力和敌人打起来了。他们不知道总部给我们这么一个命令，就自动像我们靠拢。四〇三团派了一个连到山头上看一看。一看这边打得很激烈，部队很快上来了，正好敌一七二师跑到半山腰，我们四〇三团正好从山上下来，一堵，全部歼灭。正如我们在东北所说，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就向哪里靠拢。这个时候就用上了。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他又没有电台，没有人指挥。我们有这种教育、这种训练，他就能想到向打仗那个方向靠拢。枪声就是命令！这个作用非常大，无形的力量，无穷的力量。你传他，你找他，到哪儿去找？找也来不及啊。如果四〇三团不这样下来，一七二师就会跑过去，跑是跑不掉，但我们的战果不会有这样大。他们也跑步到哪里去，因为当时主力都过来了，四个军都过来了。



【圖6】1949年10月，在一三五師衡寶戰役祝捷慶功大會上，授錦旗予四〇五團一營。

10 日下午将敌人全部歼灭。一七二师两个团，还有一个团不知到哪儿去了。这样，我们四〇五团歼灭敌人一个军部，四〇四团歼灭敌人一七二师师部，四〇三团配合将一七二师歼灭。我们师在衡宝战役中的任务结束了。打这仗的时候，没有任何部队配合。打完了，四十九军来了个部队看了看，没有事了。四十一军在另一个地方歼灭敌人。所以衡宝战役体现我们这个部队战斗力的坚强，上下信任，互相信任。你是个营长，我是个团长，我相信你。他们也相信我们师长、政委，彼此间非常信任，这个很不容易。如果他不信的话，你说话，他会想：这样行不行啊？一犹豫就不一样，这个时候不允许犹豫，不允许更多考虑，必须是绝对地相信。所以说权威权威，就很重要，没有权不行，没有威不行，没有信也不行，这是一致的，三点必须是统一的。部队 6、7 天没有好好休息，没有好好吃饭，上下之间没有埋怨。下雨就下吧，不怕天；走路路滑就滑吧，不怕地，哗哗地走。没有饭吃，艰苦吧，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害怕，这就很不容易。衡宝战役是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全面考验。军事考验，政治考验，纪律考验，都及格。一三五师在衡宝战役得到四野总部的表扬，兵团的表扬，军的表扬，都有通报，师、团都有。

战役结束了，对消灭白崇禧，我觉得意义很大。当时国民党在长江北的部队消灭了，剩下的就是白崇禧。白崇禧号称小诸葛，军事家呀。美国就寄希望于白崇禧的坚持。他们援助谁呀？白崇禧呀，因为蒋介石不行了，主力已经被我们歼灭了。其他胡宗南部队在四川，宋希濂部队在湘西，这些都不行的。所以这一仗把美国支持白崇禧、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思想打破了。桂林陆军学院院长马声儒对我讲：有一次，美国的一个什么小组到桂林陆院。他们认为，衡宝战役这么打了以后，白崇禧一下就消失了。美国人很不理解：白崇禧几十万人，怎么一下就没有了呢？他们不懂这个道理，想不通。我说：七军这四个师是白崇禧的脊梁骨。一个人不管四肢有多么发达，脑子怎么样，脊梁骨断了，你就直不起来。白崇禧的七军被我们歼灭了，他就不可能组织新的战役，在广西就不可能组织。这样，对我们进军广西造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①刘建邦 建国后曾任五十四军炮兵主任，重庆军分区副司令员。

②郝子义 建国后曾任一三五师四〇四团政委，五十四军政治部宣传处长，一三五师政治部副主任。

吕作绪 建国后曾任一三五师四〇四团团长。

四、广西剿匪

我们在 1949 年 10 月底、11 月初进军广西。四十一军走前面，他们一下占领桂林，没遇到抵抗。我们三个师如入无人之境，一路上也没有遇到抵抗。小一点的，一千几百的，我们也没管他，往前走，这些都不在话下了。我们一三五师从湖南的东安出发，经过桂林，到贵县，到玉林。我们师部到了容县，三个团中一个团住博白，一个团住桂平，一个团住北流。一三三师经过桂林、阳朔，一直插到钦州湾（就是现在的北海）。一三四师经过桂林、柳州，一直追到镇南关，中越边界。敌人的刘嘉树兵团想到越南去，还没有来得及走，一三四师追上去，把它全部歼灭，没有大的抵抗。所以，我们进军广西基本上没有打仗，就是一三四师打了一个漂亮仗。衡宝战役的胜利造成我们解放广西非常有利的条件。是不是夸大了我们衡宝战役的战果？实事求是地讲，衡宝战役之后，白崇禧确实是组织不起防线了，不可能组织了。他指挥谁？他的主力都被解放军消灭了，叫他怎么打？

1950 年，我们军的领导成员有很大变动，师也有很大变动。陈伯钧走了，他是兵团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他当然不会在军里呆着了，他去长沙。萧劲光在长沙当司令，刘道生他们都在那里。陈伯钧走了，副军长张天云当军长[①]，参谋长雷震回武汉去了。1950 年 3 月份，我到军里当副军长。我们师两个主要负责人调走了，调动了一个人就会牵动一串。吴瑞山副师长当师长，任思忠主任当政委，牵动地下一大批。同时，机关的部分干部也调动了。那个学俄文的许文益调外交部去了。韩辰从宣传科调军里当秘书科长了。刘江亭等一批干部调到南京军事学院了。1950 年 10 月，张天云又调到南京学习了。这样，我从 3 月份到军里，当了几个月副军长就代理军长了。这个变动就大了，1949 年的师长，1950 年就代理军长了，没有参谋长，当时空着了。一三四师的黄鹄显调走了。这个人很有本事，文化程度比较高，过去在中央苏区跟朱老总当参谋的，教育、军事样样都行。



【圖7】1950年9月上旬，與參加一三五師幹部整風會議人員在廣西容縣。前排左三丁盛。

我们1950年的任务是什么呢？开始那些反动武装被打懵了，喘过气以后呢，这些家伙醒了。广西的土匪和别地方不一样，很多国民党散兵游勇回去后在那里参加组织。军官也好，兵也好，对我军不了解，很多人被我们放回去后，就和地主、恶霸坏分子纠合在一起。广西发生普遍的土匪暴动，而且很厉害，杀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样，我们四十五军三个师的任务，就是在那儿停下来剿匪。半年时间内，这些土匪怎么剿也不行。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当时在广西也有这个问题。抓的匪首放回去了，放回去，他也不改。这样看来，匪首不镇压，土匪消灭不了，群众发动不起来，老百姓害怕。我们问：“你们怎么不敢起来和地主争，拿东西？”“大军，不行的，你们走了以后，他们要把我们杀了的。”“这么多的武装，你们都没办法，我们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很大，但当时我们也不敢杀，所以上半年没有效果。



【圖8】1950年11月，丁盛(左一)代理第四十五軍軍長。與軍政委邱會作(左二)、軍副政委謝明(左三)合影。

下半年，叶剑英、陶铸从广州来南宁，感到广西剿匪有点“右”。你这么剿不干净，什么原因？它的头目很坏，不把头目镇压了，群众发动不了，土匪也消灭不了，这两者是联系

在一起的。我们在热东地区也有这个问题，这时普遍真理，好像夹皮沟一样，你不把座山雕消灭了，夹皮沟始终起不来。你不发动夹皮沟的群众，敌人消灭不了，很密切的联系。陶铸到了我们军部讲："怎么办呢？得定个标准。"我记不清具体标准了，总之是规定带多少人的头目，抓住就把他杀了。这一杀很有效，这些人还是怕死啊。谁不怕死啊？他要钱干什么？为了吃，人都死了还吃什么？土匪反共也是想搞个什么天下去享福。你把他杀了，很有效，头目一杀，匪众就投降。别的头目一看，大军动真格的了，杀人了，投降。所以 1950 年下半年一搞，整个广西我们三个师的地区，成果很大。我们的任务完成的不错。1951 年 3 月份，还没栽秧，我们就撤离广西。走了之后，广西地区没有反复，很平稳。我们在广西剿匪一年零三个月。在广西招了不少兵，博白那一带，四〇四团很多啊。我前年到广西去，有博白的人参了军，抗美援朝后又转业回南宁，很多的。

在广西剿匪必须发动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把土匪消灭，这就是经验。宽大和镇压要相结合，宽大无边是不行的，光是镇压也不行的，政策很重要。该严就要严，该宽就要宽，该抓就要抓，该放就要放。在广西，我感觉不错。

①张天云 湖北黄安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1948 年 11 月到 1950 年 4 月任四十五军副军长，1950 年 4 月任军长。

第八章 率军入朝

一、两军合并与入朝初期

1951 年 3 月，我们部队从广西到了广州，准备抗美援朝。当时四十七军从湘西集结，经长沙北上。本来我们很快入朝，后来是他们先走，我们在广州训练一年。在广州训练，军部驻在花县，一三五师驻在佛山，一三四师开始驻在清远，后来驻在湛江，一三二师就驻在广州附近。在广州这一年，思想比较平稳，脑子里想着抗美援朝，装备也没有变化，什么也没有动。这一年没有什么更多说的。1952 年 10 月份，我觉得平时训练事情不多，就想去学文化，我文化低。上级批准了，我就到南昌学习文化，学到 12 月份。11 月份，准备抗美援朝，又一个转折，四十四军拆散了。上级决定四十四军军部到海军，是到青岛，还是什么地方去了。萧劲光那个十二兵团不也到海军去了吗？四十四军到海军去了，一三〇师拨给四十五军。我们四十五军的一三三师拨给四十六军。四十四军还有两个师，在海南岛有一个一三一师，还有一个师搞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两个军合并了，叫什么番号呢？叫四十四军不行，因为四十四军取消了呀；叫四十五军也不行，因为四十四军有一个师在这里呀。你不要看这个番号那么简单。在当时的部队很有讲究的，有个心理作用。"我们取消了，归你们？"谁也不服气。好了，不是一个四十四，一个四十五嘛，翻过来就叫五十四军吧，我任军长。据说是这样来的[①]。连在一块，两家都有了，即有四十四，也有四十五，两家都能接受。这时我已不在了。

抗美援朝，决定五十四军马上要走。我们夫妇俩都在南昌，妻子在医大学习。来个命令到南昌，让我马上回广州，什么消息我都不知道哇，立即回广州。到广州待了一下，谭政、黄永胜接见我[②]讲了些官话：你们过去怎么样，现在到朝鲜去，注意什么问题啦。要打好仗，

要执行纪律，要听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发扬我们部队过去的光荣传统，我们就表示欢送你们啦。1953 年，我们部队入朝，我直接由广州坐火车到北京，到总参谋部接受任务。到了北京之后，我住在总政一个招待所，在珠市口什么地方。那时聂老总代理总长，彭老总也在。从此之后，我们五十四军的建制就归志愿军了。

当时形势是艾森豪威尔威尔上台了。他一上台，就像来个第二次仁川登陆。在哪里登陆？不在仁川，在朝鲜最小的蜂腰部——清川江。清川江这个腰部最小，这边是新安州，东边是元山地区，有海军，炮火支持就比较方便。我们决心粉碎艾森豪威尔威尔的这个计划，绝对不能让他上来，要跟他硬拼。如果他成功，整个的蜂腰部被切断，前面的志愿军就困难了。他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也是吃这么个亏，如果他在清川江登录，那志愿军问题就大了。我由北京坐火车到"志司"之后，就向邓华报告：我来了，部队在广州马上也要出发了。邓华是做具体部署的，北京总参、彭老总他们是不管我们具体部署的。邓华和我都很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我问怎么办？邓华他们是有准备的，知道我们要入朝。他说：你一个师从广州坐火车，直接到安东，不要停，到朝鲜的铁山半岛。铁山半岛不是一个岛，在海边，隔清川江不远，离我们鸭绿江也不远。一个师在那儿驻防，一个师在辽东半岛，这是邓华指示的，防止敌人从清川江登陆。军部驻在凤城，一个师驻本溪。这都是我们当时的具体位置，这些都不是军能够定的，具体部署是军区给你定了的。

部署完毕，邓华就对我讲战略决心："艾森豪威尔要在蜂腰部清川江登陆，两面夹击。中央的决心，毛主席的决心，'志司'具体执行：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准备在新安州、清川江附近。三十八军死守住，那是下了死命令的，人在阵地在，人不在阵地也得在，绝对不能放，有多大的伤亡都不能顾虑，这是我们的决心。""你们的一三五师准备做第二梯队，紧急时由志司调动。如果辽东半岛没有情况，就全部过江参加战斗。"过了不久，就成立了"西海指"，邓华兼司令，梁兴初时副司令。"西海指"就是完全指挥这个地方，准备和艾森豪威尔威尔硬拼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人找我谈，他们写军史的都不知道。没有人问我，我也没法给谁说。当时这个任务对我们五十四军是很重要的。

当时一三〇师过江了。为什么呢？因为邓华和他们很熟，原来是七纵十九师。当时我们军的三个师都不错。一三〇师攻打四平有功，战斗力很强；一三四师是个老部队，一个"朱德警卫团"，一个"警一团"，两个团战斗力都很强的；一三五师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他知道，这个部队新一点，但对这个部队印象不错，要我们加紧训练。这时候就动员，没有什么好保密的，准备和美国大干一场，大家就学习，就训练。我们认真对待了。毛主席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一认真，艾森豪威尔就吓了回去。不敢登陆了。所以这个很重要，要针锋相对。你来吧，我就跟你干，他不敢来。艾森豪威尔也不是一般人，他是二次大战的欧洲美军统帅。我们的决心，他也知道；我们的部署，我们到了前线，他都清楚的。我们做了准备，把艾森豪威尔吓回去了，他不来了。

1953 年，"志司"又找我去了。美国人不来了，你们不能总待在那里呀，怎么办？你们部队集结到平壤附近。后来我知道，从 1953 年起，"志司"就有了准备，在金城前线组织一个大的反击。集结不久，"志司"就告诉我：五十四军前进到昌道里，上甘岭以东地区，和六十七军、六十八军的阵地相接。当时六十七军、六十八军两个军都在前线。我们在后边作为第二梯队，准备和美国人打一场打仗。这样，我们部队就全部坐火车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我这个军部和六十七军军部驻在一起。六十七军军长邱蔚[③]过去就是我们老一团的团长，我们俩在一块很熟。政委是旷伏兆[④]，我们在一个团待过，在教导二旅嘛。我们俩个军部驻在朝鲜昌道里的隐洞。在那里呆着，就谈了，看了，了解情况了，因为我们在朝鲜是没有经验的。那时归谁指挥呢？归二十兵团，杨勇、王平指挥[⑤]了。我们到朝鲜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杨勇、王平让我们修路。朝鲜路况不好，坑坑洼洼的。在这之前，杨勇、王平他们找我，我

把部队情况介绍了一下，把解放战争这一段给他们讲了。到朝鲜和外国人打，怎么不会。“好啊，你们解放战争有经验。到朝鲜来学习呗，和六十七军在一块，你们都很熟嘛，学一学，教一教，那不成问题。”在哪里驻了几个月，修路。同时，命令我们派一个师上去，把六十八军一个师换下来。一三〇师上去了，进入战斗。

修路就是一般任务了。朝鲜的路很难修，我们把泥巴填上去，没有用，汽车一压就没有了。说你部队怎么搞的，这样修路还行呀？不行。修路要有石头，怎么垫，怎么搞才行，坑坑洼洼的，太讨厌了。越是坑坑洼洼地方，越是敌人飞机轰炸区，汽车越要跑快就越跑不动，所以朝鲜的公路修好了非常重要。飞机那家伙真讨厌，专门在路上炸。我们要把路修好，就要摸到敌人的规律。美国轰炸朝鲜的飞机是从日本机场起飞的，到朝鲜很近，很快一下就到。轰炸机是 B-29，战斗机是 F-80、F-84，还有什么油挑子，侦察机，都是美国二次大战的东西。轰炸时间一般都在早晨几点钟之后，晚上几点钟之间，黄昏时分，天色要黑不黑的。敌机回去以后，我们所有的汽车、运输车、指挥者全部出动。路面好就修的很快；路不好，坑坑洼洼的，就快不了。两个师修路，各分一段，哪里不好你把他搞平，可不是用泥巴填的，用石头把它修好，车子才能走得快。这个速度很重要。当时在朝鲜路不好走，“小坑不管，大坑闭眼”，闭着眼过去。后来这些司机回到国内，老百姓都害怕。你们志愿军这些司机都不要命啊，他习惯了。

①五十四军 1952 年 10 月，中南军区命令：以四十五军军部、直属、一三四师（欠四〇〇团）、一三五师及四十四军一三〇师、一三一师三九一团，合编为一个军，番号改为五十四军，师团番号不变。军长丁盛，政委谢明，副军长吴瑞山，政治部主任谢家祥。1953 年 1 月，五十四军奉命北上。4 月，三九一团在辽宁省庄河县改为四〇〇团。5 月初，五十四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②谭政 黄永胜 时分别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参谋长。谭政湖南湘乡人。1927 年参加秋收暴动，1955 年授大将军衔。

③邱蔚 湖南浏阳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抗战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时任二十兵团第六十七军军长。

④旷伏兆 江西永新人。1933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二十兵团第六十七军政委。

⑤杨勇 王平时分别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政委。

杨勇 湖南浏阳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上将军衔。

二、金城反击战

1953 年 7 月份，金城反击战，当时组织了东集团、中集团、西集团。我们在昌道里，北汉江。我们中集团三个军：六十七军、六十八军和我们五十四军。五十四军连个师作为第二梯队。组织指挥部，邱蔚在朝鲜时间长啊，为主帅，我们就在旁边了。部队明确了，任务明确了。六十七军打的是桥岩山，是一九九师打的。当时对炮战的打法，意见有点不大统一。因为美国的工事比国民党的强得多，铁丝网不是架的，是一饼一饼摞在那里，你搬都搬不动。另外，鹿砦桩上挂跳雷，一碰就响，一响就炸在人的上半身，炸脑袋。这个很讨厌，你一响，他后面就知道。敌人在桥岩山的工事做得好，既可以睡觉，又可以打仗。一有情况，他“忽

忽忽”爬起来就可以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炮兵的使用，怎么打法，问题很大。我说：我们在东北学的，开始是破坏射击。什么是破坏射击呢？看到目标就标定好，一个一个目标地打单炮，把明显的目标打干净。第二就打压制射击，全面摧毁它，把所有工事、一切障碍物打平，开一条道路。为什么还要爆破呢？因为所有的铁丝网不可能一次扫平，必须由步兵爆破扫清。使用炮火是不是打在点子，是很重要的。必须打在点子上，打在节骨眼上，打在你需要地方。

还不错，六十七军打上去了，突破了，占领了桥岩山。敌人的整个防线全部被突破了。打过去之后，要一三五师上去，因为他们夺去了阵地，我们要继续前插。一三五师上去就苦了，因为我们原来的防线有工事，有坑道，什么都有，而这时行夺取的阵地什么都没有。当时敌人的火力多强呢？炮火很多了，光是飞机每天就有很多架次。我们没有高射炮打他们。我们的战斗机到不了这个地方，因为飞行半径不够。苏联的米格飞机最多到平壤，到平壤转个圈，最多十分钟，赶快回来。所以美国飞机什么都炸，炸阵地，炸公路，炸桥梁，还有北汉江桥也炸了。炸了桥，下雨，水很凶猛，炮兵和弹药、给养运不过去。这样，我们一个团就只能打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要下来，就要换。我们四〇四团出了个战斗英雄王占山[①]，就在这里。麻俊坤[②]肠子打出来了，还坐在那里和敌人干。麻俊坤，王占山，一等国际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王占山就是文化低，打仗勇敢。一三五师四〇四团，张进当团长，很能打的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问呢？很可惜。真是打得苦啊，没有工事，敌人有坦克，炮弹又多，我们伤亡很大。美国人作战在物资上是不吝惜的，有多少打多少，飞机投弹，漫山遍野，乱投。我们弹药供不上。靠什么？我们带着莫洛托夫手雷，打坦克很好。我们的伤亡主要是敌人炮兵、飞机炸的，轮番地轰炸，轮番地打炮，反正也没有个具体目标，就是这一片山，就这么打。

四〇四团打了一个礼拜，换四〇五团上，也是打一个礼拜。他们的二连打得剩下八个人。不是都是亡，也有伤，伤了就送走了。战场上，好的情况就是轻伤不下火线，但乱的时候，有的轻伤不该下火线的也下了，不该护送的也护送了。“哎呀，这俩个人附上了，把他们送下去。”这一来，人少了。很艰苦，弹药不够，粮食困难。北汉江的北岸东西多得很，堆积如山，粮食啊，什么都有，就是运不过去。美国飞机炸什么？一个是炸前沿，一个是炸公路。他那个炸弹不知道是多少吨的，一个炸弹下来，投到公路上，陷下去 5 公尺，周围有房子这么大。他这一炸，我们一个营要搞一天才能填回去，才能走。搞好以后，又一个炸弹。他堵不住前沿，就搞你的后面，搞后勤。美国在朝鲜使用很多东西，在二次大战都没用过的。我们没有飞机打它，它就放心大胆地炸，高射炮都打不到它，没有战斗机打它。有一天，我跑到山上去看，我们当兵的什么都不怕。只见大车、汽车、人，满满地挤在公路上。大家懵里懵懂的，前面上不去，一堵，后面忽忽上来，挤得满满的，反而没有什么伤亡。美国人也顾不上搞这个，也太紧张。我们在朝鲜，梁大门[③]授了“金日成奖章”的，就这个师打得厉害。

一三〇师占领了阵地，但美国的工事做得很巧妙的，你看着这个火力点就在这里，找不到门，进不去。他们搞的工事、坑道，他们可以走通，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这个伤亡就大了。他有枪眼，你走来走去，他可以打你，我们没有办法打他，抓也抓不到他，没有门进去。美国的工事很多是制式器材，从国内拿来，做好了的碉堡什么的，钢筋水泥的。一放，就是一个工事，很快的。他们的通讯联络，炮火支援，原来都测定好了的。所以一三〇师完成了这个任务，打下来了，但伤亡大，也没有什么战果。一三五师在巨里室北山也阻住了敌人。任务完成了，守住了阵地，敌人你也没有夺过去。

7 月 27 日停战，两方面没有打了，就下来了。反击战主要是一三〇师、一三五师打的，一三四师没有上去。金城反击战出了不少战斗英雄。说明我们这个部队的战斗力，英雄！四

〇五团团长王明德，四〇三团团长是陈述[4]。陈述是个大好人，他是机关参谋出生，当团长。当时战斗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美国的炮击叫做地毯式，“咚咚咚”地往前面打，也没有人，就按时按测定目标往前打。六十八军二〇二师，几分钟被打散了。炮火太密集，如果你摸不到规律，炮火绕不过去，你根本上不去。

整个抗美援朝，我们就参加金城反击战，打得不错，顶住了。两个团打得很好，很英勇，能攻能守。我守住了，你就攻不上来，不管你飞机打炮多厉害，你步兵就不可能来。我就不走，就跟你干到底，守住了阵地，当时只有这个要求。我们没有出击，不能出击，出击要吃亏的，因为没有工事。有工事就不一样，有个猫耳洞都不一样。我们部队到前线走了一趟，参加了金城反击战，就停战了。

①王占山　时为一三五师四〇四团七连排长。在金城反击战中率部连续战斗四天四夜，身负重伤。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其一等国际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王以后历任一三五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师长。

②麻俊坤　时为一三五师四〇四团三连排长。在金城反击战中，连长牺牲，麻即代理连长指挥战斗，三次身负重伤，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直至牺牲。战后，志愿军总部为其追记一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③梁大门　1938 年参加山西新军决死纵队。1945 年后历任冀热辽军区独十七旅七十一团、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治部主任，一三五师四〇四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湖北省军区政委。

④陈述　时任一三五师四〇三团团长。以后历任一三五师副师长、五十四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武汉军区炮兵副司令员。

三、停战以后

停战以后，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原来部队行动都要伪装，停战一宣布，都出来晒太阳了。没有飞机轰炸，心里很高兴。部队可以出来，上课训练就很正常了。祖国慰问团来了，那真是应接不暇，多啊！



【圖9】1953年10月，賀龍(左二)率祖國慰問團到朝鮮五十四軍陣地慰問時，與軍長丁盛(左一)、政委謝明(左三)留影。

最大的慰问团是贺老总带的，到我们军部。他见我们在往阵地去的大路上搭了一个牌楼，写着“和平”两个大字。贺老总就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光想到和平，还要注意到战争，还要好好准备，好好训练。部队不能这样，和平是国家的问题，部队只能训练好。”贺老总指明了这个问题。贺老总带了个唱歌的，不知是不是唱“二郎山”，我忘了。唱着唱着，贺老总又不高兴了，说没有唱好。贺老总很细心，对演员讲：“你们不对的，不严肃！你们给部队唱歌，怎么能随便敷衍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听了都很高兴，贺老总

很细，出来了批评他们。有一天，贺老总要到阵地上去看看，到桥岩山，桥岩山是反击战的主阵地嘛。在桥岩山照了一张像，贺老总跟我们几个人照的，贺老总、军政委谢明[①]和我三个照的像。这次找出来叫方一川的爱人在重庆给我洗了很多。这个像片是宝贵的，因为是在朝鲜照的，在我们军部照的。贺老总带慰问团来都是说好话，过年话："志愿军打败了美国，是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党中央、全国人民都很高兴。"上海唱京戏的言慧珠，北京唱武生的裘盛戎，很有名气的演员都来了。

接待这些慰问团，我们部队搞得很疲劳。当时跳舞都成了大负担，祖国慰问团来，你总要跳舞，我们没什么招待，跳舞吧。晚上跳多了，我们这些女同志不愿意跳，太累了。来了要鼓掌，要邀请人家，人家也邀请我们，不要看这些小事，不容易做好。我们招待祖国慰问团，过去国内送给志愿军的东西舍不得吃，用来招待祖国的亲人，我们的心意是这样。好的反映是说志愿军很热情。不大好的反映是说志愿军也不大苦嘛，招待我们的东西都很不错，很丰富嘛。我们一片好心把东西省下来招待他们，整个反映是好的。


【圖10】1953年10月，賀龍率祖國慰問團到朝鮮五十四軍橋岩山陣地慰問時合影。前排穿大衣者為丁盛，丁盛後站立者為賀龍。

过了这一段后，部队就做工事，建营房，桥岩山坑道整个重搞了一遍。桥岩山整个的路，是我们部队修的，因为原来是敌人的前沿，没有路。收复桥岩山之后，我们把路修好，把坑道修好，再帮助昌道里的老百姓重建家园。老百姓因为战争都跑了，停战以后陆陆续续回来一些老百姓。我们部队要帮他们修房子。朝鲜老百姓很穷。战争一来，头上顶一点东西就走了。打了好几年仗才回来，什么也没有，赤手空拳。部队有这么个任务，如果有老百姓回来，要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是群众工作。

1954 年春，我们撤了，从金城反击战的前线昌道里，全军回到元山。元山是朝鲜北部东边的一个大港。我们军部离元山不远，住在莲花洞，是在一个山沟里。那个地方不错的，朝鲜人原先修了洗澡池，有电线。撤到元山之后，我们的建制不归二十兵团，归三兵团建制了。军到达那里归哪里指挥。到了这里，部队就进行正规教育，开始从军事上学苏联这一套。当时对我们来讲就很生疏，画地图等一大套。苏联那套东西，我们都不会，从来没弄过。同时，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师以上干部去看地形，从咸兴、元山，到蛤蟆岛，整个东海岸我们都看了。所以朝鲜很多地方我很熟啊，金城前线，东海岸从咸兴、袁尚道蛤蟆岛，西海岸从鸭绿江、铁山半岛到平壤，我都看过了的。我们的辽东半岛，从鸭鑅江口一直到大连，我们都看过的。当时我们看地形，部队训练。这是，谢明要求到北京政治学院去学习。谢明走了之后，谢家祥主任当政委[②]，一三〇师师长蒋润观[③]调上来当政治部主任。不久，蒋润观去苏联学习了，大概是 1955 年，后来就没有回我们部队，军的领导又变动了[④]。

① 谢明 江西于都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衔。10948 年任东北野战军八纵二十二师政委，1949 年任四十五军一三三师政委，1950 年 11 月任四十五军副政委，1951 年 3 月代政委，同年 8 月任政委，1952 年 10 月至 1955 年 10 月任五十四军政委。1960

年后历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军政大学副政委，政治学院副政委。

②谢家祥 江西瑞金人。1933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48 年任东北野战军八纵二十三师政委，1949 年任四十五军一三四师政委，1952 年 10 月至 1954 年 6 月任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1954 年 6 月至 1955 年 10 月任五十四军副政委，1955 年 10 月至 1967 年 7 月任五十四军政委。后历任成都军区副政委、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顾问。中共第九、十届中委。

③蒋润观 江西广丰人。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1949 年后历任四十四军一三二师政治部主任、政委，五十四军一三〇师师长兼政委，1954 年 6 月至 1955 年 6 月任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后入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1957 年回国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总政保卫部部长，福建省军区政委，军事学院副教育长，训练部副部长、训练部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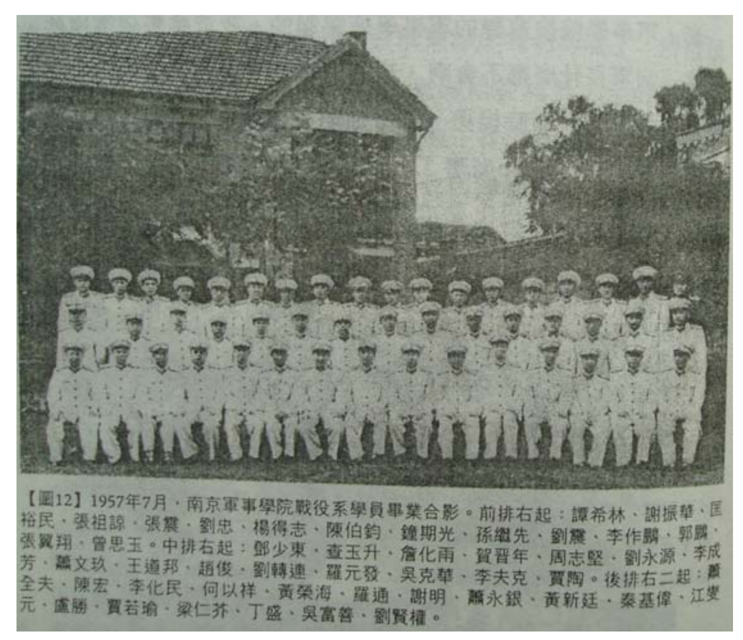
四、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我们在莲花洞住了一段时间后，南京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开始，组织一个大的演习，不是实兵演习，是作业，图上演习。我们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就回国，到了南京，又到山东半岛，一直演习到青岛。我参加这么个演习，但当时我们都不懂啊。那一套，军事学院按苏联的军事学术编制的。我就感觉到搞这些，我当一个军长什么都不会啊，这怎么行？所以回到朝鲜以后，我就提出要学习。那时杨勇、王平他们在志愿军。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战争了，没有什么事了，经过这几次演习，我什么都不会啊，那怎么行？我提出要求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就批准了。1954 年 11 月离开朝鲜，回到大连，在志愿军疗养院休息了一个月，由大连回到武汉。1955 年初，国家薪金制度实行了，发钱了。原来 1954 年以前，我们一个月有几十块钱，我记得出国之前大概就七十块钱，我们当军长的也才七十块钱。1955 年开始薪金制，给我发了三百多块钱。这在当时来讲就是很多啊。过去在广西剿匪的时候才五块钱嘛。1950 年五块钱，到了广州，1952 年七十块钱，到了 1955 年三百多块钱，有这么个变化。我们在武汉休息了几天，因为我在武汉还有几个孩子，在“八一”小学，看看他们。以后由武汉经过长沙到萍乡，孟文虹带着我的女儿西西到娘家里住了一段[①]，然后就到了南京。


【圖11】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後與夫人孟文虹留影。

当时成立了一个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系，过去还有高级系。这个战役系就是军以上干部，军长、政委以上的干部，有五十二个人，有几个上将，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李天佑、刘震。我们五十多个人主要是军事干部，也有政治干部，谢明又由政治学院转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在南京开学时，我们还是先学文化，因为我们这批人文化低。学文化以后学军事，完全是学苏联那套东西。南京的军事教员，有我们的刘元帅、陈伯钧副院长这些人上课。还有我们自己 1950 年调到南京学习的一批人当教员。原来我们师的刘江亭后来都当我们的教员了。战役系的教员有培养出来的，还有国民党

俘虏过来的。



【圖12】1957年7月，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員畢業合影。前排右起：譚希林、謝振華、匡裕民、張祖諒、張震、劉忠、楊得志、陳伯鈞、鍾期光、孫繼先、劉震、李作鵬、郭鵬、張翼翔、曾思玉。中排右起：鄧少東、查玉升、詹化雨、賀晉年、周志堅、劉永源、李成芳、蕭文玖、王道邦、趙俊、劉轉連、羅元發、吳克華、李夫克、賈陶。後排右二起：蕭全夫、陳宏、李化民、何以祥、黃榮海、羅通、謝明、蕭永銀、黃新廷、秦基偉、江燮元、盧勝、賈若瑜、梁仁芥、丁盛、吳富善、劉賢權。

苏联这套东西要先学基础，用很多时间来削铅笔，打电话，画地图，学这些东西。专门学打电话，我说我们会打电话，打电话还有什么学的？不行！按苏联那一套程序来的，从那裏学起。削铅笔我不会，一削就断。我们说，我们是军长，削什么铅笔？我们还有参谋长。“不行，要削”！画地图，我们也不会画，画那个工事，一点一点地画，堑壕，堑壕里面那个像猫耳洞一样的掩体。我们都接受不了，认为是浪费时间，所以当时有抵触情绪。作息时间是“一贯制”，吃了早饭就去上课，一直上六个小时。为什么是“一贯制”？苏联那些军官们是不住学校的，他吃了早饭去，上完课就回家，而我们是住学校的，我们习惯吃中午饭，休息一下，下午再上课，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行！



【圖13】1957年7月，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第二組學員畢業留影。前排左起：劉轉連、吳克華、廖漢生、羅元發、郭鵬。後排左起：匡裕民、丁盛、趙俊、羅通、黃榮海、賈若瑜、蕭永銀。

训练，比如射击，要练各种各样的射击，立射、卧射、跪射、防御、进攻，射击都不一样。我很强调部队训练，要训练端着枪射击，短距离的，看看实际情况，真是两军拼命的时候，哪有卧倒打枪，端枪瞄准的？端起枪就打呀！必须要这个科目，没有这样的训练，不行。

部队要拉练，要走。光是在房子里面，工事里面，这样不够，必须是各种方法。走啊，夜行军，拉来拉去。所以我们一三五师这个部队，五十四军这个部队很能走路，强调“拉”。打仗，在很多时间是靠两条腿走路，走不了路，你打什么仗？你到都到不了啊。当然，现在就不一样了，现代化了，坐火车，坐汽车了。那是靠两条腿。炮要拉得动，汽车要开得动，不拉练，老爷并呆在营房里怎么行？要拉出去。按照我这个训练方法，后来张宗逊副总长，他是管训练的，李作鹏[②]到我们部队来考试。考试的内容、方法就是按照我这套训练的内容，考得好啊！如果机械地训练，经不起考核。所以这个训练的内容、方法不大一样。一个师傅一个土地，小师傅小徒弟出来就不一样。大师傅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个是一致的，具体的不一样。你不信？一个军，一个师，一个团，有很多的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做法不完全一样。

南京军事学院待了三年，然后又回朝鲜五十四军。军领导班子已有不小的变动。除谢家

祥政委外，欧阳家祥代军长调任二十兵团参谋长③，赵文进任副军长兼参谋长④，韦统泰任副军长，汪易任副政委⑤。



【圖14】1958年2月，丁盛(左三)與五十四軍其他領導在朝鮮志願軍烈士陵園門前。



【圖15】1958年3月，與五十四軍其他領導、祖國慰問團成員在朝鮮。前左三丁盛。

①孟文虹 丁盛夫人，西西即丁克西，丁盛女儿。

②李作鹏 1957 年 10 月至 1962 年 6 月任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

③欧阳家祥 江西吉安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54 年 7 月任五十四军副军长，丁盛到军事学院学习期间，自 1955 年 12 月至 1957 年 9 月代理军长职务。丁盛毕业回军后调任二十兵团参谋长。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防化学兵学院院长，总参防化部顾问。

④赵文进 湖北大悟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57 年 7 月由六十五军副军长调任五十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60 年后历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军政干校校长，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

⑤汪易 四川阆中人。1933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57 年 7 月任五十四军副政委。1960 年后历任总后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副司令员。

第九章 战友情深

一、告别五十四军

我想起来，当时我们平叛回来之后[①]，他们把意思透露给我，想调韦统泰到西藏去工作，张国华想要他[②]。我说："不行！"我不同意，我很明确说韦统泰不能走，别人都可以。"噢，调人你也不愿意？"我的想法是：我走了，军长就是韦统泰，老实说就是接班人。我当了十几年的军长，不能总在这儿当吧？我总在这儿待着，待多少年啊？调谁呢？赵文进，一个非常好的同志，艰苦朴素，工作积极，兢兢业业，就是文化程度低一点。我们在军里合作的很好，赵文进也是副军长，后来就是赵文进走了。

到了 1962 年中印边境反击战[③]。当时我们的意见是去一个师，一三五师。为什么一三五师去呢？一三五师从朝鲜回来就驻在江津，没有动，是个满员、齐装、全训师。一三五师从来就是一个值班师，满员师，给它一个锻炼机会。成都军区不知是怎么想的，说一三五师不去，一三〇师去，我不同意。他们也有道理。一三〇是在西藏剿匪三年，1959 年 3 月去的，1962 年 2 月回来的，对于西藏的地形、气候比较熟，这是对的。我说，一三〇师才回来，才开始训练，再说一三〇师高度分散，搞生产，集合起来很不容易。当然，后来军区还是决定让一三〇师去了。

开始总参没叫我去，一三〇是直接从雅安坐汽车到拉萨，到打旺方向，归张国华指挥。期间，杨成武直接来电话[④]总参谋部来电话，要我去。这样我就报告：丁指嘛，五个人去——我们军里的韦统泰、蓝亦农、钟池、霍烈昆[⑤]其他什么作战处佟俊阁、通讯的，电台、伙夫，拉拉杂杂，这么些人去。以后成都军区领导对我们有些看法，有些隔阂。

1964 年，罗瑞卿[⑥]到成都检查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说：罗总长点将，让你到新疆去，到生产兵团当副司令。这家伙！我会有想法，我不说什么就是了。我当时就接受不了说："我不去，我又不懂生产，我搞什么生产？"因为罗瑞卿点将，后来"文化大革命"这文章就很多了。我说："我不去！"后来成都军区说："你不去嘛，你要到北京去讲了，我们又不能决定。"这样，八月份，我就到了北京。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管干部[⑦]，他找我谈话："总长点名叫你去，你要去新疆生产兵团当副司令。为什么当副司令呢？因为生产兵团那个陶峙岳[⑧]是国民党起义的上将。他当司令，当然不会把他拿下来，让你当司令。"这个我理解，我也不会有意见。我说："不管当什么，我不会，我不懂，我也不愿意。"徐立清跟我谈了，我不去，左齐也在[⑨]说："去吧，老丁，我们在一块。"

后来告诉贺龙，贺老总找我谈话。我说："贺老总，我不懂，没搞过这个东西，我不会。"他给我讲："新疆是反修防修的前线。"当时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嘛。"你到新疆去不是搞生产。你的任务是组织十个武装师。我给你派榴弹炮团，给你派坦克来。你要把这个部队组织起来，一边生产，一边搞军事训练。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还是军队的。你不是专门到兵团去搞什么生产。"贺老总这样说，我就没敢说话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⑩]，我们很熟，过去在三五八旅的。他看到我说："老丁啊，老总都找你谈话了，你得去啊。"徐立清、王尚荣、左齐，大家催促啊。因为贺老总讲了，就没有余地了。你还有什么余地啊？在部队就一直通天了嘛，贺老总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嘛。贺老总讲了再不去，那就是要周恩来、毛泽东讲了，是不是？好吧，后来大家这样劝，我就答应了，去吧。

我在五十四军的这段时间，从 1945 年的 12 月份在师里面算起，一直到 1964 年 8 月离开，整整二十年，很长。我在师里，1945 年到 1950 年，差一点就满五年。1950 年到 1964 年都在军里，这段时间很长。中见到南京军事学院待了三年，还有十七年。这么长的时间在军、师，我感觉做得比较好。师、军的领导思想上比较一致，虽然我们都来自各方，过去都互不相识，大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可是思想上大家是比较一致的。什么原因呢？这还是要回到我们在延安学习这一段，就是毛主席讲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干革命，要建设好部队，很重要的一条原则，我回想起来，就是彼此之间没有私心，凡是对与不对，出于公心，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成功。


【圖16】1958年。下連當兵留影。

①平叛 1959 年 3 月至 1961 年底，人民解放军平息西藏地区武装叛乱的作战。此处主要指 1959 年 3 月之 1961 年 4 月，五十四军军长丁盛奉命组成指挥所（简称丁指），率第一三四、第十一师进藏，执行西藏评判作战任务。此次作战的具体经过，丁盛在 1990 年代的回忆中未有展开深谈。详情可见本书附录"丁指部队的西藏平叛作战"。

②张国华 江西永新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③中印边境反击战 又称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从 1962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至 11 月 21 日基本结束，历时一个月。此处主要指 1962 年 1 月至 12 月，奉军委命令，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组成指挥所（简称丁指），率陆军第一三〇师等部队入藏，在西藏军区部队配合下，进行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主要作战——瓦弄地区自卫反击作战。此次作战的具体经过，丁盛在回忆中亦未及深谈。详情可见本书附录"关于中印边境部分地区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报告"。

④杨成武 福建长汀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⑤韦统泰、蓝亦农、钟池、霍烈昆 时分别任五十四军副军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和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钟池福建长汀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1949 年后历任四十五军一三三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五十四军干部部部长，五十四军一三〇师政委、军副政委，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⑥罗瑞卿 四川南充人。1926 年参加革命。1955 年授大将军衔。时任军委常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

⑦徐立清 安徽金寨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⑧陶峙岳 湖南宁乡人。1911 年参加武昌起义后加入同盟会。1916 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湘军营长、团长。1926 年参加过北伐战争。1937 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七军军长，参加淞沪抗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员，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 年率部在新疆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

⑨左齐 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江西永新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

1949 年后历任一野二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南疆军区副政委、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75 年后历任济南军区副政委、顾问。

⑩王尚荣 湖北石首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军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二、干部政策

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一是团结了广大来自各个方面的干部。特别是在我们师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小知识分子。那时候，中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就等于小知识分子。我对知识份子是比较重视的，觉得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脑子比较敏捷，来得快。当然，对其他的老同志都是一视同仁的。我觉得，正如歌词所唱的“团结就是力量”，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



【圖17】1958年，下連當兵時與戰士敘家常。

我 1994 年出去转了一趟，无论当年的知识份子也好，老同志也好，都感觉到我们五十四军比较团结，凝聚力很强。没有团结，今天我琢磨你，明天你琢磨我，那还怎么能够做好工作？其二，对干部的使用问题很大。原来一三〇师没来，就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三个师。我在一三五师比较公正。他们提不出“你这个人用人不大公道”。当然，我不能说没有缺点。到军里面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三五师的，谢家祥是 1951 年到军里来，他是一三四师的。就这样，三个师组成的军领导。而且，当时我是先到军里面，我是 1950 年去的，谢明是后来的，邱会作 1951 年要调走前他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师干部的使用提拔就很重要。我们在广州出发前，我是军长，有个副军长左叶[①]是从四十一军来的。谁来当参谋长呢？就从一三四师调了张晓冰任副参谋长[②]。谢家祥当主任，谢明是政委，钟池当干部部长。1952 年，吴瑞山调军里任副军长，这段时间就完整了。我们三个师，基本是每个师在军里两个人，这个很重要。我们到朝鲜去，这一段大家都很团结。所以，使用干部非常重要。比如说后来蓝亦农当政治部主任，当副政委。当时这几个知识份子都很能干。蓝亦农、卜占亚，工作能力、思想水平都差不多。蓝亦农当政治部主任，后来当了副政委，梁大门当了主任。为什么不用卜占亚呢？西藏平叛时，卜占亚是一三四政委，资格也很老，也是抗战 1938 年来的。卜占亚当时没工作，就在军部待了好久。我们从西藏平叛回来，他到政治学院去学习，军里

面没有办法分配。我这庙就这么大，也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让蓝亦农当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的领导班子要平衡，要注意照顾各方面。

我们 1952 年到朝鲜，1954 年停战了。当时，谢明去政治学院学习，谢家祥就从政治部主任当上政委。按道理讲，任思忠比蒋润观老，也有工作能力，他是一三五师的。蓝文兆[③]是老资格的政治委员，福建人，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他也有点文化，工作能力也可以。但是我们在朝鲜没有提着两个人，而从一三〇师师长位置提升蒋润观。因为蒋润观过去也是政治委员，把蒋润观调到军里当主任，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原则的。一三〇师是 1952 年从四十四军调来编成五十四军的嘛。一三〇师政委姚国民也是老红军[④]，后调军里当干部部长。姚国民调走，干部部长就是潘纯[⑤]，潘纯是地方干部来的。总的来说，使用干部，从军师来讲，我觉得可以。蒋润观走了，姚国民走了，一三〇师的政委是谁呢？是耿青[⑥]。1952 年合并时，他任一三〇是政治部主任。他当政委是合适的。蒋润观走了。叫谁去当师长呢？叫韦统泰去当师长。韦统泰那时是一三五师的。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他的人品、作战、工作、思想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比较起来，他是比他们强一点，合适的。最大的问题是注意到一三〇、一三五和一三四师的领导，都是师里本身提起来的，没有到别的单位去调人。军里其他人不是我们配备的，都是我不再朝鲜的时候，“志司”调来的。这些人到重庆后，陆陆续续调走了，那不存在什么问题。这是使用人才，使用干部。

对于干部工作的评价，要评成绩，没有什么偏向，所以就产生一个教育、批评、使用的问题。当时名为军里面注重教育、批评、自我批评，我很注重这个。我一般不大赞成一棍子把人家打死。这个人犯再打的错误，教育以后，或者这个单位使用得不大妥当，换一个比较合适他做的工作来做。按毛主席讲的“批评从严，处理从宽”。而且，我们对这些人的批评教育，在犯了错误之后没有厌他们。所以这个很得人心，错归错，批归批，处分归处分，但对这些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自己也感觉到可以。我讲那个袁智武平叛的问题[⑦]。他当团长不大合适，调机关也可以嘛，也是工作嘛。这样子，他也高兴，后来也是师干部了。一三五师的陈述也是这个问题。他是个参谋，机关出身，要当指挥员就不大合适，既然炮火一打就搞懵了，就不要当团长，干别的工作。我们应采取这个办法，实在不行就放在一边，打点零工也可以。教育、使用、批评，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所以我在这个部队 20 年，还没有一个干部因为犯了错误而翻不起身。我想不起来有没有，没有人提到。对干部，亲疏有没有一点？我们是有一点，问题不很大。我在一三五师时间比较长了，当然对他们了解比较多一点，比较熟。对一三三、一三四，后来的一三〇师，当然就没有那么了解，那么熟悉。互相之间了解，使用起来可能有影响，反映出我对一三五师干部比较亲一点。有点意见，不很大。

这个亲疏问题，我想起这样一段话，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1972 年，要我当广东省委书记。在北京，周恩来总理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个领导者，对底下的部队、干部要注意这么个问题，亲者要严。比如说，一个师的师长、政委，这个师犯了什么错误，那么你批评的时候，这个师长比较熟，比较亲切，也比较了解你。这政委呢，就没有那么熟，也认识，历史关系就差一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处理的时候主要是批评这个师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师长对你比较了解，你对他也比较了解。政委要不要批，要，但是次要的。这就是‘亲者严’亲者要疏，疏者要亲”，周恩来总理对我讲这个。

“亲者要疏”，什么意思呢？熟的干部在一起，什么都能说，真的假的，开玩笑的，很容易接近。不那么了解的，没那么熟的人，他就不敢，就在旁边站一站，笑一笑，插不上嘴。因此，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到，多接触和你不是很熟的干部。对你熟的干部可以不理他，要他们到旁边去，对那些比较起来不很熟的干部，多和他交谈，多和他说话。这叫作“亲者疏，疏者亲”。在这个问题上，如我去过一三〇师几次，我觉得周恩来的讲话非常正确，非

常适用。领导者对部署要注意很多方面。比如说吃饭，你们两个人要先把疏一点的干部拉一拉，来坐这个地方，靠着你坐，那个和你亲的干部到那边坐，这是很重要的。平时坐也是一样的，疏者近一点，亲者远一点，这个感觉不一样。当时我要离开了，要到广州了，总理跟我谈这么个问题。当时要我当广东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①左叶 江西永新人。1927 年参加革命军。1949 年后历任第四十一军一五四师、一二一师师长，1951 年任四十五军副军长。1952 年转业地方工作。

②张晓冰 河北丰润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49 年后历任四十五军一三四师副师长、师长、军副参谋长（时未有任命军参谋长）。1954 年后到海军工作。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

③蓝文兆 福建武平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64 你啊晋升少将军衔。1949 年后历任四十五军一三四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兼代师长、师长。1960 年调离五十四军后历任军委防化学兵部参谋长，总参军务动员部部长，军委炮兵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顾问。

④姚国民 江西吉水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49 年后历任四十四军一三〇师政委，五十四军一三〇师政委，军干部部部长。1954 年调离五十四军后历任军委工程兵特种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军委装甲兵副政委、政委（1975 年 9 月降任副政委）。

⑤潘纯 河北青龙人。1938 年入抗大学习。1947 年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八纵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民运部部长，五十四军党委常委、军干部部部长。1956 年转业至中国科学院工作。

⑥耿青 湖北沔阳人。原名杨朝汉，其父为著名新闻记者羊枣（原名杨潮）。1937 年参加新四军。1950 年后历任一三〇是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1956 年 7 月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⑦袁智武 时任一三四师四〇二团团长。后任四川省涪陵军分区参谋长。

三、作风养成

部队的作风要硬，要雷厉风行。干部说话要实在，是则是，会则会，有多大就多大，我们今天布置完的事情，你做不完是不行的，做不好也是不行的。在广西贵县时，我刚到军里当副军长。我们搞了一本很具体的小册子，这都失传了，


【圖18】1958年，下連當兵時穿著防化服演練。右一丁盛。

要求按照这个办。你不按这个办，搞错了，唯你是问。这是很严格的。那时我们连走路、甩手都有规定的。有的干部走路把手插到口袋里面，规定不允许的，这像什么样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不像站，坐不像坐。走起路来，手放在口袋里，好像条牛一样，牛的前腿后腿一起走，你像个什么样子？军容风纪，清洁卫生，工作时间，要求很严。不这样做，就要挨批评。你批评了他，他认为应当，自己没有做好嘛。

工作有优点不允许夸大。比如说你成绩有十条，你讲九条可以，讲八条也可以，不允许你讲十一条，夸大了就

不行。我们认为，优点嘛，你不讲也没什么坏处，当然总结经验要全面，但你讲这么多干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缺点必须要讲透，不能隐瞒，隐瞒一点都不行。我查出你的缺点来，你不讲，就要批评你。毛主席讲的话："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有多少讲多少。设计部队的荣誉啊，有缺点不大愿意讲，或者讲的不够，或者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我讲话多数是批评，恐怕这也片面一点。衡宝战役打这样一场好仗，我都没表扬过，反而是批评。我的想法是：缺点不批评、不纠正的话，对于下次就有害。优点我不讲，没什么害处。我也知道，这种指导思想有时会引起一些人不高兴。

衡宝战役之后，我批评四〇四团，忘了批评什么。冰野当时没有去，没有听到。后来他问参谋长："师长批评什么？师长讲一七二师，是怎样讲的？""一七二师是四〇四团把它堵住了，把它消灭了。"行了，别的不说都可以，只要有这句话就行了。这个我要肯定的，其他方面就不多说了。所以部队要实事求是，不搞假的，不要报喜不报忧，这是非常害人的。我给他们规定：你有什么错，讲清楚了，什么原因，该改正就改正，该批评就批评。你犯下错误不讲，要隐瞒，讲假话，一定要受处分。你在部队里面，只要讲了假话，明知故犯，你在这个部队里就不要想得志，不要想重用你，这个很明显的。咱们都把丑话说在前。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我也一样，他也一样，谁都一样，但是错了你不要说假话呀，对不对？错就错了，你说假话骗人，骗人就害人，那怎么行？这个我很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反感说假话，夸大成绩，报喜不报忧，说空话。

那次董占林①从昌都回到成都汇报。他到不是说假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西藏气候对部队的影响。讲的过程中，我就不耐烦说："你讲这个干什么？我又不是没到过西藏。我从西藏才回来，你不要讲这个话。"当时很不客气。他讲也没有错，不是假的，当时我才从西藏回来嘛，又不是不知道。饭煮不熟，我不知道啊？供应困难，我不知道？这不是耽误时间嘛。这个不是假话，但不必要讲，何必讲这个呢？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你给我汇报什么？但我们熟了，大家也不计较。所以我很强调部队的作风要好，要快，要迅速，要讲效果。一个是方法，一个是效果。你不注意效果，搞了半天有什么用？整个这二十年，我提倡这些东西。

最后，部队要上进。什么都要好，不好就不行。部队要好，你不好就靠边站，站后排，也不对你客气。人家优秀百分之百，你是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你该站哪一排？唱歌你比不赢人家，你该站哪一排？打球打不赢，你该站哪一排？部队野营训练人家按时到，你到不了，你该站哪一排？所以这个部队，上进心、竞争性很强，很活跃啊。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相当有名气。在这些方面，一点都不含糊。那年我们到重庆，听到别人对我讲：两个战士复员回重庆，在公共汽车上不知为什么吵起来，吵起来就要打。"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我从五十四军回来。""我也是。"不打了。所以他这个荣誉感是很强的。没有荣誉感是不行的，没有上进心不行的。


【圖19】1958年，下連當兵時與戰士一起學文化。右一丁盛。

1994 年我到昆明，昆明后勤分部主任，原来是五十四军的。他给我讲，我们在这里不得志，但是他们又不能不用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很能干，很实在。我在后勤当分部主任，他们就干不了，我就干得好，他就不能不用我。有一次，我在疗养院休息。那个卫生部政委是兄弟部队的，请我们吃饭时也谈到这个问题，说你们五十四军的干部很实在。说干就干，干得彻底，没有假的。我很强调这个东

西，你不要说那么多的话，要干实际工作，拿出成绩来，这样显得有本事。我们很多干部调出去，大家佩服，说你们的干部能干，没什么空话，实实在在，叫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能干好，有成绩。那个政委也讲学到我们这个作风，其实那个政委跟主任合不来，但是这点他承认。这个部队一举一动都提倡荣誉感，上进心，不要说假的，实实在在。所以，我们部队调出不少干部，在昆明、成都、新疆、赣州，一三〇师的那些转业干部都提这个问题。在南宁，有个干部不认识我，我一说话，他说："你是丁盛下面的干部，我听你说话很像五十四军丁盛培养的干部。"我们军里面，韦统泰很严，很具体，吴瑞山都很具体。没有说很多空话的。

①董占林 河北房山（今属北京市）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47 年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副团长、团长，四十五军一三四师四〇二团团长，五十四军一三〇师代师长、师长、副军长。1969 年 11 月至 1975 年 11 月任陆军第十一军军长。1975 年 11 月至 1978 年受审查待分配工作。1979 年 3 月后历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88 年授中将军衔。中共第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委

四、战友情谊深似海

我在五十四军二十年，对这个部队很留恋，很怀念他们。我说这一生，从 1945 年离开延安开始，直到 1964 年，没到过别的部队去过，就在这个部队成长起来，所以对这个部队有很深厚的感情。


【圖20】1963年初，在五十四軍演習現場。第二排左七丁盛。

这几年我没有事，就到处跑一跑。先是 1990 年到北京。我们过去那些干部真是亲热啊。不要说认识的，韦统泰、王志敏，他那位夫人隔三五天提个罐子："军长，我给你提来个鸡。"就这样，我在北京住了半年，有给我送米的，送富强面的。那个参谋周凤伦[①]给我提一篮子鸡蛋。给我提油的，是那个魏锦卿[②]。我们的秘书看到我去买肉，给我提肉来。过去我们一团团长邱蔚的老婆给我拿一包小米。什么都有，半年内，我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油，没有买过鸡蛋。我们单独起伙，在儿子那房子里住着，看我的人就不断，一次、两次、三次。我们的参谋李凡[③]三番五次来。张英新不但自己两口子，还交代在银行工作的儿子张克说："张克，我走了，以后军长的生活你要负责。你每天给他送几个馒头，送东西来。"一直是这样给我搞，我叫他不要搞，我有啊。我们走的时候给他放下了五十块钱，不知张克要没要？成都也是这样。成都的老同志佟俊阁自己是清贫生活，叫他们的儿子佟斌，他是个"小款"有汽车，好客气。连他的孙子也要见见我，照个像。这批干部出去一直是这样。10 月份到了天津。有许多基层干部，特别是连干部，那次请我去吃饭。有几个干部，打天津时是指导员、副指导员，生活很困难，但走的时候他们凑钱给我买从天津回广州的车票。我说，我不要，车票钱我还是有的。王荫民、杨继业、李恩普、韩辰、姚建都给了的[④]。后来我买了车票，身上有用的，

就想退给他们，想给他们买些什么东西，没办成。在天津，我住在天津警备区招待所。他们怕我冻着，这个送皮衣服，那个送个毛衣服，非常的亲热！

1991 年到武汉，还是一样，不重复了。这家去，那家去，这个住、那个看。1992 年到济南，主要是一三三师的。过去认识不认识的都来看，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还有就是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当兵的一、二百人，山东济南人。有一天，有个人要来看我。我说可以啊，结果忽啦啦来了一房子的人。我说："我都不认识大家。""哎，我们认识你啊，我们在四〇四团当兵，你不也在当兵嘛。"那是 1958 年大跃进，毛主席号召干部都要下连当兵嘛。"我们都在一块，你忘了？"

我在南京处于逆境的时候，有新疆来的，青海来的，沈阳来的，来看我的，写信的，给我寄东西的都有。我在南京、广州住着，这些人也都是一样。

1994 年我先到桂林，认识几个人，多数都不认识，和刘兴旺联系不上，住了七、八没办法。准备走吧，又不甘心呀，我老伴写封信寄出去，正好收到了。下着大雨，刘兴旺的老伴、儿子光着脚，趟着水，夹着伞，找到步兵学校，找到我了，本来我们火车票买好了，准备走的。"不行，不能走，退票"，这样就把票退了。到他们家里一看，还有十多个人等着，很多人还不知道。看了有五、六家，走的时候送到火车站。从桂林到了南宁，也是一样，多数人不认识，主要是看我们过去那个师政委韦祖珍的老婆，还想看看王正常[5]，过去我们师政治部的老红军，管理科长，还有邱五金。那些人知道了，看望啊，吃饭啊，都是一样热情。耿跃华是老一团的一个连长，他说："我是老一团的，你过去在老一团当过团长、政委。"他两口子热情，接我们，陪着我们，住高级房子。后来我们到北海，两口子送我们到北海。他们一站一站交代："我把老军长交给你了！"在一三五师当过宣传科长的李百顺转业了，很能干。他有一次翻车把腿摔断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但非常热情。我到了北海，他从海口专门坐船来接我。我就到海南岛住在他那里。"您在这里住、吃、行，我包，什么都不要管。"一起生活，他也很朴素，很实在。我们住了个把礼拜，临走，从海口到昆明的飞机票还是他买的。

这样，7 月 6 日，海口到昆明。好多好多人去接，这部分人我就熟啊，男的女的都熟。到了昆明之后，他们问我老伴："军长喜欢吃些什么？住房里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穿的衣服少，昆明天气早晚凉。李世翼、彭道英[6]送来毛衣，我说不要。送了衣服，送水果，这个提芒果，那个提香蕉、荔枝，吃不完都坏了。在云南省军区招待所住了几天后，又计划到每一个干休所住一下。先去佟俊阁家住几天，我们就到了大理。王铎是从昆明带着我们去的。大理又有几十个人，就不大认识的了，有的可能见过，有的确实不认识，吃饭是三桌，都在一起吃饭、照像。在那里见到张舟，她丈夫王庆喜过去是一三五师的宣传科长。在 1974 年"文化革命"中自杀了，当时是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张舟是从北京来的。知道这个情况，我就很同情。我说，把张舟找来，我要感谢她，对王庆喜这么忠诚，带着两个孩子很困难啊！在大理住了三天，就到洱海去转了一趟。从洱海回到招待所，照像、吃饭，我都要把张舟带在旁边。住了几天，我们又回到昆明，就到王凤戈家。然后就到温泉住了二十多天。在这期间到曾惠平那里去了好几次[7]，曾惠平家的刘会师确实不大熟，那是真好啊！亲手给我老伴织毛衣。我说："刘会师，我们都不认识，你怎么这么客气？"她说，曾惠平过去在军里，你们的关系怎么的，我都知道。后来就到丁荣昌[8]，我们的小老乡家里。他们的儿女也都非常好。刘子波[9]，和他老婆姓姚，虽然都知道，却不怎么熟，都非常热情。在昆明住了五十多天，我们这些老战友会了两次餐。第一次在招待所，第二次是省军区副政委请我们吃饭，零零星星的还不算。还有地方干部，原来也是我们一三五师的，转业在高级法院，也非常热情。

昆明之后，我就到成都去了。这些老部下怕不落实，派王凤戈到成都去打前站，方一川说：“你到成都以后，我到重庆去准备一下。”当时方一川也想到成都。我说：“不要了，成都那些人都很熟的，你就不要去了。我什么时候从成都走会告诉你，你提前一个礼拜到重庆。”王凤戈去安排碰了个“钉子”。成都那些人不要公家安排。我们军那个后勤部王部长[10]，还有机要处长赵德清[11]，通讯处长高继贤[12]，董崇仁、周子珍[13]这一大批人都很熟，那不是一般熟。岳广运、马骏荣[14]这一批干部，男男女女都很熟。所以他们要“民办”，一家一家安排住，先安排我们在省委一个离休干部范孝珍家里住着。他们每天都安排两个人陪着我。我说：“你们这样怎么行？”他们说：“怕你到这里，没有人跟你说话，寂寞嘛。有人跟你说说话，聊一聊嘛。”我说：“那不必了，随便走一走。”后来周子珍来，我发现他老婆李志平发烧。我说：“你这样不行啊，李志平发烧，你们要回去。”他说：“不行，这是我的任务。”我说：“领情了，你们回去吧”。然后，我到王部长家里住，赵德请、高继贤、王保元他们安排的。在长寿桥干休所，第一个就到董崇荣家里住，这个干休所人还不少。长寿桥以后，就到了李庆普家[15]，过去我们一三五师的一个团政委，调到成都军区当秘书长。在成都住了三十八天，又到了乐山，峨眉山。到乐山又是一大批人。那些比较老的干部都认识，后来到一三五师，一三〇师当兵的都不认识。有个转业当银行行长的叫于先志说：“你们不要管，老干部也没有钱。军长来了，吃、住、车、照像，我管。”还有一个一三〇师的副主任在邮电局当党委书记。总而言之，热情实在。我到了峨眉山，郭沫若故居，三苏祠，在苏东坡故里吃东坡肘子，非常周到。回到成都，在周子珍家里，马骏祥天天陪着我[16]，他就是接待的负责人吧？马骏荣家里那个张素芬哪，真是好啊。在一起吃饭，我说过去不认识你啊，怎么对我这么周到啊。早晨起来冲奶，买点心什么的。他说：老马讲过，过去在军里你们关系怎么怎么的，所以我听到你来很高兴。这样，各家各户，男女老少，我都去看了，差不多都看到了，我很感动。也有提一点意见的，那些女同志说：“军长，我们对你有意见，你在军里对我们女同志不关心。”半真半假，半开玩笑，也是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当时我们的军里对女同志关心就是不够，对她们的培养、安排、提拔、使用是有缺点。走的时候给我一个纪念表，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的。“哎哟，王璋琳给我这个干吗？”“纪念嘛！”王璋琳和赵德清过去都是我的译电员。成都这一段，除了不认识的以外，那就差当权的了。他们接待花去了好多钱。交通公司的党委书记一直陪着。他原来是一三五师的，1961 年参军的这批战士。


【圖21】1963年11月，五十四軍領導歡送黃傳龍到陝西公安部隊任職。前排左起謝家祥、丁盛、黃傳龍、黃傳龍夫人、韋統泰。

他们四川人哪，现在都是当相当一级干部。他讲，成都一千多辆公共汽车都归他管。在不远的一个岛上，他还搞了个别墅，叫我在那儿住了一天。这是第二茬，我们不认识的，他知道我。“我们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一去就讲您怎么怎么的。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有印象。”赣州那批兵，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当兵的？“1969 年，五十四军从云南到河南去的时候，我们当的兵。”我说：“你们 1969 年当兵，我早就不在五十四军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哎，一当兵就讲您啦！所以这次您来，我们有一百多人在赣州，都要来看看您，招待您。”

所以，我对五十四军这批同志感情很深，对我精神鼓励很大，我对大家很怀念。我对他们讲：“我来，什么事也没有，就是专门来看看你们。”这是很实在的，我有什么事啊？就是来看看大家，老了嘛，今天看了，明天就不一定在了嘛。

①周凤伦 曾任五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后调北京总参作战部工作。

②魏锦卿 曾任五十四军司令部秘书，后调北京总政解放军画报社工作。

③李凡 曾任五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后调陆军第十一军、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

④王荫民、杨继业、李恩普、韩辰、姚建均为曾在五十四军工作过的干部，后转业到天津工作或离休后在天津休息。

⑤王正常 曾任一三五师司令部管理科长，后转业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委工作，曾历任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农林局、林业局副局长。

⑥李世翼、彭道英 李为王凤戈夫人；彭为方一川夫人，文革中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委员。王庆喜 曾任五十四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1969 年后调陆军第十一军历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政治部副主任。1974 年 4 月去世。

⑦曾惠平 曾任五十四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文革中因遭地方武斗人员袭击意外受伤致残，后调昆明军区后勤部工作，曾任昆明军区总医院副政委。

⑧丁荣昌 江西于都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昆明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省公安厅总队长，昆明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⑨刘子波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三九〇团团长。1969 年后历任陆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第十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⑩王部长 即王焕忠，曾任五十四军后勤部部长，1966 年后历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⑾赵德请 曾任五十四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后历任成都军区司令部机要局副局长、局长。

⑿高继贤 曾任五十四军司令部通讯处处长，后调任渡口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⒀董崇仁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副参谋长、副师长，四川省雅安军分区司令员。

周子珍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四〇三团团长，后历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军训部副部长，成都步兵学校（陆军学校）校务部部长。

⒁岳广运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四师政治部干事，后调成都军区司令部工作，曾任梁兴初司令员秘书。

马骏荣 曾任五十四军政治部干部处处长，后调任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⒂李庆普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四〇四团政委，后历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

⒃马骏祥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五师炮兵五四二团政委、军后勤部副部长，后调任成都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

五、重返重庆

到重庆也是一样。我们警卫连那批战士都当什么科长，主任啊。那天晚上来了十几个。“我们都是警卫连战士，来看看您。”我说“好好”，照了像。我特别一提的，是炮兵团的一个干部刘玉春，现在国土局当副局长，陪着我去看石窟，讲了好多故事。让我高兴的事是，所有人都叫我军长。他说：“军长，我们知道您这个人，对干部很严，一点不客气。有一次开大会，梁大门讲话照稿子念。你马上制止他，‘你梁大门，自己不动脑筋，念稿子。’耿志刚那么厉害，你叫他站起来，批得他动都不敢动。耿志刚人家叫他‘阎王’严肃的，竟然就不客气，当着那么多人训他。”“可是你对当兵不一样。有一次，您到炮团，一个兵在树底下切猪草。您就站在那儿看，那个兵切猪草的刀切不动。你就把这个兵的刀拿来看，一看这刀缺口，斩不动，你没有说这个兵，马上把炮团的团长、副团长叫来，你也不说话，把刀交给他说‘你来斩’，还是斩不动，‘你看看，什么原因？刀坏了切不动，当兵的累得要死，你们知不知道？’团长回去三天后，全团的切菜刀都换了。”“热天挂蚊帐，年轻人睡觉乱蹬，蹬开蚊帐蚊子咬，规定干部要要查铺查哨的，蚊帐不严要塞回去。你一看不行，把他们干部叫来看。您对这个很严，对干部要求严，干部没有说的呀。批评他，他也服气，当兵的也高兴啊。那时团长真害怕你来，也不知道哪儿搞得不周到要挨批呀！”



【圖22】1964年9月，調離五十四軍時與部分軍、師領導合影。前排右起梁大門、韋統泰、丁盛、謝家祥、霍烈昆、王聚賢，後排右起趙慧毅、耿志剛、何鎮浪、張進、支萬鑒。

爱兵，我在五十四军对这点很明确。你是干部，就应当管好。你没有管好，怪兵干什么？刘六春说我爱才，爱什么才？不是爱钱，爱干部这个人才。重庆大修厂一个总工程师、副厂长，在锦州时差点被枪毙，我问：“犯了什么法？不要枪毙了，关起来，劳动教育嘛！”没有枪毙，结果这个人现在当了总工程师。你当官不爱兵，你当什么官？所以我们五十四军干部特殊化不严重，不能说没有，不严重。而且，我们军里面吃饭都是按什么灶，到地方吃饭，要批条子。我说，我当了十几年军长，没有批过吃饭的条子。批什么？你们一批就是万儿八千的。我有什么可批的？按制度办事。所以官兵生活上一样，不能特殊。

我离开五十四军这么多年，我对这个部队很留恋，彼此间感情也不错，我很愉快。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周总理给我讲的话，我还要讲回来。一三〇师的政委应当在一三〇提拔，或者是刘润泉[①]，刘胖子，或者是支万鉴[②]，不应当叫钟池去。钟池去当政委，这样就有反映了，这是我的想法。后来我调走了，钟池掉出来了，谁当政委就不知道了。按道理，师长应当在一三〇师选拔，一三〇师那些团长，后来在十一军任副军长的赵福顺[③]，或者三八八团的成德禄当师长[④]，应该这些人去当师长。就不应当叫郑金海去，郑金海是一三五师的。郑金海走了之后呢，听杜照明讲[⑤]，又叫赵举去当师长[⑥]。这些都是不妥当的。一三〇师出个师长不成问题。这是后来的事情了，我当时都不在了。但总感觉一三〇师后来去这几个人是不妥当

的。对这个事情，过去我没有交待好。还有一个李洪钧[7]，在朝鲜就没怎么搞好。到西藏去的时候，我让他搞好。佟俊阁就给我讲，你还是重视他们的，当时想让他立个小功，但是没有搞好，没有办法。但他们不会有意见，他们对耿青有意见。杜照明也对我讲：这个不怪你。所以我认为总理讲的话在这里也很适用，"亲者疏，疏者亲"。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因为你不了解他，你不容易提拔他，使用可能不当，并不是你主观上有什么原因，你要全面了解这些人。我不是责备他们，而是总结经验教训。

①刘润泉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1969 年后历任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②支万鉴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三九〇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一三四师副政委，一三〇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

③赵福顺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三八八团团长、师参谋长，军后勤部部长，1970 年调任陆军第十一军副军长。

④成德禄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三八八团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政委，一六〇师政委，军副政委。

⑤杜照明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后勤部部长，军后勤部副部长，后历任陆军第十一军后勤部长，云南省军区后勤部顾问。

⑥赵举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副师长、师长，一六〇师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1978 年调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⑦李洪钧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三九〇团团长。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降任五十四军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后转业地方工作。

第十章 新疆岁月

一、兵团的成绩与缺点

1964 年 8 月份，从重庆坐飞机到西安，住了一个礼拜。新疆来了个办公室主任接我，住在宾馆里面。到了贵妃池，杨贵妃洗澡的地方，我也去洗了澡，参观了碑林。住了几天，由西安坐火车到新疆。

我们到新疆那天，生产兵团政委张仲翰[1]带了机关部以上干部到车站欢迎，我们很高兴。新疆这个地方，我是人生地不熟。新疆军区有几个人认识，延安的同学嘛，王恩茂[2]、郭鹏[3]、左齐，在我们军干过副军长的何家产[4]，还有李铨[5]都认识，其他统统不认识。我到新疆去，贺老总给我讲管兵团，不管部队。我就先下农场，带着眼睛去看。到了石河子农八师，奎屯农七师、伊犁农四师；以后又到了农七师，五十四军的阎平[6]当的参谋长；又到阿尔泰农十师。农场，我都去了；中苏边界，我也去了，大草原我也去看了。后来就去南疆，到了库尔勒农二师，塔里木农一师，喀什农三师，农三师还没完全搞好，还到了和田。这样，把新疆整个地区都看了一遍。

我感觉新疆农田建设不错，给我印象很深。新疆过去是很荒凉的地方，石河子就是石头诃子，缺少人烟嘛。我去的时候，石河子农八师有二十多万人，有学校，有卫生学校、纺织厂、商店、工厂、糖厂，什么都有，像个小城市。印象最深的是农田，新疆的农田，一块田很长很长，种的树，杨树四排，很整齐。开眼界，我虽然没管，但看了回来也很高兴，这是农田建设。要有农田建设，就必须有水利。新疆就是有水就行，没有水不行，修了水库，水渠。新疆的水是靠雪山上的水，不是自然河里的水。伊犁、石河子、奎屯都靠雪山上的水。农六师就在乌鲁木齐附近，也靠雪山上的水，水库、水渠、支渠很多。新建的建设，我去的时候是个什么规模呢？主要是农产品，也有工厂、学校、商店，派出所，新疆生产兵团本身是一个小社会，什么都有，大社会里的小社会。新疆生产兵团归新疆自治区，也归中央农垦部，也归新疆军区，是这么个领导关系。中央对它很重视，王震、王恩茂、张仲翰他们都出了力，干得有成绩。我给他们讲，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农田，一层一层，粮食长得也很好，小麦、谷子、玉米，新疆是大米不多玉米多。什么水果都有，哈密瓜、葡萄，原是新疆的特产；后来苹果、梨呀、桃呀到处都有，水果很多很多。新疆原来是不吃菜的。听他们讲，开始我们部队吃菜，老百姓讲你们这些人吃草，他把菜和草看得一样。兵团这样一搞，新疆个个都种菜。这就是一种建设啊，好像文成公主到西藏一样。同时，新疆生产兵团的民兵连也不少，也不错，有枪，军事装备也不错。工农兵学商，什么都有，所以我感觉到成绩很大，印象很实在。

我很高兴有这些成绩。有缺点没有呢？有缺点。一个人到了新的地区、新的单位，对这个单位的缺点很敏感，很容易发现。我感觉，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工人、农工生活关心不够。这些农工都是些都市青年，上山下乡的青年。上海、武汉最多，其次是湖南、北京，哪里都有，主要是上海和武汉很多。青年人，他们因为生活不好，就有点意见。原来招他们去的时候，说是到新疆当兵，穿军衣，说我们是这么来的。现在我们生活不好，有意见，所以我感觉到关心不够。具体的例子，就是冬天睡觉很冷。他们创业，搞生产是对的，但是住地窝子，虽然里面冬暖夏凉，但不是长久之计。我在石河子看到盖了房子，房子里面的地高低不平，没打炕，滴水成冰。新疆的温度很低，没有炕，也没有什么垫的，盖的一床被子，很冷啊！哎哟，我说这怎么过啊，很苦！


【圖23】1965年，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歡迎裴周玉(前排左六)到任。前排左七丁盛。

吃的还可以，种粮食嘛。穿的也勉勉强强，主要是冬天难过。那些青年都是城市的学生。公家发的这些衣服，他们拿了双鞋给我看，大头皮鞋，一个长，一个短。当时我才去，他们不认识我，说：“副司令，你看。”我说：“你咋不换呢？”“他们不给换啊，谁还给我啊？”部队过去也有这个问题，发了服装以后，开始不可能那么合适，以后调整啊。长的发给大个子，短的发给小个子，换一换，但这里没有换。所以他们说：“这个我不能穿，有什么用呢？”病号病了，管得不够，也不是没有管，管得不够。我在昭苏，昭苏是个大草原地区，边界地区。一个人病了，可能是气候的关系，腰椎发炎，起不来，恰恰我就去了。这个病号被办法，车也不能坐，抬也没办法抬，当地医院也不行。我想一想，这样吧，搞个

大卡车，我们几个人搞个担架抬着，站在车上，他躺在担架上，绑好，这样用卡车拉到伊犁去。这样不就行了吗？所以说，对病号关心不够，各级领导都有这个问题。

大草原，有的地方很大，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怎么知道我去了，就来了一个人找我，让我去看看，我就去了。大草原一望无边啊，那儿住了二十多个上海支边青年，全是女的。住的什么房子呢，像个羊圈，窗户是个洞，全是一把草。她们给我讲，晚上狼“呜呜”直叫。那些青年的意见就大了，我也很难过。人家家里把青年交给我们了，把 20 多个年轻女孩子放在这样一个荒凉地方，不沾天，不沾地，怎么行？她们拉着我，让我上那里住。我说，住是没法住，你们都是大姑娘，我怎么能在这里住呢？晚上我就走了。这是很具体的例子，我看到的，也就是管理方法不对头。后来我就讲了一下，毛主席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样怎么行？成绩是摆在这里的，讲不讲都没有关系，成绩也是这些人搞的呀，年轻人干的。良田、水渠、水库，不是农工搞的，谁搞的呀？领导同志要关心他们。我就把这些问题摆出来。讲了之后，机关就有反映，感到我这个讲话看他们的缺点多。我不是说了嘛，我是有这个毛病，优点讲得一般化，不具体，而缺点呢就具体，有鼻子有眼，一个一个摆出来，机关就这个反映。

后来，中央军委又不断派干部到兵团来。裴周玉到兵团当政委⑦；李荆山来当主任⑧。李荆山是空军，他资格也很老啊，山东人，在空军哪个单位当主任。四十六军的一个副军长王振东⑨来当副参谋长。这样，机关就有意见。部、处那些人讲闲话哟，就说我们兵团就提不起一个副司令啊？我们兵团就提不起一个参谋长啊？我们兵团就没有一个能当主任啊？生产兵团这样多的成绩，这样多的年月，我们就不能提啊？平心静气地讲，兵团那个师级是很老，有红军。农六师师长就是老红军，二师政委是红军，师的干部主要是抗战时期的干部。这些人都是有本事的，提拔他们是完全可以的，不应当派我们去，这个毛病是可以解决的。这个就不怪我们，不是我要去的，也不是我派来的，上面派来的。后来部长级会议上，我就讲了这个问题。我讲：“我不愿意来的。几十年干革命工作，哪里不可以干，一定要来这里干？我是没有办法，罗瑞卿总长点名叫我来的，那怎么办？我不愿意来，他点了，我也不来。到了北京，总政副主任徐立清找我谈话，我还是不来。贺老总找我谈话，那我就不能不来，元帅谈了嘛，我能不来吗？我不愿意来，我告诉你们。”我很气愤地讲：“你们感觉了不起，你们革命有功，有成绩，我不否认。我革命也不是吃干饭的，不是到了你这里才有饭吃。我说我不愿意来，但是我现在来了，你们想把我赶走，不可能！不行！我来了我就要干，你不动，我就要批你！”


【圖24】1966年5月，在國防科委二十基地觀看導彈發射試驗。左起：陳康、張震、丁盛、郭鵬、左齊、宋時輪、裴周玉。

当时不一定要这样讲话，只不过有气，本来我就不愿意来，来了你还这样说我。我们是1964年去的，1966年才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年之间有点隔阂了。我批的很厉害啊，他们也知道。一看我这人不好惹啊，“噢，这家伙很厉害！”这没事，工作嘛，我搞什么，他们不敢不支持。我虽然才去，我不是司令，但是陶峙岳他是不太管事的。

①张仲翰 河北沧县人。1937 年组织抗日武装入伍。1949 年后历任一野二军六十师长，第九军政委，二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

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主持兵团工作。1960 年后兼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常委，1966 年 3 月后兼新疆军区副政委。1966 年 12 月被召去北京。1967 年 3 月中办通知留京监护，隔离审查。1975 年 5 月解除监护，后任军委炮兵顾问。

②王恩茂 江西永新人。1928 年参加革命。1955 年授中将军衔。建国后历任南疆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68 年 9 月至 1972 年 12 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2 年 12 月调离新疆。1981 年重回新疆，历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委主任。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委、中委，第九届候补中委，第十一、十二届中委。

③郭鹏 湖南醴陵人。1929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建国后历任一野二军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69 年后历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④何家产 江西上犹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1949 年后历任一野一军五师副师长，南疆军区副司令员。1960 年至 1962 年任五十四军副军长，后回新疆历任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参谋长。1975 年任福州军区参谋长。

⑤李铨 江西吉安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五军政委，伊犁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1959 年调地方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⑥阎平 曾任五十四军一三〇师三八九团、三九〇团团长。1967 年至 1968 年曾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代参谋长。

⑦裴周玉 湖南平江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二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六十九军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4 年 5 月调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政委（1965 年 5 月到职）。1968 年 8 月后主持兵团党委工作，1967 年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兵团第二政委，1971 年任兵团党委第一书记。1977 年任军委装甲兵顾问。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

⑧李荆山 山东寿光人。1937 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建国后历任广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主任，空二军副政委。1964 年 5 月调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任，1966 年至 1972 年兼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8 年任兵团副政委。1972 年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⑨王振东 河北饶阳人。1938 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四十五军一三三师副师长、师长，四十六军一三三师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1964 年 5 月调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1968 年任兵团副司令员。

二、文革初期的冲击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新疆比内地晚一点。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有些大字报，北京来了些红卫兵，开会呀，街上写大字报呀。8 月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批了刘少奇。罗瑞卿是 1965 年 12 月在上海搞下来的。把他搞下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提倡这个呢？文化革命一开始，裴周玉来了。当时他在西北局开会，传达八届十一种全会。不知是谁讲，我和裴俩个是罗瑞卿派来夺权的。我说：“老裴，是不是他们西北局负责人讲的？”

裴说："他们没点名，只是说：罗瑞卿的黑手伸到新疆来夺权了。实际上是指我们几个人。"

乌鲁木齐开会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那天开大会就没叫我去，因为他们点了我们。裴周玉在西安开会没回来。我呢，没什么感觉，不去就不去。副参谋长王振东就流泪了，很着急，他感觉有问题。我那时候迟钝，问王振东："没叫你去，他们都去了？"会开到半截时有叫我去了。到了会场之后，见到金忠藩[①]和其他一些人。"哎，你现在又叫我来了？你们不怕牵连啊？"我也说风凉话，"我是来夺权的嘛，刚才不是说什么罗瑞卿分子吗？"这样，1966 年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批过那些人不满意，就写大字报批我。也没什么事实，就是说我到新疆来夺权怎么的。写我的大字报，我看了，也没管，你写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怕。我到新疆后做了几件事，我批评机关搞得乱七八糟不整齐，院子里鸡窝、菜窝什么都有。批了一顿，拔掉了鸡窝，种树，做了一件好事。有一部分群众很高兴。"这个人不错嘛，我们机关像个样子嘛"，"这样搞多好，关心群众生活"。他们不同意说我夺权，不同意说我是坏人。这部分人就成为后来"八野"派的兵团机关"联总"。另外一部分兵团机关的人，有副参谋长，还有科长，工作人员，成了另一派，叫做"兵机造"②。所以无形之中就分成两派。我当时不知道，还没有这个概念。

这时候，原来三五九旅的一个老干部贺振新[③]，六军团的，江西永新人，和王震、王恩茂他们比较好。他从湖北一个什么学校调到兵团来准备当副政委。他才来什么也不了解，就和造反派站在一边。因为他和他们过去熟悉啊，过去是一个单位的人。他一支持造反派，另一部分群众就批他。文化大革命说有什么后台，实际上没人给他出主意，没有什么后台。批他好几个月，到 11 月，那天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在开会。保我的这派群众把贺振新批了一顿。其实批他也是什么根据也没有。人家才来，命令都没有下，你批什么呢？但群众不管这些，把他拿去批斗。贺振新有心脏病，批斗以后回去洗了个澡。一洗澡，发了心脏病，死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就说硬把他批死的。机关造反派就要我去守灵，整我呢。当然，我去看看也可以。当时军区王恩茂等领导是保护我的。时间长了，他们出个主意说，军区开什么会，叫丁盛来开会。这样把我叫走了。后来要我表态，我对贺振新的评价很高。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老同志，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解放战争。贺振新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们说："你是不是评价就这样高了？"我说："就这样。"他们也没什么说的了。只能这样高，还能多高？还高到哪儿去？

到了 12 月初，批我是个坏蛋，要夺权。夺权？我还是说这个话，夺谁的权？你们说说。陶峙岳吗？他有什么权？他没有权，有什么夺的？张仲翰吗？张仲翰是政委，我是副司令，我怎么夺张仲翰的权啊？就跟他们辩论，我不让步的。"罗瑞卿叫你来的！""是他叫我来的，怎么样？我是一个军人，他命令我来，我能不来吗？"裴周玉是政委，也是才来的，当然也挨批。有一次，那些造反派男男女女，什么话都说得出来，骂娘呀。骂得我起火了。有个女青年骂我："你是约翰逊！"气得我不得了，就骂她了："你们是什么东西？"后来到了北京还是骂啊，批啊，罚我立正。我都没在意说："你批我可以，骂我也可以，咱们说清楚，但你不能打我，你打我就不行。你打我，我等会儿就要打你。你骂我，随便你骂，反正骂又不痛的。我不知道你们过去是怎么个搞法，我才来的，你批吧。"他们有调查我呀，到四川去调查，到五十四军去调查，到处调查，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有一天批我，搞得我很苦，冻得够呛。保我的一派都很聪明。他们说："今天晚上造反派要批你。怎么办呢？我们也批你。批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房子里，你就坐在另一个房间，不开灯，不要说话，什么也不要说，派两个人陪着。我们拿着稿子批你，骂你，这个也不是假的，但你坐在那里不挨冻了。他们批你，你就受罪了。"我坐在那房子里休息。他们这样保护我。新疆石河子农学院造反派头头叫王兵。12 月 16 日，他们通知说明天开大会要批斗。他说不是批我，但要参加，还给了我一个海报。当时不是贺振新被斗死了吗？我就说："我

不参加！”“你一定要参加！”我就和他们硬顶：“我为什么要参加？你们开会关我什么事？你们干你们的事，我又不是造反派。”就是那天晚上，新疆军区不知从哪儿得到情报，说明天开大会造反派要把我搞死，那有可能。晚上把我叫到军区说，“明天你不能够去开会！”那怎么办呢？想来想去，郭鹏、张希钦④、王恩茂他们说：“今天晚上派个吉普车，把你送到飞机场，坐飞机离开这里到北京去。”军区有个小飞机场。这事孟文虹都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就是一个陈秘书知道⑤，生产兵团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样，我就坐飞机走了，到北京去了。

第二天开大会，我没去，造反派就找啊。找不到丁盛就抄家，就找孟文虹，找我的小孩。女儿西西串联去了，才十三岁。孟文虹带着宁宁、毛毛、小江三个孩子。我的小孩吓得不得了啊，毛毛和小江跑到何家产家里躲起来了。孟文虹多到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何家产就把我的老婆孩子藏到呼图壁一个医院，不是医院的病房，是一处闲房子里边。冬天，墙上都是冰块，他们母子几个人就躲在那里边。孟文虹告诉 5 岁的小江，去理发店时要戴个口罩，旁人问什么就摇头。他们这样苦，我不知道，我跑了。造反派在家里乱翻腾，还不止搞了一次。

①金忠藩 江西莲花人。1937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一野二军六师师长、第二高级步校训练部部长，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1972 年调成都军区工作。

②“八野”即“八一野战军总部”，主要由来兵团较晚的复转军人组成。“兵机造”即“兵团机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为造反派群众组织。1967 年 3 月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由裴周玉宣布解散。

③贺振新 江西永新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政委，军事工程院校炮兵系副主任、政委，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委。1964 年 5 月调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1966 年 1 月到职）。1966 年 8 月被揭发批判。12 月 12 日，在批斗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④张希钦 河南东明（今属山东）人。1930 年入国民革命军南京军官学校。1955 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副部长、部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75 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⑤陈秘书 即陈宏康，1957 年至 1964 年 8 月任五十四军政治部秘书处秘书，1964 年 8 月随丁盛调新疆，此后长期担任丁盛专职秘书，至 1974 年 2 月。

三、“你们打不倒我”

我到北京之后，造反派很坏，煽动那些年龄小的绝食，在乌鲁木齐的“八楼”，当时一座比较大的楼。“我们开会，丁盛不来，我们就不吃饭。”绝食问题很大，我不知道，我在北京。裴周玉还在新疆，张仲翰在新疆。绝食二三天，周总理知道了。周恩来是无事不知啊，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关键。怎么办呢？周恩来的措施是叫张仲翰出来做工作，叫他们不要绝食，造反派派代表到北京来。那些造反派头头，年龄大一点的人，他们没有绝食。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坐一坐，换换班。换班时去吃饭去了。真正绝食的是中学生、小孩、年轻人，糊里糊涂的说坐在这里绝食。“不许出来呀”，那些大人都放着哨的，不许出来。绝食到一定程

度，你想说话，想站起来，没有力气，你起不来，就要饿死。那些年龄大的一点没绝食。他绝什么食啊？他都吃了，到外面买东西吃，吃蛋糕、点心。周恩来指示：张仲翰出去说话，有问题，到北京来谈。造反派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有多少人，我就不知道了。张仲翰也到了北京。这样，局势平息了。

我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找我，要谈，要见我。到了 12 月份，全国都紧张，乱啊，都是这种形势。大区、省委，各级党委都瘫痪。新疆自治区瘫痪了，没人办事，没人干活了。到了北京，那就不是我一个人了。王恩茂、裴周玉、郭鹏、张希钦他们都来了，和造反派谈判呀。造反派胡搅蛮缠嘛，当然开会就不可能了。

谈了几天后，谈不出什么东西，那些人又策划一个阴谋。在石河子有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他们策划什么呢？在石河子抢枪①。石河子有个独立团，有枪。造反派他们也有枪，这样一抢枪，就要打起来，一打起来就要出事。所以全国打的第一枪就是新疆，第一个绝食也是新疆，有名啊，很厉害的。

他们想把我搞回去。前两天，造反派已经把我叫去了，要斗我。那时候，我也不怕。我就去了，说要斗，你们斗吧。原来是斗了一整天后，晚上把我放回去，回京西宾馆。后几天，就不让我走了。“不能回去，跟我们在这儿住。”我说，住就住呗，反正我也无所谓。当时我有个秘书，陈宏康秘书，一去就把我和秘书分开了，剩我一个人。第二天，他们都准备好车，那时候坐火车不要票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要票，毛泽东不是搞大串联嘛。他们和北京造反派有联系，想把我绑架走。他们为什么要我上火车，到乌鲁木齐，到石河子？因为石河子打起来了，打死了人，想把这个罪加在我身上，要搞死我，这是他们的目的。我坐的是京西宾馆的车。京西宾馆的司机非常好，看到他们把我架上火车，陈宏康没去。上了火车，没走之前，我告诉司机赶快去报告王恩茂、裴周玉。王恩茂他们就报告了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办公室就叫了“红二司”的头②，说，不管你是什么派，必须把丁盛找到。找到之后，接回来，不能走，不能回新疆去。有事，将来我们谈，我们解决。快开车了，“红二司”那些人上来了。那些造反派很凶啊，不管哪一派都很厉害，不客气的。我坐在一边，新疆这一派想把我藏起来，我就不干。“红二司”的人看到我，把我拉下去，拉走了。这样，我就没回乌鲁木齐。如果回乌鲁木齐，我看有危险，当然这是设想的，没有成为事实，但他们是有这个阴谋的。这个阴谋没得逞，周总理又保护我，这是第二次保护，第一次是绝食。绝食搞死了人，我那几天最发愁。我被搞死无所谓，这么大年纪了，我想想老婆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交给谁？当时我想过交给吴瑞山帮我照顾，可是吴瑞山在江西比我搞得还苦。哎呀，那时一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时期。

没离开北京，但造反派还是找我，经常去，经常批斗，不让我走。晚上，男男女女都住在一块儿。造反派在开会时很凶，有的家伙很坏。也有的人不是这样，对我很好。给我两件皮大衣，没有面子的那种老羊皮。给我打饭，热饭，“你吃饭吧。”后来，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打到我？”他给我讲：“不是真要打倒你。因为你这个人态度太硬，想把你打软，因为你保护王恩茂。”开始他们每当我怎么样。经过这一段，感觉我这个人不大好弄，要把我拉过去：“你呢，站过来，打倒王恩茂，你支持我们，我们就推荐你当我们造反派的头。”我说：“那你们也不能这样搞我呀！”“不这样搞你怎么办？你的态度那么硬，动不动就跟我们吵。”我说：“你们打不倒我，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老红军？”开始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说：“你们怎么能打倒我？第一，我是工农，我家里是农民，不是地主。第二，我十七岁当红军，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红军，没被俘过，你打倒我什么？我也没有贪污，也没有腐化。你怎么打倒我？你打不倒我，我告诉你！”这样一来，他们也没话讲。后来他们就调查，就给我讲：“我们到重庆调查了。”到五十四军调查了。那里也有许多大字报，他们一看，这五十四军是从哪里来的？是第四野战军，是林彪的部队。噢，吓了一

跳，“你是林彪的部队，打不倒的。”那些人很天真啊，很好笑啊。

头头们是知道这些情况的。批还是批，斗还是斗。后来斗我们，王恩茂、裴周玉、张仲瀚、张希钦、郭鹏、我，六个人站在台上。批什么哪，有什么说的，乱扣帽子啦，修正主义当权派，瞎骂一顿，没什么内容。骂完以后，造反派就这种口气：“王恩茂你滚！”叫滚就好事了，就走了，滚来滚去，裴周玉也滚了，张仲瀚也滚了，张希钦也滚了，郭鹏也滚了，只有我还在那里没有滚。当时，后勤有二十多个造反派。看到我站在那里说：“你怎么还不走啊？”我说：“你们没叫我滚啊。”“快，快，下来下来。”我就下去了，他们把我拉到外面，搞一个车，把我送回京西宾馆。后来大会批斗又好多次。有一次，斗完了以后，让我回去。当时在西城区，让我回去，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呀？那时候身上一分钱也没，这就麻烦了。没有钱，他们也不管我了，“你走！”我想来想去，还不错，脑子里还记得谢明家的电话。打了电话，他就派车接我，把我送回京西宾馆，把他们一家人吓了一跳。

周总理接见我们好几次。有一次接见我们，造反派造谣说我骂他们。总理说：“丁盛同志”，总理是很客气的：“你怎么骂他们？”我说：“总理，不是我骂他们，他们骂我。那个女同志看我的样子说‘看你的样子像个约翰逊’。我就火了，我是骂他们了。”总理就笑了，说“你还没见过约翰逊什么样子呢。约翰逊不是美国总统吗？”还有一次，一到总理接见的地方，造反派就叫我跪下，我没理会。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说：“那不行，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子做！叫人家跪下，不行。”就这样挡回去了。总理接见次数很多，我们在一起吃饭，从晚上一直到天亮。我当时想不通，各地方的造反派搞破坏，交通火车不通，这里不通，那里不通。总理就把这些造反派找来谈，交通不能破坏，火车不能不通，不通不得了。这样，我们就感觉到，总理是为了维持交通，维持工作，维持生活。陈伯达这些王八蛋一天到晚就是煽风点火。陈伯达说：“你们要到群众里面去，接近群众。”我和张希钦两个就骂他：“小小老百姓，你怎么不去？我们哪天没有去？”我们也不敢当面骂他，就偷着骂。

这次我们在北京从 1 月份到 3 月份，有两个多月。在这阶段，我们感到不理解的，就是天天一车一车戴高帽子的人。这些戴高帽子的，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但都是党政军的负责人嘛，还会有别人？真是多呀，天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京西宾馆外面写了很多标语，我很反感，怎么能够这样？张希钦挂个很大的黑板，铁丝挂在脖子上，很粗的铁丝，一拉铁丝也拉断了。那时候，人火了，力气特别大。张希钦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有些人批斗以后画了黑脸回来，我们看到都哭啊。那时候，各大区的负责人都来了，那些司令，政委呀，哪里的都有，在京西宾馆躲起来。总理做工作，保护他们。这样子，我们心情很不高兴，很不愉快。

①石河子抢枪 1967 年 1 月 25、36 日，石河子地区连续发生武装冲突事件。25 日下午，毛纺厂等单位造反派约 2000 人冲入汽车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车二团掌权一派请求独立团支援。当独立团几十名干部战士赶至时，被造反派抢去枪弹一批。当日傍晚，造反派增至 4000 余人。26 日零时，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造成多人伤亡。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部分值班部队调进师部，对师机关进行保护，与要进入师部的造反派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又再进行枪战。当日，共打死 27 人，伤 78 人。关于石河子事件的性质，新疆军区事后给军委的报告称，事件“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毛泽东支持了军区的意见。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 12 月 27 日，中共新疆区委却又称其“完全是丁盛阴谋篡党夺权，调动兵团值班部队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其实，石河子武装冲突是一次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与远在北京的丁盛完全无关。

②新疆红二司 即“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以打倒王恩茂等人为号召的新疆著名造反派组织。

四、“新疆十二条”公布之后

到三月份，周总理主持给生产兵团写了一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这个很重要。十二条公布之后，就让我们先派人回去做工作。同时，把张仲瀚调走了，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①]。我们其他人陆陆续续回到新疆。回到新疆之后，把这个“十二条”一公布。因为保守派是多数，造反派是少数，这样生产兵团整个秩序就恢复正常了。学毛主席著作，开大会，工作统统正常进行了。3 月、4 月、5 月都很好，兵团本身也没有什么人闹了，秩序也有了。这时候命令我为生产兵团司令[②]，陶峙岳也没有说他不是司令。命令丁盛是司令，这一派就跟高兴了，大家敲锣打鼓了。不久，农学院的造反派从北京回来了。中央讲：各地造反派回到各地，原地闹革命。学校的回学校去，工厂的回工厂去，地区的回地区去。农学院造反派头目王兵也是个干部子弟。一回到新疆，几张大字报写到我们院子里：“兵团要大乱”。“你们又犯了镇压革命群众的错误。”这样一说又起来了，新疆地区的武斗就开始升级了。那就很厉害了，大大小小的武斗呀，地方的两派斗啊。因为生产兵团可以左右新疆和乌鲁木齐市的形势。只要生产兵团稳定了，那些地方造反派就没有多大能量了。地方的工农兵群众也是多数，造反派是少数，所以兵团稳定下来，整个乌鲁木齐就稳定。兵团一起来一乱，乌鲁木齐就乱了。造反派说我们“犯了镇压革命群众的错误”，兵团和地方造反派要联合起来。这样斗啊。



【圖25】1968年3—5月，丁盛奉周恩來之命參加在北京召開的解決新疆問題會議，圖為與會者在京西賓館留影。前排左起：裴周玉、郭鵬、賽福鼎、艾則孜、丁盛、王恩茂、張希欽、徐國賢、何家產、曾如清。

后来说罗瑞卿叫我来，我不来。贺龙让我来，我来了。于是就说：“啊，贺龙叫你来的，贺龙是二月兵变！”把我和“二月兵变”联上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二月兵变”，没有人给我们讲。造反派知道，王、关、戚这些坏蛋什么事都捅给他们，而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说：“是贺龙叫你来？”我说：“是啊，是叫我来的。”“好哇，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要搞兵变！”怎么搞兵变？他搞兵变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叫你来干什么？”“叫我到兵团来带武装嘛。”“这不就对了吗！”你看，又这样联起来了，带武装可以搞兵变了嘛。“他给我讲这里是反修防修的前线，怎么说搞兵变呢？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嘛。”翻来覆去斗我，造反派胡搅蛮缠。再就是一定要我表态，要打倒王恩茂。我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打倒王恩茂？”“他是修正主义啊。”我讲新疆的建设是有成绩的。王恩茂和兵团其他同志，张仲瀚他们是有贡献的。这一点我很明确。我说到新疆来感觉建设得不错，有成绩，开了眼界。至于王恩茂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评，或批判。大批判嘛，你们批啊。“不行，你要表态。”要我表态，我表什么态啊？当时一个是说成绩，再一

个毛主席不是讲“治病救人”嘛，为什么人家一有错误，你们就要打倒呢？王恩茂打倒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不行，就要你表态！”我就不表态，我就不说打倒。你们要打倒，你们讲，叫我讲干什么？我为什么去打倒他？这些家伙胡搅蛮缠搞了许多次。

他们熟悉情况以后，又来一个问题：“西蒙诺夫怎么到你们部队里去的？”衡宝战役之后，我们消灭了白崇禧的钢七军，这一仗影响很大。西蒙诺夫是苏联有名的作家。当时他以苏联《真理报》记者的身份由四野总部安排来的，还访问了我。听说他还写了书[③]。“苏修到你这里来，怎么来的？你和他有什么联系？”哈哈哈，我说：“他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是到我这个师来了，写了东西。”“为什么到你这里来？”我说：“当时 1949 年，我们在衡宝战役中把白崇禧部队消灭了。我们这个师打得不错。这样就有很多作家、老艺术家，舒绣文、张致祥他们都到我们师里来了。”“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是来了，他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当时不是我请他来的，我能请他来啊？我凭哪一条能请他来？那是公家请来的。”“谁叫他到你这个师呢？”“我也不知道，四野啊，兵团啊，军啊，你问他们去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你搅很长时间，搞得我很烦。



【圖26】1968年3—5月，丁盛奉周恩來之命參加在北京召開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圖為與會者在京西賓館留影。前排左起：曾如清、孔瑞雲、丁盛、王恩茂、裴周玉。

有一次，造反派占了保守派控制的生产兵团后勤部的一个工厂。保我的这一派，就是老保派就拿着钢钎，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时的西河堤，每个人拿着一样这种东西，带着柳条帽，他们要去打，要我表态。我说：“不行，不能打。”“那是他们占我们的地方。”“占也不能打。”逼着我表态，我就是不表态。不能打，我很明确。实在没有办法，你们要打，我也没办法，但有一条：如果你们打死了人，打伤了人，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不管你们这些事情。这样来制止这个武斗。有一次，造反派连我们机要局也想要去冲。我给他们讲：“这个不能冲，这是国家的机密，你们知道吗？谁要进来的话，抓起来，可不要怪我。”这样，他们也么有敢冲。造反派在乌鲁木齐武斗，打得很厉害，把人打伤了，保守派抓了几十个造反派。抓了以后，我不知道，后来他们说：“武斗中抓了好多人。”我说：“在哪里呀？”“在地下室。”我说：“我去看一看。”一看那里绑着的，负重伤的，什么人都有。我说：“你们这样不行。我们过去和敌人打仗，捉到俘虏都尽可能优待。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人家呢？富商的人要上药，要送医院，不能这样搞。叫人家回去，这样就不好了。”我这样处理问题，造反派知道了，认为我对他们不错。有一个伤员，我们派了飞机，花了一万块钱，送到北京医院。造反派对我这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在新疆文化大革命两派之间，除了过去那几个头头，王兵和兵团的几个人以外，多数对我都有好感，对我没有什么仇恨，因为我是公正的。这样一来，大的武斗就没有形成。

到了 7 月份，来了个“七二〇事件”，就是武汉陈再道他们。这一家伙又乱了。新疆要开大会，要支持，要声援，越高越乱。这时候，我们说话也没用了。经过请示中央，1967 年 10 月份，我们五个人，王恩茂、张希钦、郭鹏、裴周玉、我，又到北京去了，又到京西

宾馆住着。部队造反派抓住王恩茂不放，批他。部队独立师的一个政治部主任，我们都不认识他，天天批，天天斗。当然他没批我们，就批王恩茂。批王恩茂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们净胡造乱编，说王做了什么坏事，根本没有的事。就这样批他，每个完，批到回新疆才告一段落。后来，中央调我去广州军区工作，离开新疆了。

我是 1968 年 4 月 1 日到广州，由北京乘民航飞机到南宁，从南宁到了广州，这样去的，就我一个人。广州有有几个人到机场来迎接我，吴纯任副司令他们。在广州住了一个礼拜，就在留园招待所住着。我在广州待了个把礼拜，总理又来电话，叫我去北京。到了北京，我问周总理来干什么？“现在要解决新疆问题，要你来，来了要参加。”总理给我讲：“现在王恩茂回新疆主持工作有困难。你看地方造反派、部队造反派扭住他不放。你去还合适，新疆两派对你都没有什么大的意见。”让我到新疆去主持工作，当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我说：“总理，不行，我不会。”我还是这个意思，说我在兵团就不会搞生产，搞地方工作更不会啊。“总理，你考虑考虑，我不行，另外选人吧。我干不了。”总理认为我说这个话也有理。我没有干过地方，兵团都不会，怎么能搞这个自治区呢？所以我就表示不去。总理在 1968 年就有这个意思。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广州去，临走的时候又跟总理见了一下。“总理，我要走，还有什么指示？”“好吧，那你去吧，到广州好好地工作。新疆的事就算了，别人也不知道，也没有说。你也不要说了，安心工作吧。”总理这样交待我。新疆的问题就结束了。新疆 1968 年 5 月份写了个文件，我参加了。

①1967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将正在北京的张仲翰留京监护隔离审查。未几，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进行监护审查。

②1967 年 6 月，中央军委任命裴周玉为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兵团第二司令、党委第三书记。翌年 9 月，净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免除陶峙岳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职务，作退休处理。

③指《战斗的中国》。该书为 1949 年 9 月来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代表团副团长西蒙诺夫的访华印象记，1951 年 1 月由上海文光书店出版。书中记载了作者与一三五师师长田兴（丁盛名字的误译）的谈话。

第十一章 军区司令（一）

一、毛泽东、林彪调我去广州

1968 年 1 月，广州军区黄永胜、邱国光、任思忠[①]和机关工作人员一、二十人，到北京准备向中央汇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方案。我住在京西宾馆六楼，他们住在几楼记不清楚了，上下楼。广州有些人我认识，跟我很熟。1968 年春节之前，我无意识地下去串门，楼上楼下嘛。正好邱国光和项辉方在说话[②]，让我坐，因为我们都熟。项辉方就说：“我们准备春节过后，初一、初二吧，去看林总。”他们在说，我在旁边听着。她说完之后，我说：“老项，我也去，怎么样？”项辉方说：“这个我得请示，问问他们同不同意。”我说：“好，你请示一下。”项辉方请示完了之后，就告诉我：“你去吧，同意你去。”

这样，1968 年的春节，正月初二下午[③]，去到林彪家。同去的除黄永胜、邱国光、任

思忠、项辉方外，还有广州军区机关干部十几人。林彪先与大家合影留念，然后在他的会客室里与黄永胜、邱国光、任思忠和我谈话。林彪除了认识黄永胜以外，我们其他几个人他都不认识。黄永胜接着谈些事情，谈了一阵，我看没有什么事了，就站起来说："林总，我有个要求。"我就说了："我在新疆实在待不下去了。造反派搞得我不安宁，几次搞得我很厉害，我待不下去。再者呢，新疆的工作我也不适应，我不会，因为我搞生产我不会。新疆军区本身也没有什么部队，就是一个师，再就是独立团。我在那儿没有什么事干。"我就说这么几句话。这时候，黄永胜插嘴，指着我对林彪说，"他是到野战部队工作好一点。"黄永胜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来，也就没有说话了。在林彪家里前后不到一小时。叶群，当时我们也见面了，而且都说了话。他的儿女们，什么林立果、豆豆，我们都不认识。接见完了以后，我们就回到京西宾馆。这是我第一次到林彪家离去。

不久，一个月、半个月，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就通知我，毛主席同意我到广州去当副司令，通知我了④。我很高兴哪。但是又通知我现在还不能走，因为新疆这些造反派还在搞王恩茂，所以我也没走。黄永胜他们回广州去了，我还在京西宾馆呆着。



【圖27】1970年・丁盛與戰備疏散到廣州的董必武合影。

到了 3 月 24 日，就是"杨余傅事件"。那天，我们也不知道是开什么会，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就都去了。总理在那里看了会场，布置会场。我们坐在那里，看见黄永胜他们都来了，都在台上嘛。开会就讲"杨、余、傅"他们什么什么事，当时我们也记不清楚啊，宣布杨、余、傅出什么事情了。先是林彪讲话，宣布黄永胜当参谋长，当众宣布。宣布完了以后，我们坐在里边。总理对新疆这片是很注意的，我们坐在前边啊。总理看到我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挨斗挨批，总理印象比较深，我说话也比较"冲"一点。总理就把我叫去："丁盛同志。""是。""你看到了吧，黄永胜当总参谋长了，那广州军区就没有人了。你呢，马上走，到广州去主持工作。"我说："好！"

散会以后，回到京西宾馆，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我现在要走了，要到广州工作。因为当时总参都没有什么人了，只能打到林办。后来林办就来了个电话，叫我到林彪家里去一下。去了之后，我就给林彪讲："总理告诉我，要我到广州去工作。您有什么指示？"他也没什么说。当时 1968 年初，部队搞得很乱，我有点感觉。我就自己提出问题来了。我


【圖28】1970年代初，丁盛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時為戰士示範刺殺動作。

说："我到广州去，要抓军事训练。现在这样'四不像'很散。支左的，开会的，搞得很散。我说部队不训练，将来作战很困难的。"我跟他谈了以后，他讲了一下。他讲的内容，我简单记了，因为我文化不高啊，用大字写。回到京西宾馆，我又追记了一下。重点就是讲军事训练。这个记录以后给印出来了，我也没给林办看。印出来了，后来他们有点责备我。叶群说："你们印这个东西，怎么没有告诉我们？"我说："不是我搞的，我记录后，他们印出来了。"这个本子，昆明印了，广州没有印。这个本子发得很广中心问题是军事训练。所以，后来搞我的时候问："林彪给你什么黑指示啊？搞什么东西啊？"我说："就是讲军事训练。有一个本子你们可以查，可以找到。"这是第二次，我到林彪家里去。这次接见就是单独的，我一个人。

①黄永胜、邱国光、任思忠时分别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党委常委；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

邱国光 福建上杭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1949 年后历任四野十三兵团、十五兵团后勤部部长，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1963 年起任广州军区党委常委。1968 年 2 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68 年 6 月至 1970 年 5 月任国务院卫生部军管会主任（仍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77 年至 1985 年任后勤学院副院长。中共第九届中委。

②项辉方 黄永胜夫人，时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③即 1968 年 1 月 31 日。

④1968 年 2 月 15 日，军委任命丁盛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二、与林彪的几次接触

第三次，是 1969 年的"九大"之后，开完了"九大"，各个地区的人都接见过。我们广州军区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全去了。黄永胜、刘兴元、黄荣海、江燮元、邱国光、任思忠，我们全去了[①]，这是集体接见。接见的时候，林彪指着我，"把你留下，卫生部支左。"当时忘了是谁插话："不是他。"卫生部支左是叫邱国光去的，林彪不认识我。为啥说他不认识我呢，他以为我就是邱国光，实际上是要邱国光在北京到卫生部支左。所以我说林彪一直不认识我，这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

接见完了，在北京没事了，广州的代表回到广州，我们当选的中央委员统统回去了。我们在北京就讨论好一个传达提纲。这次传达主要是刘兴元他们搞，我又不会搞这些东西。当时我们定的是实实在在按"九大"的情况如实传达，不要搞别的什么事情，有一个传达提纲。我当时还是副司令员，刘兴元的意思要我来讲："你来讲，你传达吧。"我说："行啊，我来

讲就我来讲吧。”这样，我就传达。

传达“九大”选中央委员的时候，毛主席一定要把那些老同志选上。黄永胜给我们传达了，“要选上。”原话就是这么传达，要把他们选上，不选上，毛主席就会感到不安。老同志，陈老总、徐老总、聂老总一大批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后面又讲了：“这些人不能够得全票。”哈哈！当时我们考虑也不周，不能不选，一定要选上，但是又不能得全票，这是一个问题。当时九大主席台的座位，朱老总，董老，徐老总，陈老总，还有其他的老同志们坐在右边，其他那些人坐在左边。右边这些人就成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


【圖29】1970年代初·丁盛與葉劍英在廣州小島。

这么一来，就有问题了。我是这么传达的，当时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后来在南京整我这个事情。我说是这么传达的，他们是坐在右边，我有什么办法。所错吧，是错。但是当时这种情况不是我搞出来的，我们是有传达提纲的呀！也可能我说话，某事，某一句话，不大合适，这是有的，这是可能的。因为我这个人讲话一般不按照稿子，有稿子放在旁边看一下，按照我的口气，不是念的。有的不念是有可能的，可能有错误。传达“九大”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问题。后来他们搞我。其实，当时不讲他们坐什么位置，也可以。但是错都错了，怎么办呢？我没有意思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

1970 年尼克松要访问中国。当时毛主席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是很仇恨的，反美情绪很高，因为我们一直是和美国搞斗争的。所以为了使尼克松访华过程中不发生意外的事情，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说明尼克松访华，我们应持什么态度，打招呼，给大家说一说，说明厉害关系。我们中国人，共产党、解放军对美国是很反感的。尼克松来访华，不打招呼怕出什么事，就这么个意思。

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两件事我说一下。一件，有一天晚上，林办来电话，要我，刘兴元、任思忠到他家里去看电影，日期我不记得了。我和刘兴元一起，找任思忠没有找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我们两个人，还有些小孩，还有些家属，好像刘兴元夫人徐杰也去了吧。我们到了林彪家里，叶群带我们去看了一下林彪。林彪是待在房子里不出来的。问了问好，林彪给我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还记得，你们要搞好工作，要搞好团结，就这么说。他这个人不大爱说话，也不大愿意跟人交谈。之后，我们就到会议室看电影了。看完电影之后，我们也没有再去看他，我和刘兴元就回到京西宾馆。这是我从 1968 年以来，第四次和林彪见面。从那以后没有单独见过，也没有说过话。这次见面就这么几句话。这就是我接触林彪的次数、时间、原因。

在这个开会期间，韦国清[2]、刘兴元他们要到江青那儿去照个相。江青答应照个相。韦国清、刘兴元、我、卜占亚，我们四个人到她家里照了个相，每个人都照了。我和她不熟悉，也没有和她说什么话。她也不大认识我，好像到她家吃了个饭。1970 年到北京开会，就这么两件事。江青家照相韦国清联系的。开完会之后，我们就回广州，就没什么事了，照常工作，平时一般的战备工作。

1970 年的 8 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期间，除了林彪讲话之外，没见到林彪，也没有跟他们联系，什么联系都没有。见到了李作鹏、邱会作，那次开会黄永胜没有来，他以后来的。大家见面就说说话。在庐山凉快，山下热啊，就谈这些气候啦。当时也不知道讨论什么问题。那次我们和华国锋[③]住在一起。没有开会之前，华国锋、刘兴元、任思忠，还有些中央委员，认识的人就互相串一串，走一走，庐山会议是这样的。

那天正是开会了，林彪作了个报告。毛主席后来讲林彪突然袭击，没有经过他，没有经过毛主席，瞒着中央。总之是毛主席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突然袭击，欺骗两百多个中央委员。林彪讲些什么问题呢？讲了这么几件：一个要设国家主席[②]；一个讲了毛主席是个“天才”，“天才论”；一个讲毛泽东“老三篇”没有过时，这么三个问题。林彪讲话之后，各个小组就讨论，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他这些话，大家讨论都表态呀，也不知他有什么阴谋，这些都不知道呀。认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没有过时。有人说“老三篇”过时。“没有过时”，大家这么讨论，很热烈啊，抢着发言。我们也是一样，毛泽东思想、老三篇都是不过时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赞成设国家主席，那时我们这个组，包括我这个人统统赞成，没有反对的。讨论了一天，还是一天半，然后就通知不开小组会了，休息，不讨论了。什么原因呢？林彪这个报告是错误的，搞突然袭击。讲“天才论”是错误的。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都是后来批判林彪才知道的，当时也不知道，也没讲。后来才知道，批判他讲这个话的动机。这样，会议上大家又作自我批评，检讨，说不知道这个意思啊。开完会，也没和他们见面，也没谈什么问题，就各走个的了。我们广州军区三个人就从九江回到广州。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个不欢而散的会议。

还有一件事。庐山会议前，叶群打了个电话给广州，是我接的。说是林彪要到广州过冬。广东冬天气候暖和。这样，我们就要给他准备房子了。以前他住“老一号”，那时我不在广州，我不知道情况。管理局的同志们讲，这个地方不合适，下雨时天窗很响，吵得很，不安静。说林彪在市中心的一幢房子里住过。我说到那里看看。那里看了也不行，那个房子已经给了广州市了，不属于军区范围了。广州市换了一些房子给广州军区，广州军区这个房子就归了广州市。这里也不行，就不好办了。怎么办？找不到房子就修一个房子吧。修房子有很多问题，林彪怕水，林彪住的地方不能有水，要安静。当然安静、安全这些都是一样的。这样就给林彪在白云山的老虎洞找了个地方，在这个位置给他修了个房子。这就是我到那里后做这么些事。后来强加给我们广州军区的领导，成了林彪死党，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伪中央，就这样来的。

①广州军区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委、候补中委的，还有韦国清（第一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孔石泉（第三政委）、吴纯仁（副司令员）。

刘兴元 山东莒县人。1931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1948 年后历任东北野战军五纵政委，四野四十二军政委，中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副政委、第二政委，军区党委副书记、第四、第三、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2 年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后历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军政大学政委，军事学院政委。1978 年 11 月免职接受审查。1984 年 8 月撤销军事学院政委职务，按大军区副职待遇退休安置。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委。

江燮元 江西永新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四十一军第一副军长，海南军区兼四十三军参谋长，四十一军军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司令

员、顾问。中共第九、十届中委，第十一届候补中委。

②韦国清 广西东兰人。1929 年参加白色暴动。1955 年授上将军衔。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③华国锋 时为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委。

④丁盛此处记忆有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提及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三、为毛泽东修“南湖”

1971 年初，汪东兴讲，毛主席要到广州来过冬，也是一样的，要到广州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得修房子，没地方住啊。原来有个省委的小岛一号，感觉住那里也不够，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刘兴元几个领导人又去找，在广州城边上，麓湖边上，我们找了个地方。看了一下，不行，那个位置是好的，但是太嘈杂。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部队在磨刀湖搞演习，搞潜泳，我去看了。无意之中就看到这个位置不错，给中央领导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围是山，中间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刘兴元高兴，这个位置可以了。我就问汪东兴：“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你给我们讲个原则。”汪东兴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

这不更好嘛，根据汪东兴的介绍，我们就派了具体办事情的三个人，一个是我们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一个是工程兵主任，叫什么李大个子；一个是后勤部营房部的一个副部长，负责修房子的具体工作。我说你们去看看吧，把它的规格、大小、尺寸、长短、摆设，都把它记回来。他们去把这两个地方都看了。这样，我们就在 1971 年的 5 月份开工，现在那里叫南湖。总的方面，我经常去管；更具体一点的是我们一个副司令江燮元管。办具体工作的就是这几个人。因为很急，当时我们就调了两个团修这个房子。 汪东兴在开工的过程中来了。我就问他，我们修多少栋房子呢？汪东兴讲：主席一栋，总理一栋、康老一栋，江青一栋，这是这样，修这么多。按照画回来的图纸，主席那里有一个卫生间，很大的卫生间；卫生间出来，就是个卧室；卧室出来就有个活动室，起床洗完了脸有个房间休息休息。看了毛主席房子的位置，汪东兴就给我说：“还要添一间，一间不够。”我说：“卧室全部在这里，洗漱完了，不是在这里休息吗？”对，休息，还要搞个小房间，和这个一样大的房间。在那里，有时候可以接待一些人，有时候可以活动活动。“所以汪东兴规定的就是：卫生间，卧室，洗漱完了，休息还有一个房间。这样就是两间小活动室，再出道外面大厅。这就是给毛主席修房子，整个由汪东兴规定的。

后来我就问他了：“汪主任，你在哪里住”？因为他是办公厅主任，他跟随着毛泽东哪。“你这么办！我最后跟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我和张耀祠——张耀祠也是办公厅的副主任，专门跟着主席的——还有医生、护士和其它工作人员修一幢，我们住一块。”这个位置就好定了，我说“好。”去年，我们到南湖去吃饭，叫 8 号。他们不知道这个 8 号是干什么的，给谁住的。因为我们搞完后就没管了，没有说了，所以后来的人搞不清楚。汪东兴和赵耀祠那两套房子是不错的，房子水平都不低。在这过程中，又去看毛主席那个房子。汪东兴一看说：“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啊？”“江青同志来了以后怎么办？”这样，我知道了，毛主席这个房子除了他本人以外，还要修一个小套给江青。我们上次只看了主房这边，那边还有一

套卧室、卫生间、休息室是江青的。我又问他："总理、康生，这些房子我们都比较好定。江青的房子往哪儿修？"汪东兴说："江青的房子离主席也不能太远，太远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见。"这怎么好找啊？好费神，费力啊。找来找去，后来找了那个地方，现在的南湖一号。原来是毛主席那儿叫一号，总理的叫三号，康生的叫五号，江青的房子七号，后来为了保密，就倒过来了！江青的房子叫一号，康生的叫三号，总理的房子叫五号，主席的房子叫七号。

后来汪东兴又出题，说主席不能总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总住在这里啊？有什么办法？再修一个地方呗！所以，后来 "松园"那一幢也是给主席修的！整个南湖的房子，就是 1、3、5、7、松园，汪东兴他们住在那个 8 号，全部按照这样修了。修完以后，汪东兴又来了，看了不大高兴，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意思是，我在哪里住啊？本来汪东兴就讲了，和张耀祠以及主席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的 8 号，房子都在，两套还是很高级的。他不高兴，没办法，那就给你再修一幢嘛！就是一号下来，水边那幢房子是汪东兴的。为什么修在水边呢？就是离毛主席近！别的还没有地方了。这下他就没什么说的啦。这是一次，他来了好多次。


【圖30】1971年8月，陪同周恩來及正在廣州訪問的緬甸總理奈溫觀看演出。

我们把毛主席房子修完，汪东兴来看了。本来毛主席的房子后面的走廊是条明走廊，有柱子，柱子是大理石的。他来看了就给我讲："你这个走廊不行！""为啥不行？""你看这山上，毛主席在这里散步，山上看得见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山上有警戒的，有当兵的啊。""不行，你要把这个走廊给垒起来，变成个暗走廊。外面靠山这一边要垒起来，不要这个明走廊。"这样又改了。看了卫生间，原来毛主席习惯大便是蹲式的，我们就按照蹲式修的。他一看说：" 不行！毛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蹲着不合适，要修坐式的。"我们又把他改了，这都随修随改的呀。在 7 号一进门那个地方，不是天井式的吗？他一看说，这个天井周围要镶起来。我问为什么镶起来？他说，这个天井下雨时，水全溅到到过道上，主席容易摔跤。汪东兴对这些都是很细致的。

他看了周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房子。他要我们把江青的房子边上也要镶起来，水也会溅到过道上。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没有搞。这几个领导的房子是汪东兴定的原则，具体规定的，具体检查的。我们是完全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来办，按他的要求来做的。中央办公厅还有个局长姓毛，专管工程的，也来过几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房子是绝对可靠的事情，是汪东兴交给我的。修起来就要用。这个房子每个大厅都要有一个放电影的机器。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个电影机呀。汪东兴就讲哈尔滨有。靠汪东兴的关系，从哈尔滨拿来四台放映机。主席的、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个大厅有一台。

在"九·一三"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周总理、叶帅。整个花了六千多万元，他给批了这个钱。那时候，松园这套没有完工。我说："总理，那套没有完工，怎么办呢？"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就这样没有完工，没法用，就担心浪费了，再加点钱，把

它修起来，今后还可以用。”总理说：“好啊，你们就把工程搞完吧。”“松园”的房子是“九一三”之后才完工的。修这个房子的全部过程就这样！本来很明确，名正言顺地给他们修的。1974 年“批林批孔”，广东的那些造反派就硬说，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在这儿住的。这就伤害了很多人，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是很老的同志，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修这个房子，硬说他是给林彪的。

在这情况下，广东就写信给汪东兴：你亲自坐镇，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汪东兴就是不说。1974 年批林批孔，拼命地查呀，伤害多少人啊！我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说这个房子是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你们定的，不是给林彪修的。不说话，广州军区相当一部分参加工程的人很愤慨，我也很愤慨。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帐？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是中央副主席的呀。你们不说话，把这边搞得灰溜溜的，检讨呀，追查呀。74 年在广州批林批孔，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兴元、丁盛、任思忠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许世友在广州翻箱倒柜，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查出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林彪南逃广州，广东军区领导人知道。批林批孔是从 3 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 7 月底，搞乱了，瘫痪了，不可收拾。这个时候，主席、总理派韦国清到广州来收拾这个摊子，这个时候才讲房子不是给林彪他们修的，是给毛主席修的。这样才结束。

四、“九一三”后的广州军区

“九一三”一大早，周恩来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是“庐山会议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就是说林彪，带着老婆叶群，儿子逃跑了。这是周恩来给我讲的这个情况。周总理给我几条指示：第一，广州陆、海、空军归你直接指挥；第二，广州地区要稳定，部队要稳定，政府要稳定，所有的都要稳定；第三，加强边防，不能跑人。“你们立即进入指挥部，同时监听敌台广播，注意敌人动向。”当时，林彪逃跑，在温都尔汗摔死，都还不知道啊。当时就是看林彪这么逃跑了，外国有什么反应。

周总理给我这个电话之后，我就找到刘兴元、任思忠说：“总理告诉我，林彪逃跑了。军区的全体领导同志立即开常委会。”在留园，我们党委办公室开会，这是可以查的。当时决定，我们完全拥护主席、总理的指示，坚决听主席、总理的指挥，并且立即发电报给中央，当时就发电报。我们备战，一下子进入指挥所，机关都不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就是通知机关不允许休息，备战，很紧张。我听他们讲，这个电报搞得苦啊。我们的机要局局长是卫继烈[①]，这次非得他亲自译不可，但很长时间不译报了，搞得时间长了点。后来就硬是追他，为什么时间搞得那么长？这可以查，电报有原稿，中央也会有电报档案可以查。第一是我们表态。第二呢，传达之后，广州地区的部队、地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林彪逃跑了，广州地区部队就动乱哪，没有这个事，很稳定。

没过几天，李先念和华国锋就到广州来了。后来给我讲，他们认为广州肯定是很乱的，但一看，没有什么事，很平静嘛。李先念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注意什么事情，对那些人的子女不要动他们，不要牵连他们。李先念他们就按总理的指示办事情。所以广州军区没有发生什么逃跑呀，自杀呀，或是搞其他什么。如果按照那种想法，说我们都是林彪的人，那还会不出事情吗？后来许世友就搞啊！把我那个秘书陈宏康抓起来，还抓了其他一些人。许世友找他们谈话，找李维英谈话[②]，说你李维英有本事，有能力，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揭出来，就可以受重用，就是封官许愿。李维英讲：“许司令，我不能当着毛主席面说假话（许

的房间内挂着毛泽东像)。我就是不知道林彪要南逃，我不知道。”找作战部长王玉振喝茅台，“你们把问题揭出来。林彪南逃，你要你们谁说了一句‘我们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这些人是久经考验的人，他们不会无中生有，他们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你作战部长不知道？”“我不知道！”“丁盛知道啊？”“丁盛不知道。”这样就受牵连。那时候，查电话呀，说邱会作老婆是给我打过电话，那时候我有病，是问候我：“你的病怎么样呀？”根本没有谈任何其他事情。

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 1974 年，第二次是 1977 年到 1979 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是搞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江燮元、黄荣海。这些同志是非常忠诚老实，拥护毛泽东、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不是为林彪革命，是为劳苦人民革命，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人。把他们隔离起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多人的大会，批斗副参谋长刘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赵国楠，要打倒他们。说是丁盛不接电话不知道，丁盛的秘书陈宏康知道，真是没有这个事。所以我感觉到，中央虽然没有下正式结论，但是在广州搞得这些事情影响很大，对广州军区这部分干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这时候，过去几次运动、“文化大革命”反对黄永胜的那些人成了英雄。“啊，反对黄永胜对了。你们错了，那时候黄永胜就是反革命，就是坏蛋。”我认为不对的。查一查，这些造反派头目，军区和机关的个别负责人，还有哪个师的政委，他们坐在造反派那边。他们搞得很厉害。当时军区批判他们是对的。这是广州，说林彪南逃，广州知道，翻箱倒柜两次，都没有查到任何证据。

当时，我不自广州，在南京工作。1974 年 8 月在北京开会。当时主持会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总理他们都没有来，主席就更不说了。我们就个人作检讨，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曾思玉、我、陈先瑞、刘兴元都作检讨，谈对林彪的思想认识。这期间，张春桥、王洪文硬追着我问，“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不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几个吵起来。张春桥说：“林彪南逃，从北京打电话打到上海。为什么只打上海，就没有打广州？”我说：“这电话又不是我打的。电话总机在北京，你问他们。你问我干什么？”在北京，张春桥和王洪文硬逼我承认知道林彪“南逃”。这些家伙就想把我打倒，把我搞下去。后来，我在南京对专案组讲，“什么道理，他们就这样恨我呀？我又没得罪过他们，过去我们也不相识啊。”专案组的人就问我，“九大”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投他们四个人的票啊？这时我才想起来，是没投他们的票。是没有投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的票。查是肯定查的出来的，因为我这个名字是在第一排第一名坐着，很容易查到的。我也不知他们是否查出来了。“你呀，没投他们的票，他们就恨你了。


【圖31】1971年9月初，在湖南韶山整理毛澤東南巡長沙談話時在毛澤東舊居前留影。前排左起：丁盛、華國鋒、劉興元、韋國清、卜占亞。

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丁盛不能下来。这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有记录，有材料。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我说不知道。张春桥的作风比王洪文兄啊，形象凶，讲话也凶。王洪文看着总下不了台就说：“你知不知道，以后再说。但是你上了林彪的贼船。”从思想上讲，我们对林彪确实是很钦佩，很尊重，也很崇拜。但是我们没有和他搞任何阴谋诡计，做见不得人的事。我讲了，我和林彪见面就

这么几次，话就这么多，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来往，通信都没有。我怎么就成了林彪的死党呢？我说，好吧，咱们就作妥协，说我对林彪很钦佩可以，但我没和他搞阴谋诡计。“你要写上。”我说：“写上就写上。”这是 1974 年 8 月检讨，我们这九个人的检讨，各种各样的检讨。现在来看不该屈服，不该写。我上什么贼船啊？

三番五次地搞广州军区，说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我们从东莞订了几吨重的鞭炮，准备从广州最高的建筑二十七层的广州宾馆楼顶上挂到地下，准备欢迎。军以上干部都在广州开会，准备欢迎。我们军以上干部是办学习班，读那三十本书，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是可以查的，是宣传部搞的。本来是宣传部提出的宣传计划，军区党委讨论批准的，读书嘛。那些人就这么说：“你们为什么搞这么多军以上干部在这里读书呀？”读书跟林彪南逃有什么关系呀？又说：“为什么卜占亚的老婆到广州来？”我说：“她到广州来，我都不知道。后来问她，她说是来广州学习接待外宾哪。她是找地方政府来的，我根本不知道卜占亚老婆到广州来。我怎么知道啊？”林立果来广州，我们广州军区领导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他也没有到我们大院里来。他在白云山，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跟他没有联系，我没见过林立果，也不认识林立果，这可以查呀。所以这一段，我很气愤。

①卫继烈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机要局局长。

②李维英 1969 年 11 月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1969 年 11 月至 1978 年 5 月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五、“林彪南逃”，广州军区不知道

当时，我是广州军区司令，主要负责人之一。刘兴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都是政委、副政委。我今天有责任说，当时所有人都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我们都不知道。我向中央负责，向全国人民负责。许世友他们搞了这样厉害的大运动，翻箱倒柜。搞到什么证据没有？没有任何证据。这样多人有人知道没有啊？领导者没人知道。有人说知道，后来又翻供了，他是被逼的[①]。“九一三”到现在，算一算二十五年了。我请求中央，对这问题给广州军区机关、广州地区讲一讲，说林彪南逃，广州不知道。“九一三”以后，毛主席说，“林彪南逃，他为什么又不去了？他怎么有没有去呢？”这是毛主席的原话嘛。“我在长沙，和丁盛他们谈话。他把我的内容全传达了嘛。丁盛他们听我的话嘛。你们怎么还这么搞呢？毛主席给他们讲。这些话他们一直听不进去，死咬着知道“南逃”。在哪儿知道？谁知道？你们有什么根据？

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没有嘛。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到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啊？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哪有这个逻辑呀？他们查来查去，查这么多，都毫无根据。硬是把这黑锅扣在广州军区领导人头上。当时全国十一个大军区，有七个被列入“借用力量”。为什么偏偏揪住广州不放？这是很大的考验。1971 年“九一三”以后，1974 年“批林批孔”、1977 年、1978 年、1979 年“揭批查”。1979 年中越边境作战的时候，黄荣海、江燮元他们从被隔离处境中调出来，到前线参加指挥。这些同志为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虽然被隔离，受了委屈，还是跟着部队走，指挥作战。还要怎么样啊？这就证明我们广州军区的指战员是

经得起考验的，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部队，是听党中央，听毛主席，听周总理的，而不是听林彪一个人的。

事实证明嘛。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查出来什么没有啊？没有嘛！既然没有，还怀疑广州军区，是什么道理啊？还不把这个帽子摘掉，黑锅拿下来啊？

我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再三说明这个问题：广州军区没有搞一个阴谋诡计，没有河林彪、黄永胜搞任何阴谋诡计。他们搞“反革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危害毛泽东，在哪里危害，我们不知道；“九一三”以前，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说林彪过去反对毛主席，我们不知道啊！我一身戎马，林彪犯错误，我知道一次，就是 1936 年红军东渡黄河到山西，一军团可能发了点洋财，后来就把他撤了。林彪离开一军团到红军大学当校长，是什么原因？本位主义。说在遵义会议之后，他怀疑毛泽东的指挥。我们不知道啊。辽沈战役，打锦州，打长春，你们争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过去听到的，是毛泽东主席讲林彪的是好话呀。你们什么时候讲过他坏话？这样子搞，把部队搞成这样子，你信任的干部搞得灰溜溜的，走到哪里都觉得“低人一等”。自黄永胜当广州军区司令员起，做了哪一件事情是反革命的？哪一件事情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可以查，可以摆出来。黄永胜到北京当总长之后，搞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法查，你们去查。那几年，广州军区搞得很漂亮。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台湾经常派武装特务登陆袭扰。一股一股地歼灭，一个不留。1971 年，总理讲：你们准备抗击台湾一个师的登陆。广州军区在粤东做准备。后来说是你们要搞政变。这哪还有理呀？明明是总理讲的抗击嘛，和林彪的政变有什么关系？和他逃跑有什么关系？在南京专案组问我：广州搞政变，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平常有人给你送材料吗？”“没有。”我胸有成竹，没有做坏事，你们怎么说，我也不怕。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随便你们怎么讲。

①指卜占亚。

第十二章 军区司令（二）

一、我与黄永胜的关系

从 1944 年我认识黄永胜，到黄永胜从广州调到北京，这段过程，我前面都讲过了。1971 年 8 月，在长沙，毛泽东指着我：“丁盛、刘兴元，你俩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我们当什么是毛泽东、周恩来你们的命令，不是黄永胜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啦？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够这样说话。我认为，毛泽东当时对广州军区这个考虑是不公道的。你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密切。那你跟他的关系不密切啊？你们从井冈山一起下来。他当总长是我们让他当的吗？不是你毛泽东、周恩来，你们中央叫他当的？丁盛、刘兴元有这个权利说“黄永胜，你去当总参谋长”吗？这不讲理嘛。你毛泽东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那么我们怎么听指挥呀？他是革命的，我们当然要听。以后你说他们不对了，是反革命了，

我们就不听。这是界限嘛。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责怪我们，把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你怎么不讲你用错了人啊？“九一三”以后，打击了多少人啊！

我回忆，我们 1940 年到延安的。传说 1939 年，原四方面军的一个指导员讲，“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是他在庆阳步兵学校这样讲的。这个话三传两传就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去了。毛泽东知道了，开会就讲了：“是啊，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毛泽东呢？人家为什么讲这个话呢？我不对嘛，我处理得不公。张国焘逃跑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嘛。”1938 年，部队呼呼往前线开，四方面军一大批干部留在延安，留在学校。他们就说：你毛泽东不应当这样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张国焘跑了，他一个人都没带走嘛。证明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是为张国焘革命，是为劳苦大众革命。后来毛泽东把这些人统统派到前方去，证明你是对的嘛。应当记住这个教训。那么林彪逃跑以后，你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道理嘛。怎么能这样搞法呢？你说这能怪谁呀，怪别人哪？你毛泽东不点头，不说话，谁敢搞啊？为什么在广州军区这样搞呢？我们和黄永胜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他是总参谋长，过去在广州军区当司令。他的官是上面封的，底下人不听行吗？每一件事情都要你毛泽东下命令能行吗？这样的话在广州打击了多少人？后来就搞啊，三番五次地搞，不都是这样来的吗？

实际上，我和黄永胜的关系如何？1944 年是聂老总点名把我调到教导二旅一团当政委。1945 年日本鬼子打败了，我们要到东北。有一年时间跟黄永胜一起。1947 年组织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黄永胜当司令。秋季攻势之后不久，大概是 1948 年初，黄永胜走了。他在八纵队不到半年，就这么多时间。辽沈战役之后，部队进关，黄永胜又回来了。这时八纵改称四十五军，他任军长，指挥打天津。这是你们中央叫他来的呀，不是我们叫他来的，关我们什么事？天津打完了，他调走了。黄永胜后来先后担任十三兵团、十五兵团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那时，四野机关在武汉，华南军区司令员是叶剑英。我们 1951 年到广州，1952 年走了，就这样一年多，工作关系啊。我们跟他关系怎么好？我承认很尊重黄永胜。我们在第八纵队接触的时候，他对部队管得很严，要求很严。特别是杨杖子战斗，在前线很佩服他。在广州军区，我是副司令。他当司令的时候，我还没有来，我在北京。他是 1968 年 3 月份“杨余傅事件”时离开广州的。他走了以后，我才到广州，根本就没有交接班。我们怎么了？这是历史事实嘛。根据这事实查一下：我们哪一点不对？哪一件是反革命的？

“九一三”之后，说他们搞反革命活动了，我们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当时我们怎么讲的，这个有电报可查。当时海军南海舰队政委段德彰在湛江。我说：“总理呀，怎么办呢，他们那么远。”“不能讲，打电话叫他们来。到广州来专门告诉他这个事情。”我们一举一动都是按照总理指示来办的。9 月 16 日，总理又给我打电话，说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了。在这次电话中，我说：“总理，我们还有个事给您说一下。”“什么事？”我说，“‘九大’开完后，黄永胜、吴法宪交待给我，我又告诉刘兴元：黄的一个秘书李必达用飞机送到广州，由我们看管①。这个人还在这里。我们没管他，没审他，这个可以查。”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把他送到北京来。”我们把李必达送回起了。这可以问李必达，李必达还在。我们也没虐待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黄永胜交待的，我们不办能行吗？这事情是我们不对。当时给黄永胜提了，吴法宪他们都在。我说，“这样大的事，你应当向毛主席报告。”黄永胜说：“刚开过九大，毛主席很高兴，不要干扰他。”这是原话。我们能不接受吗？如果不接受，当时我没这个水平，也没这个胆量，也没理由。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李必达陷害他，偷听他的电话。“你们不要管，把他看管起来，不要跑就行了。”就是这样交待的。

二、广州军区绝对没有搞阴谋诡计

那么我们对林彪有没有什么错误呢，我后面专门讲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广州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是绝对的忠实、忠诚的。比如说，冬天北方没有蔬菜，由我们广州军区来供应。毛泽东喜欢吃什么呢？蔬菜嘛。我们这里有空心菜，玉米。我们在海南岛种玉米，很嫩很嫩的玉米，还有其他的青菜。毛泽东喜欢吃麦片，麦片是澳大利亚的。我们从香港专门买的澳大利亚麦片给毛泽东，送到北京去。从香港买麦片不能过海关，通过海关要检查，要打开来，那就不行。哪怎么办呢？我们情报部有船，在香港买的麦片装在船上开回来。开回来以后，直接交给管理局。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知道，负责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仓库。那么多麦片，我从来没拿过一包，尝也没尝过。我们也不知道那麦片怎么吃。


【圖32】1972年4月，周恩來在廣州小島一號樓接見廣州軍區主要負責人時合影。二排右五起：孔石泉、丁盛、周恩來、任思忠。

我们修的毛泽东那个房子，为了他的安全，怕飞机轰炸，就在 7 号楼旁边，几公尺的地方打一个穿山洞，大的坑道，坑道里面还有小房子。万一有飞机轰炸，他在房子里面可以休息，还可以办公，很安全。只要不打原子弹，那绝对么问题。周总理那套房子，他来睡了个午觉，吃了饭，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邓大姐讲，周总理在南方睡了个午觉，说那个房子很安静，环境也好。周总理很高兴。毛主席没来住过，康生没来住过，只有周总理去过。董老、董必武去休息过。李先念、华国锋去过。江青在 1 号住过，在松园住过，其他人没有住过。


【圖33】1972年11月，丁盛陪同李先念副總理接待到廣州訪問的尼泊爾王國首相基爾提・尼迪・比斯塔。

广州军区有人在林彪手下工作过，有人没在他手下工作过。抢占东北，功劳是中央的。当时派了两万干部到东北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就有 20 个。四面八方去的干部，特别山东去的多，山东去了多少个师啊，11 万兵呢。没有这个决策不行。蒋介石大量部队抢占东北，中央指示我们让开大道，占领两厢，开辟根据地。中央指示英明正确，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林彪在东北局的作用不能否认。我们很佩服林彪。来自各方面的人统一思想，当时是很不容

易的。1946 年那么困难，打得敌人狼狈不堪。1947 年东北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是事实。1947 年秋季攻势把陈诚打败了。派了个卫立煌，又打败了。这些功劳，林彪有一份，指挥是正确的，战略思想是对的，具体运用了毛泽东思想，贯彻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当时我们很佩服他，我个人很佩服他，这是事实。



【圖34】1973年2月，丁盛陪同徐向前副委員長接待到廣州訪問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前左二起林李明、任思忠、徐向前、諾羅敦·西哈努克、丁盛、西哈努克夫人、孟文虹、王首道、李堅真。

攻打锦州，我们胜利了。攻打天津，我们的部队打得不错。南下打白崇禧的时候，一三四、一三五师受奖。历次战斗都是按东北的打法，以致后来抗美援朝、中印边界都是按这套打得的。刘亚楼在哈尔滨讲话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个人认为，林彪管理部队，战术思想，战斗作风很好。难道因为是林彪搞的，就不能用，就是错误的？军事科学没有阶级性。谁应用得好就是胜利。孙子是什么阶级？现在可以用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他总结的经验。当时林彪是革命的，是党的副主席，接班人。他的指示，我们要执行。说我们上了林彪贼船，没有上。我也不知道林彪贼船是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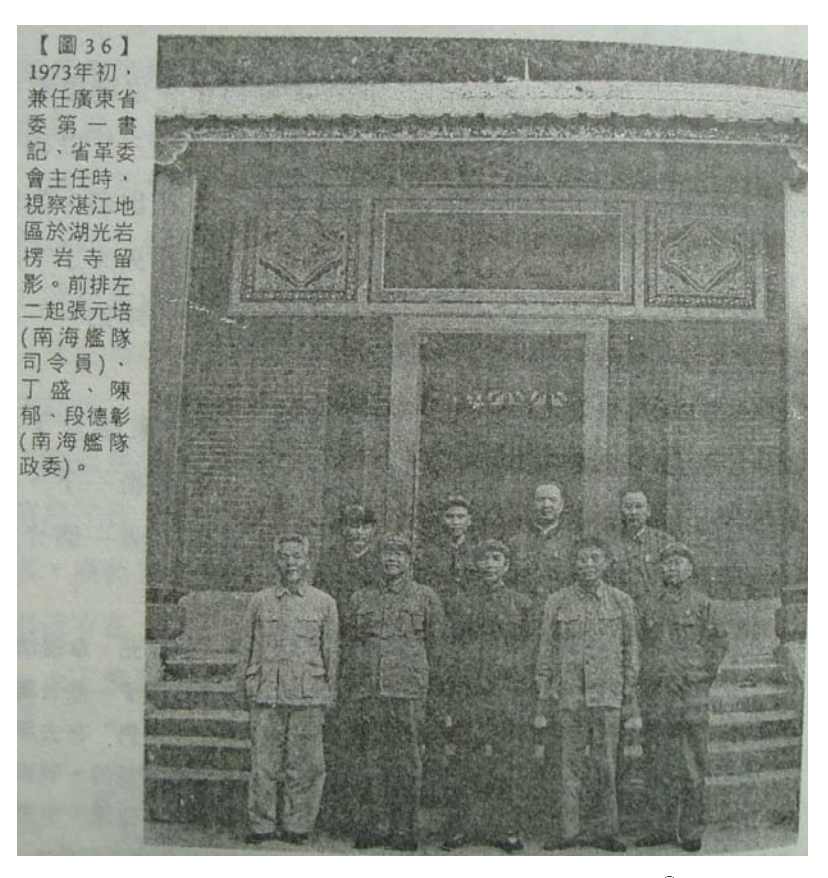
我在广州军区工作这一段，小结一下。



【圖35】1973年初，丁盛(右一)陪同徐向前視察部隊。

我认为广州军区的领导和部队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部队也好，个人也好，都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壮大起来的，是经得起风雨的的。所以在广州军区这段工作，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做亏心事！广州的领导同志们没有做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谁都没有搞。搞什么阴谋诡计啊？我们都是工作关系，上下级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就应当好，上级说话，下级不执行能行吗？毛泽东在长沙与我谈话，[①]我们全部执行了，贯彻了，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北京作检讨，总理讲：“你不要检讨了，你们思想检讨，检讨够了”。总理当面给我讲的。“你们九·一三以后，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很满意，部队稳定，没有出事。当时北京跑出来五六个人，你们都把他们抓回来了，送到中央来了，很高兴，很好嘛！还作什么检讨”。总理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不要检讨，好好工作就行了”。



【圖36】1973年初，兼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時，視察湛江地區於湖光岩楞岩寺留影。前排左二起張元培(南海艦隊司令員)、丁盛、陳郁、段德彰(南海艦隊政委)。

1973 年 12 月份，八个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接见了我们[②]。毛泽东对我讲：“你呢，到广州也不久，也调换一下，你身体不大好。”毛泽东这样跟我讲。总理在跟前一个一个介绍的，“噢，我知道，要注意身体。”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事！” 这一段，我们应该向党交待，广州军区绝对没有搞阴谋诡计，绝对没有的事情。强加广州军区，强加于哪一个人，都是错误的。

①1971 年 8 月 28 日晚，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在长沙找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据在场的汪东兴回忆称，毛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谈了党在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指责“他们”在去年庐山会议上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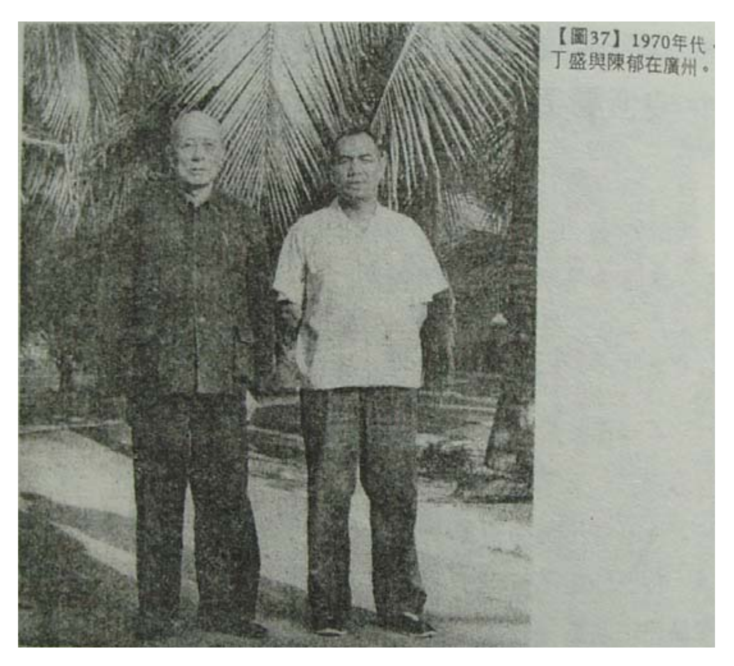
当丁盛谈到他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啰！毛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毛对丁、刘、韦说：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8 月 30 日，毛在离长沙去南昌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据在场的汪东兴回忆，毛称：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在谈到读书问题时，毛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吧？刘答：不会。毛指着丁盛说：你呢？丁答：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还对刘、丁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②1973 年 12 月 31 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丁盛参加了接见。翌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三、我所看到的江青

再讲另外一个人，江青。1972 年 3 月份，汪东兴交代我一个任务，当面给我讲的，说江青要来广州疗养。交待我们几条规定：第一。必须保证她的安全；第二，要让江青吃好，玩好，休息好，身体好，高兴，这是我的任务；第三江青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管。关于江青到广州疗养的事情，汪东兴就这样给我交待的。


【圖37】1970年代，丁盛與陳郁在廣州。

当时他为什么交待给我呢？1972 年 3 月份，我是广州军区负责人。刘兴元走了，调到四川成都去了。韦国清走了，原来韦国庆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刘兴元原来是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时候，周总理就把这副担子交给我说："现在你当广东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当时在广州的地位，就是党权、政权、军权全都要负责任，担子很重[①]。所以江青要到广州疗养，就要交给我。不找我找谁？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这个任务很重，担子很重。所以就召开军区和省里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把汪东兴的话给他们说了。广州军区组织一个接待小组，由副司令员吴纯任牵头负责。派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石勇负责江青的安全，还带两个保卫干事。生活就交给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他们两个人。保证把她生活安排好，搞不好唯你是问。她的医疗自己有一套医生、护士，自己带来了。当时我们讨论也是喜忧参半。高兴，因为党中央、毛主席信任我们广州军区。当时我们把江青看得很重，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把她的医疗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很高兴。但是又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可不得了！1971 年 9 月 13 日，到 1972 年的 3 月份才半年时间。原来就怀疑我们广州军区有问题。如果江青这次来出了什么事，那我们就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我们也很担心。我们省委书记怎么办？决定她来之后，大家陪同她看电影。我们就这个态度，也没有讲欢迎啊，吃饭啊，都没有，就这么定了。

那天，江青就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的白云机场。下来之后，飞机没有滑行到候机楼位置。停在那里，我们就迎上去接她了。当时，军区就是我和任思忠政委，其他还有赵紫阳等省委几个人。接到后，他们就回去了。我和汪东兴一起陪她到南湖一号。路上，汪东兴不许我靠近她，"你隔远一点，不要跟那么紧。"，这是他对我们不信任的表现。到了他们指定的驻地南湖 1 号。原来 1 号楼就是给他们修的嘛。安排好后，我们就吃饭。我和汪东兴两个人吃饭，我就给汪东兴讲："汪主任，江青同志来了，我应当回去告诉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啊。"

他想了想说："不行！"我说："这样他们会对我有意见的呀。她来了，我接来了，不告诉他们，这样不好。""不行，要保密！"我就叹了一口气，汪东兴说："看你这个江西老表。"这是江西人的习惯，这样就算了。吃了饭，我就回去了，他们自己安置。因为江青当时生活的一套人马都有，医生、护士、设施都是自己带来的。我们插不上手，不让我们搞。

吃了晚饭，我、赵紫阳、王首道、陈郁、孔石泉、林李明、任思忠[②]，当时广东省委的书记，广州军区的政委就到 1 号，陪她看电影。我们离她房子较远处就下车。那时候，我们真是怕车子开近了干扰她。在那里等着，她是不出来的，一直等到十二点叫我们去了。江青出来在房子里见面，我们就到放电影的厅里，说我们这么多人陪您看电影。这场电影一直看到二三点钟了。我这个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到了 12 点后再不睡觉就不行了，就睡不着了。第二天，我说这样不行，我吃不消。我们要上班，要办事情，晚上睡不了觉，我哪吃得消啊。我说，不能这样做了。今后每天晚上我们去一个人。我们有七八个人嘛，一人一晚就可以了嘛。第二天以后排了班，今天你去，明天他去，但后来去没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反正我是不能去了。

江青在一号住的时候，我和她的接触过四次，刚才讲的是一次。第二次是一部电影《龙江颂》试片，珠江电影制片厂放的。叫我去陪，我去了。看电影，没什么说的。那电影我没看过，看了感觉技术很好。我就说拍得很好看，因为没话找话说，这是一次。第三次，她从北京拿来《古诗源》样书，通知我们到五号，就是周总理那个房间里。她拿出这本书叫我们大家都看一看。我们全体书记都去的。有一天，她要去佛山石湾的陶瓷厂看陶瓷。头一天，赵紫阳也在，我答应了说陪去。第二天起来后，我不想去了，就说紫阳你陪她去吧，我不想去了。赵紫阳说："唉，不好吧，你答应了去，你不去怎么好呢？"这样，我从家里直接坐车赶去，他们怎么去的我不知道，赶到石湾正好看陶瓷，没什么话说，我这个人也不大善于说这一类话。这是第四次。有一次，她到 7 号毛泽东那个房子，在外面看完花草。我去看她，当时有个服务员叫刘金华。她说："改了，什么刘金华，叫刘华。"

江青 4 月初来的，大概住了个把月，全部事情就由吴纯仁负责。吴纯仁有次给我讲，江青同志要骑马。我说："不行，骑马摔下来怎么办？"没有答应。后来我给汪东兴讲了，说她要骑马。汪东兴说："你找匹老马给她骑嘛"！到 5 月初，突然之间，汪东兴，华国锋来了[③]。干什么呢？"我们来接江青同志"，接就接呗，没说什么，接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去北京，还是到上海。这是江青第一次到广州。

第二次，7 月份了，杨德中来了[④]。他是代表总理来的。到了以后，也是我接待，杨德中说，江青同志要到这里来疗养。我没有说的了，表示欢迎。总理指定她要住小岛一号。就是广东省委招待所。过去是岛，现在就不是个岛了！都连成一片了。小岛 1 号的房子是毛泽东主席住的房子。除毛泽东以外，周恩来住过，别人没住过。这次的接待还是第一次接待的原班人马。还是按照第一次那样的规格。还是由吴纯仁牵头，保卫部石勇部长，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他们负责，他们具体管。这一次住在小岛，是市区，和住在南湖就不一样了，事情特别多。有一次，她要去三元里。三元里有一个温泉露天游泳池，她要去游泳。这个事就那么巧，她从小岛坐车出去，到东山那儿有个铁路。火车来了，当然她就不能走啊。她就在那儿等着，等火车过了之后才能到三元里游泳去了。回来就把我叫去："你怎么搞的？"我莫名其妙，"有什么问题，怎么了？""你没安排好！"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没安排好，我们过的时候，车站的火车过去！"哎呀，那个火车我怎么能够安排啊。谁也不能安排，谁也不能限制。我怎么知道火车这个时候过？我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发。我都不知道啊，全盘都是由吴纯仁他们在那儿管着的。所以我就在那儿听训。"你在那儿修一个立交桥！"当时，我还不懂"立交桥"，听也没有听过。我也没吭气，你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就听着！训了我一顿。东山修立交桥可不是个小事，那可不容易。你看深圳这些立交桥，好大

的工程啊。我那时候才当省委书记几个月呀！什么都不知道。那地方现在也没修立交桥，那不可能修，那个地方人口稠密，怎么修？

有一次，她去三元里游泳，走了很远的路，看见马路两边栽了很多马尾松，就是栽在海边上长得很好、不怕风吹，长得也快的那种马尾松，又把我叫去了，“马尾松是陶铸的德政”。陶铸，原广东省委书记，中南局的书记。“没有用，你把他砍掉、换掉。”这些工程我办得到吗？多少马尾松啊？谁也办不到啊！怎么能砍啊。听着呗，不吭气。我也不说马上办，也不说我不办。我不说话，你坐在那儿说去吧，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浩亮，那个唱戏的，于会泳，还有那个跳芭蕾舞的刘庆棠[⑤]他们从广西来。因为江青住在那儿嘛，他们也到那儿，住在小岛，搞了个房子给他们住下。我们过去在广东很朴素的。一般的人来不摆水果的。他们来了呢，没有摆水果。江青把我叫去了，他们也在那里。她就指着他们几个说：“他们是代表文化部来的。你怎么没给他们摆水果啊？”像这些人住两天，要水果，你有钱不会买吗？还要人家给你摆？我没吭气，也没说摆，也没说不摆！反正不吭气，怎么说你说去呗！训一顿。他们几个人不知道来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以后他们到长沙。长沙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接待的，问邵云升，邵云升当时是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就像现在省委秘书长这么个职务，什么事都管。后来摆没有摆水果，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又一次，因为广州八月份很热，下雨，小岛的路边上种了很多茉莉花。茉莉花茎长长的。所长是好意，花茎长到路上不好走，怕江青摔跤，所长就把它修剪得干干净净。她看到后又生气了，把我叫去说：“你这个所长是坏人，是陶铸留下来的。”我还摸不着头脑，她是不说什么事的。怎么回事呀？“他搞破坏，路上的茉莉花都被他剪了，破坏了！”这个人真是一点理也不讲，我们就没有吭气。“要他作检讨，要处理。”怎么处理啊？叫他写了个检讨，内容我也没看，就送给她了。她看了不满意，又把我叫去：“所长的检讨，你为什么不签字啊？”签字就签字吧，在所长的检讨上签了我的名字。这就说明我也作了检讨了嘛。一点茉莉花有什么事？就是不合理，又值得这样子作吗？

有一次，她想起来就吩咐：“我要开会，讲话，你通知广州市机关的部、处级以上干部，搞千把人这么个会。”开什么会，我也没有问。“我要讲主席给我的那封信。”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讲林彪在 1966 年“五一八”开会时讲什么政变一大堆的东西。反正汪东兴交待我，她要干什么我不要管。就是不交待我，我也不能管她呀。她把我们训得一楞一楞的，我能管她？她就讲滴水洞那封信。“你们知不知道那封信？”她还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七二〇”，陈再道，钟汉华，和“百万雄狮”的事。“我们怎么搞的，搞错了。”当时钟汉华正好到广州军区当副政委[⑥]，听了很感动，很激动。她讲是王关戚搞的[⑦]。那时候，王关戚早就关起来了，她推给人家。她又讲到我，“丁盛有山头主义，但是你没有搞阴谋诡计”，这句话后来在南京审查我的时候，又成了“江青保你过关”。保我过什么关？我是省委书记，从 1971 年“九一三”到了 1972 年，我有什么关要她保？她能保我吗？她讲完话叫大家唱《国际歌》。准备散会了，她忽然又讲起了“九一三”事件，说那天清晨周总理给各地打电话，她就在总理旁边。周总理听了广州的表态之后，放下电话说了一句：“丁盛好！”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她又补充了一句：“真的，这不是我恭维丁盛同志。”

再一件事情就是维特克[⑧]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到了广州。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她把总参测绘局的张清化[⑨]调来要画个什么地图。他们到后把我叫去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她对张清化讲：现在美国的一个女记者来了。她要写东西，她要一个图，要画个什么图。这张清化也没有准备，也不知道到广州来干什么的。他说：“画图，我不知道，也没有带人呀。”江青就指着我给张清化讲：“你找他，你跟他要人”，我也没有吭气，跟张清化

眼对眼，会意地点了点头。后来在南京搞我的时候说："你给了美国特务的地图，是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西柏坡的路线图。"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有什么路线图？我在广州从来没有听说过。毛主席经过的路线，画的什么图，我不知道。江青要一部历史书，《二十四史》，我不懂，也没有看过。不知道陈宏康怎么搞来的，给了她一部。一次电影，去了很多人，我们的老婆孩子。会议室里差不多坐满了人。那天张清华去了，维特克也去了。这时候，江青介绍给我，这是维特克。我也没跟她搭话，我又不会说外国话。

又一次，我们省委在小岛开会。会议休息时，我们在院子里散散步，走一走。碰到江青，大家就走近去和她说话。记不清是谁说："江青同志来这么久。我们从来也没有请您吃过饭，我们想请您吃顿饭。"她想了想说："可以。"并说叫"团结饭"，由大家凑钱，每人还要交几两粮票。当时，每人要出一块钱，拿小米呀，青岛啤酒呀，我们省委班子和她吃了一顿饭。这个事后来在南京成了"江青专门请吃饭"。我说："没有，我没有单独和她一起吃过饭。我们大家吃了一顿饭，而且我在南京给你们讲过。"吃了这顿饭，我还说过她好话"不错，我们吃饭，她还拿酒，拿东西，我们大家出钱。"再一次是 8 月份，瑞典打乒乓球的本格森到广州来比赛。原来江青没说看，后来说："我要去看本格森打乒乓球。"我们那个保卫部长说："不行，不能去，您早一点没讲，我们没有布置，出了事情怎么办？""不行，我要去。"她跟他缠。保卫部长没有办法就打电话找我，说江青同志要到体育馆去看打乒乓球，他劝不住，让我赶快去。我去了之后，她就训我："我怎么不能去？"我开始不吭声。说了半天，您为什么不能去？您原来没有给我讲啊。您要去的话，我们要布置警戒，负责您的安全，您出了事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啊。您要体谅我。再有呢，现在太热，体育馆热得不得了。"嗯！你们为什么不装空调！装上空调，冷气！"我还没去过几次体育馆呢。省委书记才上任几个月，我有这个本事修体育馆吗？当时也没有钱。反正我说不能去："您一定要看也可以，我家里有个彩电，因为我身体不大好，是省委给我的，你到我家里去。"这样就算平息了。我们那个接待组的全去了。她的保卫干事啦，还有护士啦，全到我家里去了。坐到二楼上看了一阵说："我不看了！下楼去。"她尽跟你捣乱，我那楼下有个乒乓球台，她就说，打乒乓球！我们又不会打，我就叫小儿子小江陪她打，他会打，打了几下乒乓球就这样走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留园开会。保卫干事跑过来告诉我们说："江青同志来了。"她没给我们打招呼。来干什么？说到你们各家都看一看。那时孟文虹住院，没在家。她来了怎么办？赶紧回来。从留园到孔石泉家门口也不算很远，100 多、200 公尺.她到了那个地方说："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各家看看。"我给她讲，我们都在这里了。你不必再到各家去了，都差不多。要么就到孔政委家里坐一坐，看一看，就行了。我记得总共就这么多次数，也可能有遗漏，因为我不敢去找接待组的人问。怕说我们对口供，搞攻守同盟啊。在小岛住这次接触最多了。后来就接走了，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是 1972 年的 7、8 月份，天最热的时候，那时开会，她讲滴水洞那封信，广西的韦国清也来了，湖南的卜占亚也参加了这个会。

1973 年 3 月底、4 月初，她又来了，也是我去接的。这次汪东兴没有打招呼，杨德中也没打招呼，是"中办"来电话。这次没住小岛，也没住南湖，中办指定住在松园。她第一次来在南湖住的时候知道这个位置。我把她接到松园，那个房子里用具都是现成的，不必要布置。她住下来，我就走了。住了几天，她不知发了什么"羊癫疯"，去拣玉兰花。广东的玉兰花，你用扫帚去扫，到处都是。她拣了玉兰花，要拿去卖。她问我："这个花你们怎么不拣起来，扫起来去卖啊？你们在珠江边上多种些茉莉花什么的。"她去看了一次说："我叫吴德拿点草种，种在田里很肥的。"后来也没有搞，我们也没管。4 月中旬，我们省委在从化办了一个读书班，我从广州到从化去了。到从化待了几天，读书班，看看大家，读书。这时候，我的心脏病复发，就不能回广州，在从化休息。广东 5 月份雨季，下大雨！我就没

有回去。从此，我没和她联系，也没见她。她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都不知道。

①1972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决定：一、调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二、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三、韦国清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不变。任命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孔石泉为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四、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紫阳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丁盛说“韦国清走了”的意思，应指韦主要在广西而不在广东工作。

②赵紫阳、王首道、陈郁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孔石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李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任思忠时任广州军区政委。

③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广州军区政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

④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

⑤浩亮 原名钱浩梁，原中国京剧院演员，“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扮演者；于会泳原上海音乐学院教师，“革命样板戏”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唱腔设计者；刘庆棠原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员，“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扮演者。时均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文革结束后均被清查，浩亮免于起诉，于会泳自杀身亡，刘庆堂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

⑥钟汉华 江西万安人。1930 年参加红军。1955 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初期为武汉军区第二政委，1967 年 7 月因“七二〇”事件受审查，在江西下放劳动 5 年之久。1972 年 5 月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文革结束后历任军委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

⑦王关戚 指王力、关锋、戚本禹。1966 年 5 月被指定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进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于 1967 年 8 月、戚本禹于 1968 年 1 月被隔离审查，后长期关押于秦城监狱。

⑧罗克珊•维特克（Roxanc Wicke）时在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任教，1972 年 7 至 8 月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以“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维特克在北京、广州与江青长谈达 60 小时，文革结束后于 1977 年在北美出版《江青同志》(《Comerade Chiang Ching》）一书。该书在中国大陆长期被误传为《红都女皇》。

⑨张清化 时任总参测绘局局长。河北获鹿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总参测绘局副局长、代局长、局长。1977 年 9 月因 1972 年受江青指令向维特克提供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等地图事受审查，后解脱。离休前任总参作战部顾问。

第十三章 飞来横祸

一、打招呼会议

我是 1973 年 12 月底到南京的。从 1973 年的 4 月见过江青以后，1974 年在南京“批林批孔”，1975 年正常工作，将近三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没有电话，没有书信，也没有任何来往。

到了 1976 年 2 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到中央参加打招呼会议[①]，转弯子。我们南京军区有我，廖汉生、彭冲，我们三个去开会。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廖汉生是南京军区政委，我是南京军区司令。住在京西宾馆，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华东地区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②]他们住的大套间，住在边上那一套。我们都是一人一间，我一间，廖汉生一间，彭冲也是一间。

21 日的晚上，我睡觉了，我这个人睡觉早。晚 12 点过了，我迷迷糊糊睡熟了。我的秘书陈长顺叫醒我：“江青同志派人叫你去。”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说：“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好吧，我就起来，起来后就去了。一进马天水他们那个房间，江青、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还有曾绍山[③]在。我进去也没吭气。她在那里骂邓小平，“不让我讲话”，“在大寨，不让我说话”，“我身体不好，我现在要讲话了”，什么都骂 。我什么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坐下。她在广州时就骂林彪。江青这个家伙，谁倒了，她就把自己身体不好的责任扣在人家头上，说人家如何暗害她。其实，她和林彪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坏。“九一三”之前，她还给林彪照了像的。那时候，江青不是当了总政治部什么顾问嘛[③] 。她在广州骂林彪，在北京就骂邓小平.骂完了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你们老同志要保卫毛主席。”我们当然要保卫毛主席。骂完了，给了我们一本书。什么书呢？邓小平讲话摘录。我就回去睡觉。



【圖38】1974年1月，廣州、南京軍區司令員對調交接時，與兩軍區及廣東、江蘇省委領導在南京長江大橋前合影。左起：肖永銀、任思忠、寧國清、丁盛、田普(許世友夫人)、許世友、孟文虹、杜平、杜平夫人、王首道、吳大勝、彭沖。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我就给廖汉生、彭冲两个人讲：头天晚上，江青叫我去了。她在那儿骂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我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给廖汉生、彭冲两人讲了。他们俩都在，因为我们三个房间挨在一起的嘛！后来，廖汉生给中央写信，检举我说：“丁盛那天晚上到江青那儿去讲了什么，我不知道。谈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你廖汉生怎么能这样子呢？我明明都给你讲了嘛，彭冲也在那里的嘛。问问看，我讲过没讲过嘛。这个人居然做出这些事来。


【圖39】1974年1月，就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後接見軍區機關幹部。

22日早晨吃了早饭，江青召集好多人开大会，在京西宾馆后面一个大会场开大会。她一个人在台上讲的就是这些内容。骂邓小平，她声嘶力竭，像疯子一样的骂，讲话阴阳怪气的。底下的人也搞不清楚呀，她胡骂一顿完了，华国锋他们才开会的，要转弯子，原来都不知道。骂完之后，她就走下台去握手，每个人握手。廖汉生在我跟前，她先跟廖汉生握手，指着廖汉生说："你呀，不能欺侮丁盛哪！"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当时我一楞。没有欺侮我呀，我们关系还挺好呀。当然，廖汉生不可能说我和江青通什么气。因为我跟他讲了，从1973年到1976年2月这个时候才见面的。廖汉生当时也没有怀疑这个事情。江青她突然莫名其妙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接着在人民大会堂楼上一个会议室开大会。华国锋讲话，还有什么人我都不记得了。华国锋讲话就讲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讲右倾翻案风就是邓小平。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开完会议，回去把北京会议传达，邓小平怎么样的，搞右倾翻案风，我也讲了话。

①打招呼会议 1976年2月18日至3月5日，由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召集"12省市负责同志打招呼会议"，借传达毛"重要指示"为名，实则贯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精神。参加者为东北、华北、华东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沈阳、北京、济南、南京 4 大军区及所属省军区负责人，以及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

②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时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河北唐县人。1931年加入中共。1954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于1967年4月被结合进食为革委会领导班子，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工作。1977年1月停职审查，翌年开除党籍，1982年因审讯期间患反应性精神病，中止起诉，取保候审。1988年去世。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委，第十届中委。

徐景贤 上海奉贤人。196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于1967年2月起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6年10月后停职审查。1980年被开除党籍。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07年去世。中共第九、十届中委。

王秀珍 辽宁辽阳人。女。文革前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技术员、工段长。文革中参与上海"工总司"造反行动，1970年3月后先后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77年1月离职审查，翌年被开除党籍并隔离审查。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中共第九、十届中委。

③曾绍山 时任沈阳军区第二政委，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委会主任。

④1966年11月，军委决定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江青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顾问。

二、给后半生带来厄运的那个夜晚

我们南京军区 1976 年的训练计划，在杭州湾有个陆海空军的联合演习。因为 1975 年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整个工作是按秩序正规进行的，包括军事训练，政治教育。7 月份，南京军区开了一个党委扩大会，检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人反对，有人说好。在这个会上，我也讲了话，我说文化大革命嘛，什么看法都有，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后来还写了个《纪要》，后来这就是事啊。一般性的会检查一下，军区决定开这个会的，倒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开完会之后，7 月底我离开南京，8 月 1 日路过上海，没有停，到了嘉兴。我们一军有个团在那里，参加杭州湾演习的是一军的部队。我到那儿去看一看，看看部队，看看驻地。全军各大单位负责人有好几百人来开会参观，我说看看吧。看完后，我就坐船看舟山群岛的地形。舟山群岛，我 3 月份就去看过一次，没有看完。3 月底，张才千①给许世友写了张大字报。那时候很乱，杜平②打电话要我马上回去。我说什么事啊，我还没看完地形。他说："你快回来。"这样，我就回去了。什么事啊？张才千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大字报，叫我回来做什么？看怎么办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情况，我说："大字报的内容不要外传，军区的领导同志你给他们说一说。"我一直没有看，不知道什么内容，也不愿意管那些事情。这样就耽误了我看地形。8 月份，我又去舟山群岛现场，还有几个岛看。舟山群岛要塞区的王司令陪着我们看的。8 月 8 日中午，我坐船到了上海长江口外的大小洋山。这个地区的部队归上海警备区管。上海警备区的李宝奇③还有个副司令到大洋山来接我。我们吃了饭，看了地形，坐船到吴淞口上岸，时间已是五六点钟了。

上岸后，李宝奇就问我："您来了，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因为原先上海市给他们警备区有交待，凡是大区一级领导来上海，要告诉一声，所以李宝奇问我。我说："不要告诉。"我没讲别的什么，没有准备要去跟他们说什么，也没有什么事。我是来看地形的，到上海是来看看驻地，因为嘉兴那地方不太合适，全军各大区的人来好几百，那怎么行啊？不合适，所以我考虑大家住到上海来。


【圖40】1970年代中，南京軍區司令員任內到轄區看地形。

到了上海之后，因为坐了一天的船很疲劳。到延安饭店④，廖汉生也在那儿住着，住在延安饭店西头一个大套间。廖汉生是害皮肤病，手肿的很厉害，在上海治病。我到上海之后，洗个澡，吃了饭，九点多钟要睡觉了。这时候，廖汉生的张秘书找我们党办副主任和我的秘书，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张秘书讲：李主任，明天上海的医生来给廖政委会诊。廖政委的意思，要丁司令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要他们重视给廖政委的检查，就这么个意思。李主任对我的秘书讲："他们坐船都很疲劳，司令已经睡觉了，这个电话我来打行不行？"张秘书说："还是请丁司令打好，比较好一点，我们都是秘书啊。"我的秘书就把经过给我讲了，我说行吧，我就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这样，接通之后，秘书把电话给我："通了，市委办。"我就给市委办打了电话，不是给马天水他们直接打的，是给市委办公厅

打的。我就把这事说了："我们廖政委明天要请你们地方医生给他会诊。我先打个招呼，请你们关照一下，重视这件事情。"这样打了电话之后，上海市委知道我来了，就报告了马天水。报告之后，10 点钟左右，我的秘书告诉我，市委办来电话，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来看你。我说："好吧，来吧。"我能让他们不来吗？我们要注意军政关系嘛。这样，他们就来了。

来了之后，在我的住房坐下，大家很客气地说说话。我说："这么晚了，你们还来看我，对不起呀，感谢你们。""来看看您，应当的嘛。"马天水他们问我："这么晚了，您从哪里来？"我说："我这次在舟山群岛看了地形，今天从大洋山坐船到吴淞口，是从海岛上来。"我说，进长江口的时候，船下水很浅，看到那个挖泥船在挖泥。水浅，大船就进不来，货就不能按时卸下来。我说，"这次在海岛上看见修码头。码头修起来之后，外国大船来了，把东西卸在码头，用我们的船驳回来不好吗？我在广州的时候，听李先念同志讲过，过去有外国船来了，到码头之后，有时间限制。如果不能按时卸货，耽误时间，就要罚款的。"他们也没讲所以然，没说我讲的对，还是不对。就这么随便聊了。

马天水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们军区在杭州湾组织一个陆海空军的演习，各大军区都要来人，总参、总政、总后都要来人。他们是来指导我们，各大军区要来参观。我看了一下，那边住地不大合适，供应、汽车，都解决不了。所以我想把各地去来参观的人都安排住在上海。上海的延安饭店可能住不下，恐怕就要麻烦你们了。原来住在延安饭店的人要腾出来，请你们安排一下，到上海市的招待所。因为我们的人住在一起便于集中学习，出发都方便一点。还有现在来这么多人，副食品供应、车辆、交通秩序都解决不了，请你们帮帮忙。""这可以，帮什么忙？我们应该办的嘛。"住地、供应、车辆，民兵哨都一口答应了。那就好了，这几个问题解决了。

马天水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你们南京军区 7 月份开会开得好。总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得好。你们水平高，抓住了要害。你们领导同志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我说："一致的，大家商量好的，有什么不一致的？"他说："六十军那个政委魏金山[⑤]怎么没有去开会？""魏金山身体不好，请假住院去了，没有来。""上海警备区的李宝奇怎么来上海的？""李宝奇是中央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的，到上海警备区当政委。"这些都是原话。马天水又说："原来那个政委到哪儿去了？刘耀宗[⑥]哪去了？""刘耀宗道黄山疗养去了，身体不太好。""疗养好了，欢迎他回来工作。"马天水问我："李宝奇怎么样啊？"我说："过去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你说怎么样啊？"马天水说："李宝奇和刘耀宗不一样。刘耀宗是个直筒子，工农干部嘛，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李宝奇说话比较圆滑一些。"他们没说李宝奇别的什么事。说李宝奇说话讲究方式，圆滑一些，我也没吭气，这也不算什么事，个人的习惯嘛。马天水说："李宝奇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你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马天水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叫董常云。你们南京军区的这个会议，他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回来我们要批评他。"

谈完之后我说："我们这次看地形不错。我们在杭州湾演习，抗登陆。整个舟山群岛都看过了，地形很好，是很好的一个海上屏障。对我们在杭州湾的防守很有好处。对我们陆海空军在这里演习很有帮助。"海上的屏障，打不沉的航空母舰，这多好啊。看了地形之后，我感觉在这个方向上防御侵略者进攻很有把握，地形好，兵力密度大。长江口以东和以南，我看过了。但在长江口已被，苏北地区，地形就不一样了。我没有去过，但大概知道在长江口以北，没有舟山群岛这样的屏障，地形没有这边好，是水网地带，兵力密度也没有这样大。这个方向我有点担心，还要去看一看。防御问题，我是这样讲的，完全指的是上海，保卫大上海。战争打起来了，敌人要打我们，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准备得怎么样？我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讲了这些之后，他们问道："身体怎么样啊？""身体还可以，不过有些病，心脏病。"马天水就对徐景贤说："老徐啊，你安排一下，到华东医院检查检查。"以后就谈到文工团演戏。王秀珍问到这个事，我说，我们军区文工团要来演出，大家都看一看，互相学习。

①张才千 时任副总参谋长。1957 年 9 月至 1971 年 11 月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②杜平 时病休未任职。1974 年 11 月前任南京军区第七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

③李宝奇 山西长治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时任上海警备区政委，警备区党委书记。1964 年 12 月起任陆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1969 年 12 月随军长李德生调总政，任总政组织部部长。李德生调北京军区后，于 1972 年 5 月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75 年 10 月降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文革结束后升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

④延安饭店 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南京军区所属往来干部接待处。时由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直接管理。

⑤魏金山 山东蓬莱人。1945 年参加八路军。1960 年代中曾为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82 年之后历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总参政治部主任，海军副政委、政委。1988 年授海军中将军衔。

⑥刘耀宗 江西兴国人。1932 年参加红军。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警备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历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三、几个罪名的事实真相

八月二十几号，部队就演习了。演习了 3 天[①]。演习完之后，9 月 3 号，他们又来了。这次没打招呼，他们三个人又来了，我也不知道。突然之间，秘书都没有给我打招呼就到了房间里。我一看感到很奇怪，"你们怎么来了？"马天水就讲："最近有两批外宾，人数比较多。我们的宴会厅不够，没有这么大。我来看看延安饭店宴会厅大不大？我们想借用一下。"他的来意是想借我们延安饭店的宴会厅。顺便去看了一看，随便谈了谈。

我就讲，这次演习很成功。部队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供应上没有困难，生活也可以，你们给我们解决了。交通上没有困难，没出什么事故，还请我们吃了饭，大家都很感谢你们。演习的部队，参观的人看了好几场戏，我们的文工团演了，上海市的文工团也给我们演出了，还组织看电影。我说，我们看了金山卫这个化工厂，开了眼界，很好。过去没有看过这么大规模的工厂，像个城市一样，完全是化工厂，感到很高兴。徐景贤讲，修金山化工厂，当时有很多困难。没有火车路，那个机器大的汽车都拉不动。工人想了办法，用竹排子从河里拉过去的。我说，不容易，参观化工厂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王秀珍说："你们文工团演得不错，我们接见过他们。能不能留下来，给我们多演几场。"我说："可以啊，没有关系，随你们的便。你们要他们演多少场，就演多少场。"王秀珍说我们军区文工团的演出水平高。"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之后，马天水问我："前一段时间，给你们军区转去了一封信，是驻无锡部队查出来的。这封信说招待所里有四个箱子。这四个箱子运到上海来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们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他说："这个信要很好的处理。"他没有讲怎么处理，我没有吭气。

我说。:“我们也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写给医院一个护士的。这里面说，毛主席百年之后，要打内战。信里边这样讲的。”我说：“这个信我们送到中央去了。”当时实际上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送给陈锡联的，是我和廖汉生两个人签名盖章送的。这次谈话，总的来说就是这么多。谈完之后，时间很短了，那去宴会厅看看吧。我们上去看了，看完宴会厅回到房间里，每人吃了一碗面，他们就回去了。

9 月 6 日，毛主席病重，中央通知各单位负责人都回到工作岗位去。这时候，我们都要走了。我们在上海搞这么一场演习，我去告别一下。我就到市委看一下，说我们要走了。他们当时也乱糟糟的，大家也没说什么话，我就回南京了。这就是我在上海这一段时间的整个活动。为什么讲全部经过呢？后来说我，一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失败之后，积极投靠江青，没有讲事实。要么就是江青到广州来的时候，我们接待了她？我说，江青到广州来不是我请她来的，是汪东兴、杨德中，你们代表中央，代表主席、总理，送她来的。你们送他来，当时我在广州那样的地位，你们找的是我，我能不接受吗？我接受这种安排，是不是就算我投靠了江青？这些事情全部经过可以查。我们接待组的人全都在，江青的工作人员，她的保卫干事，护士也有，你们可以问他们啊，是不是这样？我怎么投靠他了？有什么事实？没人给我讲。上次到北京，刘兴元给我讲：“你丁盛不接待怎么行？如我在广州，我们也得接待，谁敢不接待？”当时江青是什么位置？是什么情况？这个讲理不讲理？

“四人帮”10 月 6 日被抓起来以后，7 日或 8 日，南京军区的我、廖汉生、彭冲，上海警备区司令的周纯麟，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到了北京。杨得志、王平他们武汉也去了，曾思玉也去了，我们三个军区都去了[②]。给我们讲，四人帮抓起来了，让我们掌控部队，掌握情况，我们都拥护。曾思玉还说了好几段话，我和廖汉生都没有说什么。这时候，汪东兴问我：“江青在海南岛打高射炮，你知道不知道？”这很明显，他把这个责任推给我。

那是什么时候，是 1969 年还是 1970 年我记不清楚。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管。江青到海南岛去，也没人叫我负责。我也没管她，也没招待她，我怎么知道？再说，我知道又怎么样？如果我知道她打高射炮，就能说明我现在支持她？问题不在这里，这一下子点出来江青。华国锋说：“上海是他们几个人的老窝子，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不知道，这些人是上海起家的嘛。“我知道！”我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样呢？后来批评我，造舆论说：“叶帅叫你不要去上海，为什么要去？”叶帅什么时候给我打的招呼的呢？是 1975 年的 11 月份。我当时有病，报告了。叶帅说：“丁盛有病，可以在南京休息，也可以到北京休息，不要去上海，不要去广州。”我没有去上海，也没有去广州，我就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说我不停叶帅的招呼。叶帅打招呼，毛主席讲他们搞“上海帮”是 1975 年，军委在我们调整班子的时候就传达了[③]。打招呼之前也好，打招呼之后也好，1974 年，1975 年，1976 年，我跟“四人帮”他们几个人没有任何接触。1976 年 4 月份，天安门事件，召我们去，也是廖汉生、彭冲，还有不少人去了[④]。他们都摩拳擦掌，怎么样镇压群众的，怎么样搞的。讲了呢，江青又说这个话：“你廖汉生，你不要欺负丁盛嘛！”这次我也没有说话。还有他们招摇说我不听招呼，“叶帅叫你派部队占领上海，你问叶帅：‘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中央的意见？’”纯属捏造！哪有这个事情？抓“四人帮”的第二天，我们就在北京，怎么占领上海呀？没有这个事情。这是把他们抓起来之后，我们在北京的情况，后来我们就回南京了。

后来，南京军区于 1977 年 3 月 26 日停我的职，停职反省，立专案了，搞这个问题。“你在上海，给马天水说了句话。”什么话呢？是捏造的，说我给马、徐、王讲，“六十军驻在京沪线上，对你们上海是个威胁，你们要注意。”还有一句话，说我给马、徐、王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杀头。”这纯属捏造。说我讲了“六十军靠不住，我调不动。”这话之后，马、徐、王就回去。专案组定我案的时候这么讲：你 8 日谈完之后，8 月 11 日，马、徐、王查了过去的枪发下去没有？没有，赶快发！11 日，上海发了七万多枝枪，一千多万发子

弹、炮弹。然后，他们在 10 月份“四人帮”抓起来之后，就准备搞反革命暴动。一推敲，就是你丁盛 8 月 8 日给马天水讲了这几句话，因此马天水他们就发枪，因此他们 10 月就搞上海的反革命暴乱。因此，你就犯了国家的法律 90 条，你参与了反革命武装叛乱。你给他们讲这些话犯了罪。因为你是被动的，所以保卫部建议不起诉。不起诉了，这样处理了，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⑤]。

“你不听叶帅的指挥。叶帅叫你不要去上海，你为什么去？”华国锋问我：“他们的老窝子，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他们就这个意思——你给他们说了话，所以他们就暴动。放屁！我这有材料，是调查上海那些反革命分子暴乱的材料[⑥]。原来我就讲过，上海发枪不是秘密地发枪。我在广州工作的时候，中央就通知过，到上海去学习参观上海民兵。他们的枪是上海造的，是王洪文、张春桥他们早就搞的第二武装。他们明目张胆地发枪，谁都知道。而且，这时候上海有多少枪炮呢？有 21 万到 22 万件，并不是 8 月 11 日才发的枪炮。再说，不管 8 月 11 日是发枪，还是没有发枪，跟我毫无关系。他们要搞反革命活动，关我什么事啊？他们当时的动机，是什么反革命目的，我不知道。他们也没给我讲。我凭什么说让他们注意？凭什么说六十军调不动？

1975 年，我到上海之后，我提议，军区讨论，总参批准调防，六十军军部是从江北的江浦调到镇江。去查查看，是不是事实？一八〇师因交通不便，从淮阴调到无锡，是我提议的，为了便于机动。部队嘛，哪有你调的动，他调不动，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常识嘛！部队调一个军，没有军委的命令，个人怎么去调啊？调部队干什么去？我跟谁打去？专案组不容许我说话：“就这样定了。”说我“投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参加上海的武装叛乱。”因为“丁盛被动”，免于起诉。北京总政治部来的人就这样讲的，审我。因为你讲了打内战，所以上海就发枪。我说，不是我讲的，也不是 8 月 8 日，是 9 月 3 日，是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写给一个护士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嘛，为什么栽在我身上呢？这绝对是有意搞我的。突然问我，许建军信里“打内战”这个话什么时候讲的？我说：9 月 3 日，当时我脑子混乱，口误讲了 8 月 8 日。好，完，你改也不能改！我说，你们这是明目张胆在捏造嘛。“打内战”这话不是我讲的，是信里边讲的，时间也不是 8 月 8 日，是 9 月 3 日，你们怎么就咬着我呢？

①1976 年 8 月 25 日至 26 日，南京军区在浙江乍浦岱山地区组织了代号为“东海一号”的师、团机关带一个加强步兵营的登陆作战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陆军第一军第一师、海军东海舰队和军区空军部分兵力，共 4500 余人。各种舰艇 63 艘，各种飞机 85 架。

②1976 年 10 月 7 日至 14 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南京、济南、武汉军区等为首批参加会议单位。杨得志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平时任武汉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曾思玉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③1975 年 8 月 30 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军委通知，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为：丁盛为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张春桥兼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彭冲兼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廖汉生为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丁盛称，叶剑英打招呼，即找丁、廖谈话，应为班子调整前，当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在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期间。

④1976 年 4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在京集体接见丁盛、廖汉生、彭冲、杨广立（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谈“南京事件”问题（至当年 3 月底南京鼓楼广场有大标语点名反对张春桥、江青一事）。

⑤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2）军检免字第 13 号《免于起诉决定书》，详见本书附录。

⑥指新华社记者撰写的《上海市委一些人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初步调查》。

四、审讯与关押

1977 年的 3 月 26 日，停了我的职，停职检查。当时我没有这思想准备，没有想到他们会采取那样的手段来对付我。我认为，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解放军的事。至于言论或工作上的什么错误，我想是会有的，绝对没有想到会把我关起来搞逼供信。停职以后，从 1977 年 11 月 5 日，至 79 年 4 月 14 日，关了我一年零五个月。关我的那天，也没说要把我关起来。因为停职以后，专案组就住在我家里，把我原来的公务员换了，炊事员也换了，全部是专案组带来的人，实际上是监视我了。我还是不怕，你监视我可以，怎么做也可以，我怕什么？我光明磊落。这段期间也没给我老伴孟文虹和孩子们打什么招呼，没交待我将来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怎么办？都没有，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们问，有错误，我检讨错误。

11 月 5 日早晨，专案组的沈干事上来了，到我跟前，就不让我随便走动了。我看着就不耐烦，怎么回事呢？吃了饭就说军区开会，叫我去参加，我就去了。开什么会呢？专门讲我犯错，故说一顿。讲完之后，我说回去了，坐上车一走，不是到我家去，是把我搞到政治部的一个蹩脚地方，限制我的自由了，关在房子里去了。我走的时候，家里人不知道。关起来之后，他们才派人到我家里，把我的被子、行李搬来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被关起来了。他们原来就准备好了的，一个警卫班专门看着我，宣布从此之后不能出门，一天放二三次风，每次半个小时，除此以外不能出去。完全把我当一个犯人来看待了。拉屎，两个警卫员看着，一边一个。晚上睡觉，那个大电灯就放在枕头跟前照着我，那个电灯很亮，照得厉害，怎么能够睡呀？两个警卫员，一边一个站在床头。长期都是这样，在生活上折磨我。也是在这一天，抄了我的家。

然后，就是专案组的三个人：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一个副科长，姓张；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一个干事，姓段了；还有一个从江苏省军区调来的沈干事。三个人专门审我。这以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叫我怎么办，我就得怎么办，天天这么搞。一直到 1978 年发现我右肋底下有个包，要开刀。我说，开刀应当告诉我家里，没告诉。差不多两年时间天天搞，反正他们提什么问题，你不按照他的要求说不合他们的口味就顿脚，拍桌子，骂人。我没做过的事情就不能承认，至于你们怎么想，怎么讲，那是你们的事情。两年时间，逼、供、信，一句话。材料也不知道有多少，很多啊，起码可以搞一大箱。天天讲，鸡毛蒜皮的事也好，国家大事也好，军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什么事情都讲。我现在不知道当时该讲不该讲，忘了。就这样搞，对我折磨的很厉害。到了 1978 年春节，因为我被关起来之后，我家里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家里不知道我的情况，我要求和家里人见面。“不行！”当时我的心脏病很重，早搏一分钟八九次，那个医生有点同情我，要他们注意，是不是让我看看病？“不行！”一分钟八九次，一个小时五、六百次，搞得不好就要死人的，他们不准看，我也没有办法。他们什么都骂，轮番搞我，白天搞，晚上也搞。你们想搞就搞吧，我也没有办法。

关押期间，他们不准我和警卫班的战士讲话，也规定警卫班不准和我讲话。不许出门，互相之间不准讲话。规定了，没有任何自由。时间久了，警卫班战士就发现他们搞得不耐烦。原来是看管我的，后来警卫班的就和我说话了。他们觉得专案组这样搞太过份了。警卫班的

人开始跟我说话，坐在门口看着专案组的人。

警卫班的人，一部分是山东人，一部分是苏北人。那时家里什么都不能给我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战士们家里带来花生啊，枣子啊，鸡蛋啊，吃的东西一包一包拿来后，他们都给我在一起吃。所以说战士们非常好，对我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有很大作用。后来可能被发现了，到 1978 年 11 月份我开刀之后，他们把这个班调走，换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班人。我的房子用铁丝网封死，用纸糊死，不让我看到外头。搞铁丝网，我没说；我说，住的地方，你们连窗户都糊死，我受不了。我提出抗议，后来他们就没有糊，外面用铁丝网圈着。我说，我不会自杀。我自杀了，你们不就成功了吗？你们怕我"畏罪自杀"。我没有罪，我自杀什么？后来这个警卫班慢慢又跟我说上话了。这时候，我们住在山上一个房子里，专案组的人的从山下上来。战士们有时在生活上可以帮帮我的忙，搞点水，洗个澡，专案组都不让，战士们就和他们争吵："我就是要帮他的忙！你不要我干，我就走。我为什么不能为他做些事情呢？"这些战士很坚强。他们开始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后来通过交谈知道了一些。他们就鸣不平，和专案组的人争吵："为什么这样搞人家？"一个苏北射阳县的战士后来复员了，跟我还有联系。另外一个每天跟着我的胖子，一举一动都要监视的，后来一没事就跟我下棋。看看不行，专案组又换一个。这次换的人就完全听他们的了，对我很不客气。什么人都有，多数是好的，就这个人对我太不友好。一天就东找西找，突然就窜到我房子里来。有一次，我女儿火了，就跟他们吵。她不服气呀，她也是年轻人，怕什么？我们当儿女的有什么错？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的态度？我对西西讲，你们这样吵，正好中他们的计。他们希望你们跟他们吵，吵完了，你们没事，要我做检讨，让我写，说我态度不端正，为什么不教育儿女？为这些事都写了不少检讨，没有个完。外面的人一般不准进。要进来的，填表，什么单位。外面的人一听说填表，还敢进来吗？过去我们部队的老同志，作战处长杜铿之[①]也在南京，我们关系很好的。外面有个房子门口坐了两个警卫战士，"你看他，好，你填表。"这样，他也不敢来了。一句话：不让外面的人来，隔绝！

1977 年 11 月 5 日至 79 年 4 月 14 日，把我放回去了。1980 年 10 月 6 日至 81 年 5 月 9 日，又把我关起来了，总共是关了两年多的时间。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关我，你们把这个道理给我讲一讲。他们说："保护你，为了你的安全。"我说："我有什么不安全？我现在这个样子，来害我干什么？"实际上，这时候是要审判那 10 个人，陈伯达他们，黄、吴、李、邱，"四人帮"。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怕我做什么事吧，我都不知道。审判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他们不跟我说什么道理，关了你，你也没有办法呀！

这次又调来一个班，这个班搞了一段，也很好。有个暴牙齿的战士是苏北人，这人又给我通气了："你家离你不很远，在一个院子里面。""怎么样啊？""家里面还可以。"他给我通气，我就知道我家还在南京，原来都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①杜铿之 曾任四十五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1950 年代后转业在南京工作，曾任南京艺术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五、开除党籍，退出现役

据说，把我搞成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搞武装叛乱，连专案组也不同意这样搞，但是领导决定，有什么办法？1982 年 6 月份定的，1982 年 7 月 31 日，军区原干部部副部长，后来当了副主任的王永明来通知我：接总政治部通知，你退出现役。没

有说开除我的党籍，退出现役，这是一句话。原来总政治部指示：待遇按一般干部待遇。王永明说，我们请示，什么算是一般干部啊？总政答复是：按团级干部待遇，每个月给你发 150 块钱生活费，看病要车辆保证，看病实报实销。这是王永明到我家里讲的。到了 1982 年 11 月份，专案组的一个人 ，组织部的叫段干事来通知：中纪委、军委纪委同意南京军区的报告，批准开除了丁盛的党籍。原来我住的地方有两个兵看着我，从禁闭室放出来，在家里也是不自由的，不能出去的，人家也不能进来。之后，要把我赶出南京，规定丁盛不能在沪宁线，南京、上海、杭州，这条线不能待；广州不能去；北京更不要说了。安排到安徽的滁县，到那里安家。我说：我不去。天天这样吵。后来说到淮阴去，我不去，他们没有办法。后来又请到扬州去，实在逼得我没有办法，反正是不能在南京的。后来我说到南昌去，江西老表嘛。这样很快就批下来了，地方就这么定了。定了就催我搬家，1984 年 7 月 28 日到南昌，路上走了一天。

“八一”节在南昌过的。南昌市老干局一个姓刘的副局长来接我们。那里干休所所长不在南昌。后来我分析，这时候她是到南京去了，专案组的人告诉她怎么办。当天晚上算是招待我们，吃了顿便饭。因为第二天过“八一”节，好多人在那里会餐喝酒，我们就没有份，冷冷清清吃这么一顿饭。吃饭后，就安排我们临时住在南昌军分区的一个招待所。住下之后，就带我去看我要住的地方。8 月份，江西最热的天气，热得不得了。我们去一看，厕所没搞好，电灯也不行，南京来的那些人就希望我们赶快搬进去。我说：“没搞好怎么去？我又不是赖在这里。我们从南京来的时候连菜都带好了。”他们也没什么说的。

南京军区干部部的一个干事和另外三个人送我们到南昌，押着我去的。那天交接班，就把我交给南昌市老干局。接受的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南昌市老干局局长，谈什么待遇。我说是 1930 年参加红军的。他说：“不是，你是 1930 年参加的革命。”那时不知道在待遇上有什么区别。我说：“参加革命不就是参加红军嘛，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去？我有没有参加地方党，又没有参加游击队，就是红军嘛。”“不是，你是参加革命。”不承认我是红军。本来中央规定我们到南昌去可以带一个子女。我的女儿给他们讲了，回答说“不行，不能带。”什么都没有解决。总政治部规定的那些待遇，到了南昌什么都没有。

过“八一”，中秋节，他们干休所，老干局，民政局开茶话会，我不知道。我带着外孙女在院子里，天气热，在树底下玩，就看见他们的车来了，带着东西。后来老干局的一个书记，姓李，这个人不错的。他看不惯了，就出来招手，让我去，我去了。那个所长和民政局的人根本不跟我说话，连“你坐嘛”这句话都没有。那个女所长给这个送香蕉，给那个送水果。我呢，没人理。我也很有气，还有一个河南人，抗战时期的干部也有气，也不理她。后来我就走了，没什么打交道，因为我也没什么好求她的。看到这些情况，干休所同志们对我的处境，对这些领导的恶劣态度很反感。说“你们怎么能这个样子？太没人情了嘛。不要说他过去是红军，不管是有错没错，他现在是干休所的一员嘛。”“你不管政治，你管生活嘛。怎么能这样子呢？”这些老同志看不惯，抱不平。第二天给我们送来自己种的南瓜、玉米、花生。

8 月一个月，到 9 月 18 日，我心脏本来不好，就犯了心脏病。老伴孟文虹陪我去看病。我走在后面，在路上“啪”地一声，直直地倒下去，死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几秒钟之后才恢复了意识。怎么躺在这里地上？这时，有些人坐在树底下乘凉，看见这种情况就叫：“老孟，快来快来，出事了，出事了！”大家都赶来抢救。这次女所长不错，急得不得了，急急忙忙地叫车，赶快送医院，一直陪我们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停下来，我也不知道停了多少时间。为什么呢？为了决定住哪个病房，去请示啊，请示市卫生局，请示市里，不知还请示了什么地方，就这样刁难。没有办法，住抢救室，住了几天之后就住到楼上普通病房里。我一个外甥陪着，因为老伴一个人，家里还有外孙女。老伴在家里给我做饭，送返，那时可怜啊。

我当时摔得很重，脑出血，上半身不能动，脑袋震动得很厉害，一动就吐。这个医院里没有脑外科，又去请示，让外面医院请一个医生来诊治，没人答复。

住到 10 月初，过了国庆节，好一点了。我的女婿高瑞君从南京到了南昌。这时我提出来，儿女不在身边，我老伴照顾不了，请求回到南京和儿女在一起。看病啊，照顾啊，才有办法，不然怎么办呢？这样，市里又报告了，不知报告到哪里，批准了，“可以，你回去吧。”10 月国庆节之后，我回到了南京。到南京之后不久，我又去住院，病得很重，住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

第十四章 沉冤待雪

一、株连家人，扫地出门

1977 年 11 月把我关押之后，连夜迫害我的家人，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军区一个副政委叫刘公元，很老的同志，是个老红军；政治部主任孙克骥，抗战时期的干部，两人到我家里去想孟文虹宣布：丁盛被关起来了，你们不能在这里住了。没有看见逮捕证，又没有看见搜查证，任何手续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什么法律，他要执行就是法律。只有搬家了。我们几十年以来，供应都在部队，过去没买过油盐酱醋，都不管这些事情，都是部队里面供应的。有时买点零碎，买点菜，什么票都没有，那时候许多东西是要票的。这样，就把他们赶走了。公家的东西一点不能带，自己的东西由你带走。我们也没有东西，我们从广州到南京来什么也没有带。我从广州到南京来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一个司机。这个司机是浙江人，他愿意到南京这边来工作。

怎么办呢？孩子们在南京住了几年了，都有些朋友了。小江、毛毛他们的同学来帮忙搬家，抬我们的东西，买家具买床，买桌椅板凳，这样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凑合着可以睡觉了。但是，供应关系没有拿到，他们根本就进不去南京军区大院。没有办法，没有吃的，同学们就把粮食一类的东西给我们送来。这样过日子，困难的不得了，老百姓不理解，“你们这么多孩子，怎么连米都没有啊？”那时米是定量的，我们的粮食都是部队供应的。到第二年，1978 年 1 月份才开始供应。

孟文虹当时有病，受刺激太大，大出血，去军区医院看。按道理讲，应该住院，大出血嘛，弄不好要死人的呀。“不行，不能住院，回去。”哪有什么人性，哪有什么共产党的气味？对我老婆是这样，我女儿西西因为我的关系，我被隔离不到半年，就被派到医疗队下乡。我被关的时候，西西不在家。后来她妈写信告诉她，你爸爸被抓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妈妈有病，叫你回来，她就回来了。领导就质问她：你为什么回来？她在军区总医院嘛。“回去，不允许在这儿待着！”要把她赶回去，多伤心啊，这些人真做得出来啊。当时在南京的几个孩子中，她是老大，宁宁、毛毛、小江都很小，她还能管点事啊。不行，回乡下去。这样，孟文虹负担更大了，女儿不允许回来，我又不知道哪儿去了。这时候，因为精神刺激，她就生病了。对我的家属就这样摧残。

在第一次关押期间，拉着我到处批斗。司令部大会，政治部大会，后勤部大会，炮兵大会，六十军大会，上海警备区大会，批斗我。反正我不怕斗，但他们要一些流氓手段。在上海，一群人冲上来硬要我承认讲过，“三连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放哨。”没有，不是这样讲的，

我是说，“你们是给上海市委站岗，你们任务很重。”冲上来威胁我，我说你们不要来这一套，我不怕你们这样搞，我又不是没见过。我不怕，问题在哪里呢？孟文虹。我关起来之后搞她，完全当成敌我矛盾。“你为什么参军？”“你为什么和丁盛结婚？”到处去调查，跑到江西赣州，到河南五十四军，到西安，到她过去的同学那里，全部去调查，搞她的材料，把她当特务看，大会小会批斗。南京的冬天很冷，11 月、12 月，1 月份很冷的。“你要上班！”规定孟文虹要上班。上班也是可以的，她当时是俱乐部副政委嘛。其他什么站长，政委，他们房子里有火烤，木炭火啊。她坐在老房子里，没有火，冻她。没有事干，可能给她任务吗？不可能，完全就是要在肉体上、精神上折磨她。他们暖暖和和的烤火，她在那冷房子里什么事情都没有。而且，歧视她，叫她承认这个，揭发那个，也是在政治部开大会斗呀，批呀，很长时间了，把她当特务看待。直到我出来后，有关部门才在电话上给她说了一句：“你没有事了。”按道理，你们大会小会，骂得狗血淋头，搞成这个样子，应当给她平反。毛泽东主席过去教导的，你在什么范围内戴的帽子，什么场合批斗的，应该在什么场合平反，恢复名誉。连小范围的平反也没有，只是在电话上说了一次就完了。

她的生活待遇，她的职务，1949 年参军，是学生，本来就是排级干部待遇。后来到军里，到新疆的时候，她是学校校长，是科级干部，当管理局接待科副科长。“九一三”之后，到军区政治部当宣传科副科长，到南京军区就当俱乐部的副政委。我们是完完全全一心为公的。1970 年，广州军区领导，那时是刘兴元主持的，提出来，云南发生谭甫仁事件①，我们这些领导同志的老婆是不是都穿上军衣？本来她们参加革命的时候都是军人，1954 年转业了。1970 年，其他领导的老婆都穿上军衣了。孟文虹是我老婆，我是军区司令，我就没让她穿。我说：“你们的老婆穿军衣，我批准，我同意。我的老婆不能穿。”为什么呢？没有什么原因。我是司令，我担心这样做，群众有意见，你怎么说？你们的老婆穿上军衣，我老婆不穿，我来讲话，不是有本钱吗？完全为党啊。1973 年底，我走的时候，广州军区给她穿上了军衣，1974 年批林批孔又把她搞掉了，许世友搞的。这事我没管，本来当时找一下上级，是可以给她穿的。她的职务，我说不能提。这样，她的科技待遇多少年没有动。职没有动，级没有动，还是 20 级。后来全国规定，大学生多少年没调级的，给调了两级，她 18 级。退休之前，军区俱乐部有七个人调级。按理讲，七个人中，有司机，有一般工作人员，退休的时候要提一级，俱乐部也报告了。报告之后，其他人都提了一级，唯有她没提，还是 18 级，每月工资就是 113 元。什么问题呢，从生活上折磨她，从政治上打击她，从经济上限制她。他们这样对她，不讲什么共产主义道德，还有人性吗？这是对她的折磨，对我的折磨。我还是干脆折磨都士？（土话）L 兀，

1982 年，我就解除关押了。1984 年到了南昌，因为生病又回到南京。原来我第一个地方是在宁海路住着的。我被抓走之后，就叫我老婆、孩子从宁海路搬到仁和街一个院子里住着。到了 1985 年又要搬家，“你们不能在这儿住。”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走的时候，给他们讲了：我走了，我的老婆孩子，你们要搞个房子给他们住着。他们是同意了的，说你的老婆孩子一定会安置好。到了 1985 年，没有房子了，要搬家。我说：“往哪里搬啊？”一个是三牌楼，就两间房子，叫我们往那里搬，我们当然不愿意。他们说，住这房子的干部已经升为师级干部了，你们还不能住，真是笑话，这里原是连排级干部的房子，不能因为干部升为师级干部，这套房子也就升为师职的房子了，就这样不讲理。儿女们往哪里办呢？镇江路有套房子，能住两个人，我女儿毛毛和西西到那儿去住。但是镇江路这家人没有搬。，按道理是应该由主管单位去安排，让前面住的这家人搬走。别人走了以后，我们还得收拾一下再往里面搬。没有搬，怎么办呢？

后来政治部换人了，不是原来那个人了，让外面搬到五条巷。我们去看了一下，这房子还可以，但这里原来住着军区俱乐部的一个副主任。这个人不知犯什么错误搞走了，他的女

儿在那里住着。按道理，你们应当叫她搬开，搞好了以后，我们再搬进去，但有关部门去不管，让我们自己去讲。我说，我们自己怎么去讲？你们应该做工作，最后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还是我们去给她讲。这个孩子还是很好的，看着我们实在可怜，搬走了。为了逼我们搬家，他们采取恶劣什么措施呢？第一步就是断水，断电，把电线给我们剪掉。剪了之后，我的孩子么也有办法，同学也多，老百姓中什么能人都有，又给接上。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有一次很危险，我的女婿从步校到我们家来，不知道电线被剪断了，差一点把他电死。还巧，他摸着的东西不导电，没粘上，粘上就死了。他们把水管子破坏了，我们又接上，后来他们把粗水管锯断这么一截，就没法搞了。搬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家没走，你没法搬。最后，他们把院子大门打开，说是房子要维修。工人、老百姓，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搞得你不得安宁。这样折磨到后来，镇江路那家搬走了，五条巷那家也搬走了，我们终于搬过去了，这场折磨才结束。前前后后，折磨了好几个月。当时，五条巷这房子也不成个样子。我们提出，南京这地方蚊子多，苍蝇也多，阳台上没有纱门，给我们搞个纱门好不好？办了，破破烂烂的木头拼起来加一层铁纱。墙上乱七八糟，地板不成样了，他们也答应搞。这些家伙呀！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搞点红料呼呼呼地往地板上一刷，看起来很齐，很漂亮，门也是红的，地也是红的。我们搬进去住，一拖地板，拖把全是红的，地板又成了原来的样了。

我的女儿西西是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的。毕业后，按过去的制度，要在医院实习一年。她到南京后，到鼓楼医院实习一年，就回军区医院工作。领导前一天找她谈，你实习期满就是正式医生了，第二天又找她谈，你转业。她在南京军区医院眼科，表现很好的，那里的主任等都对她很好。那也没办法，领导说话了。你有什么道理？这样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实习满了，今天成为正式医生，明天就转业，这不是受株连吗？还有什么道理？是丁盛的女儿，就不能在军队医院。女婿高瑞君也在南京军区医院。他这个科有点青黄不接，而他正是得力的中坚力量，经验也有，技术也有。转业！为什么？因为是丁盛的女婿。西西后来到了深圳，当眼科副主任医生、副教授，只要她看过的病号，公认她这个人好。另一个女儿毛毛是 1975 年下放的嘛，因为我的问题回不来。所有下放的人都回来了，就她一个人在农村回不来。部队领导小孩下放，全国哪有啊？有多少啊？毛毛到江宁农村五年，在农民家里，插秧、挑大粪、打猪草，什么都会，什么都干。

①谭甫人事件 197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昆明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兼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谭甫人在军区大院内的住所遇刺身亡，其夫人王里岩同时遇难。半月后破案，查实凶手为军区内部人员。

二、这一切都是捏造

大会小会搞完以后，到 1979 年审判“两案”十名主犯之前，在军委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负责的人乱说一顿，丁盛不听叶帅的指挥，丁盛骄傲自满，叶帅叫他不要去上海，他要去上海。林彪南逃，丁盛在广州。这些人什么根据也没有，说完了，走了。他们认为要查办，要审判。另外一种意见不同意，哪能是这样一种做法呢？所以 1979 年我的案件没有定，没有解决，直到 1982 年。为什么这样定的，我就不知道了。实际上我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在华国锋、汪东兴，加上南京那些负责人。

华国锋为什么这样搞我呢？因为我不支持他们搞卜占亚。1972 年下半年，华国锋要整卜占亚，说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在北京开完会，我和华国锋等人一同飞长沙。到了湖南，

卜占亚还蒙在鼓里，他不知道哇。晚上开会，我就骂卜占亚一顿，骂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后来我给他说了，我骂了你一顿卜占亚，但华国锋他们对我不满意，说骂一顿有什么用啊？你要揭发他的材料。我说不知道卜占亚有什么事，我揭发什么呀？所以华国锋就记下这个仇恨。本来我们过去没有同过事，我在广州，他在湖南，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一般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搞我呢？就是他认为，要搞卜占亚，我没有支持他。华国锋这种心情，汪东兴是为了表现。在江青跟前的时候，跟江青说话，腰都挺不起来，江青同志这样、那样的。你叫我们接待江青，给我交待那么具体，那么明确，三番五次地讲。等江青倒台了又反过来说，江青在海南岛打高射炮，你丁盛知道不知道？你安排了任务，完了又说我投靠了江青，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1982 年 6 月，总政治部的保卫部、检察院、法院三个单位来人了。在大会上讲来审我了。他们是有框框的，是照华国锋、汪东兴与他们讲的那个框框来的。我这事完全是先带好了帽子，后穿衣服，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要我承认什么？一是说我讲了那几句话。文件上这么写的：“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这不是我说的，是许建军信上有这么一句话。“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为什么我前面谈到李宝奇和刘耀宗呢？刘耀宗到哪儿去了啦，李宝奇的来龙去脉，这就是所谓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部署什么呢？就是我谈了上海的防御。我是针对未来外敌入侵讲的，他们完全是歪曲。

“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就是六十军’‘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到苏州一线，我很担心’。”这是捏造，根本没有提这些东西。“‘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他们就没有想一想，七万多条枪，一千多万发子弹、炮弹，要多少仓库装？要多少车运？要多少时间才能发下去？绝对没有这个事情！“9 月 1 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徐景贤关于丁盛与马、徐、王密谈和给上海民兵发武器情况的汇报后，对徐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鉴于被告人丁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决定免于起诉”从犯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两次到延安饭店，是他们来找的丁盛，不是丁盛找他们。

他们讲到“杀头”这句话，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我没有讲。讲话总要有个头绪吧，这话从哪里讲起来的呢？当时我们没有提全国形势，而且我是去上海布置演习的，不是去上海玩，也不是去上海找他们。所以过去说我不听叶帅的指示，叶帅不是说不要去上海吗？叶帅是 1975 年 11 月，我有病，叫我不要去上海治病。我去是 1976 年 8 月，将近一年了，根本是两回事。我不是去治病，我是去搞演习。说“杀头”，谁杀我的头？蒋介石杀不到我的头，日本人杀不到，台湾杀不到，美国也杀不到，谁来杀我的头呢？总有个前提呀，我要反对谁啊？我不反对毛泽东，不反对共产党，谁杀我的头呀？这些话都是捏造。我睡，你们拿出证据来，他们当时讲：我们没有证据。毛主席说过，审案子，审查干部，要凭证据，不凭口供。但他们讲，我们没有证据。马天水他们的口供就是证据。那就没法说了，就这样定我的案。

这一段，审查多少天，都搞突然袭击：“‘打内战’你什么时候讲的？”我说：“9 月 3 日”。他们想把我思路搞乱，又问什么时间讲的？我被他们搞得头昏脑胀答：“8 月 8 日讲的。”那就完了，你也不能改了。后来，他们专案组搞了个什么地方，一进去，叫我坐下，“你签字”。我迷迷糊糊地就签了，签什么字，我都不知道。搞我的时候，造成很大压力，心脏反应得厉害，有医生陪着的。我说：“我不行了，心脏不行，吃不住。”医生也说：“不行，赶快让他回去休息。”他们还这样搞，那医生也在呀。他们就是这样搞诡计，拿不到桌面上来的。

我讲的他们不听，他们讲的我也不听。我说，你们这样搞行吗？徐景贤、王秀珍他们的

口供就是证明。他们的口供又是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开始又没隔离，还可以串，就把武装暴乱的责任推到我头上。是徐景贤、王秀珍要搞武装叛乱，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所以，别看他们有口供，那口供是假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口供是假的。我这里有新华总社 1976 年关于上海密谋暴乱的调查材料，其中有王秀珍企图推卸策动暴乱的责任。王秀珍说：我为什么暴乱呢？就因为受了丁盛的影响。你王秀珍受我什么影响？我从来没和她一起工作过，没有业务关系，受我什么影响啊？她嫁祸于人，说搞叛乱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不叫你气愤吗？他们搞武装叛乱，总共有多少武器？上海民兵武器总数二十二万余件，库存还有一万五千余件，这是一个数字。另外，7 月份，市委批准下发了七万余件武器。他们把这也退给我，说我批准下发。我问过新华总社参加调查的记者。他说，据了解，从 8 月份以后，上海没发大批的武器，但要搞暴动，零零星星发了些手枪，大概有几十枝。发也好，不发也好，跟我没有关系。上海搞武装叛乱，就算发了三分之一武器，还有三分之二，要搞武装叛乱照样可以。受我什么影响？徐景贤这个文化痞子，造谣！

上海搞叛乱，徐景贤问上海的一个副司令："上海附近有什么部队？"他连这都不知道嘛！如果是有所部署，那徐景贤为什么要问？8 月 8 日到 10 月有两个月嘛，他怎么会不知道？反过来说，"四人帮"没打倒之前，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如果需要的话，全国哪一个地方的兵力部署，他搞不到呀？随便一句话，兵力部署就会弄来，很简单的事嘛，他怎么弄不到呢？上海有几个军，王洪文，张春桥不知道啊？要我给他们说啊？所以这些人没有知识，乱讲话，强加于我，我也没有办法。

他们还说：你老婆 1974 年"批林批孔"在广州挨整。因为江青说了话才解围。我说："不对"。'批林批孔'1974 年 3 月份才开始，我老婆 1974 年 1 月就到了南京，在南京过的春节，这个你们可以查。他们说："你没说这个话，但不等于你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是什么逻辑？是这样的啊！天气是阴的，就说晴的；是晴的，就说是阴的，这些人就这样颠倒是非，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冤案错案。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定，你们没有证据，一件证据也没有。去年 9、10 月，我又给中央江泽民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写了材料，送上去了。我也把这几份材料送给中纪委尉健行书记。我希望到北京去，谈我的问题。

三、何处可伸冤

我到南昌，又回到南京。我们全家生活很困难，我是一百五十块钱，丁克西是一百二十块钱，毛毛和小江是八、九十块钱。孟文虹也是百把块钱，就这样维持生活，是相当困难。加上南京气候冷，过去冬天有暖气，现在没有了，冻得受不了。我的关系搞到南昌之后，供应是要户口，凭票的。我人在南京，户口在南昌，在南京买什么东西都没我的份，只有他们几个人的。怎么办呢？忍着了，忍耐。搬家后，我女儿在南京医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了。我感觉没办法就给她讲：我们在南京维持不下去了，太困难，经济困难，物资困难。你可不可以到广州，到深圳看看。她就去看了一下，找找关系，找找过去的同学。上面这些人，在职的人没有用，也不能去找他们。找了以后就说可以，因为她是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又毕业了。她过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手术开刀很不错，所以考了一下，说可以接收，就要离开南京。从我来讲，做父母的，年纪都大了，无论哪方面都舍不得她走，不走呢，也没有办法。1987 年，我们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她本身也很不愿意。一是父母年纪大了，一是她丈夫、孩子在南京。我们全家没有人在深圳，倒是有个大女儿和儿子在广州，也帮不了忙，他们自己也是苦得不得了。我的儿子小明因为我受株连把他搞到三水。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忍心让孩

子们出去。想来想去，最后还得忍心让他们出去。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谋生，深圳这边收入高一点。她走了以后，我常常一个人在床上流泪，睡不着觉。

这时候，我的女婿为民从步兵学校毕业到了惠阳四十二军。他到惠阳之后，我的女儿毛毛就可以到惠阳了，这样就靠近深圳了，好一点。再往后，找点关系，1989 年把小江他们也搞到深圳来了。开始没地方住，他们兄弟姐妹就挤在这房子里。我们来了，他们还住在这里。后来我女婿在警备区分了房子，他们一家才搬过那边去。当时的困难逼着大家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站住了脚。1989 年冬，南京很冷了，我们两个老的就到深圳来，在这过一个冬天。

1990 年 5 月份，我们就到北京去了。我第一步去找了中组部。这个处长，我在南昌病倒时，他来过，所以我找他。我当时发了电报，中组部来了个处长，中纪委来了个处长。我把这几年的情况都给他讲了。他说："现在你的事情，我们中组部不管了，归中纪委。"我说："中纪委去找谁，我不知道啊？"他说："现在中纪委有个'两案办'。你到那儿找就可以了。"我就到中纪委，找到副秘书长马英杰。一开始，我把自己的遭遇，错案都提出来。他说："不能谈。""为什么不能谈？""为了稳定局面，为了安定，所以就不能谈。"我认为，这个矛盾不谈怎么行呢？他说，你怎么说，都不能谈，可以谈生活。我就讲，1984 年我到了南昌。生了病，身边没有儿女，儿女都在南京。老伴也在南京。我一个人在南昌，没办法生活，又回到南京。可是我的关系在南昌，在南京没有供应关系，生活困难，票证不够用，粮票，油票，什么都是票。我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回南京，就这么一个要求，没有别的，为了解决我的供应问题。他答应说，这些要求不高，但我没有决定权。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你的问题要找政治部。办你的事情，我们中纪委知道，但具体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解决你的问题，要找政治部。他记录下来，说反映上去。

这样，我又去找总政治部。到了接待室，很多的人，我们到那儿都报名的，递条子进去，就坐着等。那时我们都很老实，等了好久，没人管，也没有人问。后来孟文虹就进去了，也没给他们打招呼，说：这样一个老人，到这里来，你们也没人管。他坐在这里怎么办？坐好长时间了。这时候，他们才出来，把我叫进去了。他们说，不知道。我想，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我来了，就给她们讲。我把怎么受迫害的全部给他们讲。也是一样的答案：不能谈！不能谈，我也要谈；不能说，我也要说。我到了总政治部怎么不说啊？人家就不愿意接见，不愿意办这事。见干部就一个一个说，他们听完了就说，你这问题，我们管不了。不是我们管，纪委管。好，明天我再来找纪委。反正你不接待，我也不走。找纪委谈了以后说：我们可以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四个部门都谈了，最后他们说："现在谈了没有用。""为什么没用？什么道理？""现在凡是'两案'，就是林彪一案，江青这个案，过去办了的、处理了的，处理对了，不要动了；处理错了，也不动，就错了；处理轻了，也不动，就轻了；处理重了，也不动，就重了。对也好，错也好，轻也好，重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压死了。""什么道理，你么给我讲啊！""为了安定，为了社会安定。""你这种情况不是你一个人，是一批人。""一个也好，一批也好，总是个问题存在呀，回避怎么行？不谈怎么行？怎么办呢？""这个我们管不了。生活问题可以向上面反映，我们没有权。"

他们是没有权，他是个处长嘛，部一级的根本不接见。我们都在那个信访办公室。讲得这个信访办满好，实际上信访办最脱离群众。不是挨训，就是挨批，不然就不管。上午等到 12 点，下班了，没有人了，下午到几点钟又没有人了。这些上访的人哭啊，可怜啊。我去了五六次，每次去都听到在讲这讲那的。最后一次是信访办主任见。我没有别的要求，要求把我的关系转一下，不是转到南京，是转到广州。我的儿女全都在广东了，南京没有人了。他讲：你这个要求不算高，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他这也是实话。信访办有什么权？上去就是石沉大海①

没有办法，搞到 8、9 月份，我在北京住了几个月时间。一些老战友听说我来了，都来看望。老战友见面都说：你是不会犯什么错误的，我们相信你。他们知道我很困难，一个月两百块钱，自己开伙，租房子，所以一下就是一大筐鸡蛋、油、米，生活用品齐了。鸡蛋、小米、红茶、富强面、肉，什么都有。陆陆续续来看我的，有过去负责干部，也有过去的译电员、保密员、秘书。

在这过程中，我给聂荣臻写了封信。这封信原稿还放着：聂老总，我到这儿来，我这个情况说一下，简单提了一下，要求先把我的关系转到广州，请您给批个条子。这是 1990 年 9 月份。聂老总批了，当然批之前我不知道。聂荣臻是很严肃的，原则性很强的。如果他认为我不对，他会退回来给我的。据说，聂老总这个批件是批的让刘华清、杨白冰来办。杨白冰当时权利很大，是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9 月 24 日，聂老总批了，告诉我说，送给他们了，我很高兴哪[②]。等来等去，一点消息也没有，等到 10 月份也没有。听说有一次参观外国的一个什么展览，王平碰到刘华清问：“看到聂老总的批件没有？”刘华清说他：“管这个闲事干什么？”碰了个钉子。

元帅，当时就剩聂老总了，其他元帅都没有了。聂元帅，1990 年批的这个条子，把我的关系转到广州来。这个话是别人听到的，我们没有听到。具体怎么批的，我们不清楚，不敢随便说。但聂老总有批示，这是真的。



【圖41】1993年10月，丁盛八十大壽時與子女合影。站立者左起：丁克西(西西)、丁濤(寧寧)、蕭虹(毛毛)、丁力(小梅)、丁克林(小園)、丁克雲(小亮)、丁小明、丁克江(小江)。

①丁盛在 1980-1990 年代曾写过多次申诉，现留存于亲属处的，详见本书附录《我的申诉》。

②有关经过详见本书附录《关于丁盛同志要找聂帅面报情况的证明》。

四、人间自有真情在

10 月份，天津来人，把我们两人接到天津去了。在天津住了二十天，也就是过去的老



【圖42】1997年夏，陸軍第五十四集團軍歡迎老軍長丁盛重返部隊。前排中為丁盛。

战友，各家各户走走。在天津比较冷了，因为我们从广州去都穿得很薄，结果毛衣、棉衣、皮衣都送来。对我们非常热情，还照了像。当年我们打天津的时候，这些都是参加了天津战役的人啊。当年打天津时的连副指导员负伤留下，离休了。他们也很困难。走的时候对我很同情，知道我们要走，每个人十块、八块、三块、五块，把钱凑起来给我们。没有任何人给他们讲啊，干什么呀？表达心意，你买东西也可以，买什么也可以，反正是我们的心意。他们收入很低的，连级干部嘛。我们在天津那批人，最高就是韩辰，是军级干部，后来到贵州省军区当副政委，其他人都是团以下干部。我们各家去看了，吃了饭，照了像。到了金汤桥，民权门那个地方没有了，完全改了，形象都变了，我们在那儿照了相。11 月份，我们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广州，到深圳，这是 1990 年。1990 年，批条子也好，提要求也好，都没有一点反应。

1991 年 6、7 月份，我们又出去，到武汉去了。我那天讲过，我现在出去是靠战友，武汉是一样的也都是老战友，到他们家里去吃饭。那时候，天气很热，大家来看我。我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也是一批战友在那里，我们部队的，也有过去不认识的，鸡公山没什么事，就是避暑。之后，我们从武汉到了南京。到南京后我生病了，心脏病，就在南京住医院，江苏省工人医院，住了个把月。后来好点就出院了。医药费就要五千多块钱，哪折腾得久啊，我哪里有钱？就欠这医院的钱。我们没有钱，要找个担保的。当时，我就给医院说：医药费你们开个收据，你们算一算。后来由南京到济南，到济南后好几个月才解决这医药费。后来南昌市老干局的罗局长讲，你在南京住院花了那么多的钱。按道理说，你是没有那么多开支的。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才给你报销的。按规定是实报实销的，我是实报实销的嘛。他说：我们不知道。凭良心讲，他那个南昌市卫生局是很穷。有一次，我们去报个帐一百多块钱，转了一圈，没有钱，报不了，这也是实际情况。


【圖43】1997年夏，丁盛(拿相機者)重返陸軍第五十四集團時為列隊歡迎他的戰士們拍照。

到济南，在老战友家住。过去一三三师的，六、七十岁了，离休了，来看我，又到他们家去。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在济南的，来了一百多人。有一位一三五师的干部，我下连当兵时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干部我不认识他，他说：我听说你啊要来看看。在济南过了一个冬天，这是 1992 年冬天。1993 年到南京，买不起软席票，坐的 硬席卧铺，还是最上的第三层。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的年纪，也没有人和我们换位置，得爬上去，这样到的南京。孟文虹在最底下，底下人多拥挤，我就在上头。南京天气也热，因为热的关系，我的甲状腺发炎，影响到心脏。本来准备 9 月中买票回广州，但那天我很难受，孟文虹原单位军区俱乐部的一个医生利用关系，把我们带到军区“八一”医院。一检查，医生就感觉我病的很重，不能回去。医生是按医学观点讲话的，他不管你政治不政治。“今天不能走，住下！”我也感到很难受，就住下了。但他是俱乐部医生，我住院，他要办很多交涉，在这里磕头，到那里去讲。他讲了之后，医院也没这个权，也得往上面反映，往军区反映，后来答应了：住下。


【圖44】1998年8月，五十四軍在京老戰友歡迎丁盛夫婦到京。前排左起：趙學、王玲、韓懷智、孟文虹、丁盛、韋統泰、藍亦農、董占林、魯挺、董荊玉。

暂时住在急救室里。晚上孟文虹回去了，医生也会去了。这个医院是给战士连排干部治病的，病房里没有卫生间。我的病很重，身上没有力气，但要大便，不能不去呀，厕所是战士用的，是蹲在地下的，结果我解完大便就起不来了。当时，我很明白，如果起不来，今晚就会死在厕所里，所以我拼命把脚往前蹭，猛地一下抓前面的墙站起来了。我晕乎乎地往前走，在走廊碰见一个战士。她说：你这种情况必须有人照看的。我也没有说话，回到病床上休息。第二天，孟文虹他们来看我，我说了前一晚的情况。她着急，就给军区报告：丁盛病

重，我们的儿女都在广东，没人照顾，请求派个人来照顾一下，主要是上厕所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军区派了一个战士来。这里的好些战士是学校里去实习的，我也是处处遇到好人。他们看到我的样子，不输液不行，就 24 小时看着，用心脏监护器。当时并很重，有死的可能，医生很重视，态度也还可以。孟文虹一个人忙不过来，每天要给我抹好澡，洗好脚才走，每晚 11 点还没吃晚饭，回去还要通广州、深圳的长途，真是困难啊。幸好儿女们，战友们都来看我，给我很大的安慰。10 月份，我们就有南京到了广州和深圳。

1993 年 1 月 16 日，孟文虹在住房里犯病，晕晕乎乎，我赶快把她扶着，人事不省。我赶快打电话给武警医院一个认识的医生。找不到，没办法，女儿去北京开会了。一直到晚上，我的侄孙女婿帮忙找到一个车，送到武警医院。后来知道是丁盛的老婆住院，他们请示警备区，请示广东省军区，才同意住院。他们不请示，就不敢接受。女儿毛毛去了，孟文虹吐得一塌糊涂，实际上她那天也可能死。毛毛不敢告诉我。怕我急病了。第二天我去看她，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也不能说话。我想，这都是受我的株连啊，连看病也要请示，这里批准，那里同意。

总算有了病房，氧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了。但这个医院没能够对症地看她的病，也没有这个仪器来检查。我的女婿小高用车把她送到宝安一家医院作了“CT”，才确诊为脑干炎，就是中枢神经发炎。这种病有可能死，有可能残废。这样必须要到红会医院看，因为那里有个专家门诊，是上海的专家轮流来的。这个专家很负责，当时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后来一起吃饭他才知道：“噢，你是这么一个人！”

1993 年这一年就过去了。我也去住了一个月医院，孙逸仙心血管病医院，有些不舒服，但没有什么危险。在当时情况下，一点小事对我来说都会很困难。1994 年就好了，我的身体还好，她也恢复了。1994 年 4 月，儿女们、战友们凑了些钱，我们回老家。飞机票，我们买不起的呀，五个人去，三个孩子，我们两个人，要千把块钱。到了赣州，住了几天，遇到一三〇师那些同志热情的不得了。“是老军长！”一定要看我，一定要吃饭，接待我。交际处的范科长是五十四军转业干部。他把我们原来五十四军的许多同志召集来了，讲话呀，座谈呀，给我很大鼓励。我很高兴，对他说：你参军时，我已不在五十四军工作了。他说：你是不再五十四军工作了，但我一参军就知道你是老军长。讲部队作风，讲训练，都提到你呢，所以我们知道，但没见过面。这次就好了，见到了。当时他们问我：“能不能报销？”我说：“到哪里报销？到我的儿女处报销。”后来，吃饭没要钱，住房也少交了些钱。

回到我老家，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女儿们不同意我在家里面住说：这儿没有医院，你生病怎么办？我的姐姐不让我走，要我多住一住。好可怜啊，瘦得像干柴一样，我姐姐当时已九十岁了。我给姐姐留了些钱，留了些药，就从老家赶到赣州住了两天，回到深圳。6 月份，从深圳到桂林，一站一站选好的。1994 年很快活，很高兴，战友们对我们也好。

那次，我对中纪委的人讲：你们说我身体好。对！为什么？从我本身来讲，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我没有做坏事，我问心无愧，理直气壮。我现在的生活是“三靠”：一靠老伴、儿女。老伴招呼我，儿女养着我；二靠组织。住医院，儿女们拿不起钱，住孙逸仙医院那次就是八千多块钱，我住院必须靠组织；三靠我的战友。出门靠我的战友，他们安排我吃、住、行。平时，我的战友给我寄钱，一百也有，五百也有，一千也有，我让他们不要寄，他们说这是自己的心意。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心情愉快。战友们说：你不是坏人，你受委屈，总有一天会好。这三条，一条都不能缺。儿女养活我，谁能代替？老伴、儿女伺候我，谁能代替？我住院必须靠组织，我的儿女不能代替。我要出去转，儿女代替不了，组织代替不了，老战友给我安排。这三条是我的依靠，我不能少一条，每一条也不能互相代替，少一条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到深圳来，就是这个道理。

去年，1995 年[①],我八十二岁。你们看看我，眼睛也快瞎了，不行了，单独不能生活。在江西举目无亲，没有人可以依靠，怎么办呢？中国人的习惯，人老了，就享天伦之乐吧。我不靠他们靠谁呢？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嘛，所以我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到深圳来，必须靠近我的儿女。而且，深圳这个地方，军队就有一个干休所，这个干休所是团级干部的，现在还有十几套房子没有人住。他们那些人要求高，要三房，我哪怕有两房的给我几间就可以了。我自己和老伴一套，我的儿女还没有房子的，他们来住，就可以了，什么要求都没有。关系转过来更好，不转过来就给我房子也可以。

中纪委的同志讲："到广州，到深圳，恐怕有些困难，还是要找军队。"他问我："军队有什么熟人没有？"我说："当然有了，他们当了大官了，不敢干这件事请，没有人管，要找军队，还是你们中纪委，你么去找为好，你们好商量着办。"中纪委这个人是办事的。他回去以后，中纪委可能和总政商量好了，总政愿意接受了。所以中纪委就发了一个文件给江西省纪委，纪委通知老干局，通知干休所，干休所就正式通知我："军队愿意接收您了。""还有什么内容？""没有，就是个通知，告诉一下。"怎么办？不知道。往哪去？他也不知道。这个所长很好，不是那个女的了，是干休所周所长，很实在地告诉我。

①1995 年，经军委一位领导人批准，总政同意由军队接收丁盛，到广州安置。

丁盛生平大事年表

余汝信 编

1913 年诞生

11 月 7 日（农历十月初十）出身于江西省于都县罗江乡上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七人，排行最小。

1914 年-1929 年 1 岁-16 岁

在家乡生活、务农。

1930 年 17 岁

年中 加入途径家乡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纵队，从此参加革命。

10 月 第一纵队改编为红六十四师，在该师一九二团当通讯员。

1931 年 18 岁

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战后，先后调至红四军十一师当打旗兵，第四军政治部通讯员。

1932 年 19 岁

年初 调至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任通讯员、通讯班长。是年，由团转党。

1933 年 20 岁

10 月 到公略步兵学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学习。结业后调至红三军团第六师所属团部卫生队任指导员。

1934 年 21 岁

10 月 随红三军团开始长征。

1935 年 22 岁

1 月 遵义会议后，先后调至红三军十二团、十一团任连指导员。

7 月 调至红军大学“上干队”学习。

1936 年 23 岁

2 月 红军大学“上干队”结业后，分配至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任指导员。

年中 调红二十八军第二五一团任团长。

1937 年 24 岁

8 月 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协理员、七一五团组织股长。

1938 年 25 岁

5 月-6 月 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组织科长、三十一大队政委。

1939 年 26 岁

2 月 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一支队（邓华支队）第七团政委。是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0 年 27 岁

5 月-6 月 随同出席中共“七大”的晋察冀代表团赴延安。后因“七大”未如期举行，在为造就高级军政干部的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

1941 年-1943 年 28-30 岁

先后在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

1944 年 31 岁

从中央党校分配至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任政委，率部开荒生产。

1945 年 32 岁

4 月-6 月 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9 月 率教导二旅一团赴东北。

11 月 在锦州任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热辽纵队（黄永胜纵队）第二十七旅旅长。

1946 年 33 岁

4 月 二十七旅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热河军区热东军分区（5 月，改称热河军分区第十八军分区，11 月，改称冀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任军分区司令员，参与创建、开辟热东根据地。

1947 年 34 岁

5 月 第十八军分区改编为冀察热辽军区（归东北局领导，后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独立第十八旅，任旅长。

8 月 冀察热辽军区所属三个旅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任八纵二十四师师长。

9 月 率第二十四师投入秋季攻势作战。

1948 年 35 岁

1 月 率第二十四师攻歼新立屯之敌。

3 月 率第二十四师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9 月 率第二十四师参加攻克锦州战斗。

10 月 率第二十四师参加辽西会战，围歼廖耀湘兵团。

11 月 东北野战军八纵二十四师在辽宁海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仍任师长。

12 月 率一三五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1949 年 36 岁

1 月 14-15 日 率第一三五师参加天津攻城战斗，迅速突破民权门，攻占金汤桥，受到东总首长通令嘉奖。

4 月 率第一三五师南下。

9 月-10 月 率第一三五师参加衡宝战役。是役，大胆插入敌后，以一个师的兵力，堵住敌四个师主力的退路，并歼敌第七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和一七二师部及两个团全部，共歼敌 5531 名，为整个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受到四野总部和十二兵团传令嘉奖和表扬。

12 月 率第一三五师主力包干广西大容山周围地区剿匪任务。翌年 3 月，率第一三五师平息玉林地区土匪暴乱，受广西军区通令表扬。

1950 年 37 岁

4 月 升任第四十五军副局长。

11 月 代理第四十五军军长职务。

1951 年 38 岁

3 月 第四十五军剿匪工作受中南军区通令嘉奖。上旬，率第四十五军由广西调防广东粤南地区，执行守卫海防和机动作战任务。

8 月 任第四十五军军长。

1952 年 39 岁

8 月 第四十五军一三三师调归第四十六军建制入朝作战。

10 月 第四十五军军部、一三四师、一三五师与第四十四军一三〇师合编为敌五十四军，隶属中南军区建制，任军长。

1953 年 40 岁

1 月-2 月 率第五十四军北上进至辽东半岛和朝鲜铁山半岛地区，担负反敌登陆作战任务。

5 月 率第五十四军全部入朝，先后进到平壤附近地区，接替第三十九军防务。

7 月 率军机关参加金城反击战役中央集团的作战指挥。当月，战役结束。全军在整个战役中进行大小战斗 254 次，歼敌 7600 余人。是月，朝鲜停战后，率第五十四军担负“三八线”前哨阵地防御任务。

11 月 率五十四军按照国防军编制进行大规模整编改装工作。

1954 年 41 岁

4 月 率五十四军撤离“三八线”，担负守卫朝鲜东海岸任务。

11 月 奉命离开朝鲜返国。

1955 年 42 岁

年初 离职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学习期间五十四军军长职由欧阳家禅代理）。

9 月 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 年 43 岁

1 月-12 月 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 年 44 岁

7 月 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

9 月 重返第五十四军任军长。

1958 年 45 岁

2 月 增补为中共第五十四局今年党委书记。

5 月-7 月 第五十四军撤离朝鲜返国，隶属程度军区建制。8 月 1 日，率军直进抵四川重庆。在朝鲜期间，被授予二级国际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9 年 46 岁

3 月 11 日 中共中央电令第五十四军组织一个小型指挥所（简称丁指），由军长丁盛率领入藏执行平叛作战任务，统一指挥第一三四师、第十一师（后增加第一三〇师）作战。15 日，“丁指”机关组成。

3 月 27 日 率“丁指”成员乘飞机抵达拉萨。次日，第一三四师先头部队到达拉萨。次月，第一三四师统一指挥山南地区平叛作战。

7 月 2 日 率“丁指”统一指挥纳木湖地区平叛作战。28 日，结束战斗，歼敌 2000 余人，为西藏牧区平叛作战首捷。

8 月 率“丁指”统一指挥麦地卡地区平叛作战。至 9 月 20 日，历经大小战斗 40 余次，歼敌 5500 多人。

1960 年 47 岁

2 月 2 日，经总参、总政批准，成立重庆警备区，由第五十四军机关兼。兼任重庆警备区司令员。

2 月 29 日-4 月 15 日 率“丁指”统一指挥西藏 1 号地区平叛作战，历时 47 天，共歼敌人 1.22 万人，受到军委通报嘉奖。

9 月 奉总参命令，协同“昌指”（昌都地区指挥所）召开“宁三”地区平叛作战会议。。

12 月 30 日 军委表示，“丁指”及第一三〇师、第一三四师胜利完成西藏平叛作战任务，返川归建。

1961 年 48 岁

4 月 1 日 率“丁指”从拉萨出发，19 日，返抵重庆归建。第一三四师至 5 月 19 日、第一三〇师至 12 月 1 日全部归建。

8 月 增补为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 年 49 岁

10 月 8 日 陆军第五十四军接到军委关于准备入藏担负自卫反击作战的预先号令，陆军第一三〇师随即开始入藏。28 日，军委，总参命令组成“丁指”，丁盛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陆军第一三〇师、昌都军分区前指所辖部队以及其他加强部队在瓦弄地区的反击作战行动。

11 月 6 日 率“丁指”抵达察隅，立即与总参沟通联络。次日，主持召开作战会议。14 日，“丁指”前进至航堆以南地区开设。16 日，率部向瓦弄印军发起全线反击。17 日起，“丁指”部队除以一部分兵力实施追击外，其余部队转入搜剿作战。

12 月 1 日 前线各部队奉命开始后撤，瓦弄地区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是役历时 21 天，共歼敌 1256 人，击落、缴获印军飞机各一架，缴获 51 口径以上火炮 62 门，枪 809 枝（挺）。

12 月 5 日 率“丁指”撤离吉公。26 日，返抵重庆。

1963 年 50 岁

2 月 20 日-28 日 陆军第五十四军在重庆隆重召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祝捷授奖大会。及后，率少数机关人员先后到沈阳、南京、广州、兰州等军区进行汇报。

1964 年 51 岁

5 月 奉军委命令，调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当年 10 月到职，司令员陶峙岳）。

8 月 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实际工作仍在兵团。

1965 年 52 岁

5 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为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

11 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新疆军区党委常委。

1966 年 53 岁

5 月 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任小组成员。

8 月 24 日 经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兵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作出调整，任组长。

1967 年 54 岁

1 月 28 日 中央军委致电新疆军区党委称：包括王恩茂、丁盛等在内的 8 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望你们想大家作和善解释。

3 月 26 日 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经新疆军区党委批覆成立，丁盛为第二主任（主任裴周玉）。

6 月 22 日 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兵团第二司令员，兵团常委第三书记。

11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开始解决新疆问题。与王恩茂等奉命赴京。翌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王恩茂、丁盛等 8 人《关于建议召集新疆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支左代表到京开会，解决新疆问题的报告》。

1968 年 55 岁

2 月 15 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命令，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4 月到职后，任中共广州军区党委常委，12 月，任军区党委副书记。

3 月-5 月 奉周恩来之命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解决新疆问题的会议。

3 月 26 日 到林彪处汇报，听取了林彪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指示。

1969 年 56 岁

4 月 1 日-24 日 在北京参加中共“九大”并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4 月 28 日 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名单，任中央军委委员。

6 月 25 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成立中共第四届党委，任军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刘兴元）。

7 月 12 日 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电令，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10 月 18 日 为警惕苏联突然袭击，全军部队进入临战状态。率广州军区 59 人组成的指挥班子，进驻军区前方指挥所。

10 月 19 日 在军区前指接到周恩来电话，通知中央决定将一批在京老同志疏散外地，其中疏散广东 21 户，将于次日乘专机抵穗。与刘兴元商定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组织

一个班子负责接待工作。当日下午，到从化温泉视察接待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10 月 24 日-26 日 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率前指共 500 多人在广州从化地区进行野营拉练。

11 月 15 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增补为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

1970 年 57 岁

8 月 23-9 月 6 日 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2 月 26 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刘兴元）。

1971 年 58 岁

1 月 3 日-8 日 参加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第四届四次全会（扩大）。就部队建设、战备训练等问题作了讲话。

8 月 11 日 陪同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接见军区读书班军以上干部 74 人。周就东南沿海战备、“三支两军”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8 月 27 日 与刘兴元等奉命飞赴湖南长沙。

8 月 28 日 上午，随同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受毛委托，向丁盛、刘兴元等传达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精神。

晚上，毛泽东与丁、刘、韦国清、汪东兴谈话。据汪东兴回忆称，毛对丁、刘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谈了党在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指责“他们”在去年庐山会议上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由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丁盛向毛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 2 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毛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

毛问丁盛：你打过些什么仗？丁回答说，打过锦州。丁汇报了他们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丁谈到他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罗！毛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毛对丁、刘、韦说：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8 月 30 日 毛在离长沙去南昌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据在场的汪东兴回忆，毛称：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在谈到读书问题时，毛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吧？刘答，不会。毛指着丁盛说：你呢？丁答：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还对刘、丁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

永胜倒了怎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离长沙后，与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到湖南韶山整理毛南巡长沙谈话。

9 月 5 日 按毛泽东的指示，刘兴元、丁盛向广州军区军事上干部传达了长沙谈话的主要内容。

9 月 13 日 接周恩来电话，称：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人（指林彪）带着他老婆、儿子坐飞机向被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主席命令，广州军区的陆、海、空统一归你（指丁盛）指挥。当日，分别向军以上单位和省革委会领导传达了周恩来指示精神。

10 月 12 日-13 日 周恩来、李先念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到广州。在珠岛宾馆接见了广州军区丁盛等负责人，听取了广州军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并简要讲述了“九一三”事件经过。

11 月 27 日 与广州军区其他负责人向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广州的周恩来汇报工作并听取了周作的指示。

1972 年 59 岁

3 月 23 日 刘兴元调成都军区。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4 月 9 日 周恩来在广州小岛 1 号楼接见了丁盛等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7 月 5 日-8 月 10 日 主持中共广东省委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

11 月 10 日-11 日 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传达周恩来、叶剑英等对广东工作的指示。

1973 年 60 岁

2 月 陪同徐向前接待到广州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8 月 24 日-28 日 参加中共“十大”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12 月 2 日 到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

12 月 21 日 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在与丁盛握手时说：“我记得你有什么病？”丁答：“心脏病。”毛说：“你要注意哪。”

12 月 22 日 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1974 年 61 岁

10 月 任中共南京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张春桥）。

1975 年 62 岁

5 月 27 日-29 日 根据军委 5 月 24 日关于二十军、一军对调防务的命令，率军区及陆军第二十军主要负责人在武汉与武汉军区杨得志司令员等，就两军调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协商，研究确定了调整后部队的部署、行动时间、调防中的组织指挥、交接工作等具体事宜。

7 月 21 日-8 月 4 日 参加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传达贯彻 1975 年 6 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6 月下旬-7 月中旬 到北京参加集中讨论精简整编和整顿问题的军委扩大会议。

8 月 30 日 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军委通知，调整配备南京军区领导班子。仍为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张春桥兼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6 年 63 岁

2 月 17 日 经丁盛提议，军委批准，南京军区下达关于陆军第六十军、江苏省军区等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命令。其中第六十军军部从南京调至镇江，所辖陆军第一八〇师从苏北调至无锡，至此，第六十军所属部队集中在沪宁铁路沿线。

2 月 18 日-3 月 5 日 到京参加中共召集的“十二省市负责同志招呼会议。”

4 月 16 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在京集体接见丁盛、廖汉生、彭冲、杨广立，谈“南京事件”问题（指 3 月底南京鼓楼广场有大标语点名反对张春桥、江青一事）。

5 月 11 日-22 日 根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指示精神，召开南京军区作战会议。22 日，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与此同时，丁盛等军区首长勘察浙东地形，研究拟制了作战方案。

7 月 5 日-8 月 9 日 南京军区决定利用陆军第一军组织的师、团机关带一个加强步兵营登陆作战研究性演习的成果，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 250 人。

8 月 8 日 勘察地形后途径上海，住延安饭店。晚因廖汉生看病事电话告上海市委关照，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得知后来访。该晚的礼节性谈话后被诬指为“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

8 月 25 日-26 日 南京军区在浙江乍浦、岱山地区组织师，团机关带一个加强步兵营的登陆作战演习（“东海一号”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陆军第一师和第三团机关及一个步兵营，海、空军部分兵力共 4500 余人，在现场先后组织营以上干部 900 余人集训，5000 余人参观学习。

9 月 9 日 毛泽东逝世。上午 8 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加强战备值班》的指示，南京军区党委接到指示后，立即召集各大单位主管传达并重新调整了部署。根据军区命令，全区部队迅速进入一级战备。10 月 4 日，恢复正常战备。

10 月 7 日-10 日 粉碎“四人帮”后，到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批“打招呼”会

议。期间，9 日上午，与廖汉生、彭冲找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谈话，分析讨论了“四人帮”被公开揭露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及应对措施。

11 月 11 日-12 日 会见并宴请了到南京访问的斯里兰卡军事代表团。

1977 年 64 岁

3 月 26 日 被宣布停职审查。

11 月 5 日 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被关押并抄家，家属随即被赶出军区大院，搬往仁和街 9 号，本人被拉着到处批斗。

1978 年 65 岁

1 月-12 月 整年被关押。

1979 年 66 岁

4 月 解除关押。

1980 年 67 岁

10 月 6 日 两案审判前夕，再次被关押。

11 月 2 日 两案审判时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内称：“1976 年 8 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立即检查对民兵发枪情况。随后突击发枪 74200 枝、炮 300 门、各种弹药 1000 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9 月 21 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了丁盛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和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

1981 年 68 岁

5 月 9 日 解除第二次关押。

1982 年 69 岁

7 月 6 日 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免于起诉决定书》，内称："被告人丁盛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审查，于 1982 年 6 月 19 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于起诉。""被告人丁盛，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鉴于被告人丁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决定免于起诉。"

7 月 21 日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命令，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

10 月 29 日 中央军委纪委披覆：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

1983 年 70 岁

南京军区拟将丁盛安置到滁县或淮阴或扬州，不从，未果。

1984 年 71 岁

7 月 丁盛夫妇被南京军区按"一般干部"待遇，送至南昌交地方安置。丁盛的户口关系亦迁至南昌。

10 月 因病回南京住院治疗。

1985 年-1988 年 72 岁-75 岁

长居于南京分配予孟文虹的住处（大方巷五条巷 17 号），期间多次申诉，惟未得任何答复。

1989 年-1994 年 76 岁-81 岁

1989 年冬后，丁盛夫妇离南京到深圳鹿丹村女儿家长期居住。期间，于 1990 年 6 月到北京中纪委、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申诉，被告知："为了安定团结"，两案问题一律不懂，对错都不动。1990 年 9 月给聂荣臻写申诉信，聂批示交刘华清、杨白冰办理，惟未有下文。1990 年 11 月后，几年间分别应战友之邀到天津、武汉、南京、济南、桂林、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受到老战友、老部下的热情款待。1994 年 5 月，回江西老家探访亲友。

1995 年 82 岁

年中，经总政同意由军队接收，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置。住房、住院按副师级待遇，惟每月仅发 550 元生活费。

1996 年 -1998 年 83 岁-85 岁

在广州干休所居住。期间，于 1997 年夏天重返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1998 年 8 月到北京与五十四军在京老战友见面，均受到热烈欢迎。

1999 年 86 岁

9 月 25 日 在广州逝世。近 700 位老战友、老部下及晚辈参加了告别仪式。及后，其骨灰安放在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丁指部队的西藏平叛作战

齐心　整理

一、奉命组建丁指

1955 年 3 月 11 日 232 时，中共中央电令第五十四军组织一个小型指挥所（简称丁指），由军长丁盛率领入藏执行平叛作战任务，统一指挥步兵第 134 师、第 11 师作战。中共中央同时电令，由成都军区副司令黄新廷组成指挥所（简称黄指），指挥步兵第 130 师、第 42 师前指和昌都警备区部队，平息昌都地区的武装叛乱（第 130 师于 4 月 14 日进抵昌都地区）。

总参谋部于 3 月 15 日就部队入藏发出预先号令，令步兵第 134 师于 3 月 26 日集结于格尔木，4 月 15 日前入藏；步兵第 11 师集结于敦煌，随步兵第 134 师后跟进。同时，令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于 3 月 16 日赴京了解西藏地区情况。丁指机关于 3 月 15 日组成，共 305 人。同日，第五十四军作战值班室组成，并立即担负起组织指挥任务。

3 月 19 日，丁指机关由重庆乘火车赴兰州。20 日，军委令步兵第 134 师沿青藏公路向拉萨开进，限 3 月 30 日到达拉萨地区；步兵第 11 师限 4 月 2 日到达拉萨地区。步兵第 134 师，待丁指到达格尔木即归丁指指挥；同时，丁指归西藏军区指挥。3 月 27 日，丁指成员由兰州乘飞机抵拉萨。28 日，步兵第 134 师先头部队到达拉萨，30 日，该师如期赶到拉萨、当雄地。

二、山南地区平叛作战

山南地区叛乱分子约 1 万人，加上拉萨地区平叛作战前后，窜至该区的藏军、喇嘛、贵族及被裹胁的群众约 6000 人，共约 1.6 万人左右，曾围攻驻泽当的山南分工委及驻军长达 77 天，气焰十分嚣张。西藏军区令第 134 师以分进合击、迂回包围手段，对山南地区之叛乱武装发起进剿，首先控制边境，而后将山南境内之叛乱武装予以围歼。

4 月 4-9 日，各参战部队先后分五路向山南地区进击。步兵第 402 团于 4 月 7 日拂晓，在曲水东、西三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围歼贡嘎、江达 400 余敌，歼敌 79 人。当时，步兵第 155 团尾随步兵第 402 团在曲江渡江。步兵第 401 团在温宗击溃 500 余敌的阻击（歼敌 24 人）后渡江。4 月 8 日拂晓，步兵第 401 团在泽当守军步兵第 155 团第 3 营配合下，对围困泽当驻军和山南分工委之敌发起攻击。战至 13 时，步兵第 401 团第 3 营与步兵第 155 团第 6、第 9 连同时攻占供坡热主峰，歼敌 454 人。

步兵第 402 团 4 月 10 日进至浪卡子；步兵第 155 团 4 月 9 日在藏达击退 300 余敌伏击后，于 10 日黄昏进至索结，侦悉当许有敌 800 余人，遂日夜兼程奔袭。左翼步兵第 159 团于 4 月 7、8 两日在羌纳顺利渡江，经两日行程，进至仲生。

为弥补左翼部队进展迟缓而影响对敌达成合围，西藏军区除令步兵第 159 团日夜兼程疾进外，并令步兵第 401 团（含步兵第 155 团第 3 营）于 4 月 11 日由泽当出动，以两路分别经颇章、琼结于 12 日拂晓包围哲古；步兵第 155 团自当许南进，首歼错那之敌，再东向觉拉希卡方向疾进，力求将敌主力逼至隆子宗以北或阻于隆子宗以南地区。然后集中步兵第 155、第 159、第 401 团等三个团的兵力围歼之。


【圖45】1959年8月，西藏平叛作戰時在拉薩羅布林卡。左起韋統泰(五十四軍副軍長)、詹化雨(西藏軍區副政委)、丁盛、余致泉(11師師長)。

步兵第 401 团 4 月日在开进中，第 1 营在颇章溪卡遇 400 余敌阻击，战斗数小时，敌向阿拉岗方向逃窜，团闻该地有敌 1000 余人，即将主力转向阿拉岗，错过了向隆子宗迂回截击敌主力的时机；4 月 12 日拂晓，步兵第 155 师进抵当许。因该团第 1 营未按时到达，合围未成，仅歼敌 32 人；步兵第 159 团因栈道被敌破坏，沿途遭遇阻击，于 4 月 12 日夜才进至江中；步兵第 402 团主力与步兵第 160 团第 2 营，于 4 月 11 日在打隆会合。

从 4 月 11、12 日所获情况判明敌主力已向隆子宗方向逃窜，步兵第 155 团以两个营分别于 4 月 13、14 日由当许向觉拉希卡、错那开进，执行“关门”任务。4 月 15 日，步兵第 155 团率第 1 营经热若奔隆子宗；步兵第 159 团向颇章羊者和加玉地区疾进；步兵第 401 团 4 月 14 日进至邛多江，与自接加里南逃叛乱武装之恩珠 •公布扎西部后尾 300 余人遭遇，歼敌 10 余人，余敌南逃。当得知敌 4000 余人已于数日前向隆子宗方向逃窜，步兵第 134 师决定提前 1 天于 4 月 17 日拂晓对隆子宗达成合围。遂令步兵第 401 团第 2 营、第 155 团第 3 营，分两路奔向隆子宗东北及北侧，团主力经俗坡多向隆子宗进击。步兵第 401 团主力及步兵第 155 团第 1、第 2 营，步兵第 402 团第 1 营，虽分别进至指定位置，但敌主力已经南逃。

为堵击由隆子宗南逃的最后一批叛乱武装，4 月 18 日，步兵第 134 师令步兵第 402 团

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由错那进至品多。该连抵达品多时，敌主力 5000 余人已先离品多，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左翼之步兵第 159 团经 10 天 8 也兼程疾进，于 4 月 18 日进至三安曲林。至此，合围隆子宗的行动遂告结束。

西绕之步兵第 160 团第 2 营位打隆、浪卡子一线阻敌西逃。步兵第 402 团主力于 4 月 16 日拂晓奔袭多宗，达成合围后，敌 240 余人据守顽抗，未能全歼敌人。该团于 4 月 21 日向拉康推进。

步兵第 15 团 4 月 23 日抵达及萧以北地区。步兵第 402 团 4 月 22 日进至申隔宗，奔袭蛇（地名）300 余敌未果。步兵第 134 师又令其一个营的兵力向龙东追击，该团第 2 营于 26 日进至拉康，以两个连于 29 日进至龙东。至此，山南地区平叛进剿作战行动结束。

三、纳木湖地区平叛作战

纳木湖地区的叛乱武装，总计有 3000 余人，枪 600 余枝，马 600 余匹。7 月 2 日，丁指奉西康军区命令，统一指挥纳木湖地区的平叛作战。根据西藏军区的意图和敌情、地形情况，丁指以步兵第 400 团、步兵第 31 团第 1 营、当雄机场警卫营两个连、军区警卫营一个混合连，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敌进击。鉴于敌主力盘踞在 7088 高地以及 7055 高地以北、纳木湖南岸地区，7 月 3 日，西藏军区、丁指令步兵第 32 团第 2、第 3 营迅速由挑呷格不隆南北向东进击；步兵第 31 团第 2 营由黑河乘车进至当雄，由纳木湖东南向西进击；步兵第 134 师第 400 团第 2 营、军区警卫营、当雄警卫营各以一个加强连、炮兵第 308 团三个连、步兵第 134 师直属教导连及步兵第 11 师侦察连，分别进至 7088、7050、6915 高地一线翻越雪山，由南向北进击；另以小分队留于羊八井至当雄段的各重要山口担负堵截任务。

各进剿部队均与 7 月 6 日拂晓前进抵指定位置，将敌压缩于 7088、7050 高地附近山沟内。步兵第 400 团第 2 营第 4 连，克服高山缺氧的困难，全副武装翻越大雪山，按时到达指定位置，阻止了敌人东逃。7 日实施分割围剿，歼敌一部，敌大部溃散。参战部队多分路逐山、逐沟反复梳理搜剿。战至 7 月 12 日，将集股之敌歼灭。随即展开分区清剿，至 7 月 29 日结束战斗，歼敌 2035 人，解放被裹胁的群众 1151 人，缴获各种枪 531 枝（挺），子弹 4223 发。

纳木湖战役是在西藏牧区平叛作战首次成功的歼灭战。这次作战基本肃清了班戈湖、申扎和黑河之间地区的集股叛乱武装，清除了青藏公路两侧敌情顾虑。

四、麦地卡地区平叛作战

麦地卡地区的本地叛乱部落和四川、青海以及西藏的拉萨、黑河等地窜入该地的叛乱部落共 80 余个，有战斗力者 5000 余人，活动十分猖獗，曾攻打索县党政机关和青藏公路沿线道班。为确保青藏公路运输的安全，西藏军区决定将原拟于 1960 年进剿麦地卡的计划，提前于 1959 年 8 月实施，并授权丁指统一指挥这次作战行动。丁指受领任务后，令步兵第 400 团、第 402 团（配属师侦察连），步兵第 11 师第 32 团及炮兵第 308 团三个连（不带炮），炮兵第 541 团三个连（不带炮），西藏军区军士教导营，步兵第 11 师第 31 团第 2 营，步兵第 11 师侦察连，共约四个团的兵力，歼灭麦地卡地区之敌。首先多路分进，于 8 月 25 日 5

时前完成对敌合围，而后，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担任堵截，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向心穿插，将敌歼灭于彭错湖周围地区。完成进剿任务后由步兵第 402 团负责全区清剿，其余部队待命撤出战区。战役发起前，为造车敌人错觉，断敌东逃之路，派飞机对所宗、比如地区进行轰炸，并解所宗之围，以隐蔽战役企图。


【圖46】1959年8月，西藏平叛作戰時與韋統泰在拉薩布達拉宮西側留影。

步兵第 32 团第 1 营以解所宗之围为名，于 8 月 17 日由黑河出发，其他各部部队先后于 8 月 19-23 日，分别由雪喀、拉萨、黑河出发。步兵第 32 团第 1 营及步兵第 400 团第 2 营，分别于 8 月 25 日黄昏及 26 日拂晓前，先主力部队进至嘎培拉、底金山口一线，断敌东逃，主力部队均按计划提前一天，于 8 月 27 日 5 时进至预定地区，对敌达成合围。

8 月 24 日，步兵第 402 团第 3 营在菊加拉与敌警戒 40 余人打响，战斗开始。西藏军区军士教导营、步兵第 400 团第 2 营于 8 月 25 日分别在夏布山口北侧、嘉黎至底金山口间遭敌伏击、阻击，经反击后敌向麦地卡逃窜。

战役预备队于 8 月 25 日进至赶尕地区后作为合围第二线部队，防敌东逃。西藏地区装甲连，于 8 月 26 日进至黑河下丘地区，并在当雄、黑河、下丘卡公路沿线进行活动，防敌西窜。

8 月 27 日，步兵第 400 团第 2 营将 300 余骑匪（系由青海窜来的叛匪）包围在底金拉西北山。13 时 30 分，对敌发起攻击，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仅 25 分钟，即迫敌全部退守底金拉主峰。战至 15 时，敌实施反击。经 2 小时白刃搏斗，第 4、第六连相继攻占主峰，全歼匪首阿羊、洛桑、群沛以下 309 人。

步兵第 31 团第 2 营 8 月 27 日 8 时，在彭错湖东侧与 100 余骑匪打响。与此同时，各路部队以彭错湖为中心向内压缩。步兵第 402 团第 1 营在的母拉以南连续作战，歼敌 248 人；该团第 2 营进至兰拉附近，迫使 74 名叛匪投降。步兵第 32 团在彭错湖东侧，围歼骑匪 156 人。步兵第 402 团第 3 连在张日松多以东积极出击，连续作战，歼敌 279 人。战至 9 月 2 日，麦地卡地区大股叛匪已基本就歼，余匪溃散。据此，丁指令各部转入划片清剿。

步兵第 134 师部队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共劝降叛匪 1700 余人，占该师部队歼敌总数的 70%。麦地卡地区的平叛作战，截至 9 月 20 日，历经大小战斗 40 余次，歼敌 5563 人，其中争取归降 2869 人，收缴各种枪 2438 枝（挺），解放被胁迫的群众 7517 人。

此役，保障了青藏公路交通运输安全，而且积累了大部队合围作战和贯彻执行牧区政策的经验，达到了战役预期目的。

五、一号地区平叛作战

一号地区包括洛隆、硕督、边坝、沙丁等四个宗（县）的全部和八宿、类乌齐、丁青、色扎、尺牍、索宗、比如、嘉黎、曲宗、倾多宗（县）各一部，物产较丰富。该地区叛匪总实力约 1.3 万人（其中骨干约 4500 人）、钢枪 6000 余枝，而且进行了训练，妄图凭藉雪山险阻，“坚持中国战略后方的游击战争”。



【圖47】1959年12月，與下連當兵時的同班戰士黃大昆談話。

西藏军区令丁指统一指挥步兵第 130 师（欠炮兵第 540 团）、第 134 师和步兵第 157 团，共七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不带炮）的兵力，在航空兵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为主，结合奔袭、堵击、追击等战术手段，以多路分进、多层合围、层层剥皮、步步逼近的战法，首先肃清伊塔西、当雄地区，中仲比寺、沙摩依地区，邦古通、沙丁及其以南、热依拉以北地区，拉若（杀那寺、唐假尕）地区，郎籍公、阿兰多地区之敌，逐次缩小包围圈，而后攻、堵结合，歼灭一号地区之敌。参战部队于 1960 年 2 月 28 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丁指受命后立即立即开展准备工作。1959 年 11 月，组织 10 个连的兵力分别深入到洛隆、丁青、松宗、育儿根、纪路通等地设立十一个情报站，收集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适时调整兵力部署，进行临战训练。抓紧时机对物资、装备进行补充、调整。动员民工抢修急造军路，并组织数以万计的牦牛运输物资。

丁指于 1960 年 1 月 7 日、2 月 20 日分别在拉萨、扎木召开作战于协同会议，统一作战指导思想。为防止叛乱武装外窜，丁指自 1959 年 10 月即开始从其他战区抽出部队进至一号地区边缘。各进剿部队，于 2 月 28 日前，基本肃清战区边缘地区的股匪，并完成一切战役准备。


【圖48】1960年秋，丁盛(站立者)協同昌都指揮所指揮寧靜、三岩地區平叛作戰期間，深入前綫部隊對指戰員作指示。

一号地区进剿作战历时 47 天，经历了扫清外围（2 月 29 日至 3 月 12 日）、向心进击（3 月 13 至 21 日）、分片搜剿（3 月 22 日至 4 月 15 日）三个阶段，共歼敌 1.22 万人，其中击毙 1140 人，俘 4820 人，投降 1049 人，政治争取 5150 人（占歼敌总数的 46.3%）。缴获无后座力炮 7 门，各种枪 6910 枝（挺），子弹 38.7 万余发，刀毛 5733 把，骡、马 2061 匹，电台 6 部，降落伞 268 顶级其他物资一部。一号地区平叛作战的圆满成功，受到中央军委的通报嘉奖，嘉奖电指出：平叛部队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克服了冰山陡壁、怒江激流的障碍，战胜了雪崩地塌、给养缺补等各种困难，发扬了高度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英勇机智的战斗作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它的意义在于荡平了国外势力所接济和指挥的西藏地区最大的叛乱武装盘踞的巢穴，为实现民主改革、促进生产建设，以及在年内肃清全西藏叛乱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二号地区平叛作战

二号地区是指以聂荣宗为中心的巴青、黑河、安多，位青、藏交界处。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叛乱武装月 5000 余人，拥有钢枪 3000 余枝，轻机枪约 200 挺，高射机枪 10 余挺，炮 10 余门，电台 6、7 部。盘踞该区的叛乱武装多系青、川和西藏其他地区窜来的骨干分子，比较顽固。

西藏军区令步兵第 134 师（1960 年 5 月后改称陆军第 134 师）指挥步兵第 32、第 157、第 401 团、第 158 团三个连、西藏军区军士教导营、装甲 2 连，第 134 师重炮营、骑兵大队及兰州军区青海骑兵第 2、第 13、第 14 团、摩托大队、装甲营两个连，共约七个多团的兵力，以远程奔袭对敌达成战役合围，而后以进堵结合的手段全歼二号地区之敌。

第 134 师受领任务后，记过详细调查和周密研究，决心以青海省军区骑兵部队自西北、北、东方向，以西藏军区各步兵团自西、南、东南方向，于 1960 年 5 月日，预订在乌拉山沿阿克达木河及其南北支流以西，唐古拉山以南，苍来拉至当松多地区，对敌造成合围，进堵结合，将敌全歼于苍来拉、尕尔红、宁多吉、查当松多、卡赛渡及唐古拉山北侧地区。

在战役准备阶段，据空中、地面侦查发现，敌主力有向西北移动之迹象，为防敌越过青藏公里西窜，第 134 师即令师重炮营、西藏军区军士教导营、步兵第 158 团三个连，进至

唐古拉山南北之青藏公路沿线，步兵第 157 团主力提前进入出发位置，与青海省军区摩托大队共同组成指挥所，统一指挥唐古拉山南北公路沿线之堵击分队，并有意暴露我在战区西北之力量，以防敌西窜。

各参战部队分别于 4 月 27 日-5 月 2 日，分 24 路向合围地区开进，为防止敌在我开进是逃窜，造成战役突然性，第 134 师决定战役合围和打响的时间，由 5 月 7 日提前到 5 月 5 日 6 时。参战部队昼夜疾进，如期对敌达成合围。

5 月 5 日，航空兵首先以轰炸机 15 架次对敌中心地区实施轰炸、扫射，各部队主力随即分路向心进击。骑兵第 13 团东路分队于查用滩与叛敌近千人打响，团主力立即围歼该敌。据侦查，查用滩，尕尔红以西地区之敌近 3000 人，是时，各步兵团正在翻越唐古拉山，尚未进入战区中心。第 134 师决心集中三个骑兵团众歼该敌。但因骑兵第 2 团为当面之敌迟滞，骑兵第 14 团主力已按原定计划分路向依然错改方向寻歼敌人，致使骑兵第 13 团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仅歼敌一部，敌主力分散四窜。

5 月 6 日，敌大部分窜至查用滩、索巷查受、底马尔商及唐古拉山北侧地区。为确保全歼敌主力，第 134 师决定压缩包围圈，将南侧堵击线向北推至唐古拉山脊，西侧推进至孔庚永山南北地区，令各部队大胆穿插、分割歼敌；并以轰炸机 18 架次对集中之敌实施连续突击。同时，步兵第 401、第 32 团翻越塘沽拉山，未作停滞，即分路插入敌心脏。第 134 师骑兵大队 1 中队（师侦察连组成）直插索台地区，截获敌运输队后，遭 500 余敌包围，奋战十三个小时，打退敌人 5 次冲击，拖住了敌人，配合步兵第 32 团歼灭了该敌。骑兵大队第 2、第 3 中队分四路直插查用滩东南地区，抓住由宁多吉窜入之敌 400 余人，歼其一部。

步兵第 32 团团指率第 2 营，于 5 月 6 日进至查用滩西南地区，与索德部落叛敌约 800 人打响，激战 40 分钟后，敌分两路向东北、西北逃窜。步兵第 2 营当即尾追，途中与步兵第 3 营会合，迫使敌人龟缩于滩内，因合围不严，敌乘夜逃窜。次战给敌主力以沉重打击，缴获无后坐力炮一门，高射机枪一挺，轻机枪六挺，电台两部。

步兵第 401 团第 3 营分 3 路直插至麻布贡、查午滩、查用滩以南之间地区，先后与 1000 余敌战斗 4 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大胆穿插，顽强战斗，仅 6、7 两日即歼敌 481 人。

鉴于敌主力已处于参战部队的合围圈内，能否堵住敌人是全歼敌人的重要关键。第 134 师遂于 5 月 7 日令各部队以二分之一的兵力转为堵击。同日，玉树指挥所各骑兵支队亦推进至阿克达木河北岸地区，增强了北面的堵击力量。

鉴于在唐古拉山北侧地区隐蔽有大量叛乱分子，第 134 师即以三个步兵团主力进入该区寻歼集股之敌。历经 3 昼夜战斗，全歼罗布次仁股匪 230 人，缴高射机枪一挺，轻机枪 20 挺，步枪 121 枝。步兵第 401 团组织第 1、3 营寻歼唐古拉山北侧地区之敌，经数日搜剿，歼敌一部。

战至 5 月 14 日，全面进剿基本告一段落，敌部分骨干分子携电台已窜至莫云、苦毛隆阿日松多之间地区，合围圈内残存的叛乱分子大部分分散隐蔽。据此，第 134 师除以骑兵第 13、第 14 团一部继续执行追歼任务外，进击部队主力即在孔庚永山东南 5500、5000 高地、乌金拉以北之间与宁多吉、查当松多、郭当松多及其以南地区展开搜剿。截至 6 岳日，连续作战 38 天，基本全歼二号地区之敌，计歼敌总司令罗布次仁以下 5084 人（含空降敌特 7 人），缴获长、短枪 2249 枝，轻机枪 180 挺，高射机枪六挺，无后坐力炮七门，电台六部。

二号地区平叛作战是在青藏交界的高寒牧区进行的一次陆空协同作战和大区协同作战，歼灭了盘踞在青藏公路东侧的叛乱武装，保障了青藏公路运输安全。

七、宁静、三岩地区平叛作战

平叛部队曾先后数次进剿昌都之宁静、三岩地区的叛乱武装，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由于叛首公呷喇嘛、八角活佛、扎巴喇嘛、麦巴本等未被擒获，1960 年 4 月，被我关押之匪首吉错本等 14 人越狱逃跑，至 9 月底，该区叛乱分子又发展到千余人，活动甚为猖獗。

1960 年 9 月上旬，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奉总参谋部命令，协同昌指（即 1959 年 10 月黄指奉命撤销后成立的昌都地区指挥所）召开了“宁三”地区平叛作战会议。会上决定以陆军第 130 师直属三个连、步兵第 388 团、昌都警备区步兵第 156 团、第 126 团两个营、骑兵第 1 团四个连、成都军区步兵第 3 团及步兵第 4 团一个营，共约五个团的兵力，首先围歼宁静、三岩接壤地区以八角活佛为首之匪，而后以一部分兵力就地清剿散匪，主力转入宁静北部，歼灭扎巴喇嘛、麦巴本股匪，并负责完成该区的民主改革。

10 月 17 日，陆军第 130 师第 388 团炮营、各营机枪连、炮连和师直三个连，奉命进至 5200 高地、包底寺、区孝公一线担任堵击。团主力对盘踞苏洼卡堆、苏洼卡麦地区以八角活佛为首之叛匪实施合围，由于行动暴露，扑空，至 12 月上旬止，仅歼敌 82 人，其余叛匪就地潜藏或分散流窜于附近原始森林内，平叛部队遂展开清剿。

11 月下旬，得知国务院通缉之叛国分子贡呷喇嘛率残部偷渡怒江，窜至林呷地区，企图偷越国境。12 月 6 日黄昏，将叛匪追至一断崖绝壁上，贡呷喇嘛中弹重伤坠崖毙命，余匪被全歼。

12 月中旬，步兵第 388 团和成都军区步兵第 3 团，分别组成专案侦捕队，寻歼以国民党成都行辕少将参议、“宁三”地区叛匪主要指挥者八角喇嘛为首之股匪。至 1961 年 1 月底止，两个侦捕队先后与敌 4 次接触，共歼敌 60 余人。2 月 10 日，八角喇嘛手下仅剩 1 名亲信，且已断炊数日，被迫缴械投降。

1961 年 2 月 28 日，步兵第 388 团获悉扎巴喇嘛、麦巴本股匪 100 余人窜入吉错、牧下东南至花达、尼谷地区活动。当即调集九个连实施围剿。至 3 月 22 日，除扎巴、麦巴本两匪首率十余名亲信逃跑外，余敌 86 人被歼。

为彻底消灭漏网之扎巴、麦巴本股匪，昌指于 1961 年 4 月 1 日令第 130 师组成前指，统一指挥步兵第 388 团、成都军区步兵第 3 团（欠第 2 营）、第 126 团第 3 营，共六个营的兵力，继续对重点地区实施搜剿。

在历时八个月的宁静、三岩地区平叛作战中，第 130 师圆满第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全师歼敌 989 人（其中政治争取 680 人），缴获 60 迫击炮 1 门，各种枪 500 余枝（挺），电台一部。

八、丁指率部返川归建

丁指及陆军第 130、第 134 师胜利完成西藏平叛作战任务后，奉中央军委 1960 年 12 月 30 日电示，于 1961 年内先后返川归建。

1961 年 4 月 1 日，丁指 69 人从拉萨出发，4 月 18 日到达成都，19 日返抵重庆归建。第 134 师于 1961 年 3 月 28 日，4 月 13 日先后启运，4 月 25 日，5 月 19 日先后返川。第 130 师于 1961 年 10 月 16 日-11 月 12 日先后启运，11 月 6 日，12 月 1 日先后返川，至此，陆军第五十四军进藏参加平叛作战的部队全部归建。

关于中印边境部分地区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报告（节录）①

（**1963** 年 **12** 月 **6** 日 高等军事学院）

丁盛

学院首长要我来汇报一下，中印边境部分地区自卫反击战的一些经过。我今天汇报的东西，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系统，就按照我们做的先后经过给大家讲。一方面我本身没有什么理论，讲不好，同时，学院在座的各位同志各方面都是很高明的，我就讲讲经过，请同志们分析就可以了，你们认为那些地方对的就对，那些不对就不对，有错误的地方请问志们批评。

我们部队是在印度军队向我逼得很紧的时候开进的。因为他原来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在麦克马洪线占了九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浙江省那么大；同时在西面向我们提出了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在东线，从克节朗到察隅，又占领我们好多地方，新设了四十三个据点，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向察隅逼进。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很猖狂。我们抓到的俘虏，问他：“你们打算怎么样?“他们说：“准备进到察隅，攻占你们然乌。”他这样疯狂，很骄傲的样子. 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去年这种情况下反击他，他认为我们不敢呀！一方面在国际上看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我们作对；另一方面看到我们国内情况比较困难。他们很疯狂，向我们逼进。我们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奉了总参的命令出发了。

第一部分 地形情况，敌情，战前部队情绪，人民支前的情况

1、地形情况（略）

2、敌情（略）

3、战前部队情绪

下面介绍我们部队的情况。我们部队从朝鲜回来就到了四川，我们 1958 年回国，1959 年达赖叛乱，我们就入藏平叛去。直到 1961 年 12 月才回到四川，这就搞了整整 3 年。1962 年我们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呢？当时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生产。要自给菜呀、猪肉呀、油呀，要自给一半，任务很重。四川生产和北方不一样，地少，要生产就得开荒，分了几十个点，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都有一片荒地。东一点，西一点。部队分散生产，当时满脑子想搞个丰收，完成生产任务，搞几百万斤粮食。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对战备来讲，准备就不足。

我们部队不是个满员师，也不是一个值班师。130 师是执行生产任务。东南沿海紧张时讲一下战备，野营了一个礼拜，中印边界教育进行了的。印度打到什么地方来了，我们要准备打仗。领导这么讲了，但部队他不相信。他这样想："我们从西藏才回来，现在才几个月嘛，如果是东南沿海，怎么用的上我们呢？有的是部队，不会让我们去的。到西藏吧，我们才从西藏回来，要去嘛，也会让别的部队去呀，那有这么倒霉，又让我们去？"（大笑）他不相信，下面干部不相信，兵也这样。所以去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足。

总参谋部命令来了，就是要这个部队参加中印边界作战。任务来得很急，问我们什么时候走。我就打电话、发电报嘛，派人到山上去找部队，几十个点就这么叫吧。但是来不及动员了，回去干什么呢？准备打仗；到哪里呢？到中印边境，就这样喊。有的干部和战士还不相信，以为是紧急集合，动作很快，跑了半天了，几十里路了，他说：行了，别走啦。回到营房一看才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命令一来，汽车部队就来了，汽车从山沟里出来了嘛。一看汽车来的同时还带来很多东西，因为到中印边境作战要换装。我们在四川，穿的棉衣是薄的。到了西藏去得厚棉衣、皮大衣、皮毛、皮手套，还有 40 火箭筒、手榴弹，这么一看才相信了。（笑声）

真要打仗了。干部当时很急，接到命令，军区、军、地方的党政军民也都跟着来了，帮助部队搞动员，说你们要到中印边境去打仗，要扬国威、震军威呀，为国争光呀！这样说。当然啦，当时就是要鼓气。军区文 1 团也来了（笑声），平时来大家欢迎，现在不行，太紧啦，干部忙得不得了。首长来了讲话，他也要跟着去呀，地方来了也要去，文工团来了演戏，你不看也得去呀！很多事情处理来不及，产生干部的急躁情绪。新兵发了一大堆东西，不知道怎么捆，他不会呀！怎么捆呢，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平时在四川就一床薄被，一捆就行了，现在增加了这么一大捆，新兵没有办法，干部着急，不会做准备工作。上面来的人很多，干部就产生了急躁情绪，部队里显得忙乱，汽车来回人又走，真是又忙又乱。

虽然这样，但是部队的情绪很高，接到这个命令大家很高兴，乱是乱，还是高兴的。打仗嘛，经过这么几天的动员、换装不容易。服装和装备有些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譬如 40 火箭筒，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现在发来了不会用。手榴弹平时带的是木柄手榴弹，现在拿的是甜瓜那样的手榴弹。很多东西跟着下来了，很紧张的，这是 130 师部队是这样。其他部队呢？我们全军的高炮都去了，军队，135 师的、134 师的，还去了炮兵。虽然是去的一个师，但牵动全军。也正巧，这个时候 134 师、135 师高炮到唐山打靶，接到这个命令，你说怎么办呢？有的到了西安，有的到了河北，有的到了唐山。这种情况就打电话嘛，就说你们赶快回来，不用比啦。当时在唐山打靶比赛嘛，打靶的部队回到成都，家里生产的部队汽车送到成都，一汇合就走了。这样干部和家里没有见面，动员工作也没有做呀！从西安为什么会来，他不清楚，一道成都就发装备，很紧张。当时我们分两路走，130 师炮团坐火车，由成都做到西宁，由西宁坐汽车到拉萨，还有高炮部队坐火车，步兵坐汽车分两路走。这是高炮，他们没有和家里人见面，更谈不上和家属见面啦，他们没有时间回去就走了。

我们军指挥所更急，原来总参没有叫我们去。去年 10 月 28 日，我在 12 点左右接到电话，早起有个电报没有叫我去，只叫我们去几个人，后来我就不放心，哪也不去了，在家准备，我就打电话问总参谋部。总参的处长说：现在首长都开会去了，叫我们等着。12 点钟左右，王部长打电话来说要我们组织一个指挥所，我说谁去呀，我去吧！他说我问一下，他问了说："好！你可以去。"

我接了电话后还得传达呀！要大家走呀。28 日是个星期天，机关的同志在重庆呀。重庆虽然是个山城，小地方，也还是个大城市呢（笑声）！那天吃两顿饭，上街的啦、上百货

公司啦、看电影啦，到处都有，都走出去了。接到命令我说去，今天下午 8 点就走，我报告王部长，他说：“可以，你们走。”当时机关的同志都走了，到处去找，参谋啦、通信员啦，助理员啦。那天正巧，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总参谋长到重庆，要我们去接，我们派了一个人去飞机场。当时就乱了，收回来后，家里的通知把东西都领好了，拿了东西就上汽车到火车站。就这样有的 3 小时、有的 2 小时、有的 1 小时，有的就没有时间，反正早晚不齐地到了火车站。

到了车站买票来不及，不让上，火车是有规矩的，什么票呀，很多规矩的呀。我们这时候来不及了呀，不能买。东西往上一撂就上，车站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吵。吵也得上，不上来不及了呀！上去以后再道歉吧，我们说：“你看我们这个样子是有任务的呀！平时我们可以守规矩！”车长说：“有任务也不行呀！”我们说：“不行火车开了呀，到明天差一天，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呀，你不给我们坐，我们站着也可以，反正得让我们走！”以后车长说行呀，道个谦就解决了。这样很急很紧的，军指挥所接到命令就几个小时。所以接到命令六个小时开动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次我们很仓卒，从军到连队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出动一万多人，这次走没有发现开小差的。这个在我们当时是很担心的，因为在东南沿海紧张时，总部发了一个通报说 1 师最好，走得快，没有开小差的，我们当时还差一些，很担心。首先考虑的是，不要有开小差的呀！开小差多难看（笑声）。这是第一条怕开小差的，第二西藏的路我们很熟，就怕翻车。路太险，从雅安出发到二郎山、雀儿山、卡集拉非常之险。翻车不得了，翻 1 辆车就是一个排，司机压力很大，就怕翻车。所以我们就千方百计不叫部队开小差，叫谁去谁就去。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经过动员以后，要去的人是很多的，因为机关没全部去，要留下一些看后方的。有些处呀很多人想去，哭鼻子的呀，写决心书的呀，这是很多的，情绪是很好的。

这些战士，我们认为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是毛泽东西乡教育的结果，是我们军队的代表，当时的情绪就是这样。当时的家属，因为我们部队没有专门的营房，家属和部队隔得不远。家属这次变现也不错，部队要出发，在队的家属帮助连队，帮助丈夫缝些东西，洗衣服，补袜子。部队出发，她们送郎上前线。这次上下都表现的很好。我们部队保卫祖国，杀敌立功这个思想非常低明确，决心也很硬。当时部队情绪是这样，没有开小差的，走的很顺利。

同时，在路上我们坐人的汽车没有翻车的，这个很不容易。因为这次路上赶，开始按 6 小时行军，一天走两站，后来总参来电报说不行，他不管我们走多远啦，要我们必须在什么时候赶到。这下怎么办呢？我们就加班了嘛，白天黑夜都走。司机呀，十分好，我说中国的汽车司机呀，世界上没有比的。勇敢，技术好。那样的路呀，别的司机不要说开车，就是坐车也要害怕。所以我们的司机非常好，坐人的汽车没有翻车的，拉物资的车翻了几台，这个就影响不太大了，所以走的也很顺利。这样走，走多远呢？坐车坐的最久的坐了 11 天。我们从重庆出发，坐小车走了 6 天，就这样急。

我刚讲了，我们 28 日下午 8 点在重庆坐火车到了成都，成都首长和机关，给我们交代一下，你们好好地完成任务呀！交代一番，鼓励一番（笑声），以后又要干杯欢送我们呀，耽误了时间，10 月 28 日下午 3 时在成都出发，11 月 6 日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察隅。我从察隅骑马又走了 3 天。骑马在我过去来讲，是不在话下。这个时候不行啦，很久没有骑，下来腿都硬了。

部队下了汽车，运输力量没有赶上，前面没有东西，都靠自己带，什么东西都要带。我们的战士，新兵很多，新兵十八、九岁的，十七、八岁的，有些体格好些，有些体格差些，老兵当然好些。他们没离过四川呀，一走走这么远，走了 2000 多公里。坐汽车坐得迷迷糊

糊，一下车就背东西。一般在 60 斤左右，小战士身体差些，50 斤。炮兵 70 斤，这是很不容易的。那里也没有什么人家，天亮就走嘛，走到天黑就宿营，这很简单，什么房子都没有，不要分，就这么住就行了，分也没房子（笑声）。可是这样走，这样苦战士没有怨言。

这次我们专门在警卫连挑了八个学生兵，考验他们一下，看能不能打仗、能不能吃苦，我们有意识地考验一下。我们往前走，他也是压得那样重呀、累呀，我说："你们休息一下吧，"他们不休息。所以四川人，不要看个子小，但很能吃苦，勇敢（笑声和掌声）！过去我们的印象是学生一不能吃苦，二不能打仗，这次看呢，他们能吃苦又能打仗。现在部队学生很多的呀，连队里每个班有几个，还有高中生，也有少数大学生。现在部队里文化娱乐活动很活跃。因为他们有文化，打仗也能行，给我们改变了一种观念，当然有很多因素、很多条件，这个等一会再介绍啦。

当时这个部队这样苦，这样累，背这么多东西，连续地走，有的走了 4 天、有的走了 5 天，连续走，不能停，要爬那样高的山呀。我们没有练过这样的兵，马上进行练兵爬山，连连续续地往上爬。当时 40 火箭筒也没有用过呀，没有见过呀，搞来之后就学，打火箭筒，甩手榴弹，就和打仗一样的打，枪也打、炮也打，就这样练呀。因为前面有部队，打起来了没有关系，我们有部队打上了嘛。前面打仗，后面就练兵，非常紧张。

在练的过程中，因为前面只能带主食，副食很少。这样，战士一天一斤半粮食就不够吃，这真叫"吃干饭"呀。一点也不假，没有别的吃，就是吃干饭呀。（笑声）没有盐，菜也没有，以后吃干饭也没有吃了，就持稀饭，多吃点行不行？不行。因为当时就带了这么多，并不是供给标准的问题，当时在准备阶段你多吃了一点，以后就没有吃的了，一天的粮食只能一天吃，不能把两天的合着一天吃，那样要吃亏。不够吃，就喝稀饭，当时就是这样。虽然这样，大家情绪很好，问他们："怎么样"，"不怕！"情绪好。从动身到坐汽车，行军背东西，战场上临时练兵的过程中，没有自伤的，过去我们有自伤的呀！这次没有。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排长，那个人不行，那个排长开小差了没有呢，没有。但他不肯去，什么原因呢？他在雅安找了个女的，这个女的马马虎虎，不怎么好，组织上没有批准，他就和她睡觉。这个女的是个落后分子，拉了他的后腿。所以这个排长不肯去，到了前面，他提了九个条件，说我牺牲了怎么办，提了九个条件。当时我说：这个排长不能去，到后面背炮弹，回去后要开除党籍。他不能当干部，不要他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找老婆要有经验，找个好老婆（大笑）。不然，打仗她拉后腿一点都不假。这次整个上下左右反应都不错的，老婆思想上很进步，鼓励丈夫上前线。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我们战士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无限忠诚，我们保卫祖国、包围边疆，为毛主席争光，扬国威、壮军威呀，当时情绪非常高，部队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4、人民支前的情况（略）

第二部分 决心部署及战斗经过

我们决心部署。我们到了察隅，总参来电报。因为我在昌都就给总参和前面部队发了个报，说我们到察隅要开作战会议。总参批准了，6 日下午到察隅后，又报告总参，说我们到察隅了。本来那天我想休息一下，第二天再来开会。可是，下午六、七点钟，就来个电报说

要报告决心。要报告决心的电报来了呀，就算了吧，今天晚上不休息了吧，就开会！当时从我个人和指挥所来讲，确实感到抓瞎。一个是对前线情况不了解，干部才到，我们也才到，我们本身疲劳的不得了，从重庆坐火车到察隅走了八天，那是白天休息不好，晚上也休息不好呀！走路非常疲劳，骑马两天，腰酸腿痛的。但是，报告决心就必须开会，总参的电报给大家看了，大家说吧，今晚不休息了，怎么办？开会吧。

开会当然要解决几个问题，我们不是学术机关，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大懂的，你们看行不行。到了那里，部队的情况是，后卫团到了公路终点，我们的主攻团 388 团喝稀饭，饭不够吃。刚才讲了，我们通信这套东西没有，在重庆出发时，总参说你们可以不带电台，到成都又说要带，要带也跟不上。我们是坐小车，他是坐打车，那个电台车跟不上，机要人员也跟不上，就很难。当是我们要报告决心，我们要报告这样几件事情，这个决心讨论了很久。

一个问题呢，首先是解决一个主要方向的选择，看看对不对呀？这是一条线。敌人是这样防御的：据了解从东面迂回过不去，总参有规定，察隅河以东 15 公里的山呢，就不能去了。因为过那边就是缅甸了，不能去。西面呢，我们派了个部队去侦察呢，也过不去，是雪山。那怎么办呢？大的迂回不行，主突方向选在什么地方好？战场分割、派一个部队去后方进行分割。那时这么个决心不好下呀！我又没有到前面，敌我双方对峙的地方，我不是说我骑马走了三天嘛，还有几十公里嘛，同时，他们告诉我们：正面当时没有迂回路，过不去。这个情况在克节朗地区俘虏一个少校营长，这个营长他在瓦弄设防，说当时印军的战术指挥部，在家隅以东，在敌能那个地方，这个问题就是麻烦了呀。因为指挥部在那里嘛，敌人主力又在那里嘛，当时我们讨论，根据我们部队在前面对峙的情况，根据地形情况，敌人的具体部署完全是靠判断的。

这个主突方向根据：“主突方向要选在敌人的要害。薄弱的地方，要害的地方，不注意的地方，对我发展有利的地方，对我炮兵能发扬火力的地方。”好多条件呀，这些条件怎么办呢？选在哪里好呢？过去毛主席的书还是经常看的，决定主突方向，大家讨论了半天，结果，最后判断，敌人的主力在察隅河以西，敌人的旅部指挥所在飞机场，他的第一线部队估计两个营，还加上一些阿隆姆的地方部队，旅部控制呢，一个多营、两个营，只能这样判断。这个估计大家一致了，那么根据敌人的主力在察隅河以西，前沿在曲子扎公 05、06 高地，这么一线和瓦弄扎公河这个边边上，敌人是一个营，察隅以东敌人正面是一个连和一些地方部队，敌人展开不到两个营，他的第二梯队两个营或两个多营。


【圖49】1962年11月，與丁指其他成員抵達西藏瓦弄北之航堆後山，在戰役前觀看地形並布置戰鬥。左二起丁盛、藍亦農、韋統泰。

根据这样的判断和地形，我主突方向大家一致意见，选在 05、06、07、38、37 高地那面下去，从那个山梁那样下去，一下去就到了瓦弄，以后到了格里，这样就把敌人的道路切断了。那么我们主力呢？一点由瓦弄以南向北打，关门打狗，这个意见大家一致了，这是解决一个主突方向的问题了。

再一个是解决兵力使用，这个也有争论。当时

对峙的部队是 153 团，有一种意见就想让 130 师全部由西面，就是 05、06 这面全部打下去，集中绝对优势了。估计敌人三个营在这边，我们集中三个团打他，可以歼灭他。当时我们的团只有 388 团是个大团，那两个团都是小团，六个步兵连这样的小团，还是可以消灭他的。这是一种意见，那么这样把分区部队调到河东。另外一种意见就不同意，因为分区部队在这里熟，他对峙这么久了，敌情地形他们都熟，调他们还要时间。就这么两个意见。当然当时两个都有利弊呀！假如，130 师全部字啊这边，当然在指挥上讲方便，这样拳头更硬一点，不利的地方就是部队调动一下很不利的。经过研究，利弊对比嘛，同时分区的同志不同意，他说，这个任务我包下来，不要以为我们这个独立团不行呀！我们包打下来，

当时我们很为难呀！因为我们从四川去，情况不大了解，部队是两个建制。当时考虑，好吧，把 130 师分开，一简编团到河东，实际上一个步兵团，就是四个步兵连、两个机炮连到河东去。他这个团一个营就是两个连，一个机炮连，作为我这儿总预备队。这次打仗很可怜，我们是一线展开，我们没有部队呀，有的同志提议，给总参发个报，再叫我们部队来一个团。我说：我们对总参的意图不了解情况，你随便给总参谋部发报，怎么行呢？这个不行。结果我说，没有预备队不要紧，我要我们所有的部队，如修路的呀，还有复员了的有几百个人，工兵营（我们去了两个工兵营），高炮营。我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要准备作战，准备和他硬拼，因为我在重庆走的时候，总参的首长给我讲：就是要和他死打硬拼，自己部队伤亡大一点都不要紧，非消灭敌人不可。我说行呀，硬拼还可以，就和他硬拼吧。这样就要所有的部队都准备打仗，就解决了一个部队使用的利弊问题。你们看行不行？我这个人的学术水平很低，我还是我们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我是勉强 3 分的学生，不行的呀！

当主攻部队解决了，就是两个团：388 团、390 团，两个团并肩往下打。390 团在 07、38、39 高地那面打下去，388 图啊今年一个营在后面跟进，两个营在瓦弄、扎公打下去，一直向南打。那边的主力向北打，为什么不讲 388 团向 07 那里打下去呢？因为我们这个瓦弄战役是逐步形成的。总参第一个电报是叫 130 师在那个方向作战的，390 团到瓦弄，388 团和师部呢，向西面走，另外一条路，390 团先开到那里去了。当时调不过来，这样就确定不要调，因为很紧急呀，来回时间不行。388 团太仓卒，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从炮兵来讲，这次最大的炮是 120 追击炮，最小的炮是 410 火箭筒，还有 60 炮、57 和 75 无后坐力炮，因为那路没有办法。我们抬两门 120 炮就用了两个步兵连，一个步兵连抬一门炮，那个路不好走。炮兵群按学术上讲呢，就没有资格叫炮兵群。炮兵群就支持曲子扎公，当时的兵力兵器使用就是这样，这个大家是一致的。整个来讲当时的决心是定下来了。问题不大，战术思想是一致的，以后我来讲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攻击的问题。因为你要向上报告决心嘛。什么时候打呢？总参谋部规定 11 月 7 日。我们还在开会，要报告决心，你们什么时候打呢很难。当时考虑的是：一个，我们的部队还没有上去，后卫团还在公路终点，正在迅速向前开进。两个问题是没有粮食、炮弹，民工还没有上来。我们就计算，民工到了公路终点，背上炮弹、粮食到作战地区，走也要走 4 天，有的 5 天。部队还要整顿一下，当时我们考虑 14 日准备完毕，总参规定 7 日，我们加了一个礼拜，大家说好，就 14 日吧，想总参报告。当时这个问题还可以，紧是紧还可以的，这是解决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呢，就是要解决乱摊子的后勤。山地作战，我们军是没有后勤，现在这个后勤就那么一个部长，几个处长，不能担任这个任务，也没有去，就去了一个战勤处副处长。当时有分区的、独立团的、130 师的，要统一起来，组织统一的后勤指挥机关。我们军的副政委、西藏军区的副政委、昌都分区的副司令员，他们三个组织起来。把 130 师的后勤调上来，统一供应。组织统一机关，统一供应、统一运输，因为那个地方，分区呀独立团呀，他都有

骡马运输，不统一就不行。没有这样一个临时的机构呀，没有这样的负责干部指挥，当时后勤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向下下命令，不管你是什么人，干部也好，汽车司机也好，在这里休息的也好，不准你在帐篷里休息，没有这样负责的指挥官是指挥部不动的。就下命令，没有很多道理。因为前面部队没有饭吃，要打仗没有炮弹，你休息是不行的。那个时候，一方面要做些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要做组织工作，这个问题当时解决了，这是后勤。


【圖50】1962年12月，瓦弄殲敵後丁盛(前右二)在西藏吉公聽取130師的戰評。

再一个是通信联络。因为我没有通信工具呀，我们司令部一共去了几个人，去了几个作战处长，作战、侦察、通信去了几个参谋，电台没有跟上。怎么办呢？把分区的、130 师的都归我用。他们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行，我没有这个不能干呀，你们能打呀。把 3 这个组织起来，当时有个好处，就是有个大电台可直接向北京发报，500 瓦的大电台。

还有一个修路，我去的时候，总部首长也说：你们要拼命修路，修不了大路修小路也行。不管骡马路、人行路，就往前修。成立了修路指挥所，我说：你们修路不管白天黑夜，就往前抢修。


【圖51】1962年12月，與丁指其他成員在西藏吉公聽取130師戰評後與指戰員留影。後排左三起丁盛、韋統泰、鍾池、霍烈民、藍亦農。

当时在那里就解决了这么几个问题：主要方向问题、兵力兵器使用问题、供应问题，工程保障问题和通信联络问题这么五个问题。协同动作没有，因为炮兵没有到，没法协同。这样开了一夜，第二天开了一个上午，这样决心就下啦，向上报告，总参批准了这个决心。你们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因为我不大清楚。我们这个是简单的，不是大规模的，没有炮兵，没有航空兵，没有装甲兵，没有坦克，有什么就用什么，没有就不说了。我们就是这么个决心。展开嘛，我们部队就是一线展开，我们在瓦弄地区呢，总预备队五个连。刚才讲的 389 团两个连、分区的一个独立营（三个连）。其他一线展开，这是在察隅的决心就是这样。

开了会之后，我在那里还呆了 2 天，还有些事呀。我们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下去了，到前面去了。以后大概是 11 月 11 日吧，我记不清楚了，就往前走。往前走了 3 天，14 日到了航堆，到了我们指挥所。因为指挥所已经开设好了，电话什么东西都搞好了，一去就能工作。我 14 日道德时候，敌人向我们攻击的很厉害。我就判断啦，敌人为什么攻击这么厉害，是不是敌人想打通这条山梁呢？当时，一个怕敌人打通这条山梁，就是打通 05、06、07 高地这条山梁。怕把我们部队打下来了，那时就很麻烦了，就不得了。再夺回来这个阵地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第二，即使他打不下来，敌人向我们攻击，就可能使我们由进攻转为防御、由主动转为被动，敌人由防御转为进攻。我当时很害怕这个问题。因为

当时上级通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什么峰，现在看来是 07 高地。还说敌人在那个山上一天要空投 500 加仑水、1000 多斤干粮。我们判断，这个山上有一个营以上的兵力。上级通报敌人还可能空降一个营下来。当时我就有点害怕了，哎呀！这个家伙，敌人要破坏我们的进攻。

我们在南京学习时讲：我们可以破坏敌人的进攻，敌人也可以破坏我们的进攻。这个从理论上讲是有的呢，在实战讲也是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5 日在航堆开会，把师的、分区的叫来开会，把这个情况讲一下。同时讲：敌人出来了更好，他没有工事，我们更好打他。大家讨论了半天还有团长参加。当时所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部队能不能上得去。当时 390 团正在开进，到了 05 高地半山上。388 团团长已经到了我们指挥所，部队在 12 点可以到航堆，准备午饭。大家就讨论来不来得及。

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 15 日晚上打，上去就打；第二种意见是 16 日晚上打。当时我考虑，15 日来不及，晚上不行。我们就怕敌人 16 日向我们进攻，我说，我们 16 日下午 3 时向敌人攻击，这样他破坏我，我破坏他。就这样想的呀。大家说对呀，就怕敌人 16 日向我们攻击。14 日敌人攻击一天没有成功，我们 4 连到他 07 高地很近了呀，还有千把公尺。15 日一天没有向我们攻击，16 日向我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大呀。我 16 日向他攻击，这样我还是主动呀，大家同意了。


【圖52】1962年12月，撤離西藏前與丁指部分成員留影。左十為丁盛。

结果 16 日拂晓的实际情况是，390 团是在 16 日 4 时 40 分向敌人攻击的；388 团是在开进的时候耽误了时间，一个是北京来了个拍电影的，部队开进呢，他要拍电影，拍电影就要耽误时间。第二师干部走了，团长、营长都走了，到前面去了，连长、班长也都走了。干部不在，晚上路又不好走，组织得又不好。在前面不知谁写了一个牌子说：注意这是炮火封锁区，那个可实在害人啦。又不知道是谁下了个命令，说疏散距离，一个人多少公尺。这样一拉，距离就长了呀。388 团就没有在拂晓前到达 05 高地，到上午 10 点钟才到了，这样开进就花了十六个小时。就那么一点距离，按直线距离讲就 3000 公尺，搞了十六个小时，还累得要死。

对这个问题，当时我估计不足。我问 390 团团长，你们能不能上去？他说没有问题！结果有个问题。所以这次给我的教训很深呀，作战就不要随便问下边，那个时候他还说有问题呀？作战他是不会说这些的。我们指挥员是要慎重考虑的，可不敢轻易问人家，问这是有害的。攻击的时间就是这样。从事后来看呢，当时不要提前，还是按 18 日攻击做好啦。提前是不对的。你们看从实战来说，在理论上来说，怎么说好呢？我说不要提前，17 日拂晓也可以，这样就不会那么仓促了，部队累得要命。天亮了呀，师、团就着急，喊：快上来呀！拉得拉呀！推得推呀！上去的战士晕头转向，气都喘不过来，放下背包就向敌人攻击。这个情况我们没有预计到。

（录音不清）可以理解的呀。我说："我这个有错误的呀。"他说："错误不一定有错误，你这个想法我可以理解。"可是理解这个意思嘛，当时没有责备我，不过错误还是错误，我是这样理解的。在学术上讲，怎么讲好，我说不应该提前，我们可以做这个准备。部队上去了，可以做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敌人不进攻，我们往前摸。原来我们规定 390 团 16 日拂晓前上去后，16 日、17 日往前摸，直往前走。敌人没有发现呢，你就直往前走，不准打枪，大炮，实行渗透。到了跟前啦，敌人发现你了，你再打他。要是按这么做法，那么这次瓦弄可以全歼敌人，部队也不会这样累，也不会这样仓促；如果敌人向我们攻击，我们部队上去了怕什么呢？攻你就攻嘛。加入当时有这么两步就好了，当时没有这样想呀！以后回忆一下，哎呀！这个人好笨呀。所以当时作战的人不是那么聪明的。我本来就不怎么灵活，那个时候脑子死了，有什么办法，就死啃一条，敌人会破坏我们的进攻。假如说我有两个方案，敌人破坏进攻我就攻，由防御转入进攻嘛，没关系，那就好喽！当时这个弯转不过来。

当时我们发电报报北京。那天总长讲："你的电报来晚了呀，我怎么办呢，说停止你的进攻，恐怕来不及；不停止，感到你这个太仓促，算了吧！你们在前面嘛，你们了解情况，就按你们的办吧。"当时总长处置这个情况是很客观的，是完全符合主席和林总的思想的。前线的指挥官嘛，别人在北京当然了解情况就差一些嘛。这是决心变动呀，下面就忙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变了，所以必须很好的考虑，不要轻易变动决心。这是变动这个决心的来源和当时的后果。

我们的攻击为什么没有按原来规定的攻下去呢？原来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由 07、38、39 高地那样下去。这个方案不行，敌人堵住了。第二个方案是从中央插下去，打的结果是按第二个方案打的。一个是 130 师参谋长和 390 团团长到 06 高地后，他们判断错了。站在山上，哪里是瓦弄、哪一条山梁是 38、39 高地判断不出来，这一手是很害人的呀。这个判断地形，我们到山上看，你不要看小了，这个问题很大。他以判断错了，就把部队使用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把 390 团、388 团的部队，统一由 06 高地那边下去的，一直到沟里去了。按我们原来的部署就两回事情了呀。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就形成了正面往下推，不能切断敌人的退路，不能达成包围后攻击，完全不行了，这是一个错误判断。

第二，07 高地，你们看了沙盘，也讲了 390 团 2 营的这个打法，这个打法本身是错误的。我原来预定打 07 高地，我们用两个营去打它，用了多少时间呢？我当时预定这个地方就个把小时打下来，因为拂晓之前就去摸它嘛，我们还是很有把握的嘛。摸上去，一阵手榴弹、刺刀就把它打垮了，占领阵地。我说也可以歼灭它，也可以打垮它。直插下去，路上什么东西都不能要，俘虏也好、东西也好，什么都不要管，直下去。结果呢，3 营打了一天都没有打下来，16 日整整一个白天 07 高地没有解决，黄昏的时候敌人逃下去了，逃跑了。当然最后还是被我们歼灭了，营长也被恶魔俘虏，是库马盎的这个部队。如果它能按时打下来，那我们这个部队开下去就快。没有打下来，就使得部队不能往下运动。所以就没有按我们预想的地一个方案打，是这样原因。为什么 07 高地没有打下来呢？是不是敌人强呢？我们弱吗？不实的。我们打 07 高地起码有 3 条错误：第一条，我们选攻击点的时候不应该在正面打，应当是从 07 高地左翼钻过去，从我们 6 连 2 排那面打上去就成了，这是攻击点的选择；第二呢，兵力使用有错，不仅是 6 连它正面是两个排，它整个的 3 营部队都是从正面上去的，这是第二条错误。

第一梯队攻不上去，第二梯队又去攻击。第二梯队攻不上去，第三梯队又去攻。你说他这像什么呢？好像飞蛾扑火一样，一扑就烧了吧？翼也烧掉了吧？我们这一攻呢，就是犯了这个错误。第 6 连没有攻上去，他打得很英勇呀！6 连没有攻上去，9 连又去。9 连它是怎样去的呢？9 连去并不是当时指挥 07 高地的 390 团团长（现在我们军里当处长）、营长调

上去的，而是 9 连一个排，就那么往前走，糊里糊涂上去的，上去呢就打上了。那两个排也是这样，指挥员带一个排往上走的时候呢，因为在夜间打上去，敌人散了一部分，前进过程中碰到一部分伞兵，向我们这个排打枪，指导员停下来不走了，就在那里打。他说你敌人要反击，我们要顶住它，不让它上来。指导员在那里不动了，这样第二梯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方向不对，使用上不对，这是第二条错误。你不应当这样嘛，应当是这个时候团、营研究一下，前面 6 连没有打上去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连怎么打，从哪里上去呢？没有研究就那样糊涂上去的，这叫做糊涂战。

第三呢？还有 4 个连在指挥官手里，他不用了，因为当时没有当上去，9 连没有打上去，他这个时候害怕了。他说这个 4 个连我不用了，再不能攻击了，再攻不下来，敌人打下来，我这个阵地丢了，我非要杀头。结果他把 4 连当成防御，唯一的想法就是敌人不打下来，我占住这一点就行了。指挥员这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想法，不顽强。这时候到了下午，我们 6 连 2 排，他们不是切断了库马盎、道格拉的退路吗？歼灭了它的营长了嘛。这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排在这个山垭口的地方，拿一个连完全可以打上去的。但当时指挥是有错误的，所以形成 07 高地没有打下来。

我们这个部队，对主席的思想及一点两面的思想领会不深。从我们军、师、团、营、连都存在不少问题，不是一点问题，而是还有很多问题。所以从翼侧打不容易，可是我们所有的指挥员不敢这样用。这是很要紧的。所以 07 高地没有打下来，这是很错误的。是战术思想的错误，思想上的错误，手段上也就有了错误。

说起来笑话，各位同志你们都是有学术水平的，也很有经验的。就是没有经验的人，也知道夜间战斗就是要肃静，尽量接近敌人，到跟前甩手榴弹、拼刺刀，这是一般的常识。我们这次出洋相，他打 07 高地先来个炮火准备，你看糟糕不糟糕，机关枪、迫击炮胡打一顿。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就批评了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要摸上去，不准打枪打炮，你用刺刀和手榴弹消灭敌人。我们下面指挥官也不同意，要打枪打炮搞炮火准备，我说你搞炮说准备不行。第一条，你们没有炮弹；第二条，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第三条，距离多远？炮兵在运动过程，你怎么知道。

他们和我争论，我说不行，要给你下命令。最后他们怎么讲呢，他说作为学术问题和你研究行不行呢？我说不行。结果真是搞炮火准备了，这个我是很明确。这个打仗可是硬功夫呀，吓唬可是不行的，谁也不怕谁，吓唬个什么？都有枪炮，这个不是演戏，不是马马虎虎的，你打枪打炮有什么用处，你这是吓唬战术。我们指挥官就是这样糊涂呀，就这么打了呀。团政委也讲了呀：军长讲不允许打枪打炮呀。他讲了这么一句，但是他没有禁止。所以，要政治干部学习军事常识是很要紧的。

我们现在介绍 06 高地的人，是个指导员，他还有点军事常识，他知道四快一慢呀，知道一点两面。我们个团政委呢？就讲了这么一句，多糟糕呀。这个时候打炮有打不上，把我们整个企图暴露了。那样大的原始森林，炮弹打不出去，打到树上，你怎么能达到人呢？白白浪费炮弹。我说这是吓唬战术，又没有吓倒人家，这是手段上的错误。看这个问题学术上怎样来研究。我认为是一个错误，你们认为是什么问题？

第三，从事后看来，当时我们如果把 07 高地不打，从翼侧绕过去，从 6 连 2 排那边过去，这是上策。这是我们的错误。那样钻过去，把敌人这个营撇开，管你一个营也好，两个营也好，都不要管。从翼侧绕过去直插瓦弄。那样上午 10 点以前也可能到达瓦弄，也可能把那个旅长抓住。搞好了呢，也可能当时考尔和他那个师长下了飞机，我们下去了，可能抓住他，来个奇迹。中央发报说：要把他抓住。当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可惜没有抓住呀！你想是一回事，行动又是一回事呀！没有这样行动。所以打这个 07 高地的决心，整个瓦弄的

决心，我认为犯了这么几个错误。

所以这个决心部署，一个大的决心下了，小的决心要围绕整个战役部署。每个连队、每个营都要这样实施，这样才能完成整个战役企图。底下没有这样完成，当然你这个战役就不行。林总讲：你前一个人打不上去，后面 1 万人也进不去呀。我们也有这个情况，前面一个连进不去，后面的部队干等着呢。这是决心变动。07 高地有这么几个问题，就是没有按计划打，就是这么多原因。

那么按计划可不可以呢？还是可以的。第二方案是不错的。按第二方案打好了，还是可以提早到瓦弄。就按他们判断错了，390 团 1 营是 16 日 3 点钟由 06 高地向下运动的，拂晓就离 32 高地不远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个副团长，他带着电台，结果呢和师没有联系上，和军也没有联系上，他从 8 点钟到 12 点钟，在那个沟里停了 4 至 5 个小时没有动。这一等要命，这是错误的。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副团长和营的干部为什么不动呢？什么原因呢？我们问他，他说：下沟里去了。原来是个山梁，现在怎么到了沟里了呢？这边打、那边也打，两边都听到哗哗的打，他在沟里害怕了。

这个我给罗总长报告了，我说我们这个干部害怕了。总长说：“这个也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我说这个不行，要受处分。总长说：“处分就不要了，这件事他是不对的，害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地形不熟，敌情也不了解，这个问题还得这样看。”罗总长对我们是原谅的态度。他们在那里停到 12 点钟，这个地方直插瓦弄需要多少时间呢？需 3 至 4 小时。就是说，他拂晓到了这个地方，不要停，直插瓦弄，16 日 12 点钟可以到达瓦弄。他要是 12 点钟到达瓦弄，敌人的旅长也是跑不了的，整个瓦弄的敌勤杂人员都是跑不了的。地炮兵分队、空降分、工兵分队都跑掉了，同时敌锡克营长带着一个连跑了。跑了这么多人，如果他能在 12 点钟赶到，这些敌人就跑不了。当时没有这样办，这是一条错误。

到了 12 点钟，团长到了、师参谋长到了，这是才知道这个营在沟里面。12 点钟前这个营到哪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急得不得了。说哎呀！一个营没有下落，这个营到哪里去了，找不到呀。他们到了这才打电话回来，说找到了，他在沟里边。这时候，这个参谋长和团长应当不顾一切地跑下去。而且这个时候 388 团 1 营到了这个沟里边，它是跑步下去的。它从 05 高地跑到这里一个多小时，它说插错了要返回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要返回来，我就枪毙你们。我说你们直打下去，结果下去了。战场上返回去是不行的呀，你就下呀，直向瓦弄方向打就行了，别的什么也不顾。如果再返回来，那草鞋都捡不到一双，敌人都跑光了。

它前进吧，到了 32 高地，390 团 5 连当时归这个营指挥，5 连发现我们前进的右面有人打枪，按道理讲，穿插的部队在前进的过程，只要我们这个部队能运动过去，就应当不管两面的情况，什么都不顾，直插指定的位置。当时我们的指挥官糊涂，说：32 高地发现敌人，把这个 5 连拉下去了，又一个错误。这样一用上去，部队一展开，你再撤下来，来不及。按道理讲，你把 5 连用上去了，应该调整别的一个连呀！把 1、2 连继续向前走才对呀！停下来这样又误了时间。所以这个穿插部队，很不容易的，又很重要。

停下来结果是什么时候才走呢？2 点半钟，32 高地的 5 连才撤下一部分，跑步前进。到 16 日下午 5 点钟左右才到达瓦弄，你看这个时间相差多少，相差五个小时。那么敌人旅长是什么时候跑的呢？是在看到我们 388 团 1 营占了瓦弄扎公之后。他一看大势已去，下命令全线撤退，当时当然他退不下去了呀，我们黏住他了，敌旅长是 16 日 13 点跑的。我们 12 点到，他就跑不了。那个很简单，那个直升飞机好打得很，直升飞机最怕机关枪，你一架上去，就把它打下来，跑不了。这个营没有下去，我们认为营、团、师都有错误，没有迅速下去。

所以，打仗穿插部队应是很强的部队，指挥员要胆大心细，那种迷迷糊糊的指挥员是不行的，我们那个副团长是个迷糊，平时说话眼睛都睁不开，我这个人说话有时带点形象，我说这个人不行，厉害一点才行嘛。一个指挥官像个姑娘那样怎么行呢？回去一汇报，军区批评我，说你这个人使用干部有点问题呀，我也没有什么说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嘛。本来这个穿插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是搞过的，我亲自穿插过的。当时我有个什么错误呢？穿插前我到过这个部队，但在穿插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没有详细给他讲，而是按一般的情况给他讲的，穿插要注意什么呢？不要怕有敌人，不要怕切断归路，不要发洋财，死要记住。规定什么时候到那里，路上有什么金银财宝都不能要的，没有交代。

当时我也糊涂，什么原因呢？打仗好久不打，忘了。这个经验我确实有，可就是没有交代呀，就是忘了呀。回来以后，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想一想，检讨一下才想起啊，我自己没有交代呀。你完全怪他们也不行，我们也有责任呀，因为我到了这些部队嘛。所有穿插部队班长以上的干部，我都讲了话，偏偏没有交代这个穿插，所以不能全怪他们。我这个组织战斗的也有错误，如果交代清楚注意事项，不要多，就这么几句话，也可以提醒他，所以久了就忘了。战斗经验，自己也忘了，给人家讲什么呢？这次打仗下来想起来了，这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穿插部队有错误，从我本身其没有交代清楚。当然担任穿插的指挥官呢？迷糊！这个部队有战斗经验、勇敢，你说他不勇敢吗？他到前面去了呀。这是两个方案，我们都有错，我也有错误。

当然我也想打好，没有打好，什么原因呢？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电报的指示、元帅的指示办，这次作战完全没有问题。元帅给我们来了电报，军委来电报怎么样办都交代得很具体，在这里我是不能讲的。我们要这样来办呢，就一定能打胜仗，没有这样办呀。所以好久没有打仗呢，这个脑子里很多东西想不到，弯子也转不过来。过去的经验忘了，上面的指示转不过弯来，接受不了。所以这样很简单的，从我起到师、团、营各级，这次指挥都很简单。情况想得简单、交代部队的情况简单、困难的情况想得太少，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教训忘了。讲经验教训部分，再给你们将这些问题。

当时整个组织战斗，在时间上太仓卒违背了主席思想，应当准备好了再打。其实这次总参谋部也没有催，实际上是我们急躁的，是心急的指挥员。嘿，我这次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林总在哈尔滨讲四快一慢问题，我也参加了的呀，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提前攻击是不对的。如果不提前攻击，那么各级指挥员他在山上多呆 1 天，平心静气可能好一些。总的来讲，是我组织这次战役掌握主席的思想、运用主席思想来指挥这次瓦弄反击战掌握得不好。大家看这些是什么问题呀？我也不知道是属于哪方面的问题，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就这么和你们讲了。

部队打得怎样呢？部队是不是打得不勇敢呢？不是的，部队打得非常勇敢。大家看了沙盘，有些例子我可以在这里讲一讲。部队是英勇顽强的，按着我们部队的传统来讲呢？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这次我们很多轻伤没有报告。问他为什么不报告呢？他们说："当时报告也没有用呀，报告你们嘛，你们首长又担心，所以我们反正能作战，我们就往前打就是了。"后来有的战士从前面抬下来，伤都化脓了，就不行了呀，轻伤不报告这不是个别的。重伤不哭、不叫喊，做到了不仅是不哭，而且还坚守阵地，这不容易。

32 高地那个陈代富，他是很英勇的。这个同志现在国防部下了命令啦，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的称号。这个班刚才给你们介绍过了，他们班有 1 挺机枪嘛，班里有的负伤、有的牺牲了，这时只剩下班长和他两个。当时他要求上呀，班长同意了，他在运动过程中用了一个手榴弹，敌人也甩来一个手榴弹，陈代富负伤三处，屁股一处，腿上一处，手上一处，我看了一下，怕报假的，当时他继续前进，拿个爆破筒和敌人打。我们不了解敌人，敌人也不了

解我们，不摸底，双方不摸底。

印度人做工事不行，他们不会做工事，他们的工事做这样宽，射孔也做这么大，那个是没有道理的呀，他们在里面可以睡觉，也可以打枪。顶上呢？他们又不捆好，因为那里树有的是，马马虎虎。有的工事就这么树条子放上就行了，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攻坚战，他们不摸底。第二，我们使的武器他们不知道，我们使用的爆破筒，敌人没有使用过这个东西。我们的战士拿着爆破筒很勇敢、很灵活，前面去不行，绕到后面去、跳上去。因为他们的射孔是向下和半山腰的，后面没有。陈代富跳到地堡上，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查下去，他当时受了伤，印度军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看到个东西这么粗往下插，印度兵就往上顶，他再上面压，压下去一拉，轰隆一声响，他就滚了下来。假如印度军队打 1 枪就行了嘛，但他们也糊涂了，陈代富往下顶，他们打 1 枪就行了嘛。爆破筒能塞下来，你子弹还打不上去呀，结果炸掉了，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周承华，看到他们班里攻到这个地方攻不上去，怎么办呢？因为地形山梁很陡、很窄，只有几公尺，上不去了，这个战士就对指导员讲："指导员，你用机关枪掩护我，我从旁边上去，你们从右边上去，我打手榴弹、打枪，使敌人注意我，你们冲上去。"指导员说这样不行，等 40 火箭筒上来打了以后再上去，如果指导员同意他的意见，这个战士就会牺牲的。他想以自己的牺牲来取得战斗的胜利。另外一个战士很灵活。刚才我讲的那个 07 高地战斗，一个营长带四、五十人下去，下去到了格里牙比河沟口。我们一个副连长带着一个排搜索，碰到了一股敌人。因为草很深，不大好看，敌人发现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战士发现了敌人架机关枪。他一看说："副连长隐蔽"就一枪把那个架机关枪射手打死了。如果那个战士晚那么几秒钟，副连长就牺牲了，战士也得牺牲。这战士往前一跳，又发现敌人，他啪的又一枪。

我们现在的装备很好，全部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我们部队已经没有那种拉枪栓的步枪，拉枪栓的就不行了，因为都在跟前，几公尺、十几公尺，只要快打就行了嘛。我们的部队通通是改了装的，三个师都改了装。连队是自动枪、办自动枪、班用轻机枪，所以打得敌人是非常害怕的。一打敌人就害怕，就叫唤说："不得了，中国军队的装备太强，顶不住。"他发电报回去。我们战士非常灵活，那几个人全部被消灭，营长被我们抓住了。敌人就笨，他机械执行命令，我们俘虏敌人了嘛，他们才笨呢。他这是地堡，这是一个地堡，这也是个地堡，我们打这个地堡，按道理讲他们要支援才对呀。他不支援，他也不走，也不打。我问他为什么不打呢？他说上面没有交待，也没有人叫我打，我说你们不打也得跑呀，他说也不行，因为上面没有叫我们跑。所以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非常要紧的，敌人和我们对比起来，根本不行。我们的战士灵活，这个战士立了功，他抓住了营长嘛，当然不仅他一个人啦，可是他的作用很大。

另外一个战士攻打 07 高地时，真是感动。攻击开始呢，他付了重伤，因为在山地救急，是困难的。在山地作战从长远来看，东南亚地区作战，深山密林、寒带热带，山上抢救工作任务很重。我们这次有些人是可以不牺牲的，没有办法，抬不下来，救急包没有，一个人一个，卫生队上不去，所以有些战士就牺牲了。以后这个人的肠子被手榴弹弹片打出来了，打出来了他就往里塞，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就一手拿手榴弹，向敌人冲去，最后他牺牲了，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勇敢。

另外还有一个排长，80 高地一个排长，这个排长组织指挥比较好。整个瓦弄地区作战，干部在战场上勇敢。但我们组织战斗不行。所以我们在带兵过程中，强调细致组织战斗，怎么打怎样组织，打一个地方组织一个地方，打一点组织一点，攻击必须是这样。我们这次从军、师、团、营和连都不行，都很差。像 06 高地的指导员，我们这次指挥很勇敢，往前打

就是了。388 团一连长勇敢，带着一个班往前冲。战士们说：看到我们连长勇敢，我们浑身是胆，我们也不怕了。新兵勇敢得很，可是呢，他组织火力攻击不行。那么这个排长在指挥上就比较好，他组织攻击，攻击过程中他负了伤，战士说排长你负伤了，我们给你包扎一下。他说：你们不要管我，继续往前冲，第二次又负伤了，还是往前冲，到最后还有一个地堡到顶了，负了重伤，牺牲了。这个排长在战斗过程中，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快要牺牲前，他讲了几句话："这仗打得好呀，同志们很勇敢呀，很光荣呀，我也很光荣呀！"说完就牺牲了。对战士们鼓舞很大。

还有一个战士腿打断了，是个机枪射手，别人都走了嘛，指导员看他。他问指导员，我们那个班到哪里了？他不问别的，专问这个。然后他压弹夹，说："指导员给你。"这个战士牺牲了。所以在山上负重伤的大都牺牲了，假如条件好一些呢，我们可以少牺牲一些人。这次战士很英勇，人自为战。

另外，我们认为"三三制"是非常正确的。森林地区的确有时候有些困难，你听到打枪，但看不见人。刚才我们讲那个 6 连 2 排，他离团离得不远，可就是看不到他在哪里。所以，我们这次打瓦弄扎公的 388 团 1 连，主要是在于他们"三三制"小组搞得好。在 32 高地、06 高地、80 高地，这些部队的班一下战斗动作都是比较好的。这些问题在我们部队一直是很好的，坚持了的，没有停过。

这些战士很勇敢。所以一些西方报纸评论我们部队，当然中印边境作战的反映不光是瓦弄啦，主要是达旺的方向，也有瓦弄的一点。我现在念一些反映：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它反映这样一个问题："五天时间就穿过了一般认为挑夫需要几天才能走过的荒凉山脊。"西德《世界报》说："中国人在过去数星期所做到的空前的军事成就，他们派军队翻越了以前登山队也很难爬上去的高山。"香港《南华早报》："林彪元帅证明世界上最大的堡垒只不过是小小的障碍，一下子就可以推开。"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像小刀切黄油一样"（指中国打印度）。西德《世界报》："简直像风卷残菜那样击败印军。"香港《明报》在评论我部队主动停火后撤和移交武器时说："史无前例，潇洒至极，漂亮至极。"法国报纸也评论说："中国军队和印度军队打，只是教训它而已，教训它一下。印度军队更不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这是西方报纸的评论。外国舆论就是这样的。我在沈阳讲、在广州也讲，说：我们五十四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讲，我们是三等部队，我们战斗力比人家差。如果叫你们沈阳部队或者广州部队、或者其他军区的野战军去打更容易。我们三等部队就打得他落花流水，要是你们一等部队去更不在话下。所以不敌的战士们打的是很英勇的，部队的实例就讲完了。（鼓掌）

这次战斗整个打了 10 个小时左右。经过 10 个小时战斗后，敌人就溃了。那时天黑了，打了一天的仗，我们抓到的俘虏很少，敌人哪里去了呢？因为山高林密、石多草深，他们藏起来了。有的是有组织的三、五十个人，有的是美誉哦组织的散兵。据达旺方向对敌人的调查，他们有一条规定说：打不赢的时候，可以散、可以藏，然后跑回去，这是条令上允许的。这个条令我们没有看到。

敌人散了，我们就搜山。这个地形，我们上去很困难，3000 公尺要上四、五个小时，我们上去困难是一方面，敌人想下来也是困难。所以我们打下去后呢，它也跑不了。敌人散了，我们就动员所有部队搜山，我们报告了总参谋部说我们要搜山。总参也指示我们准备另外一个地区的作战，到前门里，又前进了 100 多公里，走路要走八天。当时我们很高兴，准备组织第二个战役。以后中央决定停火，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计划了。

这次搜山有很多问题，当时我们下命令，战士只许穿棉衣、单裤、胶鞋，其他的都不能带，因为负荷太重，山很高。到了山上还是非常之冷的，在山上作战衣服都刮破了，很冷。

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呢，上山带的粮食掉了，有的是米袋刮破了，漏了。粮食很少，副食品当然就更说不上了。这样饥寒交加，部队极端的疲劳，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就不吃。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没有怨言。越是艰苦、越是困难，越是团结。我们有的战士剩下半碗炒面，他舍不得吃呀。他说：连长，我这半碗炒面给你吃吧，因为你是一连之长嘛，要操心、要指挥；连长也没有吃，送给扛机枪的；扛机枪的他也没有吃，结果这半碗炒面大家都没有吃，大家很团结。有些是别人的衣服破了呀，他把衣服给别人穿。

这种情况下，大家在山上凑了一首诗，很好的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这首诗是这样的：

瓦弄反击战，昼夜翻大山。上山爬着走，浑身冒大汗。

下山滑着行，两腿打颤颤。也来围松火，个个笑声欢。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挖来鱼腥草，当菜又当饭。

白雪拌糌粑，胜过大会餐。官兵团结紧，困难只等闲。

当上解放军，是个党团员。消灭侵略者，责任重如山。

再苦也不苦，再难也不难。

这是实际情况，因为山很高。上山，前面的脚跟正好碰到后面的脑袋，下山脚发软，山是非常陡。战士们很艰苦，但没有怨言，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多抓一个俘虏，就多一份胜利；多拣 1 条枪，就多一份胜利。当时我们提出搜山是进攻的继续。为什么？因为有敌人还想抵抗、还想打。在搜山过程中，我们 388 团 3 连打了个莽撞仗。他们连长、指导员带着部队进行搜索，发现了敌人，敌人有四、五十人。连长带着一个排到上面去了，是台地，指导员在底下。这个指导员没有战斗经验，按道理敌人依山向我们打枪，这时应当选好地形，居高临下往下打。他不这样，他正好向左，左边就是察隅河滩，他带一个排从这里去，一去敌人就躲在石头后面、草丛里面打枪。结果在这个地方我们伤亡 20 多人，指导员也牺牲了。什么问题呢？莽撞仗！这个指导员没有军事常识，所以政治干部学军事，哪一级也很重要。后来有的战士反映："打仗呀，这个指导员不行，不会指挥。"这个指导员是很勇敢的，是很好的指导员，结果牺牲了。所以说，当时搜山是进攻的继续，还是要打的。

达旺方向也是这样。张国华司令员说：从我们这里看呢，将来和外国军队作战，森林地带、语言不通，所以搜山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阶段。所以一方面组织战役 hide 指挥员要交代部队，将敌打散后要迅速搜；另外要预先准备好些部队，专门用于搜山，这样才能全歼敌人。因为这和国内作战不一样，在国内你可以喊话呀，那个地方没办法，只能搜，到处去找，找到一个目标算一个。我们不能喊话，他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话。所以抓俘虏还是很难的，找到一个抓一个，你想他一片一片的自动投诚是没有的。我们把他围住了，那他没有办法，二、三是各，三、五十个是有的。几百个，我们这个方向是没有的。

搜山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搜山是进攻的继续，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有详细和总参谋部汇报，不知道这个话是对还是错。整个的战斗过程就是这样。敌人基本被我们消灭，没有全部消灭。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论什么困难、什么艰苦的情况下，有我们党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苦难的克服，有时候是有条件的，不能克服怎么办？就忍耐！战斗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是有很大

的政治性、很强的政策性，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争取军政双胜。我现在谈这么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俘虏政策；一个是群众纪律问题。

俘虏开始对我们很恐惧，认为我们把他们抓来以后呢，我们会枪毙他们，他们很恐惧。当时他们在山上躲起来，寻死的、跳崖的都有，原因都是害怕。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他们不要恐惧，不要害怕，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枪毙他。我们搜山呢，敌人他饿了呀，饿了一、两天，抓到他以后，他就指身上，问我们是否枪毙他们？我们也用手比划，说不会枪毙。有的把表给我们，战士就不要他的。接着他就拍肚子，什么意思呢？说肚子饿了，要吃的。我们搜山的部队，吃的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就是糌粑面。到了一些给他们吃，然后把他们带下山去，集中起来就好办了些呀。给他们讲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更好办些了，吃的解决了。

他们的东西我们一点也不要。这个印度军队是很穷的，我们和许多军队打过仗，没有看到过这样穷的军队，和他那个军队作战呀，发不到什么洋财。我们除不要他的东西以外，还要给他们发全套的东西：棉衣、毛巾、肥皂都要给他发。他来时穿一件绒衣、一件大衣、一套单衣，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要把他们往北送呀，所以首先带了棉衣去。抓下来以后呢，给他吃饱了，讲讲政策，就给他们发衣服，这样他们情绪就安定下来了。再往后走就更好，翻译多了些，给他们上政治课。我们还按着他们的习惯，因为印度他又 2 种习惯，一种是吃大米饭，另外一种是吃油饼。这些我们都可以满足，还可以给他们搞些娱乐活动：打排球、篮球、放电影，这些工作一做，他们反映很好。

可以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有个印军少校他给我们讲："我们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我们部队会这样快被你们消灭；第二个想不到你们的政策会这样好。"因为他们印度军队战斗力不算强，他走过很多地方，他在别的地方当过人家的俘虏，他也看过俘虏，人家对他们俘虏是怎么样，我们对他们又怎么样，一对比他想不到。还有些人说："战前我恨你们中国人，现在不恨了，而且我愿意一辈子当中国人的俘虏。"有些人讲："我们当你们中国人的俘虏真是幸福。"有一次我们和他们很多人说："你们回去了啊，你们将来回去干什么呢？他说："我们回去恐怕还要当兵。"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当兵呢？"他说："我们不当兵干什么呢？种地没有地，做工没有工作，只好当兵，当兵是我们的职业。""那你们当兵，尼赫鲁还要你们打我们怎么办呢？""他还要我们打你们中国人的话，我们就要插白旗。"看来插白棋投降是世界通用的。他说："我们插白棋投降，因为你们对我们太好了，还发给我们这么多东西。"同时，他还说："你们的大油饼烙得好吃，我还要回来吃你们的大油饼。"有的人还讲："我回去以后呀，我要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祷告，祝你们长寿。我还要对许多人讲，中国人民是非常热爱和平的，中国军队对我们好。"

还有一个印军班长，在他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把他救活了。后来他讲："你们不但救了我一个人，而且救了我一家人，我家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我回去以后要教育我的两个孩子永远同中国友好。"他们很感动。另外还有写诗的说："泉水可干，高山可移，你们可以忘记我们，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的恩情。"俘虏反映是很好的。也有人发誓："我是一个印度人，恒河的水是最纯洁的，我可以捧着恒河的水向中国人民发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最愉快的、最美好的。就是尼赫鲁，我也要对他这样讲。"他很激动地举起手来这样讲。虽然我们当时语言不通，但通过这些实际行动感化他、教育他，效果很大。我们放回去的俘虏有三千多人呀！校官就有好几十个，直到现在，讲文明坏话的人一个也没有看到。《参考消息》也没有看到呀。这样尼赫鲁很为难呀，几千个俘虏，放他不能放，用他也不能用，不还在那里关着呢！他在洗脑筋，那个是不容易洗的呀。我们这是精神原子弹打过去了呀，你好洗吗。这是俘虏反映。所以和外国军队作战，俘虏政策要很好交代。

再一个是群众。群众是族，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不会计较。我问他们多大岁数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没有数字呀。我们开始去，他不太了解，有点害怕，有的躲在山上。我们从瓦弄到传统习惯线，这些地方多数都是族。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有辣椒。那个地方辣椒又很多，还有些稻子、水果。战士不吃他们的东西，不住他们的房子，他们丢下的牛，我们给他很好看管，还给他们担水呀、捡柴呀。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呀，山上的人下来了，群众是很好的。在搜山期间，他们向我们报告了十几次情况，抓到了 40 多个俘虏。不懂话，他就用手比划，他一比划我们就去，很可靠。

在沙木维尔地方有一个溜索桥，我们一个班在那里放哨。一天，一个老汉往那里经过，看样子饿得很厉害。一个战士就给了他一碗炒面吃，他吃过就走了，他也不会说什么话。第二天，他和他儿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抓来一个俘虏，五花大绑，直接送到桥头这个班来了。在路上，我们叫他给我们，他不干，硬要送给那个班。他们很耿直，很讲信用。所以政策纪律很重要。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以后，传统习惯线那边的族也三三两两的来看我们。有二次，一个类似村长这样的人，带上一、二十人过来，拿着鸡蛋之类、香蕉、红薯呀给我们吃，要我们过去解放他们。我们说不行。因为总参谋部有规定，只能到那里，不能过去。我们说："你们那边是印度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能过去。"他们说："我们本来不是印度人，我们长期和你们一样。"他说："古代有一个传说，你们（指我们）是龙族，藏族是龙身，族是龙尾，所以我们是一家人。"他说："你们过去吧，你们要是怕没有饭吃，我们那个村子可以供给你们这些人吃两天的饭（当时我们住在那里一个连），我们可以给你们杀牛。"

印度群众几次要求我们过去，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很好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明年是拥护我们的，是要革命的。在那里，我们并没有做更多的工作。主要是用我们的这个行动，他就要求我们过去。要是我们不撤回来，住在那里，那边很可能要搞起游击战争。因为就隔一条河，那地方是阿隆姆地区，山区搞革命是很好搞起来的。所以人民是要革命的，这对我们部队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感到政策纪律很重要，搞好了就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人。

整个部队的群众纪律是很好的，可是就我们领导上不好。从我来讲，在整个作战中，最后一手没有搞好，前紧后松。可是要注意啊，因为我们 130 师在西藏平叛时政策纪律是受过批评的。所以这次去就要求打好仗，要执行好政策纪律，要和友军搞好团结。最后仗打完了，工作也办完了，这很好呀！我们这个军指挥所却犯了错误了。一个呢，敌人败的时候，丢了一些东西，什么牛呀、粮食呀、罐头呀，我们在前面的人就允许他们吃了，我们做了检讨。因为当时我们的确很困难，伤兵没有饭吃，就发给他们吃吧。今年"五反"我们做了检讨，这个问题检讨是检讨，我还没有完全解决。在那个环境下，伤兵那样苦，不给他吃点东西，我们当时心里确实过不去。不过还是由于当时抓得不紧，如果我们再硬一点，和开始作战时那样硬，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仗都打完了，在这个时候忍耐一下不可以？完全可以。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没有什么意见，诚心诚意的检讨。敌人丢了很多降落伞，他那个降落伞是布的，掉在树上挂破了。他们和我讲，山上有很多降落伞，怎么办？我说捡回来，现在补票困难嘛，拿回去给我们干部不是解决问题嘛。嘿！这句话说坏了，拿回去他们就分了吧，也分了给我，我也要呀，因为我也困难呀。这个降落伞就搞坏了吧，所以这一条，我当时就缺乏考虑，影响非常之坏。干部拿了降落伞，战士们有意见呀。战士拿什么呢？连一盒烟都不能抽呀。这两件事情我做了检讨，这一条，是完全错误的，有点洋财观念。至于个人拿东西，这次在 130 师没有出现，就这么两件大事。

因为那降落伞呢，后来 388 团又犯了错误。他们在战场上收了铜子弹壳和炮弹壳，敌人丢下来的呀，都拣起来了。他们开始讲，我们拿回去。将来练兵要用，这是好意吧，回到四川他拿去卖了。你看这家伙，他作检讨你也做检讨，向西南局、四川省委检讨。我们犯错误，牵涉到地方也犯错误，县里面和我们挂了钩，我们犯错误，牵扯到他们。所以执行政策纪律要防止前紧后松。在一个地区作战，你看像我这个人，到北京来当然不在话下呀，就不算什么呀！在那里的前线呀，我们这样的就说话算话，就不敢随便说了呀。我呢就不大注意，随便说了一句就坏事了。所以一个战场指挥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政策上是不能随便说话的，不能随便表示态度的。

这次政策纪律 130 师整个来说是好的。因为 130 师解放战争时期政策记录不好，西藏 3 年平叛不好。本来它这次可以好的，因为我弄了这么一下，犯了这个错误。它整个是不错的，这些都是领导问题，不是战士的问题，也不是下面干部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政策纪律就汇报这些情况。

（下略）

（任远宁、萧虹根据录音整理）

①这里所称的中印边境部分地区自卫反击作战，指瓦弄地区自卫反击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高原严寒，森林峡谷地形条件下作战的典型战例。1962 年 10 月 28 日，中央军委、总参电令组成由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丁指，统一指挥陆军第一三〇师、昌都军分区前指所辖部队以及其他加强部队，共四个团的兵力，对入侵中印边境东段中方瓦弄地区之敌印军十一旅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战斗于 11 月 16 日 4 时 40 分发起，经过 10 小时激战，印军前沿主要阵地绝大部分被攻克，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和第十一旅旅长，带部分人员于 14 时许乘飞机逃跑。至 20 时 40 分，解放军全部攻占瓦弄，瓦弄之印军除被歼一部外，大部溃逃在高山峡谷、深山老林之中。自 11 月 17 日起，丁指部队除以一部兵力实施追击外，其余部队转入搜剿作战。12 月 1 日，前线各部队奉军委命令开始后撤。

此次作战历时 21 天，共歼灭入侵瓦弄地区印军库马盎第六营、廓尔喀第三营、道格拉第四营全部、锡克营大部和第十一旅直属分队第 1256 人，其中击毙道格拉第四营中校营长一下 754 人，俘库马盎第六营及廓尔喀第三营中校营长一下 502 人。击落、缴获印军飞机各 1 架，缴获 51 口径以上火炮 62 门，各种枪 809 枝（挺），炮弹 1 万余发，枪弹 100 余万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 13 号

被告人丁盛，男，现年六十九岁，江西省于都县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三〇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因与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停职审查至今。

被告人丁盛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审查，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丁盛犯有以下罪行：

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七万余件，炮三百门，子弹、炮弹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徐景贤关于丁盛与马、徐、王密谈和给上海民兵发武器情况的汇报后，对徐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于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他们的武装叛乱没有得逞。

上述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丁盛，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鉴于被告人丁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决定免予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印）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

我的申诉

1982 年 7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军事检察院”）对我发出

（82）军检免字第 13 号《免予起诉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认定我“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随后，总政治部和军纪委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批准对我作出开除党籍、退出现役的处理，每月发给生活费 150 元（1985 年后调整为 200 元）；继而南京军区将我送到南昌市一个地方干休所安置。我认为，军事检察院对我的指控缺乏事实根据，认定的罪名不能成立；对我的处理也不符合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根据党一贯倡导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谨作如下申诉，请求对我的问题予以覆查。

军事检察院对我定罪的唯一根据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供词。《决定书》称，1976 年 8 月 8 日晚，马、徐、王三人来上海延安饭店看我时，同我进行了“密谈”，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问题。据说，我曾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据说，我还向他们三人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由于我的这次谈话，“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七万余件，炮三百门，子弹、炮弹一千多万发”，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当上述供词纯属编造，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首先，我与他们素无交往，更无好感，根本不可能同他们密谈。我从 1973 年底调南京军区工作后，曾多次因工作关系路过上海，但我从未通知过上海市委，更未主动拜访市委的任何头头，即可说明此点。1976 年 8 月初，我去杭州湾检查军区组织抗登陆演习的准备工作情况，后又去舟山群岛勘察，于 8 月 8 日黄昏返抵上海。接待我的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曾问我：“上海市委规定，凡大军区负责人到上海都要向市委报告。今天你来了，是否也向上海市委打个招呼？”我当即表示“不要”。到了延安饭店我吃过饭、洗了澡正准备睡觉，忽然秘书陈长顺进来对我说：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说，明天上海的专家要给廖政委会诊，廖怕医院不重视，他自己又不好讲话，希望我亲自给上海市委领导打个招呼，请予关照。廖汉生同志当时患有皮肤病，病情较重，是专程来上海求医的，也住延安饭店，卧倒后已看望了他。但当时他并未向我提出此事。我应廖之请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请值班员向市委领导转达廖的要求。不久，市委办公室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已向马天水作了报告；并说，马和徐景贤、王秀珍要来看我。我婉言劝阻无效，只好等候，他们三人大约是 22 时左右来的，稍事寒暄之后，我主动向他们谈了在舟山群岛勘察的情况，还讲了将来在杭州湾演习时，因全军参观人员很多，大部分经上海中转，在住房用车和物资供应方面需请地方支持。他们三人表示不成问题，他们并谈了上海市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即陪他们去看了廖汉生同志（廖当时行动不便），前后约有一个小时，他们便告辞了。所谓 8 月 8 日我与马、徐、王“密谈”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如果我真如《决定书》所说是什么“积极投靠”，与江青集团有什么“密谋”，这次谈话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从开始就没想见马天水等人，“密谈”从何谈起？廖汉生同志当能为我作证。

《决定书》在讲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内容时，主要指出我对六十军的看法。如果说，我对六十军“最不放心”，认为这个军“指挥不动”，那岂不是说我对南京军区的其他几个军就很“放心”，就“指挥得动”了吗？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纪律的军队，如果想要军队参加叛乱活动，那么，无论什么人，就连一个排，一个班也是指挥不动的；如果是执行上级特别是中央和军委下达的任务，根本不存在哪个指挥得动，哪个指挥不动的问题。

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六十军的 178 师原驻苏北淮阴，正是我在军委常委上的建议，

经军委批准，才于 1976 年上半年调到无锡的，六十军军部也从浦口南调镇江。如果我真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伙，又对六十军“最不放心”，这样做岂不是自作自受、愚不可及？

至于说我“准备杀头”，更是耸人听闻。谈话时毛主席还在世，我也根本不知道他的病情，自己跟没有做什么不容于党纪国法的事情，怎么会想到“杀头”上去？

《决定书》讲马天水等人把大批武器弹药发给上海民兵一事同我的谈话联系起来，更是十分牵强。众所周知，“四人帮”早在几年之前就利用上海强大的工业基础，大量制造各种武器装备，不断装备他们控制的民兵。8 月份发的那批武器弹药，是他们早已决定了的。中共中央 1976 年 12 月 10 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已有明确论断：“今年 6 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8 月下旬以后，突击发了各种枪、炮 74000 余件，弹药 1000 万余发。”（见该材料 112 页）《决定书》却硬把王洪文的罪行按到我的头上了。

前面讲到，军事检察院对我定罪的唯一根据是马、徐、王三人的供词。这三人中，马天水是道德沦丧、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政治投机分子，而徐景贤、王秀珍则是冲杀出来的“造反派”头头，编造谎言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栽赃诬陷，嫁祸于我，以图减轻他们的罪责，这是毫不奇怪的。办我专案的人员强调他们三人的口供“一致”。据了解，他们三人受审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隔离，要串供是很容易的。再举个例子，办案人员曾要我承认，据马、徐、王揭发，我曾对他们讲过，1974 年“批林批孔”时，我妻子在广州军区挨整，是江青说了话才保出来的。其实，我妻子在 1974 年 1 月便到了南京，而“批林批孔”是三月份以后的事。由此可见马、徐、王等卑鄙下流之一斑。

《决定书》还笼统地提到我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关于我与林彪等人的关系，在“九一三”事件后，我曾多次向中央做过说明、检查，认为自己同他们是工作关系，“文革”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我的检查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肯定，这里不再赘述。

我从 1977 年 3 月被停职审查，其中从当年 11 月 5 日至 1979 年 4 月 14 日，1980 年 10 月 6 日至次年 5 月 9 日，被关押达两年之久，直到 1982 年对我作出正式处理，这中间没有哪一位负责同志（包括军区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几个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带着任务、带着框框办案，根本不听我的申诉，对我提出的反证一概斥之为“狡辩”、“不老实”。这不仅有悖于党的干部政策，也违反了依法办事的精神，必然导致错误的定性处理。附带说明一下：对我的行政处理和党纪处分决定，都是分别由机关工作人员口头通知我的，至今我也未看到正式文件。我从被停职至今已有 13 年，被正式处理也将近 8 年。作为一个受党教育 60 年的老党员、老干部，我认为个人的荣誉得失无足轻重，但是非必须弄清，这是关乎党的形象的大问题。今年我已 77 岁，来日无多。我渴求党组织和有关机关本着对党员、对干部、对公民高度关心负责的精神，在我有生之年，趁有关当事人多还在世，对我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覆查，然后根据事实做出公正的结论和处理。这将使我和许多人都从中受到深刻教育。

申诉人：丁盛 1990 年 3 月

关于丁盛同志要找聂帅面报情况的证明

1991 年秋天，我的同乡同学王培昆同志找我，说是丁盛同志有事向聂帅报告，原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政治学院院长林浩同志要我协助一下。为此，丁盛同志可先同我面谈一次。我知道丁盛同志是聂帅的老部下、老红军，是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所以在王培昆同志的陪同下，我到西郊海军招待所面见了丁盛同志。丁谈了他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遭遇，希望向聂帅申诉，以求得妥善解决此事。我听后感到事关重大，建议丁盛同志先写封信，我报告聂帅后再定如何办。信比较短，我记得大意是说，粉碎“四人帮”阴谋后，组织上在审查上海市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等企图配合“四人帮”的阴谋，曾有给上海民兵发枪等活动，说枪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同志发给的，而且丁还表态支持“四人帮”，实际上此事与丁盛同志无关，纯属冤枉。我回到办公室，就向聂帅面报了此事。聂帅很重视，看了丁盛同志的信，然后面示说（大意）：我从（1968 年 10 月）被定性为“二月逆流”成员后，就一直处于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境地，不了解“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内情，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工作，虽然看了有关“四人帮”的材料，但对于他们阴谋活动的纤细情况，仍不很了解。我知道，丁盛同志过去战争年代作战指挥是很英勇的，和平时期的工作表现也是好的，文革中他在南京军区的情况我不怎么了解，尤其是他信中说的情况，我更不清楚，难以表示肯定的意见。面谈就不必了，我不便表态，但确实事关重大，这封信你就转给刘华清、杨白冰同志，请他们认真阅处。遵照聂帅指示，我将丁盛同志的信，及聂帅面示的大意写出文字，一并转给了刘华清、杨白冰同志。我把大体经过转告了王培昆同志。以后我就未再过问此事。聂帅逝世后，聂帅办公室的文档经过几次清理，大部分销毁了，所以难以找到确切的证明，但我记的大意是不会有大的出入的。特此证明。

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正军职秘书

周均伦

2007 年 10 月 6 日

一腔悲愤谁诉

记丁盛将军晚年

池泽厚

1976 年 10 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 1974 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 年 3 月 24 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 7 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1970 年，四十七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之鼻息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1972 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磨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

1980 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作的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80 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 月 1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出的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 年 8 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 60 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

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 74220 支、炮 300 门、各种弹药 1000 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于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 60 军？要知道，60 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 60 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 1 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作战场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作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 1 年零 8 个月。1982 年 7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 1980 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　“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　，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 1977 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 150 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 1984 年 7 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 年 9 月 18 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 10 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

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

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 年 8 月，我所在的四野第 48 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 45 军 135 师师长。1960 年，丁盛率由 44 军和 45 军整编而成的 54 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并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 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从 1951 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 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 年 8 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于 1976 年 8 月 8 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 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 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于他指挥不动 60 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 年 12 月 10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 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于 60 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1989 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

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 年 2 月 27 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 5 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 91 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 1967 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于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于他讲了 60 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于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1998 年 4 月 14 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系，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于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并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5 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于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 1976 年 8 月 8

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并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并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 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抟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 月 20 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他。他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ＸＸ局Ｘ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 1969 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于 22 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 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并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1993 年 8 月 2 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 50 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 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终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1984 年 10 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54 军和原 45 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系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54 军和原 45 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54 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 20 人。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 80 年代丁盛那 150 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 年 8 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坐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 80 岁，那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 年 4 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 7 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 1 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 3 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 115 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

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 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 30 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最后的关怀　最后的遗憾

1998 年 8 月，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 98 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 1962 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 85 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 5 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

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 1999 年 1 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于来信了。跟 5 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届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于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7 月 11 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复，便突然病倒了。8 月 26 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

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9 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他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处理他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时间的优势不在他手里，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为此焦急。但他坚信，只要是共产党，迟早总会给他平反。

9 月 22 日，在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中体力严重超支，最后 20 年又备受屈辱，早已心力交瘁的丁盛，病情急剧恶化。医院把包括锺南山院士在内的广州几位著名专家请来会诊，最终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9 月 25 日，丁盛与世长辞。在丁盛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们曾给军委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丁盛的病情，并请求为丁盛平反，让这个一直心在共产党、心在军队的老战士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这封信也没有结果。

困惑与反思

丁盛去了，他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了。斯人虽逝，却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发人深省的问

题。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丁盛究竟为什么遭难？很多人认为，丁盛是在劫难逃。他长期在林彪、黄永胜领导下工作，在衡宝战役中率孤军插入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奖，以后又继黄永胜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些原本辉煌的历史，当毛泽东把林彪视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之后，对丁盛就很不美妙了。1971 年 8 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曾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话绝不是随便说的。丁盛不该忘记，当时华国锋就在现场，他是以善于揣摩、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而著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四野干部受到审查、处理，但因毛泽东曾讲过丁盛、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们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所不同的是，刘、卜被划入“林彪反党集团”，而丁盛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分子。为什么要把丁盛和“四人帮”弄到一起？有人认为，这是形势使然，斗争需要，符合“大方向”。这样有助于深揭和坐实“四人帮”图谋掌控军队的野心。更何况丁盛在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浅，他在南京又是个“外来户”，只要上面给他定性、点名，不愁众人不一拥而上——当年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无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说，丁盛这人说话、做事太冲，不会拐弯，不懂韬晦，有些人（当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对他不满，他却浑然不觉。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儿，但绝没想到他会成为“四人帮”分子，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来时，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丁盛）的话有记录可查”；以后，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也说，丁盛的“罪状”“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亲属如何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却始终不肯拿出为丁盛定罪的任何证据。这不仅使丁盛和他的亲属不服，许多关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诧异：既然丁盛不肯认罪，又申诉不断，何不把证据亮出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既可让丁盛老实认罪，又可教育广大群众！

丁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多数情况下不予置理，当不得不答复时，则说：上面有“精神”，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的，一律不再处理。这就奇了，且不说“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确，是一种极左政治术语，关键是这两次“路线斗争”情况极为复杂，谁敢保证件件处理正确？倘若错了，为什么却“一律不再处理”？不是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吗？不是讲“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吗？不是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于说什么“安定团结”，岂不知物极必反，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明知有问题而置之不理，只会增加动乱因素，何来安定团结！

丁盛的遭遇令许多老干部为之不平，更有人为之奔走呼吁，虽然收效甚微，却让丁盛深受感动，得到莫大宽慰。这些人几乎都是已离休的无权者，因而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尽管可能反映民意，却未必能引起重视。而一些当权者，则对此事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冷漠的态度。特别是有几位丁盛当年的部属，在丁盛申诉的后期都位居要津，他们对丁盛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也应该看到丁盛的申诉材料。他们确实无权为丁盛彻底平反，但也绝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然而，可能是为了避嫌，他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这是否也是中国特色？

尾声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丁盛是个有公民权

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尽忠，为共产党打江山，自然应该为他开个追悼会。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答复：主要由亲属办理。既开追悼会，就得发讣告，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的横幅该如何称呼丁盛？亲属按惯例拟写“丁盛同志”，不料，过去对丁盛的申诉或者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得出奇的有关方面，这次却反应奇快：不能称同志！为什么？没作解释。那么，丁盛是 1955 年授衔的少将，“决定书”并没宣布剥夺他的军衔，可否称为将军？也不行！丁盛是 1930 年的红军，他出事之后南京军区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现役”，并没说开除军籍，称老红军总可以吧？答复还是不行！丁盛的妻子儿女们一起商议该怎么办，大家都犯难了，总不能就叫丁盛吧？我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家庭会议。我搜索枯肠，提了个意见：中国有尊老传统，老作家巴金、冰心，他们晚年大家都尊称为巴金老人、冰心老人，一位著名女歌手唱的一首歌中，也称邓小平为老人，我看就叫“丁盛老人”吧！大家议了一阵子，虽然觉得不太理想，最后还是都同意了。不少人认为有关方面的决定太不近人情。有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老人”的称呼也是官方定的，以鄙夷、揶揄的口气说：“哼！真想得出，来个‘丁盛老人’！”我听到后赶紧声明，这是我的建议。对方马上换了口气：“你还真能发明创造呀！”我只能苦笑。

199 年 10 月 7 日，“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在黄花岗殡仪馆大厅举行。几百人挤满了大厅。参加者都是自发来的，不少人来自外地。没有在职的领导干部到场。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花圈飘带上写的对丁盛的称呼因吊唁者的身份而异：同志、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丁盛老人”。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这是毛泽东于 1967 年 5 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两个反映“支左”情况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两个单位对“造反派”支持不力，要求军队改变观念，跟上形势，真心支“左”。毛泽东的批示是不对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作了结论，毛泽东在作批示后仅一年多时间，便也公开表示不再支持“造反派”了。但是，此话的一般道理还是对的。用于对丁盛问题的处理也很贴切，有针对性。所以，我用此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2008 年 3 月 5 日上午于广州

后记

本书的主体——丁盛将军回忆录，系根据将军生前于 1990 年代中期两次长时间谈话录音整理而成。其时，将军身处逆境已近二十载，身边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资料，全凭对历史强烈的责任感和过人的记忆力，将五十年战斗生涯的艰辛，二十年不白之冤的磨难，一一叙述，几无错漏，殊为不易！

将军的谈话录音，经金光记录、整理成文字，曾于 2001 年自信印刷，在战友中内部传阅。该自印本保留了将军的语言风格，体现了将军的性格特征，读来确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受丁盛亲属的委托，本人近半年来对自印本进行了史实和文字上的订正，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记录将军一生征程的珍贵历史照片及附录文字。惟愿本书的公开出版，能理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将军一个公道，以告慰于将军的在天之灵。

回忆录的再整理和校对、注释工作，得到了迟泽厚、余樵、曾鸣诸前辈的襄助，将军的亲属和原秘书陈宏康先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照片，周均伦先生为将军晚年的坎坷经历提供了证言材料，尤其是迟泽厚先生拨冗为本书写了情深意切的《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对于以上各位前辈的支持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资料所限，本书再整理及编注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阅后给予批评指正。

余汝信

2008 年 5 月

